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

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之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

下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

有些人在生病的時候或煩惱的時候，拿過一本詩來翻讀，偶爾也朗吟幾首，便會覺得心上平靜些，輕鬆些。這是一種消遣，但跟玩骨牌或紙牌等等不同，那些大概只是碰碰運氣。跟讀筆記一類書也不同，那些書可以給人新的知識和趣味，但不直接調平情感。讀小說在這些時候大概祇注意在故事上，直接調平情感的效用也不如詩。詩是抒情的，直接訴諸情感，又是節奏的，同時直接訴諸感覺，又是最經濟的，語短而意長。具備這些條件，讀了心上容易平靜輕鬆，也是當然。自來說，詩可以陶冶性情，這句話不錯。

但是詩決不祇是一種消遣，正如筆記一類書和小說等不是的一樣。詩調平情感，也就是節制情感。詩裏的喜怒哀樂跟實生活裏的喜怒哀樂不同，這是經過「再團再煉再調和」的。詩人正在喜怒哀樂的時候，決想不到作詩。必得等到他的情感平靜了，他才會吟味那平靜了的情感想到作詩，於是乎運思造句，作成他的詩，這才可以供欣賞。要不然，大笑狂號只教人心緊，有什麼可欣賞的呢？讀詩所欣賞的便是詩裏所表現的那些平靜了的情感。假如是好詩，說的即使怎樣可氣可哀，我們還是不厭百回讀的。在實生活裏便不然，可氣可哀的事我們大概不願重提。這似乎是有私無私或有

我無我的分別，詩裏無我，實生活裏有我。別的文學類型也都有這種情形，不過詩裏更容易見出。讀詩的人直接吟味那無我的情感，欣賞它的發而中節，自己也得到平靜，而且也會漸漸知道節制自己的情感。一方面因爲詩裏的情感是無我的，欣賞起來得設身處地，替人着想。這也可以影響到性情上去。節制自己和替人着想這兩種影響都可以說是人在模倣詩。詩可以陶冶性情，便是這個意思。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敎，也祇該是這個意思。

部定初中國文課程標準「目標」裏有「養成欣賞文藝之興趣」一項，略讀敎材裏有「有注釋之詩歌選本」一項。高中國文課程標準「目標」裏又有「培養學生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一項，關於略讀敎材也有「選讀整部或選本之名著」的話。欣賞文藝，欣賞中國文學名著，都不能忽略讀詩。讀詩家專集不如讀詩歌選本。讀選本雖祇能「嘗鼎一臠」，卻能將各家各派鳥瞰一番；這在中學生是最適宜的，也最需要的。有特殊的選本，有一般的選本。按着特殊的作派選的是前者，按着一般的品味選的是後者。中學生不用說該讀後者。《唐詩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選本。這部詩選很著名，流行最廣，從前是家絃戶誦的書，現在也還是相當普遍的書。但這部選本並不成爲古典；它跟《古文觀止》一樣，只是當年的童蒙書，等於現在的小學用書。不過在現在的敎育制度下，這部書給高中學生讀才合式。無論它從前的地位如何，現在它卻是高中學生最合式的一部詩歌選本。唐代是詩的時代，許多大詩家都在這時代出現，各種詩體也都在這時代發展。這部書選在清代中葉，入選的差不多都

是經過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歷代公認的好詩。雖然以明白易解爲主，並限定詩篇的數目，規模不免狹窄些，卻因此成爲道地的一般的選本，高中學生讀這部書，靠着注釋的幫忙，可以吟味欣賞，收到陶冶性情的益處。

本書是淸乾隆間一位别號蘅塘退士的人編選的。卷首有《題辭》，末尾記着「時乾隆癸未年春日，蘅塘退士題」。乾隆癸未是公元一七六三年，到現在快一百八十年了。有一種刻本「題」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孫洙」兩字，也許是選者的姓名。孫洙的事迹，因爲眼前書少，還不能考出、印證。這件事只好暫時存疑。《題辭》說明編選的旨趣，很簡短，鈔在這裏：

> 世俗兒童就學，卽授《千家詩》，取其易於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製。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成一編，爲家塾課本。俾童而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諺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請以是編驗之。

這裏可見本書是斷代的選本，所選的只是「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就是唐詩中的名作。而又祗「擇其尤要者」，所以只有三百餘首，實數是三百一十首。所謂「尤要者」大概着眼在陶冶性情上。至於以明白易解的爲主，是「家塾課本」的當然，無須特别提及。本書是分體編的，所以說「每體得數十首」。引諺語一方面說明爲什麼只選三百餘首。但編者顯然同時在模倣「三百篇」。《詩經》三百零

五篇,連那有目無詩的六篇算上,共三百一十一篇;本書三百一十首,決不是偶然巧合。編者是怕人笑他僭妄,所以不將這番意思說出。引諺語另一方面敎人熟讀,學會吟詩。我們現在也勸高中學生熟讀,熟讀才眞是吟味,才能欣賞到精微處。但現在卻無須再學作舊體詩了。

本書流傳旣廣,版本極多。原書有注釋和評點,該是出於編者之手。注釋只注事,頗簡當,但不釋義。讀詩首先得了解詩句的文義;不能了解文義,欣賞根本說不上。書中各詩雖然比較明白易懂,又有一些注,但在初學還不免困難。書中的評,在詩的行旁,多半指點作法,說明作意,偶然也品評工拙。點只有句圈和連圈,沒有讀點和密點——密點和連圈都表示好句和關鍵句,並用的時候,圈的比點的更重要或更好。評點大約起於南宋,向來認爲有傷雅道,因爲妨礙讀者欣賞的自由,而且免不了成見或偏見。但是,謹愼的評點,對於初學也未嘗沒有用處。這種評點,可以幫助初學了解詩中各句的意旨,並培養他們欣賞的能力。本書的評點,似乎就有這樣效用。

但是最需要的還是詳細的注釋。道光間,浙江省建德縣(?)人章燮鑒於這個需要,便給本書作注,成《唐詩三百首注疏》一書。他的自跋作於道光甲午,就是公元一八三四年,離蘅塘退士題辭的那年是七十一年。這注本也是「爲家塾子弟起見」,很詳細。有詩人小傳,有事注,有義疏,並明作法,引評語;其中李白詩用王琦《李太白集注》,杜甫詩用仇兆鰲《杜詩詳注》。原書的旁評也留着,但連圈沒有——原刻本並句圈也沒有。書中還增補了一些詩,卻沒有增選詩家。以注書的體例而論,這

部書可以說是駁雜不純，而且不免繁瑣、疏漏、傅會等毛病。書中有「子墨客卿」（名翰，姓不詳）的校正語十來條，都確切可信。但在初學，這卻是一部有益的書。這部書我只見過兩種刻本。一種是原刻本。另一種是坊刻本，四川常見。這種刻本有句圈，書眉增錄各家評語，並附道光丁酉（公元一八三七年）印行的江蘇金壇于慶元的《續選唐詩三百首》。讀《唐詩三百首》用這個本子最好。此外還有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唐詩三百首》，根據蘅塘退士的原本而未印評語。又，世界書局石印《新體廣注唐詩三百首讀本》，每詩後有「注釋」和「作法」兩項。「注釋」注事比原書詳細些；兼釋字義，卻間有誤處。「作法」兼說明作意，還得要領。卷首有《學詩淺說》，大致簡明可看。書中只絕句有連圈，別體只有句圈；絕句連圈處也跟原書不同，似乎是鈔印時隨手加上，不足憑信。

本書編配各體詩，計五言古詩三十三首，樂府七首，七言古詩二十八首，樂府十四首，五言律詩八十首，七言律詩五十首，樂府一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樂府八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樂府九首，共三百一十首。五言古詩和樂府，七言古詩和樂府，兩項總數差不多。五言律詩的數目超出七言律詩和樂府很多；七言絕句和樂府卻又超出五言絕句和樂府很多。這不是編者的偏好，是反映着唐代各體詩發展的情形。五言律詩和七言絕句作的多，可選的也就多。這一層下文還要討論。五，七，古，律，絕的分別都在形式，樂府是題材和作風不同。樂府也等下文再論，先說五，七，古，律，絕

的形式。這些又大別爲兩類：古體詩和近體詩。五、七言古詩屬於前者，五、七言律、絕屬於後者。所謂形式，包括字數和聲調（即節奏），律詩再加對偶一項。五言古詩全篇五言句，七言古詩或全篇七言句，或在七言句當中夾着一些長短句。如李白《廬山謠》開端道：

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又如他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開端道：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笑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這些都是七言古詩。五、七古全篇沒有一定的句數。古、近體詩都得用韻，通常兩句一韻，押在雙句末字；有時也可以一句一韻，開端時便多如此。上面引的第一例裏「丘」「樓」「遊」是韻，兩句間見；第二例裏「留」和「憂」是逐句韻，「憂」和「樓」是隔句韻。古體詩的聲調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七言更其如此，只以讀來順口、聽來順耳爲標準。但順口順耳跟着訓練的不同而有等差，並不是一致的。

近體詩的聲調卻有一定的規律；五、七言絕句還可以用古體詩的聲調，律詩老得跟着規律走。規律的基礎在字調的平仄，字調就是平、上、去、入四聲，上、去、入都是仄聲。五、七言律詩基本的平仄式之一如次：

五律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七律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即使不懂平仄的人也能看出律詩是兩組重複、均齊的節奏所構成，每組裏又自有對稱、重複、變化的地方。節奏本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律詩的平仄式也不外這個理。即使不懂平仄的人只默誦或朗吟這兩個平仄式，也會覺得順口順耳；但這種順口順耳是音樂性的，跟古體詩不同，正和語言跟音樂不同一樣。律詩既有平仄式，就只能有八句，五律是四十字，七律是五十六字——排律不限句數，但本書裏沒有。絕句的平仄式照律詩減半——七絕照七律的前四句——，就是只有一組的節奏。這裏所舉的平仄式只是最基本的，其中有種種繁複的變化。懂得平仄的自然漸漸便會明白。不懂平仄的，只要多讀，熟讀，多朗吟，也能欣賞那些聲調變化的好處，恰像聽戲多的人，不懂板眼，也能分別唱的好壞，不過不大精確就是了。四聲中國人人語言中都有，但要辨別某字是某聲，卻得受過訓練才成。從前的訓練是對對子跟讀四聲表，都在幼小的時候。現在高中學生不能辨別四聲也就是不懂平仄的，大概有十之八九。他們若願意懂，不妨試讀四聲表。這只消從《康熙字典》卷首附載

的《等韻切音指南》裏選些容易讀的四聲如「巴把霸捌」「庚梗更格」之類，得閒就練習，也許不難一旦豁然貫通（中華書局出版的《學詩入門》裏有一個四聲表，似乎還容易讀出，也可用）。律詩還有一項規律，就是中四句得兩兩對偶，這層也在下文論。

初學人讀詩，往往給典故難住。他們一回、兩回不懂，便望而生畏，因畏生懶；這會斷了他們到詩去的路。所以需要注釋。但典故多半只是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用典故跟用比喻往往是一個理，並無深奧可畏之處。不過比喻多取材於眼前的事物，容易了解些罷了。廣義的比喻連典故在內，是詩的主要的生命素；詩的含蓄，詩的多義，詩的暗示力，主要的建築在廣義的比喻上。那些取材於經驗和常識的比喻——一般所謂比喻只指這些——，可以稱爲事物的比喻，跟歷史的比喻、神仙的比喻鼎足而三。這些比喻（廣義，後同）都有三個成分：一，喻依，二，喻體，三，意旨。喻依是作比喻的材料，喻體是被比喻的材料，意旨是比喻的用意所在。先從事物的比喻說起。如「天邊樹若薺」（五古，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薺是喻依，天邊樹是喻體，登山望遠樹，只如薺菜一般，只見樹的小和山的高，是意旨。意旨卻沒有說出。又，「今朝此爲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五古，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世事是喻體，沿洄不得住的波上舟是喻依，惜別難留是意旨——也沒有明白說出。又，「吳姬壓酒勸客嘗」（七古，李白，《金陵酒肆留別》），當壚是喻體，壓酒是喻依，壓酒的「壓」和所謂「壓裝」的「壓」用法一樣，壓酒是使酒的分量加重，更值得「盡觴」

（原詩，「欲行不行各盡觴」）。吳姬當壚，助客酒興是意旨。這裏只說出喻依。又，「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七古，韓愈，《石鼓歌》）。「快劍」以下五句都是描寫石鼓的字體的。這又分兩層。第一，專描寫殘缺的字。缺畫是喻體，「快劍」句是喻依，缺畫依然勁挺有生氣是意旨。第二，描寫字體的一般。字體便是喻體，「鸞翔」以下四句是五個喻依——「古鼎躍水」跟「龍騰梭」各是一個喻依。意旨依次是雋逸，典麗，堅壯，挺拔——末兩個喻依只一個意旨——，都指字體而言，卻都未說出。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原作「水下灘」，依段玉裁說改——七古，白居易，《琵琶行》）。這幾句都描寫琵琶的聲音。大絃嘈嘈跟小絃切切各是喻體，急雨跟私語各是喻依，意旨一個是高而急，一個是低而急。「嘈嘈」句又是喻體，「大珠」句是喻依，圓潤是意旨。「間關」二句各是一個喻依，喻體是琵琶的聲音；前者的意旨是明滑，後者是幽澀。頭兩層的意旨未說出，這一層喻體跟意旨都未說出。事物的比喻雖然取材於經驗和常識，卻得新鮮，才能增強情感的力量；這需要創造的工夫。新鮮還得入情入理，才能讓讀者消化；這需要雅正的品味。

有時全詩是一套事物的比喻，或者一套事物的比喻滲透在全詩裏。前者如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七絕)

唐代士子應試，先將所作的詩文呈給在朝的知名人看。若得他贊許宣揚，登科便不難。宋人詩話裏說：「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因索慶餘新舊篇什，寄之懷袖而推贊之，遂登科。」這首詩大概就是呈獻詩文時作的。全詩是新嫁娘的話，她在拜舅姑以前問夫壻，畫眉深淺合式否？這是喻依。喻體是近試獻詩文給人，朱慶餘是在應試以前問張籍，所作詩文合式否？新嫁娘問畫眉深淺，爲的請夫壻指點，好讓舅姑看得入眼。朱慶餘問詩文合式與否，爲的請張籍指點，好讓考官看得入眼。這是全詩的主旨。又，駱賓王《在獄詠蟬》：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五律)

這是聞蟬聲而感身世。蟬的頭是黑的，是喻體，玄鬢影是喻依，意旨是少年時不堪回首。「露重」一聯是蟬，是喻依，喻體是自己，身微言輕是意旨。詩有長序，序尾道：「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正指出這層意旨。「高潔」是蟬，也是人，是自己；這個詞是雙關的，多義的。又，杜甫《古柏行》(七古)詠夔州武侯廟和成都武侯祠的古柏，作意從「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二語見出。篇末道：

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

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大廈傾和梁棟雖已成爲典故，但原是事物的比喻。兩者都是喻依。前者的喻體是國家亂；大廈傾會壓死人，國家亂人民受難，這是意旨。後者的喻體是大臣，梁棟支柱大廈，大臣支持國家，這是意旨。古柏是棟梁材，雖然「不露文章世已驚」，也樂意供世用，但是太重了，太大了，誰能送去供用呢？無從供用，漸漸心空了，螞蟻爬進去了；但是「香葉終經宿鸞鳳」，它的身分還是高的。這是喻依。喻體是懷才不遇的志士幽人。志士幽人本有用世之心，但是才太大了，無人眞知灼見，推薦入朝。於是貧賤衰老，爲世人所揶揄，但是他們的身分還是高的。這是才大難爲用，是意旨。

典故只是故事的意思。這所謂故事包羅的卻很廣大。經、史、子、集等等可以說都是的；不過詩文裏引用，總以常見的和易知的爲主。典故有一部分原是事物的比喻，有一部分是事跡，另一部分是成辭。上文說典故是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是專從詩文的一般讀者着眼，他們覺得詩文裏引用史事和神話或神仙故事的地方最困難。這兩類比喻都應該包括着那三部分。如前節所引《古柏行》裏的「大廈如傾要梁棟」，「大廈之傾，非一木所支」，見《文中子》，「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是袁粲嘆美王儉的話，見《晉書》。大廈傾和梁棟都是歷史的比喻，同時可還是事物的比喻。又，「乾坤日夜浮」（五律，杜甫，《登岳陽樓》）是用《水經注》。《水經注》道：「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乾坤是喻體，日夜浮是喻依。天地中間好像只有此湖；湖蓋地，天蓋湖，天地好像只是

日夜飄浮在湖裏。洞庭湖的廣大是意旨。又：「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五絕，劉長卿，《彈琴》），用魏文侯聽古樂就要睡覺的話，見《禮記》。兩句是喻依，世人不好古是喻體，自己不合時宜是意旨。這三例不必知道出處便能明白；但知道出處，句便多義，詩味更厚些。

引用事跡和成辭不然，得知道出處，才能了解正確。如「聖代無隱者，英靈盡來歸。遂令東山客，不得顧采薇」（五古，王維，《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謝安曾隱居會稽東山。東山客是喻依，喻體是綦毋潛，意旨是大才隱處。采薇是伯夷、叔齊的故事，他們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采薇是喻依，隱居是喻體，自甘淡泊是意旨。又，「客心洗流水」（五律，李白，《聽蜀僧濬彈琴》），流水用俞伯牙、鍾子期的故事。俞伯牙彈琴，志在流水。鍾子期就聽出了，道：「洋洋乎，若江河！」詩句是倒裝，原是說流水洗客心。流水是喻依，喻體是蜀僧濬的琴曲，意旨是曲調高妙。洗流水又是雙關的，多義的。洗是喻依，淨是喻體，高妙的琴曲滌淨客心的俗慮是意旨。洗流水又是喻依，喻體是客心；聽琴而客心清淨，像流水洗過一般，是意旨。又，錢起《送僧歸日本》（五律）道：「……浮天滄海遠，去世法舟輕。……惟憐一燈影，萬里眼中明。」一燈影用《維摩經》。經裏道：「有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夫一菩薩開導千百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譯言「無上正等正覺心」），其於道意亦不滅盡。是名無盡燈。」這兒一燈是喻依，喻體是覺者；一燈燃千百燈，一覺者造成千百覺者，道意不滅是意旨。但在詩句裏，一燈影卻指舟中禪燈的光影，是喻

依，喻體是那日本僧，意旨是他回國傳法，輾轉無盡。——「惟憐」是「最愛」的意思。又，「後來鞍馬何逡巡，當先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七言樂府，杜甫，《麗人行》）全詩詠三月三日長安水邊遊樂的情形，以楊國忠兄妹爲主。詩中上文說到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這幾句說到楊國忠——他那時是丞相。「楊花」二語正是暮春水邊的景物。但是全詩裏只在這兒插入兩句景語，奇特的安排暗示別有用意。北魏胡太后私通楊華作《楊白花歌辭》，有「楊花飄蕩落南家」，「願銜楊花入窠裏」等語。白蘋，舊說是楊花入水所化。楊國忠也和虢國夫人私通。「楊花」句一方面是喻依，喻體便是這件事實。楊國忠兄妹相通，都是楊家人，所以用楊花覆白蘋爲喻，暗示譏刺的意旨。青鳥是西王母傳書帶信的侍者。當時總該有些侍婢是給那兄妹二人居間。「青鳥」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體便是這些居間的侍婢，意旨還是譏刺楊國忠不知恥。青鳥是神仙的比喻。這兩句隱約其辭，雖志在譏刺，而言之者無罪。又杜甫《登樓》（七律）：

>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舊注說本詩是代宗廣德二年在成都作。元年冬，吐蕃陷京師，郭子儀收復京師，請代宗反正。所以有「北極」二句。本篇組織用賦體，以四方爲骨幹。錦江在東，玉壘山在西，「北極」二句是北眺所思。當時後主附祀先主廟中，先主廟在成都城南。「可憐」二句正是南瞻所感（羅庸先生說見《國

文月刊》九期)。可憐後主還有祠廟，受祭享；他信任宦官，終於亡國，辜負了諸葛亮出山一番。《三國志》裏說「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梁父吟》的原辭不傳(流傳的《梁父吟》決不是諸葛亮的《梁父吟》)，大概慨嘆小人當道。這二語一方面又是喻依，喻體是代宗和郭子儀；代宗也信任宦官，杜甫希望他「親賢臣，遠小人」(諸葛亮《出師表》中語)，這是意旨。「日暮」句又是一喻依，喻體是杜甫自己；想用世是意旨。又，「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五古，韋應物，《寄全椒山中道士》)，煮白石用鮑靚事。《晉書》：「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嘗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煮白石是喻依，喻體是那山中道士，他的清苦生涯是意旨。這也是神仙的比喻。又，「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七律，李白，《登金陵鳳凰臺》)，兩句一貫，思君的意思似甚明白。但樂府《古楊柳行》道：「讒邪害公正，浮雲蔽白日」，古詩也道：「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本詩顯然在引用成辭。陸賈《新語》說：「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本詩的「浮雲能蔽日」，一方面也是喻依，喻體大概是楊國忠等遮塞賢路。意旨是邪臣蔽君誤國；所以有「長安」句。歷史的比喻和神仙的比喻引用故事，得增減變化，才能新鮮入目。宋人所謂「以舊爲新」，便是這意思。所引各例可見。

典故滲透全詩的，如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五律)：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

魚情。

張丞相是張九齡，那時在荊州。前四語描寫洞庭湖，三四是名句。後四語蟬聯而下，還是就湖說，只「端居」句露出本意，這一語便是《論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的意思。「欲濟」句一方面說想渡湖上荊州去，卻沒有船，一方面是一喻依。僞《古文尚書·說命》殷高宗命傅說道，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本詩用這喻依，喻體卻是欲用世而無引進的人，意旨是希望張丞相援手。「坐觀」二語是一喻依。《漢書》用古人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本詩裏網變爲釣。這一聯的喻體是羨人出仕而得行道。自己無釣具，只好羨人家釣得的魚，自己不得仕，只好羨人家行道。意旨同上。

全詩用典故最多的，本書中推杜甫《寄韓諫議注》一首（七古）：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落，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韓諫議的名字事迹無考。從詩裏看，他是楚人，住在岳陽。肅宗平定安史之亂，收復東、西京，他大約也是參與機密的一人。後來去官歸隱，修道學仙。這首詩是愛惜他，思念他。第一節說思念他，是秋日，自己是在病中。美人這喻依見《楚辭》，但在這兒喻體是韓諫議，意旨是他的才能出衆。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見揚雄《法言》。這兒一方面描寫秋天的實景，一方面是喻依；喻體還是韓諫議，意旨是他已逃出世網。第二節說京師貴官聲勢烜赫，而韓諫議不在朝。本節差不多全是神仙的比喻，各有來歷。「玉京」句一喻依，喻體是集於君側的朝廷貴官，意旨是他們承君命掌大權。「或騎」二語一套喻依——「煙霧落」就是落在煙霧中，喻體同上句，意旨是他們的騎從儀衛之盛。影是芙蓉旌旗的影。「影動」句一喻依，喻體是聲勢烜赫，從京師傳遍天下；意旨是在瀟湘的韓諫議也必聞知這種聲勢。星宮之君就是玉京羣帝，醉瓊漿的喻體是宴飲，意旨是徵逐酒食。羽人是飛仙，羽人稀少就是稀少的羽人；全句一喻依，喻體是一些遠引的臣僚不在這繁華場中，意思是韓諫議沒有分享到這種聲勢。第三節說韓諫議曾參預定亂收京大計，如今卻不問國事，修道學仙。全節是神仙的比喻夾着歷史的比喻。昨者是從前的意思。如今的赤松子，昨者「恐是漢代韓張良」。韓張良的跟赤松子的喻體都是韓諫議，前者的意旨是他有謀略，後者的意旨是他修道學仙。別的喻依可以準此類推下去。第四節說他閒居不出很可惜，祝他老壽，希望朝廷再起用他來匡君濟世。太史公司馬談因病留滯周南，不得參與漢武帝的封禪大典，引爲生平恨事。詩中「周南留滯」是喻依，喻體是韓諫議，意旨是他閒居鄉里。南極老人就是壽星，是喻依，喻體同，意旨便是「應壽昌」。以上只闡明大端，細節從略。

詩和文的分別，一部分是在詞句篇段的組織上，詩的組織比文的組織要經濟些。引用比喻或典

故，一個原因便是求得經濟的組織。在舊體詩裏，有字數、聲調、對偶等制限，有時更不得不鑄造一些特別經濟的組織來適應。這種特殊的組織在文裏往往沒有，至少不常見。初學遇到這種地方也感困難，或誤解，或竟不懂。這得去看詳細的注釋。但讀詩多了，常常比較着看，也可明白。這種特殊的組織也常利用比喻或典故組成，那便更複雜些。如劉長卿《送李中丞歸漢陽別業》（五律）：

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歸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輕生一劍知」就是一劍知輕生的意思；輕生是說李中丞作征南將時不顧性命殺敵人。一劍知就是自己知；劍是殺敵所用，是自己的一部分，部分代全體是修辭格之一。自己知又有兩層用意：一是問心無愧，忠可報君，二是只有自己知，別人不知。上下文都可印證。又，「卽此羨閒逸，悵然吟《式微》」（五古，王維，《渭川田家》），《式微》用《詩經》。《式微》篇道：「式微，式微，胡不歸！」本詩的《式微》是篇名，指的是這篇詩。吟《式微》只是取「胡不歸」那一語，用意是「何不歸田呢」。又，「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七律，杜甫，《野望》），「恐美人之遲暮」見《楚辭》，遲暮是老大無成的意思。「惟將」句是說自己已老大，不曾有所建樹報答聖朝，加上遲暮的年光又都銷磨在多病裏，雖然「海內風塵」（見本詩第三句），卻絲毫的力量也不能盡。「供」是喻依，杜甫自己是喻體，銷磨在裏面是意旨。這三例都是用辭格（也是一種比喻）或典故組成的。又如李頎《送陳章甫》（七古）末尾

道：「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昨日罷官，想到就要別了許多朋友歸里，自然不免一番寂寞；但是「聞道故林相識多」，今日臨行，想到就要會見着那些故林相識的朋友，又覺如何呢？——該不會寂寞了罷？昨今對照，用意是安慰。——昨日是日前的意思。又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

>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閒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忘言。

去尋常道士，他不在寓處；「隨山到水源」才尋着。對着南溪邊的花和常道士的禪意，卻不覺忘言。相對是和「溪花與禪意」相對着。禪意給人妙悟，溪花也給人妙悟——禪家有拈花微笑的故事，那正是妙悟的故事——，所以說「與」。妙悟是忘言的。尋着了常道士，卻被溪花與禪意吸引住！只顧欣賞那無言之美，不想多交談，所以說「亦」忘言。又，韋應物《送楊氏女》（五古），是送女兒出嫁楊家，前面道：「女子今有行，大江泝輕舟。爾輩苦無恃，撫念益慈柔。幼爲長所育，兩別泣不休。」篇尾道，「歸來視幼女，零淚緣纓流。」全詩不曾說出楊氏女是長女，但讀了這幾句關係自然明白。

倒裝這特殊的組織，詩裏也常見。如「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五律，王維，《山居秋暝》），「歸浣女」「下漁舟」就是浣女歸，漁舟下。又，「家書到隔年」（五律，杜牧，《旅宿》），就是家書隔年到。又，「東門酤酒飲我曹」（七古，李頎，《送陳章甫》），「飲我曹」就是我曹飲，從上下文可知。又，「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五律，杜甫，《旅夜書懷》），就是文章豈著名，老病應休官。又，「幽映每白日」

(五律，劉眘虛，《闕題》)，就是白日每幽映。又，「徒勞恨費聲」(五律，李商隱，《蟬》)，就是費聲恨徒勞。又，「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五律，錢起，《谷口書齋寄楊補闕》)，就是憐新雨後之竹，愛夕陽時之山——憐愛同意。又，「獨夜憶秦關，聽鐘未眠客」(五古，韋應物，《夕次盱眙縣》)，就是聽鐘未眠客，獨夜憶秦關。這些倒裝句裏純然爲了適應字數、聲調、對偶等限制的卻沒有，它們主要的作用還在增強語氣。此外如「何因不歸去，淮上對秋山？」(五律，韋應物，《淮上喜會梁州故人》)這是詰問自己，「何因」直貫下句，二語合爲一句。這也爲了經濟的緣故。——至如「少陵無人謫仙死」(七古，韓愈，《石鼓歌》)，「無人」也就是「死」。這是求新，求驚人。又，「百年多是幾多時」(七律，元稹，《遣悲懷》之三)，是說百年雖多，究竟又有多少時候呢。這也許是當時口語的調子。又如「雲中君不見」(五律，馬戴，《楚江懷古》)，雲中君是一個詞；這句詩上三字下二字，跟一般五言句上二下三的不同，但似乎只是個無意爲之的例外，跟古詩裏「出郭門直視」一般。可是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七律，杜甫，《宿府》)，「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七律，杜甫，《閣夜》)，都是上五下二，跟一般七言句上四下三或上二下五的不同。又，「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麥苗風柳映堤」(七絕，無名氏，《雜詩》)，每句上四字作一二一，而一般作二二或三一。這些卻是有意變調求新了。

本書選詩，各方面的題材大致都有，分配又勻稱，沒有單調或瑣屑的弊病。這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個縮影。可是題材的內容雖反映着時代，題材的項目卻多是漢、魏、六朝詩裏所已有。祇有

音樂圖畫似乎是新的。賦裏有以音樂爲題材的，但晉以來就少。唐代音樂圖畫特別發達，反映到詩裏，便增加了題材的項目。這也是時勢使然。在各種題材裏，「出處」是一重大的項目。從前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出仕，出仕爲了行道，自然也爲了衣食。出仕以前的隱居，干謁，應試（落第）等，出仕以後的恩遇，遷謫，乃至憂民，憂國，思林棲，思歸田等，乃至眞個辭官歸田，都是常見的詩的題目，本書便可作例。仕君行道是儒家的思想，隱居和歸田都是道家的思想。儒、道兩家的思想合成了從前的讀書人。但是現在時勢變了，讀書人不一定出仕，林棲、歸田等思想也絕無僅有。有些人讀這些詩，也許會覺得不眞切，青年學生讀書，往往只憑自己的狹隘的興趣，更容易有此感。但是會讀詩的人，多讀詩的人，能夠設身處地，替古人着想，依然覺得這些詩眞切。這是情感的眞切，不是知識的眞切。這些人不但對於現在有情感，對於過去也有情感。他們知道唐人的需要，唐人的得失，和現代人不一樣，可是在讀唐詩的時候，只讓那對於過去的情感領着走；這種無私，無我，無關心的同情教他們覺到這些詩的眞切。這種無關心的情感需要慢慢調整自己，擴大自己，才能養成。多讀史，多讀詩，是一條修養的途徑。就是那些比較有普遍性的題材，如相思、離別、慈幼、慕親、友愛等也還是需要無關心的情感，這些題材的節目，多少也跟着時代改變一些，固執「知識的眞切」的人，讀古代的這些詩，有時也不能感到興趣。

至於詠古之作，如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歎之》（五律），是古人敬慕古人，紀時之作，如李商隱

《韓碑》(七古)，是古人論當時事。雖然我們也敬慕孔子，替韓愈抱屈，但知識的看，古人總隔一層。這些題材的普遍性比前一類低減些，不過還在「出處」那項目之上。還有，朝會詩，如岑參，王維《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七律)，見出一番堂皇富麗的氣象；又，宮詞，往往見出一番怨情，宛轉可憐。可是這些題材現代生活裏簡直沒有。最彆扭的是邊塞和從軍之作，唐人很喜歡作這類詩，而憫苦寒，譏黷武的居多數，跟現代人冒險尙武的精神恰恰相反。但荒寒的邊塞自是一種新境界，從軍苦在當時也是一種眞情的流露；若能節取，未嘗沒有是處。要能欣賞這幾類詩，都得靠無關心的情感。此外，唐人酬應的詩很多，本書裏也可見。有些人覺得作詩該等候感興，酬應的詩不會眞切。但佇興而作的人向來大概不多；據現在所知，只有孟浩然是如此。作詩都在情感平靜了的時候，運思造句都得用到理智；佇興而作是無所爲，酬應而作是有所爲，在工力深厚的人其實無多差別。酬應的詩若能恰如分際，也就見得眞切。況且這種詩裏也不短至情至性之作。總之，讀詩得除去偏見和成見，放大眼光，設身處地看去。

明代高棅編選《唐詩品彙》，將唐詩分爲四期。後來雖有種種批評，這分期法卻漸被一般沿用。初唐是高祖武德元年(公元六一八)至玄宗開元初(公元七一三——)，約一百年。盛唐是玄宗開元元年至代宗大曆初(公元七六六——)，五十多年。中唐是代宗大曆元年至文宗太和九年(公元八三五)，七十年。晚唐是文宗開成元年(公元八三六)至昭宗天祐三年(公元九〇六)，八十年。初唐詩

還是齊梁的影響，題材多半是豔情和風雲月露，講究聲調和對偶。到了沈佺期、宋之問手裏，便成立了律詩的體製。這是唐代詩壇一件大事，影響後世最大。當時有個陳子昂，獨主張復古，擴大詩的境界。但他死得早，成就不多。盛唐詩李白努力復古，杜甫努力開新。所謂復古，只是體會漢、魏的作風和借用樂府詩的題目，並非模擬詞句。所以陳子昂、李白都能獨創一家，而李白的成就更大。他的成就主要的在七言樂府；絕句也獨步一時。杜甫卻各體詩都是創作，全然不落古人窠臼。他以時事入詩，議論入詩，使詩散文化，使詩擴大境界；一方面研究律詩的變化，用來表達各種新題材。他的影響的久遠，幾乎沒有一個詩人比得上。這時期作七古體的最多，爲的這一體比較自由，又剛在開始發展。而王維、孟浩然專用五律寫山水，也能變古成家。中唐詩韋應物、柳宗元的五古以復古的作風創作，各自成家。古文家韓愈繼承杜甫，更使詩向散文化的路上走。宋詩受他的影響極大。他的門下作詩，有詞句冷澀的，有題材詭僻的；本書裏只選了賈島一首。另一面有些人描寫一般的社會生活；這原是樂府精神，卻也是杜甫開的風氣。元稹、白居易主張詩該寫社會生活而有規諷的作意，才是正宗。但他們的成就卻不在此而在情景親切，明白如話。他們不避俗，跟韓愈一派恰相對照；可也出於杜甫。晚唐詩刻畫景物，雕琢詞句，題材又回到風雲月露和豔情上，只加了一些雅事。詩境重趨狹窄，但精緻過於前人。這時期的精力集中在近體詩。精緻的只是詞句，全篇組織往往配合不上。就中李商隱、溫庭筠雖詠豔情，卻有大處奇處，不跼蹐在綺靡的圈子裏；而李

商隱學杜學韓，境界更廣闊些。學杜、韓而兼受溫、李薰染的是杜牧，豪放之餘，不失深秀。本書選詩七十七家，初唐不到十家，盛、中、晚三期各二十多家。入選的詩較多的八家。盛唐四家：杜甫的三十九首，王維二十九首，李白二十九首，孟浩然十五首。中唐二家：韋應物十二首，劉長卿十一首。晚唐二家：李商隱二十四首，杜牧十首。

李白詩，書中選五古三首，樂府三首，七古四首，七言樂府五首，五律五首，七律一首，五絕二首，樂府一首，七絕二首，樂府三首。各體都備，七古和樂府共九首，最多，五七絕和樂府共八首，居次。李白，字太白，蜀人，玄宗時作供奉翰林，觸犯了楊貴妃，不能得志。他是個放浪不羈的人，便辭了職，遊山水，渴酒，作詩。他的態度是出世的，作詩全任自然。當時稱他爲「天上謫仙人」，這說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樂府很多，取材很廣，他其實是在抒寫自己的生活，只借用樂府的舊題目而已。他的七古和樂府篇幅恢張，氣勢充沛，增進了七古體的價值。他的絕句也奠定了一種新體製。絕句最需要經濟的寫出，李白所作，自然含蓄，情韻不盡。書中所收《下江陵》一首，有人推爲唐代七絕第一。杜甫詩，計五古五首，七古五首，樂府四首，五律十首，七律十三首，五七絕各一首。只少五言樂府，別體都有。律詩共二十三首，最多；七古和樂府共九首，居次。杜甫，字子美，河南鞏縣人。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在靈武即位。他從長安逃到靈武，作了左拾遺的官。後因事被放，輾轉流落到成都，依故人嚴武，作到「檢校工部員外郎」，世稱杜工部。他在蜀住的很久。他是儒家的信徒，一輩

子悑着仕君行道，又身經亂離，親見民間疾苦。他的詩努力描寫當時的情形。發抒自己的感想。唐代用詩取士，詩原是應試的玩意兒；詩又是供給樂工歌妓唱來伺候宮庭和貴人的玩意兒。李白用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杜甫用來抒寫那個大時代，詩的境界擴大了，地位也增高了。而杜甫抓住了廣大的實在的人生，更給詩開闢了新世界。他的詩可以說是寫實的；這寫實的態度是從樂府來的。他使詩歷史化，散文化，正是樂府的影響。七古體到他手裏正式成立，律詩到他手裏應用自如——他的五律極多，差不多窮盡了這一體的變化。

王維詩，計五古五首，七言樂府三首，五律九首，七律四首，五絕五首，七絕和樂府三首，五律最多。王維，字摩詰，太原人，試進士，第一，官至尙書右丞，世稱王右丞。他會草書、隸書，會畫畫。有別墅在輞川，常和裴迪去遊覽作詩。沈、宋的五律還多寫豔情，王維改寫山水，選詞、造句都得自出心裁。從前雖也有山水詩，但體製不同，無從因襲。蘇軾說他「詩中有畫」。他是苦吟的，宋人筆記裏說他曾因苦吟走入醋缸裏；他的《渭城曲》（樂府），有人也推爲唐代七絕壓卷之作。他的詩是精緻的。孟浩然詩，計五古三首，七古一首，五律九首，五絕二首，也是五律最多。孟浩然，名浩，以字行，襄州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四十歲才遊京師。張九齡在荊州，召爲僚屬。他用五律寫江湖，卻不苦吟，佇興而作。他專工五言，五言各體都擅長。山水詩不但描寫自然，還欣賞自然；王維的描寫比孟浩然多些。

韋應物詩，五古七首，五律二首，七律一首，五、七絕各一首，五古多。韋應物，京兆長安人，作滁州刺史，改江州，入京作左司郎中，又出作蘇州刺史，世稱韋左司或韋蘇州。他爲人少食寡欲，常焚香掃地而坐。詩淡遠如其人。五古學古詩，學陶詩，指事述情，明白易見——有理語也有理趣，正是陶淵明所長。這些是淡處。篇幅多短，句子渾含不刻畫，是遠處。朱子說他的詩無一字造作，氣象近道。他在蘇州所作《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詩開端道：「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詩話推爲一代絕唱，也只是爲那肅穆清華的氣象。篇中又道：「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寄李儋元錫》（七律）也道：「邑有流亡愧俸錢」，這是憂民；識得爲政之體，才能有些忠君愛民之言。劉長卿詩，計五律五首，七律三首，五絕三首，五律最多。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登進士第，官終隨州刺史，世稱劉隨州。他也是苦吟的人，律詩組織最爲精密整鍊；五律更勝，當時推爲「五言長城」。上文曾舉過兩首作例，可見出他的用心處。

李商隱詩，計七古一首，五律五首，七律十首，五絕一首，七絕七首。七律最多，七絕居次。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登進士第。王茂元鎮河陽，召他掌書記，並使他作女壻。王茂元是李德裕同黨，李德裕和令狐楚是政敵。李商隱和令狐本有交誼，這一來卻得罪了他家。後來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綯作了宰相，李商隱屢次寫信表明心跡，他祇是不理。這是李商隱一生的失意事，詩中常常涉及，不過多半隱約其辭。後來柳仲郢鎮東蜀，他去作過節度判官。他博學強記，又有隱衷，詩裏的典故特

別多。他在七律裏有好些《無題》詩，一方面像是相思不相見的豔情詩，另一方面又像是比喻，詠嘆他和令狐綯的事，寄託那「不遇」的意旨。還有那篇《錦瑟》，雖有題，解者也紛紛不一。那或許是悼亡詩，或許也是比喻。又有些詠史詩，如《隋宮》，或許不止是詠古，還有刺時的意旨。他的詩語既然是一貫的隱約，讀起來便只能憑文義、典故和他的事跡作一些可能的概括的解釋。他的七絕裏也有這種詠史或遊仙詩，如《隋宮》、《瑤池》等。這些都是奇情壯采之作——一方面七律的組織也有了進步——所以入選的多。他的七絕最著名的可是《寄令狐郎中》一首。杜牧詩，五律一首，七絕九首，幾乎是專選一體。杜牧，字牧之，登進士第。牛僧孺鎮揚州，他在節度府掌書記，又作過司勳員外郎。世稱杜司勳，又稱小杜——杜甫稱老杜。他很有政治的眼光，但朝中無人，終於是個失意者。他的七絕感慨深切，情辭新秀。《泊秦淮》一首也曾被推爲壓卷之作。

唐以前的詩，可以說大多數是五古，極少數是七古；但那些時候並沒有體製的分類。那些時候詩的分類，大概只從內容方面看；最顯著的一組類別是五言詩和樂府詩。五言詩雖也從樂府演變而出，但從阮籍開始，已經高度的文人化，成爲獨立的抒情、寫景的體製。樂府原是民歌，敍述民間故事，描寫各社會的生活，有時也說教，東漢以來文人仿作樂府的很多，大都沿用舊題舊調，也是五言的體製。漢末舊調漸亡，文人仿作，便只沿用舊題目；但到後來詩中的話也不盡合於舊題目。這些時候有了七言樂府，不過少極；漢、魏、六朝間著名的只有曹丕的《燕歌行》，鮑照的《行路難》十八

首等。樂府多樸素的鋪排，跟五言詩的渾含不露有別。五言詩經過漢、魏、六朝的演變，作風也分化。阮籍是一期，陶淵明、謝靈運是一期，「宮體」又是一期。阮籍抒情，「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顏延年沈約等注《詠懷詩》語），最是渾含不露。陶、謝抒情、寫景、說理，漸趨詳切，題材是田園山水。宮體起於梁簡文帝時，以豔情爲主，漸講聲調對偶。

初唐五古還是宮體餘風，陳子昂、張九齡、李白主張復古，雖標榜「建安」（漢獻帝年號，建安體的代表是曹植），實是學阮籍。本書張九齡《感遇》二首便是例子。但盛唐五古，張九齡以外，連李白所作（《古風》除外）在內，可以說都是陶、謝的流派。中唐韋應物、柳宗元也如此。陶、謝的詳切本受樂府的影響。樂府的影響到唐代最爲顯著。杜甫的五古便多從樂府變化。他第一個變了五古的調子，也是創了五古的新調子。新調子的特色是散文化。但本書所選他的五古還不是新調子，讀他的長篇才易見出。這種新調子後來漸漸代替了舊調子。本書裏似乎只有元結《賊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調子；可是散文化太過，不是成功之作。至於唐人七古，卻全然從樂府變出。這又有兩派。一派學鮑照，以慷慨爲主；一派學晉《白紵（舞名）歌辭》（四首，見《樂府詩集》）等，以綺豔爲主。李白便是著名學鮑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經多是這一派。七言句長，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鍊，散文化更方便些。《行路難》裏已有散文句，李白詩裏又多些，如「我欲因之夢吳越」（《夢遊天姥吟留別》），又如上文舉過的「棄我去者」二語。七古體夾長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個方向。初唐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全首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簡直沒有七言句，卻也可以算入七古裏。到了杜甫，更有意的以文爲詩，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長短句。後來人作七古，多半跟着他走。他不作舊題目的樂府而作了許多敍述時事、描寫社會生活的詩。這正是樂府的本來面目。本書據《樂府詩集》將他的《哀江頭》、《哀王孫》等都放在七言樂府裏，便是這個道理。從他以後，用樂府舊題作詩的就漸漸的稀少了。另一方面，元稹、白居易創出一種七古新調，全篇都用平仄調協的律句，但押韻隨時轉換，平仄相間，各句安排也不像七律有一定的規矩，這叫做長慶體。長慶是穆宗的年號，也是元、白的集名。本書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都是的。古體詩的聲調本來比較近乎語言之自然，長慶體全用律句，反失自然，只是一種變調。但卻便於歌唱。《長恨歌》可以唱，見於記載，可不知道是否全唱。五、七古裏律句多的本可歌唱，不過似乎只唱四句，跟唱五、七絕一樣。古體詩雖不像近體詩的整鍊，但組織的經濟也最著重。這也是它跟散文的一個主要的分別。前舉韋應物《送楊氏女》便是一例。又如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裏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一方面說謝朓（小謝），一方面是比喻。且不說喻旨，只就文義看，「蓬萊」句又有兩層比喻，全句的意旨是後漢文章首推建安詩。「中間」句說建安以後「大雅久不作」（見李白《古風》第一首），小謝清發，才重振遺緒；「中間」「又」三個字包括多少朝代，多少詩家，多少詩，多少議論！組織有時也變換些新方式，但得出於自然。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七古）用夢遊和夢醒作綱領，韓愈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用唱歌跟和歌作綱領，將兩篇歌辭穿插在裏頭。

律詩出於齊、梁以來的五言詩和樂府。何遜、陰鏗、徐陵、庾信等的五言都已講究聲調和對偶。庾信的《烏夜啼》樂府簡直像七律一般；不過到了沈、宋才成定體罷了。律首聲調，前已論及。對偶在中間四句，就是第一組節奏的後兩句，第二組節奏的前兩句，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這樣，前四句由散趨整，後四句由整復歸於散，增前兩組節奏的往復迴環的效用。這兩組對偶又得自有變化，如一聯寫景，一聯寫情，一聯寫見，一聯寫聞之類，才不至板滯，才能和上下打成一片。所謂情景或見聞，只是從淺處舉例，其實這中間變化很多，很複雜。五律如「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嘆之》）。四句雖兩兩平列，可是前一聯上句範圍大，下句範圍小，後一聯上句說平時，下句說將死，便見流走。又，「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鐘」（李白，《聽蜀僧濬彈琴》）。前聯一彈一聽，後聯一在彈，一已止，各是一串兒。又，「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杜甫，《月夜》）。「遙憐」直貫四句。「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固然可憐，「香霧」云云的人（杜甫妻）解得憶長安，也許更可憐些。前聯只是一句話，後聯平列；兩相調劑着。律詩多在四句分段，但也不盡然，從這一首可見。又，前面引過的劉長卿《尋南溪常道士》次聯「白雲依靜渚，芳草閉閒門」，似乎平列，用意卻側重尋常道士不遇，側重在下句。三聯「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上句景物，下句動作，雖然平列而不是一類。再說「過雨」暗示忽然

遇雨，雨住後松色才更蒼翠好看；這就兼着敍事，跟單純寫景又不同。

七律如「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煙。迴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溫庭筠，《蘇武廟》）。前聯平列，但不是單純的寫景句；這中間引用着《漢書・蘇武傳》，上句意旨是和漢朝音信斷絕（雁足傳書事），下句意旨是無歸期（匈奴使蘇武放牡羊，說牡羊有乳才許歸漢）。後聯說去漢時還是冠劍的壯年，回漢時武帝已死。「丁年奉使」見李陵《答蘇武書》，甲帳是頭等帳，是武帝作來敬神的，見《漢武故事》。這一聯是倒裝，爲的更見出那「不堪回首」的用意。又，「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李商隱，《隋宮》）。日角是額骨隆起如日，是帝王之相，這兒是根據《舊唐書》，用來指太宗。錦帆指隋煬帝的遊船，見《開河記》。這一聯說若不因爲太宗得了天下，煬帝還該遊得遠呢。上句是因，下句是果。放螢火，種垂楊，都是煬帝的事。後聯平列，上句說不放螢火，下句說垂楊棲鴉，一有一無，卻見出「而今安在」一個用意。又，李商隱《籌筆驛》中二聯道：「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諸葛武侯曾在那裏駐軍籌畫。上將指武侯，降王指後主；管、樂是管仲、樂毅，武侯早年曾自比這二人。前聯也是倒裝，因爲「終見」，才覺「徒令」。但因「籌筆」想到「降王」，即景生情，雖倒裝還是自然。後聯也將「有」「無」對照，見出本詩末句「恨有餘」的用意。七律對偶用倒裝句、因果句，到晚唐才有。七言句長，整鍊較難，整鍊而能變化如意更難。唐代律詩剛創始，五言比較容易

些，發展得自然快些。作五律的大概多些，好詩也多些，本書五律多，便是這個緣故。律詩也有不對偶或對偶不全的，如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五律），又如崔顥《黃鶴樓》（七律）的次聯，這些只算例外。又有不調平仄的，如《黃鶴樓》和王維《終南別業》（五律），也是例外。——也有故意這樣作的，後來稱爲拗體，但究竟是變調。本書不選排律。七言排律本來少，五言的卻多，也推杜甫爲大家。排律將律詩的節奏重複多次，便覺單調，教人不樂意讀下去。但本書不選，恐怕是爲了典故多。晚唐律詩着重一句一聯，忽略全篇的組織，因此後人評論律詩，多愛摘句，好像律詩篇幅完整的很少似的。其實不然，這只是偏好罷了。

絕句不是截取律詩的四句而成。五絕的源頭在六朝樂府裏。六朝五言四句的樂府很多，《子夜歌》最著名。這些大都是豔情之作，詩中用諧聲辭格很多。諧聲辭格如「蟢子」諧「喜」聲，「藁砧」就是「鈇」（鍘刀）諧「夫」聲。本書選了權德輿《玉臺體》一首，就是這種詩。也許因爲詩體太短，用這種辭格來增加它的內容，這也是多義的一式。但唐代五絕已經不用諧聲辭格，因爲不大方，範圍也窄。唐代五絕有調平仄的，有不調平仄而押仄聲韻的；後者聲調上也可以說是古體詩，但題材和作風不同。所以容許這種聲調不諧的五絕，大約也是因爲詩體太短，變化少；多一些自由，可以讓作者多一些迴旋的地步。但就是這樣，作的還是不多。七言四句的詩，唐以前沒有，似乎是唐人的創作。這大概是爲了當時流行的西域樂調而作；先有調，後有詩。五、七絕都能歌唱，七絕歌唱的更多——

該是因爲聲調曼長，好聽些。作七絕的比五絕的多得多，本書選得也多。唐人絕句有兩種作風：一是鋪排，一是含蓄。前者如柳宗元《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又，韋應物《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柳詩鋪排了三個印象，見出「江雪」的幽靜，韋詩鋪排了四個印象，見出西澗的幽靜；但柳詩有「千山」「萬徑」「絕」「滅」等詞，顯得那幽靜更大些。所謂鋪排，是平排（或略參差，如所舉例）幾個同性質的印象，讓它們集合起來，暗示一個境界。這是讓印象自己說明，也是經濟的組織，但得選擇那些精的印象。後者是說要從淺中見深，小中見大；這兩者有時是一回事。含蓄的絕句，似乎是正宗。如杜牧《秋夕》：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是說宮人秋夕的幽怨，可作淺中見深的一例。又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是晉代王導、謝安住過的地方，唐代早爲民居。詩中只用野花、夕陽、燕子，對照今昔，便見出盛衰不常一番道理。這是小中見大，也是淺中見深。又，王之渙《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鸛雀樓在平陽府蒲州城上。白日依山，黃河入海，一層樓的境界已窮，若要看得更遠，更清楚，得上高處去。三、四句上一層樓，窮千里目，是小中見大；但另一方面，這兩句可能是個比喻，喻體是人生，意旨是若求遠大得向高處去。這又是淺中見深了。但這一首比較前二首明快些。

論七絕的稱含蓄爲「風調」。風飄搖而有遠情，調悠揚而有遠韻，總之是餘味深長。這也配合着七絕的曼長的聲調而言，五絕字少節促，便無所謂風調。風調也有變化，最顯著的是強弱的差別，就是口氣否定、肯定的差別。明、清兩代論詩家推舉唐人七絕壓卷之作共十一首，見於本書的八首。就是：王維《渭城曲》（樂府），王昌齡《長信怨》或《出塞》（皆樂府），王翰《涼州詞》，李白《下江陵》，王之渙《出塞》（樂府，一作《涼州詞》），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杜牧《泊秦淮》。這中間四首是樂府，樂府的措辭總要比較明快些。其餘四首雖非樂府，也是明快一類。只看八首詩的末二語便可知道。現在依次鈔出：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這些都用否定語作骨子，所以都比較明快些。這些詩也有所含蓄，可是強調。七絕原來專爲歌唱而作，含蓄中略求明快，聽者才容易懂，適應需要，本當如此。弱調的發展該是晚點兒。——不見於本書的三首，一首也是強調，二首是弱調。十一首中共有九首強調，可算是大多數。

當時爲人傳唱的絕句見於本書的，五言有王維的《相思》，七言有他的《渭城曲》，王昌齡的《芙蓉樓送辛漸》和《長信怨》，王之渙的《出塞》。《相思》道：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芙蓉樓送辛漸》道：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除《長信怨》外，四首都是對稱的口氣。——王之渙的「羌笛」句是說「你何須吹羌笛的《折柳詞》來怨久別？」——那不見於本書的高適的「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一首也是的（這一首本是一首五古的開端四語，歌者截取作爲絕句）。歌辭用對稱的口氣，唱時好像在對聽者說話，顯得親切。絕

句用對稱口氣的特別多；有時用問句，作用也一般。這些原都是樂府的老調兒，絕句只是推廣應用罷了。——風調轉而爲才調，奇情壯采依託在豔辭和故事上，是李商隱的七絕。這些詩雖增加了些新類型，卻非七絕的本色。他又有《夜雨寄北》一絕：

>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這也是對稱的口氣。設想歸後向那人談此時此地的情形，見出此時此地思歸和想念的心境，迴環含蓄，卻又親切明快。這種重複的組織極精鍊可喜。但絕句以自然爲主。像本詩的組織，精鍊不失自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朱寶瑩先生有《詩式》（中華書局版），專釋唐人近體詩的作法、作意，頗切實，邵祖平先生有《唐詩通論》（《學衡》十二期），頗詳明，都可參看。

（《讀書指導》）

柳宗元《封建論》指導大概

原　文

（1）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2）彼其初與萬物倶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民）。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3）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4）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民），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民）而無叛吏。人（民）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5）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

（6）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7）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修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余又非之：

（8）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民）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9）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治）；酷刑苦役，而萬人（民）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10）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漢事然也。

(11)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治）平矣。

(12)或者又曰：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13)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14)夫天下之道理（治）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指導大概

本篇是議論文，而且是議論文中的辯論文。辯論的題目是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辯論的對象是魏代的曹冏，他作《六代論》，晉代的陸機，他作《五等論》，都是擁護封建的人；還有唐代的杜佑等。曹、陸的論，《文選》裏有；杜佑等的意見，載在《唐書．宗室傳贊》裏——那「贊」裏也節錄了本篇的文字。本篇着重實際的政制，所以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迹作證。但實際的政制總得有理論的根據；曹、陸都曾舉出他們理論的根據。柳宗元是反對封建的，他也有他的政治哲學作根據，這便是「勢」。他再三的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1)(2)(14)。這是全篇的主旨。柳宗元生在安史亂後，又親見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吳少誠、吳元濟、王承宗諸人作亂。這些都是「藩鎮」，都是軍閥的割據。篇中所謂「叛將」，便指的這些人。他們委任官吏，截留稅款，全不把朝廷放在眼裏。這很像春秋時代強大的諸侯。柳宗元反對封建，是在這一種背景裏。他是因爲對於當時政治的關心才引起了對於封建制的歷史的興趣；所以引證的事實一直到唐代，而且對於當時的局面還建議了一個簡要的原則(11)，供執政者參考。——柳宗元是唐朝的臣子，照例得避本朝帝王的諱。太宗諱「世民」，文中「世」作「代」，「民」作「人」——文中有兩個「民」字(10)，大概是傳刻的人改的。高宗諱「治」，文中作「理」。當時人都得如此，不獨柳宗元一個。今在想着該是避諱的字下，都用括弧註出應作的本字，也許看起來明白些。

曹、陸都以爲封建是「聖人意」。《六代論》說：「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

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五等論》也說：「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同「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共憂樂，同安危，便是封建制的理論的根據。曹、陸都說這是「先王知」，可見是「聖人意」。這是封建論者共同的主要的論據。柳宗元反對封建，得先打破這個論據。這是本篇主要的工作(1)——(6)。「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便是針對着曹、陸的理論而發的。柳宗元還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1)。那麽，不但「封建非聖人意」，聖人並且要廢除封建，只是「勢不可」罷了。說到「勢」，便得從封建起源或社會起源着眼，這便是所謂「生人(民)之初」(1)。柳宗元似乎不相信古傳的「天作君師」說(《孟子》引《逸尚書》)；他以爲「君長刑政」起於「爭」。人與人因物資而爭，其中「智而明者」給他們「斷曲直」，施刑罰，讓他們息爭。這就是「君長」。有「君長刑政」然後有秩序，然後有「羣」。羣與羣又因物資相爭，息爭的是兵強德大的人；於是乎有諸侯。諸侯相爭，息爭的是德大的人；於是乎有方伯、連帥。方伯、連帥相爭，息爭的是德更大的人；於是乎有天子。「然後天下會於一」(2)。羣的發展是自小而大，自下而上。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也就是他的政治哲學。所謂「勢」，就指這種自然的發展而言。他的理論大概是從《荀子》來的。《荀子·禮論篇》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

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君道篇》又說：「君者，何也？曰，能羣也。」這便是「君長刑政」起於「爭」的道理，不過說得不成系統罷了。「假物」也是借用《荀子．勸學篇》「君子……善假於物」的話，篇中已提明荀卿。至於那種層次的發展，是恰和《墨子．尙同篇》所說翻了個個兒。《尙同篇》以爲「正長」「刑政」起於「亂」；而封建的社會的發展是自天子至於「鄉里之長」，是自大而小，自上而下。柳宗元建立了他的封建起源論社會起源論，接着就說「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是說明封建的世襲制的來由，但未免太簡單化了些。

可是社會的自然發展是「勢」，聖人的「不得已」也是「勢」。篇中論湯、武不革除封建制的緣故道：「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13)。「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不免是姑息，不免是妥協。所以接着便說：「夫湯、武之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13)。這種「不得已」出於私心，雖然也是「勢」，卻跟那聖人無可奈何的「生人(民)之初」的「勢」不一樣。但是無論怎麽樣，封建「非聖人之意」是一定的。在封建的世襲制下，「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聖人那會定下這種不公的制度呢？本篇除辯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這個主旨以外，還設了三個難。末一難是「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

柳宗元便舉出「湯、武之所不得已」來破這一難，已見上。中一難是「夏、商、周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12)。《六代論》開端就說「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杜佑也以爲封建制「主祚常永」，郡縣制「主祚常促」。但這也是封建論者一般的意見，因爲周歷年八百，秦二世而亡，可以作他們有力的證據。柳宗元卻只舉魏、晉、唐三代作反證。魏、晉兩代，封建制還存着，「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唐代改了郡縣制，「垂二百祀，大業彌固」(12)。可見朝代的長短和封建是無關的。頭一難是：「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民)，適其俗，脩其理(治)，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7)這也是《五等論》裏一層主要的意思，而且是陸機自己的見解——他那「共憂樂，同安危」的論據是襲用曹冏的。這裏他說：「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民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共憂樂，同安危，是從治者方面看，「施化」的難易是從受治方面看。這後一層的重要僅次於前者，也是封建論者一種有力的論據。所以本篇列爲頭一難。別的兩難，柳宗元只簡單的駁了過去；只對於這一難，卻歷引周、秦、漢、唐的事迹，證明它的不正確。他對於「共憂樂，同安危」那個論據，除建立了新的代替的「勢」的理論外，也曾引周、秦、漢、唐的事迹作證。

這一難的重要性由此可見。篇中兩回引周、秦、漢、唐的事迹，觀點卻不同。一回着重在「制」，在治者；一回着重在「政」，在被治者。但從實際的政治裏比較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得失，卻是一樣的。

照全篇所論，封建制有三失。一是「諸侯盛強，末大不掉」，天子「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3)。二是「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治)國寡」(8)。三是「繼世而理(治)」，君長的賢不肖未可知，「生人(民)之理(治)亂未可知」(14)。因爲「末大不掉」，便有陸機說的「侵弱之辱」，「土崩之困」；本篇論周代的末路「判爲十二，分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3)，正是這種現象。因爲「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便不免「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的情形(10)。而這兩種流弊大半由於「繼世而理(治)」，便是所謂「世襲」。「生人(民)之初」，各級的君長至少是「智而明者」，此外「有兵有德」；越是高級的君長德越大(2)。雖然在我們看，這只是個理想，但柳宗元自己應該相信是眞的，他也應該盼望本篇的讀者相信這是眞的。那麼，封建制剛開頭的時候，該是沒有什麼弊病的。弊病似乎起於「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這就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的嗣君不必是「智而明者」，更不必「有德」。這種世襲制普遍推行，世君之下，又有「世大夫」，使得「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14)。這不是和「生人(民)之初」「智而明者」「有德」者作君長的局面剛剛相反了嗎？自然，事實上世襲制和封建制是分不開的，是二而一的。可是柳宗元直到篇末才將「繼世而理(治)」的流弊概括的提了一下，似乎也太忽略了這制度的重要性了？不，他不

是忽略，他有他的苦衷。他生在君主世襲的時代，怎能明目張膽的攻擊世襲制呢？他只能主張將無數世襲的「君長」歸併爲一個世襲的天子，他只能盼望這個世襲的天子會選賢與能去作「守宰」。篇中所論郡縣制之得有二。一是「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便是中央集權的意思。二是陸機所謂「官方（宜也）庸（同「用」）能」；按本篇的說法，便是「孟舒、魏尙之術」可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10）——一方面也便是聖賢有以立於天下（14）。但本篇重在「破」而不在「立」，封建之失，指摘得很詳細，郡縣之得，只略舉綱目罷了。

本篇論歷代政制的得失，只舉周、秦、漢、唐四代。「堯、舜、禹、湯之事遠」（3），所以存而不論。堯、舜、禹、湯時代的史料留傳的太少，難以考信，存而不論是很謹愼的態度。「及有周而甚詳」（3），從周說起，文獻是足徵的。不但文獻足徵，周更是封建制的極盛時期和衰落時期。這裏差不多可以看見封建制的全副面目。這是封建制的最完備最適當的代表。而周代八百年天下，又是封建論者所豔羨的，並且是他們憑藉着起人信心的實證。秦是第一個廢封建置郡縣的朝代；這是一個革命的朝代。可是二世而亡，留給論史家許多爭辯。封建論者很容易的指出，這短短的一代是封建制的反面的鐵證。反封建論者像柳宗元這樣，卻得很費心思來解釋秦的速亡並不在郡縣制上——郡縣固然亡，封建還是會亡的。漢是封建和郡縣兩制並用；郡縣制有了長足的發展，封建制也經過幾番修正，漸漸達到名存實亡的地步。年代又相當長。這是郡縣制成功的時代，也是最宜於比較兩種制

度的得失的時代。所以本篇說，「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漢可以代表魏、晉等代；篇中只將魏、晉帶了一筆，並不詳敍，便是爲此。漢其實也未嘗不可代表唐。但柳宗元是唐人，他固然不肯忽略自己的時代；而更有關係的是安、史以來的「藩鎮」的局面，那不能算封建卻又像封建的，別的朝代未嘗沒有這種情形，卻不像唐代的顯著和深烈，這是柳宗元所最關心的。他的反封建，不但是學術的興趣，還有切膚之痛。就這兩種制度本身看，唐代並不需要特別提出；但他卻兩回將本朝跟周、秦、漢相提並論，可見是怎樣的鄭重其事了。《唐書·宗室傳贊》說杜佑、柳宗元論封建，「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杜佑的全文不可見；以本篇而論，這卻是一個很確切的評語。「深探其本」指立封建起源論，「據古驗今而反復」正指兩回將唐代跟周、秦、漢一並引作論證。

篇中兩回引證周、秦、漢、唐的事迹，觀點雖然不同，而「制」的得失須由「政」見，所論不免有共同的地方，評爲「反復」是不錯的。第一回引證以「制」爲主，所以有「非郡邑之制失」(4)，「徇周之制」，「秦制之得」(5)，「州縣之設，固不可革」(6)等語。這裏周制之失是「末大不掉」(3)，秦制之得是「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4)；漢代兼用兩制，「有叛國而無叛郡」(5)，得失最是分明。秦雖二世而亡，但「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可見「非郡邑之制失」。唐用秦制，雖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但「有叛將而無叛州」，可見「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兵原也可以息爭，卻只能用於小羣小爭。羣大了，爭大了，便得「有德」，而且得有大德。「藩鎮」是大羣，有大爭；而有兵無德，自然便亂起來

了。——這番徵引是證明「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那個主旨。第二回引證以「政」爲主，所以有「侯伯不得變其政」，「失在於制，不在於政」(8)，「失在於政，不在於制」(9)，「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10)等語。周雖失「政」，但「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上下牽掣，以至於此。所以眞正的失，還「在於制，不在於政」。秦制是「得」了，而郡邑無權，守宰不得人；二世而亡，「失在於政」。「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篇中接着舉出孟舒、魏尙、黃霸、汲黯幾個賢明的守宰。「政」因於「制」，由此可見。至於唐「盡制郡邑，連置守宰」(11)，「制」是已然「得」了，只要「善制兵，謹擇守」，便會「理(治)乎」(11)，不致失「政」。這就是上文提到的柳宗元向當時執政者建議的簡要的原則了。——這番徵引是證明郡縣的守宰「施化易」而「能理(治)」(7)，回答那第一難。郡縣制的朝代雖也會二世而亡，雖也會「桀猾時起，虐害方域」(9)，但這是沒有認眞施行郡縣制的弊病，郡縣制本身並無弊病。封建制本身卻就有弊病，「政」雖有一時的得失，「侵弱之辱」「土崩之困」終久是必然的。——篇中徵引，第一回詳於周事，第二回詳於漢事。這因爲周是封建制的代表，漢是「政」因於「制」的實證的緣故。唐是柳宗元自己的時代，他知道的事迹應該最多，可是說的最少。一來是因爲就封建郡縣兩制而論，唐代本不佔重要的地位，用不着詳其所不當詳。二來也許是因爲當代人論當代事，容易觸犯忌諱，所以還是概括一些的好。

政制的作用在求「理(治)平」(11)或「理(治)安」(10)(14)，這是「天下之道」。「理(治)安」在乎「得人」，「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治)安」(14)。郡縣制勝於封建制的地方便在能擇守宰，能進賢退不肖，賞賢罰不肖。「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10)。這正是能擇人，能擇人才能「得人」。但如孟舒、魏尚，本都是罷免了的，文帝聽了田叔和馮唐的話，才知道他們的賢能，重行起用，官復原職。可見知人善任，賞罰不差，也是不容易的。這不但得有賢明的君主，還得有賢明的輔佐。「謹擇守」(11)只是個簡要的原則，實施起來，得因時制宜，斟酌重輕，條目是無窮盡的。能「謹」擇守宰，便能「得人」，天下便能「理(治)安」了。「得人」眞可算是一個不變的道理；縱貫古今，橫通四海，爲政都不能外乎此，不過條目隨時隨地不同罷了。柳宗元說郡縣制是「公之大者」(13)，便是爲此。封建之初，雖然是「其德在人(民)者」，死了才「求其嗣而奉之」(2)，但後來卻只是「繼世而理(治)」。「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14)這只是私天下，家天下。「賢聖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14)。湯、武雖是「聖王」，而不能革除封建制，也不免有私心；他們是「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始皇改封建爲郡縣，其實也出於另一種私心；這是「私其一己之威」，「私其盡臣畜於我」。可是從天下後世看，郡縣制使賢不肖各居其所，使聖賢有以立於天下，確是「公之大者」。所以說「公

天下之端自秦始」(13)。向來所謂「公天下」，原指堯、舜傳賢，對禹傳子的「家天下」而言。那是整個兒的「以天下與人」。但堯、舜之事太「遠」了，太理想了。本篇着重實際的政制，所以存而不論。就實際的政制看，到了柳宗元的時代，郡縣制確是「公之大者」。他將新的意義給予「公天下」這一語，而稱「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未嘗沒有道理。

議論文不管是常理，是創見，總該自圓其說，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忌的是自相矛盾的毛病。議論文的作用原在起信；不能自圓其說，甚至於自相矛盾，又怎麼能說服別人呢？本篇開端道：「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民)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上面的兩答，好像是平列的；下面的兩問兩答卻偏承着「生人(民)果有初乎？」那一問說下去，將「天地果無初乎？」一問撇開了。按舊來的看法，這一問原是所謂陪筆；這樣撇開正是很經濟的。可是我們覺得「無初」一問既然在篇首和「有初」一問平列的提出，總該交代一筆，才好撇開去。照現在這樣，不免使人遺憾。篇中又說：「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接着卻只說「德又大者」，更不提「有兵」一層。論到世襲制，也只說「其德在人(民)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2)。柳宗元不提「有兵」的用意，我們是可以看出的，上文已見。他這兒自然也是所謂省筆；可是邏輯的看，他是並沒有自圓其說的。——前一例是邏輯的不謹嚴，廣義的說，不謹嚴也是沒有自圓其說的一目。又，篇中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

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後面卻又說，「殷（湯）、周（武）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13)。這「不得已」雖也是「勢」，卻跟那「生人（民）之初」的勢大不相同。這就未免自相矛盾了。篇中又說：「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12)。這是回答那第二難。但魏、晉只是郡縣封建兩制兼用，而郡縣更見側重。用這兩代來證明「秦郡邑而促」，似乎還比用來反證「夏、商、周封建而延」合式些。那麽，這也是自相矛盾了。韓愈給柳宗元作墓誌，說他「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五百家註《柳集》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長於議論的人，精於議論的文，還不免如上所述的毛病，足見眞正嚴密的議論文還得有充分的邏輯的訓練才成。

本篇全文是辯論，是非難。開端一節提出「封建非聖人意」，已是一「非」；所以後面提出第一難時說「余『又』非之」(7)。這兩大段大體上是「反復」的。反復可以加強那要辯明的主旨，並且可以使文字的組織更顯得緊密些。這兩段裏還用了遞進的結構。論封建的起源時，連說「又有大者」「又大者」，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下會於一」。接着從里胥起又一層層升上去，直到天子。論漢代政制時說：「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民），戚之而已。……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10)。也是一層層升上去，不過最高一層又分兩面罷了。遞進跟反復是一樣的作用，可以說是「異

曲同工」。本篇的組織偏重整齊，反復和遞進各是整齊的一目。篇中還用了許多偶句，從開端便是的，總計不下三十處，七十多語。又用了許多排語，如「周有天下」(3)，「秦有天下」(4)，「漢有天下」(5)，「周之事迹斷可見矣」(8)，「秦之事迹斷可見矣」(9)，「周事然也」(8)，「秦事然也」(9)，「漢事然也」(10)，「有叛人(民)而無叛吏」(4)，「有叛國而無叛郡」(5)，「有叛將而無叛州」(6)，「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6)，「失在於制，不在於政」(8)，「失在於政，不在於制」(9)等等。偶句和排語也都可以增強組織的。柳宗元在朝中時，作文還沒有脫掉六朝駢儷的規矩，本篇偏重整齊，多半也是六朝的影響。

本篇是辯論文，而且重在「破」，重在非難。凡關鍵的非難的句子，總是毫不猶疑，斬釘截鐵。如開端的「封建非聖人意也」(1)(2)，結尾的「非聖人意也」(14)，論秦亡說「非郡邑之制失也」(4)，回答第二難說「尤非所謂知理(治)者也」(12)，回答第三難說「是大不然」(13)，都是斬截的否定的口氣。這些是柳宗元的信念。他要說服別人，讓他自己的信念取別人的不同的或者相反的信念而代之，就得用這樣剛強的口氣。要不然，遲遲疑疑的，自己不能堅信，自己還信不過自己，又怎能使別人信服呢？若是短小精悍的文字，有時不妨竟用這種口氣一貫到底。但像本篇這樣長文，若處處都用這種口氣，便太緊張了，使讀者有受威脅之感。再則許多細節，作者本人也未必都能確信不疑，說得太死，讓人挑着了眼兒，反倒減弱全文的力量。這兒便得斟酌着參進些不十分確定的，商榷或詰難的口氣，可不是猶疑的口氣。這就給讀者留了地步，也給自己留了地步，而且會增加全文的情韻或姿

態。在本篇裏，如「勢之來，其生人（民）之初乎？」(1)「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3)。「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4)。「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民）乎？」(10)便都是商榷的口氣。如「何繫於諸侯哉？」(12)「繼世而理（治）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14)便都是詰難的口氣。

本篇徵引周、秦、漢、唐四代的事迹，而能使人不覺得有糾纏不清或瑣屑可厭的地方。這是因爲有剪裁。一代的事迹往往浩如煙海，徵引時當然得有個選擇。選擇得按着行文的意念。這裏需要的是判斷，是眼光。所取的事迹得切合那意念，或巧合那意念；前者是正鋒，後者只是偏鋒。這是剪裁的第一步。所取的事迹是生料，還得融鑄一番。或引伸一面，或概括全面，或竟加以說明；總得使熟悉那些事迹的讀者能領會到精細的去處，而不熟悉的讀者也能領會到那意念，那大旨。這後一層是很重要的。因爲熟悉史事的讀者究竟比不熟悉的讀者少得多；一般不熟悉史事而讀書明理的讀者，作者是不得不顧到的。大概簡單些的事迹，直陳就行了；複雜些的就得加以概括或說明。這是剪裁的第二步。本篇秦代的事比較少些，比較簡單些；但只第一回徵引可以算是直陳的(4)，第二回便以說明爲主了(9)。唐代的事雖不少，卻也只概括的敘了幾句(6)(11)，這緣由上文已見。周、漢兩代的事都繁多而複雜，最需要第二步的剪裁的便是這些。篇中第一回徵引周事甚詳，便不得不多用說明的語句。如「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3)，「下堂而迎覲者」是「害禮

傷尊」，說明了對於一般讀者更方便些。又如「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有了後二語，即使不熟悉上面的三件事，也可以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徵引的用意。又如「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周之敗端」也是說明語。這一節也參用概括的敍述，如說周初的封建，只用「周有天下，……離爲守臣，扞城」一長句。又如「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也是的。——末一語在不熟悉史事的讀者，可以「概括化」爲「卒不能定諸侯之嗣」，意思還是明白的。篇中徵引漢事，多作概括語。如「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5)，上面接着「漢有天下」，敍的自然是高祖了。這裏前二語概括了數年間諸王叛變的事迹，後二語舉了兩個最利害的例子，只要知道了這兩件事是數年間最利害的例子，一般的讀者也就算懂得了。下面緊接着，「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寥寥二語裏也概括了許多事迹。又如「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一長句(10)，連舉了六個人名，似乎會使一般的讀者感到困難。但說「知」，說「得」，說「明審」「簡靖」，又說「拜之」，「復其位」，「卧而委之以輯一方」，這些說明的詞句，再加上上下文，那六個人名也不會妨礙一般的讀者了解大意的。

篇中有些詞句，也許需要討論。如「不初無以有封建」(1)，「不初」等於「不是生人(民)之初」，「初」是名詞作動詞用；「無以」是熟語。全句翻成白話是：「不是生民之初，沒理由會有封建」，或「不

是初民社會不會有封建」。這句話若用文言的肯定語氣，該作「有初而後有封建」，但不及雙重否定的斬截有斤兩。「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句讀是照舊傳。有人在「邦」字斷句，將「羣后」屬下句。這樣，「周……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好像容易講解些，也合於文法些。但「五等」是成詞，「五等邦」罕見；本篇還有六朝駢儷的規矩，「設五等，邦羣后」二語正是相偶的。至於文法，駢體和詩自有它們的規律，跟一般的文法原有不同的去處。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舊傳的句讀理長些。——「履」是「所達到的地界」，「布履」是「分布的地界」。「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4)，寫秦的形勢。這兒「雄圖」的「圖」是版圖，不是謀略。「六合」原指天地四方，這兒只是宇內或天下的意思。——「六合」用在這裏實在不妥貼；只因上一語有了「天下」，只得另找一詞對偶。這是駢體的毛病。——「負鋤梃謫戍之徒」(4)一語，從賈誼《過秦論》的「鋤耰棘矜」「謫戍之衆」變出，但不是駢體的句子而是「古文」的句子。這種句法，以前似乎沒有，大概是當時的語言的影響。——韓愈提倡「古文」，主要的其實也只是教人照自然的語氣造句行文罷了。這一語裏「負鋤梃」是形容「謫戍之徒」的，翻成白話的調子該是「負鋤梃的謫戍之徒」；按文法說，「負鋤梃」下似乎該有個「之」字。但一語兩個「之」字，便嫌囉唆，句子顯得不「健」似的，「古文」裏這樣兩「之」的句法極罕見。這些地方不宜拘守那並未十分確定的文法，只消達意表情明白而有力就成。況且「負鋤梃」這樣句法後來也成了用例了。「繼漢而帝者，雖百代(世)可知也」(5)，襲用《論語》「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不過孔子的話只是理想，柳宗元卻至少有唐代作證。「有理(治)人(民)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治)人(民)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9)，是說明「秦之事迹」的。第一語「理(治)人(民)之制」就指的郡縣制；可是郡邑無權。第二語「理(治)人(民)之臣」泛指賢能之士；賢能不在位，守宰不得人。「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10)，「削其半」是被朝廷「削其半」，「民猶瘁矣」是說那被削的一半的人民在被削以前，和那未被削的一半的人民，總之是吃苦的。「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民)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封略」(14)，前二語只是「爲施政的便利，求制度的一貫」的意思。——以上是句。「所伏必衆」(2)，伏，服也。「圜視而合從」(4)，「圜視」出在賈誼的《治安策》裏，就是「睜圓了眼看着」，表示驚愕的神氣；「合從」借用六國合從的事迹，表示「叛秦」的意思。「戚之而已」(10)，戚，憂也，又憤恨也。這些是「實詞」。「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2)，兩「之」字泛指上句裏「所伏」的人——指其中的有些人。「秦制之得，亦以明矣」(5)，「以」和「已」通用。「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13)，四「其」字都相當於白話的「那」字。這些是「半實詞」。「彼其初與萬物俱生」(2)，「其」等於「之」；這裏用較古的「其」，是鄭重的語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4)，兩「之」字也只是增強語氣的詞。「及夫大逆不道」，「及夫郡邑，可謂理(治)且安矣」(10)，兩「及夫」都是「至於」的意思，但第一個指時間說，第二個指論點說。「且漢知孟舒於田叔……」(10)，「且」只是發端詞，

和「夫」字一樣。這兒用「且」，也許是有意避開上面兩個「及夫」裏的「夫」字——那兩個「夫」字可是增強「及」字的語氣的。這些是「虛詞」。

篇中除襲用《論語》一句外，還襲用《過秦論》和《六代》、《五等》兩論的詞句不少。如「秦有天下」一節(4)，便多出於《過秦論》。其中「負鋤梃」二語上文已論。「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也是檃括《過秦論》的詞句。《過秦論》說：「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又說：「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都是這四語所本——這兒「六合」這個詞是很妥貼的。《六代論》漢景帝時七國之亂，有「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一語。這是引用《左傳》，本篇用「末大不掉」(5)，大約還是《六代論》的影響。這兒將原來兩語合爲一語，自然是求變化。但「末大必折」本說樹木枝幹太大，根承不住，是會斷的。現在這樣和另一語拼合起來，各存一半，便不但失去原來兩語的意義，而且簡直是語不成義了。篇中「矯秦之枉，徇周之制」(5)，出於《五等論》的「漢矯秦枉」，「秦因循周制」；而「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4)的句調也出於同論的「周之不競，有自來矣」——這兩句都是總冒下文的。《六代論》的作者曹冏是魏少帝的族祖。那時少帝年幼。曹冏歷舉夏、殷、周、秦、漢、魏六代的事迹，主張封建宗室子弟，「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作成此論，想感悟當時的執政者曹爽。曹爽沒有採納他的意見。此論純爲當時而作。《五等

論》論「八代之制」，「秦、漢之典」——「八代」指五帝三王而言。陸機是說古來聖王立「五等」治天下，「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於是乎有「過正之災」，卻「非建侯之累」。他也是封建制的辯護人，可是似乎純然出於歷史的興趣，不關時政。本篇只引周、秦、漢、唐的事迹，韓愈所謂「證據今古」，跟曹的重今，陸的述古，都是同而不同；柳宗元的態度是在曹、陸之間。

封建制郡縣制的得失，主要的是中國實際政制問題，不獨漢、唐爲然。明末的顧炎武還作了九篇《郡縣論》。他說：「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又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他主張「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論一）。我們看了他這番話，也許會覺得不倫不類，但他也是衝着時代說的。那時流寇猖獗，到那裏打劫那裏，如入無人之境一般；守土的「令長」大都聞風逃亡，絕少盡職抵抗的人。顧炎武眼見這種情形，才有提高令長職權，創設世官制度那番議論。就是我們民國時代，在國民革命以前，也還有過聯省自治和中央集權的討論，參加的很不少，那其實也在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圈子裏。

（《讀書指導》）

再論「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在本誌（《中學生》）六十號裏見到朱孟實先生論這兩句詩的文字，覺得很有趣味。自己也有點意思，寫在這裏，請孟實、丏尊二位先生指教。

先鈔全詩：

錢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
苦調凄金石，淸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
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這是一首試帖詩。詩題出於《楚辭·遠遊篇》，云：

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舊唐書》一六八記此詩情形云：

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廷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爲鬼怪，而志其一十字。起就試之年，李暐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

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爲落句。暐深嘉之，稱爲絕唱，是歲登第。

「絕唱」只說得好，只說得愛好；那個鬼故事當然是後來附會出來的。至於「究竟好在何處？有什麼理由可說？」前人評語不外兩端：一是切題，二是所謂「遠神」。唐汝詢《唐詩解》卷五十云：

瑟乃神靈所彈，原無處所，是以曲終而不見其人，徒對江上數峯而惆悵也。

這裏只說得上一句：壓根兒就不見人，不獨曲終時爲然。但「江上數峯青」又與題何干呢？「湘靈」王逸無注，洪興祖補云：「上言『二女』，則此『湘靈』乃湘水之神，非湘夫人也。」可見得以前頗有人以爲湘靈就是湘夫人，就是帝堯的二女。《楚辭·九歌·湘夫人》有云：「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王注云：「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可見得湘夫人雖「死於沅、湘之中」，卻可在九嶷山裏。又《山海經·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這裏的「二女」也就是湘夫人。那麼，「江上數峯青」只是說人雖不見，卻可想像她們在那九嶷山或「洞庭之山」裏。錢起遠在洪興祖之前，他大概還將湘靈當作湘夫人的。

可是這麼一說，這兩句詩不過切題而已，何以「稱爲絕唱」呢？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評云：「遠神不盡。」但又云：「落句固好，然亦詩人意中所有；謂得自鬼語，蓋謗之耳。」「神」字太麻煩，姑不去解釋；說「遠」，說「不盡」，究竟是什麼呢？既是「詩人意中所有」，該不是怎樣玄虛的東西。我們可以想到所謂「遠神」大概有兩個意思：一是曲終而餘音不絕，一是詞氣不竭，就是不說盡。這兩個意思

一從詩所詠的東西說，一從詩本身說，實在是一物的兩面。

我們都知道「餘音繞梁」、「響遏行雲」兩個成語；實在是兩個典故，見《列子·湯問篇》，云：

……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欐，三日不絕。

前條說聲響之高，後條說聲響之久；「江上數峯青」也正說的是曲調高遠，嫋嫋於江上青峯之間，久而不絕，該是從《列子》脫化而出。可是意境全然新的，並非鈔襲。所以可喜。這是一。

《全唐詩話》卷一云：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佺期）、宋（之問）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

沈說盡，宋不說盡，卻留下一個新境界給人想，所以爲勝。錢詩是試帖，與沈、宋應制詩體製大致相同，都是五言長律，落句也與宋異曲同工。上官昭容既定下標準在前頭，影響該不在小；錢起的試官李暐或有意或無意大約也採取了這種標準，所以深爲嘉許。這是二。

還有，據《舊唐書》所記及陳季等同題之作，知道此詩所限之韻中有「青」字。錢押得如此自然，

怕也是成爲「絕唱」的一個小因子。《唐詩別裁集》評語有云:「神來之候,功力不與」,其實就是說的這個押韻的自然。

詩中他句也有可論,但紀昀差不多都說過了,見《唐人試律說》,在《鏡烟堂十種》中。

(二十五年二月,《中學生》六十二號。)

剪裁一例

文家的添注塗改的原稿可以見出寫作的苦心，指示學習寫作的途徑，是大家都知道的。不過這種原稿總是隨手散失，流傳的極少。流傳的往往只是關於這種原稿的故事，如歐陽脩《晝錦堂記》開端「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初稿沒有兩個「而」字，《醉翁亭記》開端「環滁皆山也」，初稿是二十多字，後來刪剩了五個字，等等。這些故事或逸話也有啓發的效用，但究竟是零星、片段的，不如成篇的原稿好。古人的原稿固然難得，近代人的也還是不容易。不過我們已有幾部名人手寫的日記，如《翁同龢日記》、《越縵堂日記》、《湘綺樓日記》可以觀摩。關於白話詩的，我們也有一部《初期白話詩稿》；可是所存錄的只有寥寥的幾首。

友人浦江清先生前幾年給清華大學編選大學一年級國文選，找出歐陽脩的兩篇《吉州學記》，其中一篇大概是初稿。將這兩篇比着看，是很有意思的。原稿既不可見，這種初稿也是很可寶貴的。現在先鈔定本，次鈔初稿。定本見於《居士集》三十九卷（《四部叢刊》影元刊本，兩篇都據此本鈔錄），《居士集》是歐陽脩手定的。初稿見於外集十三卷後，有校語云：「與石本異」；《居士集》三十九卷末也有校語，說外集所收的一篇「疑是初稿先已傳布」。本文想探求歐陽脩刪改的用意，作爲一

例，供中學教師和學生的參考。我並不鼓勵學生作古文，卻覺得學生欣賞古文的能力是應該培養的。

《吉州學記》（定本）

（一）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

（二）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政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

（三）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偉壯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四)予世家于吉而濫官于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敎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敎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敎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又(初稿)

(一)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

(二)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敎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持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

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

(三)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敎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

(四)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卽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五)予世家於吉，濫食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敎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壟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

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這種「記」用意並不在記敘而在頌美。這兩篇裏只各有一段記吉州學興建的情形（定本三，初稿四），卻還是頌美李寬的口氣。其餘各段不外頌美天子興學和祝望吉州學的成功兩層意思。兩篇裏都有議論學制的興廢（定二，初二、三）和教學之法（定本四，初稿二）的話。論學制的興廢是頌美的根據，論教學之法是祝望的根據，都不是為議論而議論。歐陽脩提倡古文，是當時的文壇盟主。他不能輕易下筆，他的文多是有為而作，文中常要闡明一些大道理。這篇記裏的大道理便是：「學校，王政之本也」（定二）或「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初二）。惟其如此，天子興學才值得頌美，李寬建學也才值得頌美。惟其如此，才需注重教學之法，才祝望吉州學之道之成。這篇記顯然是歐陽脩應了李寬和州人士的請求而作的。題目雖小，他卻能從大處下筆；雖然從大處下筆，卻還是本鄉人的口氣。

初稿繁，定本簡，是一望而知的。細加比較，定本似乎更得體些，也更扼要些。論教學之法的話，初稿裏和論學制興廢的話混在一起（二），意在表明「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二）。一方面跟下文「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五）一層意思相照應。定本卻將這番話挪到後面，作為祝望吉州學之道之成的引子（四），只是泛論，不提到「三王之用心」一層。這篇記原該以當時的吉州學為主，定本的安排見出這番話雖是泛論，卻專為當時的吉州學而

說，這番話的分量便顯得重些。從組織上看，脈絡也分明些。

初稿論學制的興廢甚詳(二、三)。定本只落落幾句(二)；就中「古者政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二語，概括了初稿裏「惟三代仁政之本，……成於學校」，「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二)，「三代學制甚詳」(三)諸語的意思。不但節省文字，並且不至於將「三代」說得過多，使人有輕重失宜之感。初稿「三代」三見(二、三)，「三王」一見。定本「三代」只一見(二)；「古者」其實也是三代，但變文泛指，語氣便見得輕了。初稿「三代學制甚詳」下接「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饑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這一節裏「又欲於速」二語以及末一語，和上下文(二、五)是照應着的。但定稿只說：「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二)對照起來，初稿便顯得拖泥帶水了。再說初稿雖是頌美仁宗的明聖，而宋代在前諸帝爲什麼不曾興學，卻沒有提及。這固然不算語病。可是像定稿那樣用不定的語氣解釋一下，就圓到得多，而且也更得立言之體似的。而所謂「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也是照應着下文「須遲久之功」(四)那一語的。

天子的詔也是這篇記的主要節目。這是頌美天子的節目，兩稿中都各見了三次(初一、三、五，定一、二、四)，成爲全篇組織的綱領。只在第三次見時，兩稿都作「毋廢慢天子之詔」，別的便都不大

相同；而第一段裏異同更多。第二次見時，初稿作「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三)，定本作「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二)。前者「再下」，針對上文正月三月兩回詔書(一)說，是紀實。後者「詔下」，針對上文「詔書屢下」說，卻專指立學的詔而言。「吏民」改爲「臣民」，爲的更得體些。加「而」字，爲的是聲調柔和些，姿態宛轉些。下詔的經過初稿裏是這樣：「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一)。這也是紀實，卻將兩回詔書不分輕重。下文也是將勸農桑和立學校相提並論(三)。定本裏是：「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一)。這兒便側重到立學一邊來了。第一回的詔書說是「屢下」，可見不止一通，又用排語分列三目，都比初稿清楚。接着道：「其明年三月，遂詔——」，這是大書特書；初稿只作「三月，又詔」(一)，語氣便輕緩得多。

定本「詔天下皆立學」下加「置學官之員」一語。「置學官之員」原是立學所必有的程序，可以不說出；說出只是加重分量，吸引讀者注意。接着又添上「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三語。這三語其實只是天下皆有學的意思。既已「詔天下皆立學」，自然會天下皆有學的；是信其必然，不是敍其已然。天下皆立學，不會那麼快——吉州學不是到十月才成嗎？「然後」是說將來；「莫不」是加強語氣，表示信心。這幾句話不但見出歐陽脩的意旨側重在立學一邊，並也增加頌

美的力量，「嗚呼！盛矣」一結可見。

可是，初稿確說慶曆四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定本只說「於是詔書屢下」，「於是」是很含混的，可暫可久。接着說「其明年三月，遂詔——」，「其明年」原只是「那第二年」的意思，這裏雖不一定涵蘊那「詔書屢下」的事是在慶曆三年，可是就文論文，讀者大概會這樣解釋的。這就不免爲文字的強調犧牲了事實的清楚，不免是語病。

兩稿開端都有「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一節話。這表示鄭重其事，也是頌美的意思。初稿說：「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頌美之中，還以紀實爲主。定本改作：「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將功德全歸到皇帝一人身上，頌美更到家，也就更得臣子立言之體了。這裏卻並不犧牲事實。皇帝決不至於自己起草條例，那還是八個人的份兒；這是常理，原不消說得的。「此非愚臣所能及」，省去初稿裏「事大」二字，將兩語縮爲一語，還是一樣明白。「失措」換成「失位」，是根據上文來的。初稿上文作「賜之坐」，「使書於紙以對」，定本併爲「使坐而書以對」，自然簡潔得多。因爲「使書於紙」，所以說「失措」；因爲「使坐而書」，所以說「失位」。

這篇記憶在頌美仁宗興天下學，李寬興吉州學。定本第三段初稿第四段記吉州學興建的經過，是以頌美李寬爲主。兩稿末段裏說到「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

哉！」將天子之功和「李侯之遺愛」並提，正是全篇主旨所在。篇中敍吉州學，說李寬原有立學之意，「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定三，初四略同）；不謀而合，相得益彰。這表示他能見其大。但初稿說：「州即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三）。定本卻說：「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四）。「遷而大之」就是「變而大之」。照初稿，吉州人本已將夫子廟改爲學舍，李寬來，才「與州人遷而大之」。照定本，就夫子廟建立學舍完全出於他的意思。在定本裏，李寬的功績自然更大。但初稿所敍的好像是事實。大約歐陽脩因爲要頌美李寬，便將事實稍稍歪曲了一下。好在這一層關係本不大；而歐陽脩是本州人，不提本州人這一層微小的功績而將它全歸到李寬身上，也許還算是得體的。

篇中可並沒有忽略州人士的合作。只看敍李寬作學，第一件便是「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定三，初四）。以下三層排語，連說「而人不以爲勞」，「而人不以爲多」，「而人不以爲侈」，這「人」自然是吉州人。這些話主在頌美李寬，而州人士的助成其事，也就附見。篇中敍李寬，只就他作學說。可是他的一般治績也並沒有闕而不書；這就是「敏而有方」（定三，初四），四個字是儘够的了。若不插這一句，讀者也許會疑心到李寬只是作學一事可取；那樣，在作者方面，就算不得體了。

歐陽脩世家於吉而官於朝（定四，初五）。在他的立場，頌揚天子稱美李寬是立言之體的當然。從現代的我們看，也許覺得無聊，但在他當時卻只有這樣作才合式。他又是以道自任的古文家，對

於興學懷抱着一番大道理。天下興學，固然可以實現他懷抱着的那一番大道理；吉州興學，也可以實現他懷抱着的那一番大道理。他便借記吉州學的機緣將那一番大道理傾吐出來，作爲他對於本州的學的關切和希望。這就是篇末的一段兒（定四，初五）。他盼望能够「樂學之道成」。所謂「學之道成」就是「謁於學門」以下幾層意思。這些只是表示理想，不是表示信心；可是只要「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定四，初五略同），那些理想也未嘗不可以實現。那些理想大概本於《孟子·梁惠王篇》裏的話。這一段裏主要的是勉勵的口氣。定本篇末一語作「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以俟」二字初稿裏沒有。加上這兩個字，更見作者對於州學的迫切的關懷和希望。

描寫「學之道成」一節，兩稿都用排語；排語緊湊些，複沓的組織使力量集中。初稿裏排語從「謁於學門」到「行其道塗」共五層。定本删去「過其市」「適其野」兩層，插入「問於其俗」一層。細看「過其市」一層不免瑣屑，不如插入的一層渾括而大方，「適其野」一層，似乎已涵蘊在後二層裏。在句式上，定本的四層是「謁於學門」、「問於其俗」、「入於其里」、「行於其郊」，也比初稿更整齊，更合於排語的組織些。定本末段裏還有：「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一節。那時州縣之吏是三年一任，所以才有這幾句話，這一節話是很重要的；不說出來下文的「李侯之遺愛」便有點突兀了。這也是定本勝於初稿的地方。

王安石《明妃曲》

王安石《明妃曲》二首，頗受人攻擊，說詩中「人生失意無南北」「漢恩自淺胡自深」兩句有傷忠愛之道。第一首云：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溼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黃山谷引王深父的話，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句非是。」這是說，無論怎樣，中國總比夷、狄好，南總比北好，打在冷宮的阿嬌也總比在氈城作閼氏的明妃好；詩中將南北等量齊觀，是不對的。山谷卻辯道：孔子居九夷，可見夷、狄也未嘗無可取之處，詩語並不算錯。

這種辯論似乎有點小題大做；所以有人說王安石只是要翻新出奇罷了，是不必深求的。但細讀這首詩，王安石筆下的明妃本人，並未離開那「怨而不怒」的舊譜兒；不過「家人」給她抱不平，口氣卻有點「怒」了。「家人」怒，而身當其境的明妃並沒有怒，正見其忠厚之極。這裏「一去」兩句說她

久而不忘漢朝；「寄聲」兩句說這麼久了，也託人問漢朝消息，漢朝卻絕無消息——年年有雁來，元帝卻沒給她一個字。在國內幾年未承恩幸，出宮時雖「得君王不自持」，又殺了毛延壽，而到塞外幾年，卻也未承眷念；她只算白等着。家裏的消息卻是有的，敎她別癡想了，漢朝的恩是很薄的；當年阿嬌近在咫尺，也打下冷宮來着，你惦記漢朝，卽便你在漢朝，也還不是失意？——該失意的在南在北都一樣，別老惦着「塞南」罷。這是決絕辭，也可說是恰如其分的安慰語；不過這只是「家人」說說罷了。

第二首云：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李壁註引范沖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安石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這以詩中明妃與漢奸劉豫相比，罵她是禽獸；其實范沖眞要罵的是王安石。罵王安石，與詩無甚關係，且不必論。就詩論詩，全篇只是以琵琶的悲怨見出明妃的悲怨：初嫁時不用說，含情無處訴，只借琵琶自寫心曲。後來雖然彈琵琶勸酒，可是眼看飛

鴻，心不在胡而在漢。飛鴻有三義：句子以嵇康《贈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來，意思卻牽涉到孟子的「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又帶着盼飛鴻捎來消息。這心事「漢宮侍女」知道，只不便明言安慰，惟有暗地垂淚。「沙上行人」聽着琵琶的哀響，卻不禁回首，自語道：漢朝對你的恩淺，胡人對你的恩深，古語說得好，樂莫樂兮新相知，你何必老惦着漢朝呢？在胡言胡，這也是恰如其分的安慰語。這決不是明妃的呧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議論，已有人說過，只是沙上行人自言自語罷了。但是青塚蕪沒之後，哀弦留傳不絕，可見後世人所見的還只是個悲怨可憐的明妃；明妃並未變心可知。王深父范沖之說，都只是斷章取義，不顧全局，最是解詩大病。今寫此短文，意不在給詩中的明妃及作者王安石辯護，只在說明讀詩解詩的方法，藉着這兩首詩作個例子吧了。

（一九三六年，《世界日報》。）

《熬波圖》

近來讀了元朝陳椿的《熬波圖》。這是一本有趣的書，記着那時松江一帶煎鹽的生活。這本書現在印入羅振玉氏《吉石盦叢書初集》，係珂羅版影印。但《熬波圖詩》卻早已載入《兩浙鹽法志·藝文類》〔一〕；羅氏《雪堂叢刻》中也有《熬波圖詠》，詩前的「說」，一幷錄載。羅氏記云：

元陳椿《熬波圖》一卷，「四庫」著錄，乃館臣就《永樂大典》輯錄，中缺五圖；其書蓋久佚矣。今年春，有以此圖二巨册乞售者，乃定邸〔二〕舊藏。圖至精細；前冠《提要》，後署「焦秉貞恭繪」款。《提要》成於乾隆中葉以後，焦秉貞則聖祖時已待詔畫院；無出自秉貞之理。殆嘉慶朝畫院諸臣就《大典》本臨摹，後人妄增焦款也。念此書藏於「中祕」，人間不得而窺，而宋、元間人記述製鹽之書，絕無傳者；因錄其題詠，付之手民——其圖精細，不能摹寫付印，爲可憾也！宣統甲寅六月。

但兩年後這本「精細」的圖便印出來了，這使現在讀着的我們很高興的！《提要》云：

《熬波圖》，元陳椿撰。椿，天台人，始末未詳。此書乃元統〔三〕中椿爲下砂場鹽司，因前提幹舊圖而補成

者也。自「各團竈座」至「起運散鹽」，爲圖四十有七。圖各有說，後繫以詩。凡曬灰、打滷之方，運薪、試蓮〔四〕之細，纖悉必具。亦樓璹《耕織圖》，曾之謹《農器譜》〔五〕之流亞也。

序言地有瞿氏、唐氏，爲鹽場提幹；諱守仁而佚其姓。考雲間舊志，瞿氏實下砂望族。……然作是圖者，不知爲誰。至唐氏，則舊志不載，無可考見矣。諸圖繪畫頗工，《永樂大典》所載，已經傳摹，尙存渠度。惟原缺五圖，世無別本，不可復補。……蓋原本已佚脫也。

《提要》說陳椿「因前提幹舊圖而補成」此圖，這是據陳自序。事情是這樣的：

浙之西，華亭東，百里，實爲下砂：濱大海，枕黃浦，距大塘，襟帶吳松、揚子二江；直走東南，皆斥鹵之地——煮海作鹽，其來尙矣。宋建炎〔六〕中，始立鹽監。地有瞿氏、唐氏之祖，爲監場，爲提幹者。至元丙子〔七〕，又爲土著，相副「管勾」官，皆無其任者也。

提幹諱守仁，號樂山；弟守義，號鶴山。……鶴山尤爲溫克，端有古人風度，……授忠顯校尉，海道運糧千戶。深知煮海淵源，風土異同，法度終始；命工繪爲長卷，命曰《熬波圖》。將使後人知煎鹽之法，工役之勞，而垂於無窮也。惜乎辭世之急！

僕曩吏下砂場鹽司，暇日訪其子，諱天禧，號敬齋，於衆綠園堂（《兩浙鹽法志》所載無「堂」字）出示其父所圖草卷，披覽之餘，瞭然在目，如示諸掌。嗚呼，信知仁民之心，如是其大乎！

……………………

今觀斯圖，眞可謂得其情，備而詳矣。然而浙東竹盤〔八〕之殊，改法立倉之異，猶未及焉。敬齋慨然屬椿

而言曰：「成先君之功者，子也；子其爲我全其帙而成其美」云。椿辭不獲已，敬爲略者詳之，缺者補之。

圖幾成而敬齋下世。至順庚午〔九〕，始得大備；行鋟諸梓，垂於不朽。……有意於愛民者，將有感於斯圖，必能出長策以甦民力；於國家之治政，未必無小補云。

細看此篇所敍，圖是提幹的兄弟命工繪畫，與提幹是無關的。《提要》中「因前提幹舊圖而補成」一語，似有錯誤。這位原作者鶴山，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他的姓氏，實爲遺憾。續作者陳椿，自然更是要緊。鶴山的圖，只是「草卷」，到他手裏，才成完書。但我們也不能知道他的全部的歷史。《提要》裏說的，全據他的自序，於我們毫無幫助；此外只有元朝陳旅（此人頗有文名）作的《運司同知睢陽趙公（知章）德政碑記》（《兩浙鹽法志・藝文》三）裏有「民感之（趙）不忘，……屬寓士陳椿來徵予文紀之」一語。這時是元順帝至元中，已在《熬波圖》成書後好幾年了。趙知章是松江分司；可知陳椿那時還在松江（華亭）住着呢。

現在我將書中四十七圖分爲十組。讓我們看看「熬波」這一件事裏，共包括幾個程序：

（一）蓋造房舍　計「各團〔10〕竈舍」，「築壘圍牆」，「起蓋竈舍」，「團內便倉」五圖。

（二）裹築灰淋及池井〔11〕　計「裹築灰淋」，「築壘池井」，「蓋池井屋」三圖。

（三）引入海水　計「開河通海」，「壩堰蓄水」，「就海引潮」，「築護海岸」，「車接海潮」，「疏浚潮

溝」六圖。

（四）闢治攤場　計「開闢攤場」，「車水耕平」，「敲泥拾草」，「海潮浸灌」，「削土取平」，「棹水潑水」六圖。

（五）曬灰淋滷　計「擔灰攤曬」，「篠灰取勻」，「篩水曬灰」，「扒掃聚灰」，「擔灰入淋」，「淋灰取滷」六圖。

（六）載滷入團　計「滷船鹽船」，「打滷入船」，「擔載運鹽」，「打滷入團」四圖。

（七）斫柴運柴　計「樵斫柴薪」，「束縛柴薪」，「砍斫柴生」，「場車輴車」，「人車運柴」，「輴車運柴」六圖。

（八）冶製鐵盤〔三〕　計「鐵盤模樣」，「鑄造鐵柈（同「盤」）」，「砌柱承柈」，「排湊盤面」，「煉打草灰」，「裝泥柈縫」六圖。

（九）煎鹽　計「上滷煎鹽」，「撈灑撩鹽」，「乾柈起鹽」，「出扒生灰」〔三〕四圖。

（十）收鹽運鹽　計「日收散鹽」，「起運散鹽」二圖。

書中「築壘圍牆」和「起運散鹽」二圖互舛，不知是何時弄錯的。

又以書中所載與《兩浙鹽法志》較，《鹽法志》有詩無說，前經述及；但在《熬波圖詩》之前，卻多《題熬波圖》一詩，與前者並題爲陳椿作。這首詩說他作書之旨，與自序所說相通，是很重要的。詩云：

錢塘江水限吳、越，三十四場分兩浙：五十萬引〔一四〕課重難，九千六百戶〔一五〕優劣。火伏〔一六〕上中下三則，煎連春夏秋九月，程嚴賦足在恤民，鹽是土人口下血！

這一本《熬波圖》有三種價值，我們可從三方面論之：一是政治的，二是學術的，三是藝術的。《提要》列入「史部」政書類，是着重牠政治的一面。

陳椿序中述鶴山命工作圖之意，「將使後人知煎鹽之法，工役之勞。」他自己則希望：「有意於愛民者，將有感於斯圖，必能出長策以甦民力；於國家之治政，未必無小補云。」他們倆的意思其實是相同的：一面存典制以備後人實施和改良之參考；一面寫出工役勞苦的詳情，俾在上者覽之——蓋亦諷諫之意。明彭韶《上鹽場圖詩略》〔一七〕說：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爲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爲先。故有書《豳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一八〕者，有獻《流民圖》〔一九〕者；要之，期於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按：彭當是未見此圖。）

這一節話說諷諫的意思最明白，可藉作陳序的注脚。原來元代兩浙鹽賦最重，而且有加靡已（至順帝至正三年，始有減去一十萬引之事〔二〇〕）。前引陳旅《趙公德政碑記》裏說：

昔至元〔二一〕鹽筴之榷於兩浙也，以引計，凡四萬耳；後寖溢至四十八萬。而松江之額，十萬有奇；民其

得無瘵乎！（按：與《元史》及《新元史·食貨志》稍有出入。）

你看，不及百年，增賦已至十二倍之多！兩浙賦額既重，而松江賦額又在兩浙中最重，其民自然困悴不堪！陳序所謂「仁民之心」，所謂「愛民」，當係確有所感而發，不得作尋常門面語看。只是這種居高臨下，爲民請命的憐愍態度，在現在已無多少價值可言罷了。

羅振玉氏說：「念此書藏於『中祕』，人間不得而窺，而宋、元間人記述製鹽之書，絕無傳者；因錄其題詠，付之手民。」他的話有兩層意思：一是此書乃難見之奇書，足備藏書家之一格。二是此書乃研究元代製鹽方法僅存之書。此書的難見，大約不僅清代爲然；由前引彭韶的話，可推至明代也已流行極少。不過明初尚見刻本，故《永樂大典》得據以傳摹。現在刻本固絕不可見，《大典》又經散失，其載有此書之卷帙，亦不知存佚如何（袁同禮先生的《永樂大典現存卷目》〔三〕中無此）。羅氏所藏本，要算僅存的碩果了。我們所得見者，雖只是這第四手的，不全的本子（《大典》所載原已不全，見上文）；也要算很有眼福了。此書既爲元人記述製鹽方法僅存之書，自甚有關於史學；而有圖佐說，尤爲可貴之至。鄭樵《通志·圖譜略·索象篇》說：

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

《明用篇》又說：

善爲學者，如持軍治獄；若無部伍之法，何以得書之紀？若無嚴實之法，何以得書之情？

可見要治「實學」，非有圖譜不行，虛文無濟於事。鄭氏所舉圖譜之學凡十六種，所稱「無圖有書不可用」者，鹽法也正是如此。要明白當世的鹽法，已須靠圖爲用；要明白前代的鹽法，圖自然更不可少。

藝術的一面，最值得注意的，自然是那些圖的畫工。《提要》說：「諸圖繪畫頗工，《永樂大典》所載，尚存榘度。」羅振玉氏說，「圖至精細」，「殆嘉慶朝畫院諸臣就《大典》本臨摹。」本書繪畫的工細，確是可愛。工細而能生動，所以才好；若筆下板滯，雖工細也無味了。本書中便是「界畫」，也鮮明有致；其餘畫工作則確是正在工作，畫休息則確是正在休息。我且舉一兩個例：如「團內便倉」圖中，一人在地上，雙手捧一疊瓦，兩足離立，仰望屋上人，迴聲作勢；瓦幾欲脫手而出。屋上人則兩足一前一後，弓着腰，向下攤開雙手；只等着接那一疊瓦。又如「車水耕平」中，一老一少在水車旁石上對坐。老者右脛橫加於左股上，以兩手抱着；少者右手據石，左手拿着蒲葵扇，向老者指點着，張口似有所語。這每一圖裏，兩人間的神情，均能密合無間；但眼光尚未能相屬，是一小疵。又如「樵斫柴薪」中，一人釋鐮刀於地，蹲着，兩手高舉長的茶瓶，仰首就飲；渴態可笑。旁一人也蹲着，就礪石上磨鐮刀，卻又極爲從容；相形之下，更覺可笑了。至於駝背龍鍾的老翁，望之儼然的「北軍」，畫來也都維妙維肖。

最有趣的，各圖都能「於百忙中着些閒筆」。每幅上端，往往有些遠景；或寫亂山，或寫煙水，又以小橋村舍，雜樹飛禽，點綴其間。每幅中間，竈丁們工作之外，又往往插入些閒人閒事：如老翁負小兒，指點工作，少婦門內看閒，兒童晝地着棋，或倚闌垂釣；乃至羣雞覓食，兩狗相撲等等。而所畫人物，所布景色，位置和情形，又無一幅有重複處。這樣，每幅圖都是一個新鮮的境界，使人神往，願厠身其間。作圖本意，原要使後人知「工役之勞」；但這一點似乎失敗了。我們只覺得竈丁們家人父子，融融洩洩；一味勤勤懇懇地工作，毫不計較似的。卽有「北軍」在旁監視，他們仍是自得其樂，無一些跼蹐之態。我們明知實際上未必如此，但圖中確是如此。本圖使我們只覺着「熬波」生活之可樂，而不見其苦處，使我們超乎實際的苦樂之上而「無關心」。也許創意作圖者或臨摹者澤於「溫柔敦厚」的詩教者甚深，不願露骨地畫出，卻留待閱者自去深思熟味，亦未可知。還有一事，我們現在所見的圖的底本，大約是「嘉慶朝畫院諸臣就《大典》本臨摹」；我所論卽以此臨摹，影印之圖爲據。至於《大典》的圖與原書的圖，和現在所存，有同異否，有精粗之別否，我一概不知。若但憑猜想，原書之圖或竟不如臨摹之本，亦未可定。因爲原作圖者只是畫工，臨摹者卻大約都是畫院諸臣；且傳刻總要失眞，當不如手繪者之奕奕有神采的。

圖詠多五言，也有雜言的。圖詠本以補圖與說之不及，而實側重在陳說竈戶的疾苦，冀人「寓目動心」；與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旨趣略同。但詩過質實，自不能及白。其中記敍，說明諸

語，往往如「蓋池井屋」圖詠云：「固非人所居，但防天雨雨」之類，殆同歌訣，殊無深致。然如「篠灰取匀」云：「一片灰場幾經手，壯者尪羸肥者瘠。」「擔載運鹽」云：「日西比及到團前，牛卻長嘆人無言。」「砍斫柴生」云：「黃茅斫盡鹽未足，官司熬熬催火伏；有錢可買鄰場柴，無錢之家守鹽哭。」「撈灑撩鹽」云：「人面如灰汗如血，終朝徹夜不得歇。」諸語敍事，卻頗有筋力。至於代述竈戶情意處，更多精警可喜。此類語極多，幾乎每詩皆有；致訓之意，不顯於圖者，乃顯於詠。如「裹築灰淋」云：「作勞口舌乾，鹹水覺有味；早知作農夫，豈不太容易！」「疏浚潮溝」云：「但得朝朝水滿溝，一生甘作泥中鰍！」「敲泥拾草」云：「十指盡皸瘃，那復問肩背！」都語婉意長，耐人尋味。其餘議論語如：「上滷煎鹽」云：「烹煎不顧寒與暑，半是竈丁流汗雨！」諷諭語，如「砌柱承柈」云：「滿盤白雪積如山，不比金莖但承露。」景語，如：「轄車運柴」云：「空車晚歸去，牛背載寒鴉。」「鑄造鐵柈」云：「閒看爐鞴棄荒郊，當時鬧熱今如水。」或片言居要，或委曲有情致，也都可誦。

以上只是摘句，現在舉全篇精警者：如「車接海潮」云：

翻翻聯聯，犖犖确确，東海巨蛇才脫殼。滔滔車腹水逆行，輥輥車聲雷大作，能消幾部旱龍骨；翻得陽侯波欲涸！誰家少婦急工程？徑上車頭泥兩脚！（按：今圖中實無少婦。）

此詩寫水車的形狀，功用，活潑得神，可稱狀物之工。而末二語筆弄餘妍，似不經意，卻有無限隱恫存於言外。少婦何必「急工程」，「急工程」者自有人在；而偏說少婦者，所謂「風人之旨」。如此說法，

並非求之太深；其實便是順文直解，着此二語於本詩之末，也儘有風致的。又如「擔灰攤曬」云：

> 海天無風雲色開，相呼上場早曬灰。滿場大堆仍小堆，前擔未了後擔催。少婦勤作亦可哀，草間冬日眠嬰孩。正苦飢腹鳴如雷，轉頭饁婦從西來。（今圖中無少婦，有嬰孩在西；作者或「想當然耳」。）

此詩雖不及前作，但寫嬰孩冬日眠草間，「工役之勞」自見，又「饁婦」即「少婦」，「勤作」即指「饁」而言，章法頗曲。又如「乾柈起鹽」云：

> 大柈未冷火初歇，輕輕剗柈休剗鐵。有如昨夜未完月，妖蟆食破圓還闕。又如水晶三角片，又如蒸餅十字裂。正愁天上多苦霧，卻喜海濱有鹹雪！

此詩雖甚朴質，但寫柈的形狀卻像極，且甚有趣；故不覺其粗俗。「正愁」一句，語意雙關；與明彭韶《放鹽圖詩》中「誰念味中苦，搔首空躊躇」〔三〕略同。

諸詠雖一再力陳竈戶的疾苦，但絲毫不帶着不平的氣分，這正是時代使然。他們是很安分的，所要求的只是一些憐憫，一些仁政而已。竈戶這樣想，陳椿等也爲他們這樣想；反映在那些詩裏的，便都是些「怨而不怒」，低首下心的哀訴了。他們的理想，取詩中三語，便可包括罄盡：所謂「公利私亦利」是一，「但願天公平，無水亦無旱！」是二；而後者尤重，這也就是全部圖詠的精神了。

圖詠與說，皆楷書，字體在歐、趙之間，極秀整有致。說中偶有夾注，大抵解釋名義。其中數見「未詳」字樣，足證此項注文係後人所加，但不知加於何時。

周作人先生在《兒童的書》一文中，論及中國兒童畫之少，他說道：「如焦秉貞的《耕織圖》卻頗適用，把他翻印出來，可以供少年男女的翻閱。」〔四〕焦秉貞的圖，不知是不是臨摹樓璹的；兩種圖我都未見過，無從懸揣。我想這本《熬波圖》性質與《耕織圖》相類（《提要》說），也多「線畫」，圖詠與說又淺顯易解，而詠尤可誦。若作爲「兒童的書」，或者也適用的。只是無單行本，而《吉石盦叢書》印得既少，價錢又貴，一般人不易得着；這是很可惜的。

與本書類似的材料，我現在所能知道的，尚有下列三種：

（一）元盛彧《耙鹽詞》〔五〕盛彧是元末人，與本書作者差不多同時；其說自可供參考之用。詞云：

朝耙灘上泥，暮煮釜中雪。妾身煎鹽不辭苦，恐郎耙泥筋力竭！君不見東家阿嬌紅粉媚，不識把鋤巧梳髻；昨日典金釵，愁殺官鹽價高貴！

此詩文采自然是好，局格亦佳；但似不及本書諸詠的眞切感人。

（二）明彭韶《兩浙鹽場圖詠》明夏時正序〔六〕云：

公繼是奉有整理兩浙鹽法之命。逮竣，還，乃法《無逸》、《豳風》，採摭兩浙鹽場景物事情，分爲八節：曰鹽場，曰山場，曰草蕩，曰淋滷，曰煎鹽，曰徵鹽，曰放鹽，曰追鹽，繪爲八圖；圖各有序，復繫以詩。詩詠其情，序敍其事，圖寫其狀。即之以觀，則竈丁之貧難困苦，一展舒可得之。……亦既進呈。……（兩浙都轉運使，西蜀）

晏君……於是取圖之副，刻梓以傳。

此書未經「四庫」著錄，恐已亡佚；但圖詠尚存《兩浙鹽法志・藝文類》中，題為「恤竈圖八詠」〔三〕（第八詠題「追賠圖」，亦與前引彭上《鹽場圖詩略》不同）。詩甚妥貼。「鹽場圖」有云：

　　薪桂與炊玉，晨昏增感愴。敝屋棲寒蘆，新畬倚孤嶂。懷土思依依，承家如草剏。

末二語寫竈戶雖已窮困到「無以為家」，但仍戀戀故土，不忍遠去。為上文「感愴」二字下一注脚，甚委曲有致。又「煎鹽圖」云：

　　一勺盡傾瀉，萬竈俱焚爇。沈沈紅霧收，豔豔晴波竭。斂之白盈箕，凝華粲如雪。

此數語氣象甚佳。又「徵鹽圖」云：

　　儋石四面至，倉庾一朝盈；鹽官唱簿歷，「折閱」頻呼聲。

描寫鹽官的貪酷，可稱淋漓盡致了。

〔三〕《兩淮鹽法志》卷四《圖說》上　本卷共二十八圖：除文匯、文宗兩閣外，「淮南之鹽法十六，淮北之鹽法十。」淮南的圖，起於「引蕩刈草」，終於「子鹽開江」；淮北的圖，起於「築井鋪池」，終於「烏沙河開行」。諸圖兼括製鹽，運鹽二事，甚為簡略；與《熬波圖》之只重製鹽，不厭求詳者不同。圖尙工細，間亦有景物點綴，但不及《熬波圖》的講究與多變化；且經傳刻，究覺板滯多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完。《小說月報》第十八卷第二號，一九二七年二月。）

〔一〕本文所引各鹽法志，均據清嘉慶朝重修本。

〔二〕定親王永璜，乾隆長子。

〔三〕元順帝年號。

〔四〕以石蓮試滷鹹淡之法；詳見書中「淋灰取滷」圖說。

〔五〕《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提要》中無此書，大約已亡佚了。

〔六〕宋高宗年號。

〔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八〕煎鹽之盤，浙東以竹編之；詳見書中「鐵盤模樣」圖說。

〔九〕元文宗至順元年。

〔一〇〕煎鹽之所。

〔一一〕灰淋乃淋滷之土窟；池井則所以貯滷者也。

〔一二〕煎鹽之盤，用數鐵塊拼成。

〔一三〕未經淋滷之新灰也；舊灰必須時有新灰摻入，方能保存其性。

〔一四〕商人納鈔運鹽，謂之鹽引；元制每鹽一引，重四百斤。

〔一五〕煎鹽民戶，謂之竈戶；竈戶有定額，是一種官役；歲有定課，不容規避。

〔一六〕火之起伏也；一火伏出鹽若干，有定額。上中下則，係指旺月（如陰曆六月）淡月而言。

〔一七〕見《長蘆鹽法志・附編援證》九。

〔一八〕宋樓璹。

〔一九〕宋鄭俠。

〔二〇〕據元潘嘉《運司堂廨李公政績碑記》(《兩浙鹽法志・藝文》三)。

〔二一〕元世祖年號。

〔二二〕見《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一卷第四期。

〔二三〕見後。

〔二四〕《自己的園地》一四六頁。

〔二五〕《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鹽法部・藝文》四。

〔二六〕《兩浙鹽法志・藝文》二。

〔二七〕《圖書集成・鹽法部・藝文》四亦載「草蕩」,「淋滷」,「煎鹽」,「放鹽」四詠。

《歧路燈》〔一〕

《歧路燈》是中國舊來僅有的兩部可以稱爲眞正「長篇」的小說之一；另一部便是誰也知道的《紅樓夢》。本書現在才出了第一冊，但回目已全有了；依據這一冊的材料，我們可以將全書考量一番。

本書出版以後，有過兩篇介紹批評的文字：一是郭紹虞先生的《介紹歧路燈》，見《文學週報》五卷二十五號；一是《大公報·文學副刊》裏的一篇。郭先生所論極爲詳細；他從各方面估量本書的價值。他的話都很精當，實在是一篇好的文學批評，雖然他只題爲「介紹」。我希望讀《歧路燈》的人，在讀前或讀後，都去讀一讀那篇「介紹」文。

我對於本書的意見，差不多完全與郭先生相同。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就他的意見加以引申。因爲本書略後於《儒林外史》，而與《紅樓夢》同時，郭先生文中便拿這三部小說來相比，我也想用這種辦法。先論題材。《歧路燈》的題材，簡單地說，只是「敗子回頭」。但這個敗子，本來並非敗子，他父親竭盡心力，原想他成爲一個克家的令子；而他自己也時時在理欲交戰中。他父親死了，他結交了「匪類」；因爲習染的關係，便讓欲將理戰勝了。「東扯西撈，果然弄的家敗人亡」。後來受够了「貧

苦熬煎」，閱歷了人世險詐，加以族人、父執、義僕等的規勸，這才「改志換骨」，重新讓理將欲戰勝了。這個理欲不斷的戰爭和得失，便是本書的教訓，或說是理想。原序裏所謂彝常倫類間的發明，便是這個；「歧路燈」之名，也便指此。中國近世小說都有一個教訓或理想；像《紅樓夢》的人生如幻夢，《儒林外史》的諷刺功名熱，都是的。這種教訓或理想若能滲透在全書內，具體地寫出來，使人不覺其爲教訓或理想，便是高手。這非對於所表達的教訓或理想，先有一番眞誠的透闢的體味不可。若只是在開篇、結尾，或書中各處，泛泛地抽象地發些不痛不癢的議論，那是一些影響沒有；讀者但覺得是討厭的濫調吧了。《歧路燈》比起《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抽象的理學話確是多些，但作者卻仍能一樣地將自己的理想滲透於全書內；因爲書中理學話究竟也並不太多。馮友蘭先生的序裏，說此書道學氣雖重，但所寫大部分是道學的反面，所以不至陳腐。這種對照的取材，正是容易入人的，表達理想的法子。而那些理學話，又都是作者閱歷有得之言，說得鞭辟入裏，不枝不蔓；雖是抽象的，卻不是泛泛的；所以另有一種力量，不至與老生常談相等。至於我們現在贊同與否，自當別論。

次論結構。《儒林外史》現在雖號爲長篇小說，但實在還是雜記小說；因爲牠是一段一段的零星記載聯綴起來的。《紅樓夢》在我們知有《歧路燈》以前，確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眞正長篇小說，可惜沒有完；高鶚續作，也未能盡如人意。且這書頭緒紛繁，不免時有照顧不到之處；因此結構上有鬆

懈的地方。至於《歧路燈》，雖也「記載一家的盛衰」，與《紅樓夢》同，如郭先生所說；但節目卻少得多。這因書中人物不多之故，檢回目可知。人物不多，作者便可從容穿插，使牠的情節有機地發展；所以全書滴水不漏，圓如轉環，無臃腫和斷續的毛病。譬如開卷第一回，「念先澤千里伸孝思，慮後裔一掌寓慈情」，說譚孝移——主人公譚紹聞的父親——從祥符到丹徒去修家譜，祭祖塋，存問宗族，看見那邊子弟都用功讀書，回來時便憂慮着自己孩子的教育，這樣引起了全書。這一回的題材，與書名一樣，實是太迂腐些；看了教人昏昏欲睡。我初讀此書，翻閱第一回，覺得沒味，便掠在一旁；隔了多日，偶然再翻第二回，卻覺得漸入佳境，後來竟至不能釋手。本書至今不爲人注意，我想牠對於讀者的第一印象不大好，是一大原因；一定有些人看了書名或翻了前數頁，就不願再看下去。但這一回文字在結構上，卻是極有意義的：牠不但很自然的引出全書，並且爲後面一個大轉機的伏線；末四卷（共二十卷）全由這一回生出。那敗子所以能回頭，固有其內心上的變化，但到了「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地步，若沒有人援引一下，也無從上進的；這個援引的人，便在第一回裏伏了根。這樣大開大闔而又精細的結構，可以見出作者的筆力和文心。他處處使他的情節自然地有機地發展，不屑用「無巧不成書」的觀念甚至於聲明，來作他的藉口；那是舊小說家常依賴的老套子。所以單論結構，不獨《儒林外史》不能和本書相比，就是《紅樓夢》，也還較遜一籌；我們可以說，在結構上牠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眞正長篇小說。

次論描寫。本書不但能寫出各式人，並且能各如其分。《儒林外史》的描寫，有時不免帶有滑稽性的誇張，本書似乎沒有。本書尤能在同一種人裏，寫出他們各別的個性；這個至少不比寫出各色人容易。如他寫婁潛齋、侯中肴、惠養明同在譚家做過教讀先生，但心地、行止是怎樣懸殊！又如譚紹聞、王隆吉、盛希僑都是好人家子弟，質地都是好的，都是浮蕩少年；這樣地相同，而度量，脾氣又是怎樣差異！作者閱世甚深，極有描寫的才力，可惜並沒有盡其所長。他寫道學的反面，原只作爲映襯之用。他並不要也不肯淋漓盡致或委曲詳盡地寫出來；所謂「勸百而諷一」，想他是深以爲戒的。但是他寫得雖簡，卻能處處扼要，針針見血。這種用幾根有力的線條，畫出鮮明的輪廓的辦法，有時比那些煩瑣細膩到使人迷惑的描寫，反要直捷些，動人些。但以與《紅樓夢》的活潑，《儒林外史》的刻畫相比，卻到底是不如的；因而薰染的力量也就不及牠們了。本書之所以未能行遠，這怕也是一個原因吧。至於作者自己，他對於那些描寫法，大約實在有些不屑；看原序中痛詆《三國志》、《水滸》、《西遊記》、《金瓶梅》四書，便可知道。這原不大高明；可是他的書既從反面取材，終於也就不能不多少運用一些描寫的本領了。

若讓我估量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爲只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畢。《一般》第六卷第四號。）

〔一〕清李綠園著，樸社出版。

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

一

陶淵明年譜凡七本〔一〕：

一、王質《栗里譜》〔二〕（以下簡稱《王譜》）

二、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三〕（以下簡稱《吳譜》）

張縯《吳譜辨證》，今佚；惟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以下簡稱《李箋》）中尚存四則〔四〕。

陶澍《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五〕，首列王、吳兩譜（以下簡稱《陶攷》）。

三、丁晏《晉陶靖節年譜》〔六〕（以下簡稱《丁譜》）

四、楊希閔《陶靖節年譜》〔七〕（以下簡稱《楊譜》）

五、梁啓超《陶淵明年譜》〔八〕（以下簡稱《梁譜》）

六、古直《陶靖節年譜》〔九〕（以下簡稱《古譜》）

七、傅東華《陶淵明年譜》〔10〕（以下簡稱《傅譜》）

王、吳、張，南宋人，陶、丁、楊，清人；梁、古、傅三譜，作於民國，古、傅二君皆生存。《王譜》最早，疏

舛自不能免，然《丁譜》序所舉四謬，實多不當〔二〕。此譜中惟淵明居址一事，足資研討。《吳譜》徵引頗博，攷覈尤詳，發明之多，遠過《王譜》；居址而外，名字，甲子，出處諸端，皆加論列，爲後來諸家所本。張縯《辨證》，所存太少，不能定其短長。其論淵明年歲一條，自成一說，但不甚爲後人所重。《丁譜》(在《陶攷》前)論甲子，最得要領(見第三節)，餘無足觀。《陶攷》旁徵博引，辨析精詳；其所發明，尤在出處一事。譜首論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諸說則備載於《靖節先生集集註》(以下簡稱《陶註》)第三卷前，斷語獨創一解。《楊譜》僅論淵明出處之跡當存疑一節可取。《梁譜》簡而不密〔三〕，讀書得間，論年歲創見獨多。《古譜》就梁君說詳加考訂，所見稍有不同。徵引之多，雖不及《陶攷》，而條理之密過之。所論亦以年歲爲主，居址其次。別有《陶靖節年歲攷證》〔三〕，詳譜中所未及。古君鉤稽之勤，良有獨至；惟現存陶集，及陶傳資料，殊多錯迕，君既自創新說，勢難觸處皆通，遂不免強書以從我〔四〕，雖曰「執大法以繩」〔五〕，實不足以起信。《傳譜》似不甚經意之作，所據僅王、吳、梁三譜，吳瞻泰《陶詩彙註》，溫汝能《陶詩彙評》等，湯漢註《陶靖節先生詩》，《李箋》，《陶攷》，疑均未寓目〔六〕。惟駁《梁譜》頗有是處。又《陶攷楊譜》俱載淸儒辨淵明世系之說。此亦一大公案，自全祖望以來，論者甚衆。

年譜及論陶諸家所據資料，不外下列數者：

一、本集

二、顏延之《陶徵士誄》(以下簡稱《顏誄》)
三、《宋書》
四、蕭統《陶淵明傳》(以下簡稱《蕭傳》)
五、《晉書》
六、《南史》
七、陶茂麟《陶氏家譜》
八、湯漢註《陶靖節先生詩》〔一七〕(以下簡稱《湯註》)
九、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

《丁譜》序自述立譜之法曰:「依據本集,參稽史文」;《陶攷》則謂「倣季長(張縯字)《辨證》之例,以王、吳二譜並列於前,參攷宋、元以來諸家所說爲攷異。」各家取材範圍,此數語盡之。本集自最可考信。然記甲子載年歲諸作,各本多有異同,自宋已然,莫可究詰;其編比次第,亦不盡可憑。自餘足資考證之作,又多泛而不切。《顏誄》自可據,但當依《文選》所載,「春秋六十有三」一語作「春秋若干」〔一八〕。《宋書》、《晉書》、《南史》皆以淵明入隱逸傳(以下簡稱《宋傳》、《晉傳》、《南傳》),與《蕭傳》並行;自《蕭傳》以下,雖多相沿襲而各有新事〔一九〕,故當同見重也。陶茂麟《家譜》久佚。《陶攷》錄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及《昌邑陶氏族譜》所載宋李慶孫舊序,略存茂麟世系;然二者所記亦

不盡相合也〔一〇〕。譜牒尚郡望，往往虛誣難信，不足深論。《湯註》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謂《淵明》「平生危行遜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以「忠憤」論淵明，南宋始盛〔一一〕；王、吳二譜亦持此見。湯註《述酒詩》〔一二〕後，其說遂益堅。《李箋》多引各家評論，其中張縯、祁寬、趙泉山諸說，今已不見於他處，彌足珍貴。觀此，知陶譜之作，確可信賴之資料殊少〔一三〕；而譜家又多蔽於「忠憤」之論，其所爲亦僅鉤稽詩文史事，強爲牽合而已。千五百年來，聚訟紛紛，迄無定論，良有以也。

淵明名字之異，自《宋傳》以來已然。年號甲子之說，亦發於《宋傳》，《文選》五臣注爲之推波助瀾，遂成千古佳話。趙宋一代，論年號甲子者甚衆，論名字者次之。其論居址，則始於王、吳兩譜。論出處則始於《吳譜》。元、明二代，仍以年號甲子之辨議爲多，至清代不絕。清初全祖望始考淵明世系，創立新說；自後紛爭無已。至吳瞻泰、陶澍之論出處，則猶是承宋人之業耳。論年歲者，宋有張縯，清之中葉黃璋獨爲張目〔一四〕。至民國，梁、古二譜又各持一說，鉤深索隱，持之有故。此六者皆犖犖大端，容以次論之；其他猶有數事，悉屬細節，遂不能詳也〔一五〕。

〔一〕陶澍《靖節先生年譜攷異》永初二年云：「李公煥於《王撫軍座送客詩》註曰：『按《年譜》，此詩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下註云：「此年譜不知何人所撰。」按李公煥《箋註陶淵明集》引「年譜」僅此一處，無從比勘。但書中所引張縯語，兩見「年譜」字，皆指吳仁傑譜；李但稱「年譜」，當沿用張語例，所指亦《吳譜》也（李似未見王質譜）。今《吳譜》無此語，疑傳刻之誤。

陳沆《詩比興箋》二謂「宋王質，明潘璁均有淵明年譜。」玆僅見左白存重訂潘刊《阮陶合集》，並無年譜。

《宋史》三百八十八《李燾傳》有《陶潛新傳》並《詩譜》各三卷。今佚。其詩譜體例不知如何，疑亦年譜類也。

山東省立圖書館有趙孟頫所書陶譜刻石二方，有圖，未見。聞有仿刻本，亦未見。

吳瞻泰《陶詩彙註》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詩題下註云：「《年譜》：『隆安四年庚子，公罷佐鎮從都還。』」據《彙註》凡例，吳所見僅王、吳二譜，而皆無「罷佐鎮」語，不知何以致誤。至《移居》詩題下引年譜云：「義熙六年，公徙居南里之南村」，則誤以李公煥箋註爲年譜耳。

《梁譜》謂「《李箋》引《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下註云：「此非吳、王兩譜文」（《陶淵明》五〇至五一面）。按此說見《吳譜》元嘉三年，《李箋》係引張縯轉述《吳譜》語，故辭稍異。

〔二〕、〔三〕本文據陶澍《靖節先生集註》本。

〔四〕《總論》中二則，《贈長沙公族祖詩》，《命子詩》後各一則。

〔五〕《靖節先生集註》本。

〔六〕《頤志齋叢書本》。

〔七〕《鄉詩摭譚》本。

〔八〕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陶淵明》本。

〔九〕《隅樓叢書》本。

〔一〇〕商務印書館《學生國學叢書．陶淵明詩》本。

〔一一〕《王譜》解《怨詩楚調》中「始室喪其偏」一語爲「二十失妻」，丁謂其「肊說無據」是也。

檀韶爲江州刺史在義熙十二年，《王譜》於永初元年追敍其事，明著「義熙間」三字，不得詆爲「誤繫」。王弘爲江州在義熙十四年，《王譜》移下一年，丁糾其謬，是也。檀道濟爲江州，在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後，《宋書》本傳，《文帝紀》及《王弘傳》皆云然。丁謂在景平二年，蓋誤讀本傳耳。

〔二〕參閱註〔一〕末項，又如論淵明居江陵而不能自圓其說（《陶淵明》七四面）。

〔三〕《層冰草堂叢書》。

〔四〕陸侃如君跋《古譜》（《國學論叢》一卷一號又《國學月報彙刊》一），頗以爲病。詳第七節。

〔五〕《陶靖節年歲攷證》二一面。

〔六〕《陶淵明詩》凡例中雖言及《湯註》，而譜中徵引湯註，猶據《梁譜》，疑作書時並未參考此註本。

〔七〕《拜經樓叢書》本。

〔八〕集中所附《顏誄》，均作「春秋六十有三」，《梁譜》疑「後人據《宋傳》改增」（《陶淵明》九四面）。

〔九〕如《蕭傳》所載與子書，《晉傳》所記「祖茂，武昌太守」，《南傳》所記「妻翟氏」。

〔一〇〕《陶攷》五至一一葉。

〔一一〕南北朝、唐及北宋蓋多以淵明爲「隱逸詩人之宗」。

〔一二〕本韓駒說，黃魯直猶疑爲「讀異書所作」，均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

〔一三〕《雲仙散錄》引《淵明別傳》，今無聞；《散錄》淺妄，《別傳》有無不可知。《宋史·藝文志》及《李蘩傳》有《陶潛新傳》三卷，今佚。

〔一四〕黃有《大俞山房集》，僅見詩集，未見文集；此據《陶攷》（一二葉）。

〔三五〕淵明父先毋亡，一也。《怨詩楚調》「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始室」作始授室解，抑作年三十解，二也。有妾無妾，三也。《歸去來辭》之「家叔」與《孟府君傳》之「從父太常夔」是否一人，四也。蓮社結集之年，五也。（惟此事已經儲皖峯君論定，係在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西四〇二），見《國學月報》二卷七號。）

二

淵明名字，古今計有十說：

一，潛字淵明　《宋傳》，《南傳》及《蓮社高賢傳》主之，《蕭傳》作或說。

二，淵明字元亮　《蕭傳》主之，《宋傳》作或說。

三，潛字元亮　《晉傳》主之。

四，「字深明，名元亮」〔一〕　《南傳》或說，深即淵，避唐高祖諱改〔二〕。

五，潛字淵明前所行，淵明字元亮後所更，蓋以「自別於晉、宋之間」　《吳譜》引葉夢得說〔三〕。

六，淵明字元亮，一名潛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主之〔四〕。

七，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　《吳譜》主之，張縯從其說。

八，義熙中淵明字元亮，元嘉中潛字淵明　明熊人霖主之。

九，淵明字元亮，小名潛　《梁譜》疑其如此〔五〕。

十，潛字元亮，小名淵明　《古譜》引羅鬭雲君說。

前四者皆六朝及初唐人說。沈約《宋書》之成（齊武帝永明五年〔六〕，西四八七），上距淵明之卒（宋文帝元嘉三年〔七〕，西四二七），才六十年，而即有或說〔八〕，足見其事自始已爲疑案。大抵淵明門衰祚薄，其詩又不甚爲當時所重（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講藁》上編第六章），是以身沒未幾，名字已淆亂耳。葉說蓋本於黃魯直《宿舊彭澤懷陶令詩》（內集一），詩云：「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此作蓋亦以「忠憤」目淵明。首二語但以其名字爲戲，謂其能隱居不攖世網，非釋名字之義也。「以字行」即指「淵明」〔九〕。然此說實牽強無據。《吳譜》謂集載《孟府君傳》及晉義熙三年《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惟《蕭傳》及《晉書》、《南史》載其對檀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因主入宋更名之說〔一〇〕。按《顏誄》稱「有晉徵士陶淵明」，據義熙末徵著作佐郎，故書晉，書故名。義熙末去永初僅二三年，時猶用淵明，則入宋更名，當可信也。熊人霖爲公炤子《陶淵明集》作序〔一一〕，謂「陶公在義熙中名淵明，字元亮，元嘉中則改名潛，而以淵明爲字」。蓋參合《蕭傳》《宋傳》及《吳譜》說，與葉夢得所主適反，然無據。序中以《易》旨釋「潛」與「淵明」之義，頗曼衍。《梁譜》謂古者「君子已孤不更名」（見《禮記·曲禮下》），以爲晚年更名，殆不近理。又謂淵明五子皆有小名〔一二〕，疑潛亦淵明小名。惟「君子已孤不更名」係儒家所聞古禮。古禮至魏、晉已不遵行，阮籍所云「禮豈爲我輩設」正是一證。淵明雖不作達，然其澤於道家者深，澤於儒家者淺，且去古益遠，而謂其必守古禮，理不然也。

至另一事，更不足證，卽如淵明五子皆單名，淵明獨複名，父子豈不大相違耶！且何解於對檀道濟之言？《古譜》所引羅君說與集中自稱淵明處及《顏誄》均不合，其說解亦極離奇〔一三〕。

〔一〕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八十四謂原本當作「深明字元亮」，今文乃校者妄改。

〔二〕唐人又作泉明，李白《送韓侍御之廣德令》詩，「酣歌一夜送泉明」是也。

〔三〕在元嘉三年下；此說不見於現存葉夢得諸書中。

〔四〕此據衢本卷十七，袁本作「晉陶潛淵明」；惟衢本較早。

〔五〕《梁譜》綱目仍作「先生名淵明，一名潛，字元亮」。

〔六〕《宋書·自序》。

〔七〕《顏誄》，《自祭文》。

〔八〕錢大昕《跋陶淵明詩集》(《潛研堂文集》三十一)謂六朝最重門第，百家之譜皆上於吏部；沈休文撰宋史，親見譜牒云云。疑淵明卽有譜牒，亦未必爲約所見；不然，豈得並名字而不能定耶？

〔九〕《吳譜》謂黃詩歲晚二句乃承《南史》之誤，是矣；其論「潛魚」二句，謂「言淵明不如潛之爲晦」，深得淵明更名之意，蓋以爲二句乃釋淵明名字之義者，實誤。試思如吳說，前後文義將如何貫串耶？

〔10〕元嘉三年下。

〔一一〕未見，據郭紹虞君《陶詩考》講義引。

〔一二〕見《責子詩》及《與子儼等疏》。

〔一三〕《古譜》一，二葉。

三

年號甲子之說起於《宋傳》，《傳》云：

> （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書甲子而已。

《文選》二十六五臣注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題下云：

> 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

《宋傳》曰「文章」，此曰「詩」，《宋傳》曰「義熙以前」，此曰「晉」，此一變也。宋治平中僧思悅曰：

> 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西四〇〇）距丙辰（西四一六），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一〕，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後一十六年庚申（西四二〇），晉禪宋，……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二〕。

「五臣」謂入宋但題甲子，思悅自庚子計之，非「五臣」意也。按宋陳舜俞《廬山記》四〔三〕引顏眞卿《栗里詩》（《全唐詩》作《詠陶淵明》）云：「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

庚子歲，自謂義皇人。」亦自庚子計之。顏在思悅前，思悅之說或卽本此。然實與《宋傳》《五臣注》皆不合。至其駁「五臣」，謂陶詩中無標晉年號者，則良然。此二變也。曾季貍《艇齋詩話》主思悅說，然謂「陶淵明詩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此說始於五臣註《文選》云爾」。蓋誤以義熙爲宋年，本不足論。但《碧湖雜記》〔四〕言「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五〕，後世因仍其說」。其下稱述及曾，疑其解《五臣注》，卽據曾語。後人頗有信之者。此三變也。宋濂、郎瑛〔六〕意中之「五臣」說，又自不同。其駁之也，乃謂淵明在宋所作亦有不書甲子者，足知所重者偏於書不書甲子，而非年號甲子之辨。《陶攷》謂其不知所爭者乃晉、宋年號，是也。此四變也。何焯《讀書記》(《文選》)因謂「按集當云自永初以來，『不』書甲子；詩自《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稻》一篇外，無復書者」。此五變也。錢大昕《跋義門讀書記》(《潛研堂文集》三十)云:「文章當題年月，詩不必題年月。……《隋志》載淵明集凡九卷，今文之存者不過數首。……《桃花源記》稱太元中，《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此書晉氏年號之證也。《自祭文》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與休文所云如合符節。休文於淵明之文固偏觀而盡識之，義門未嘗盡見淵明所著文，何由知其失實?」錢雖稱述《宋書》，其所引證亦不盡合;《宋書》云，義熙以前書晉號，錢舉義熙三年文，所證適得其反耳。此六變也。陶澍及門人趙紹祖別出新意。趙謂淵明詩不必首首皆題年號甲子，不過於一年所作之前題之。……後人删而去之;其仍存甲子之數首，則以甲子在題上耳〔七〕。陶據《五柳傳》「嘗著文章

自娛，頗示己志」二語，謂其集必有自定之本，沈約去淵明不遠，必親見之。又謂自定之本當以編年爲序，而所謂或書年號或書甲子者，乃皆見於目錄中。又據《隋書·經籍志》，陶集錄自爲一卷，謂錄即目錄，唐初仍存，故李善〔八〕等依以作註〔九〕。此七變也。

按《宋傳》所著文章云云，當指淵明平生所作言之（其曰「皆題年月」，實是語病）；意謂義熙以前題年月則書年號，永初以來則不書，但云甲子而已。然義熙永初之間，題年月則如何，《傳》所未言。今以集攷之，題甲子者詩十二首，文三首，詩中庚子（西四〇〇）至癸卯（西四〇四）六首及辛丑（西四〇一）（或辛酉，西四二一）《游斜川》一首而外，皆義熙中作。文中《歸去來辭》及《祭從弟敬遠文》亦皆作於義熙中，惟《自祭文》作於宋世。題年號者文二首，《桃花源記》題「太元中」，不知何時作，《祭程氏妹文》則在義熙三年。義熙以後，既書年號甲子，永初以來書甲子者，又僅《自祭》一文（《游斜川》詩若作於辛酉〔一〇〕〔永初二年，西四二一〕，自亦應列入），是《宋傳》所說殊無據，殆是沈約憑肊之談；其斷自義熙者，當以義熙元年（西四〇五）爲淵明棄官歸耕之年耳。其義熙以後詩多記甲子，則沈存而不論矣。至錢大昕疑淵明集有散佚，攷之陽休之、宋庠〔一一〕、晁公武〔一二〕諸家敍錄，似亦不然。且以今本證之，沈說已自矛盾，不能成理，散佚與否殊無關耳。《蕭傳》《晉書》不採其說，信非無故。「五臣」殆覺《宋傳》於義熙、永初之間無詩之不可通，故爲改定其辭，然亦鑿空之論。思悅既辨之。思悅以下，論者多側重書甲子一端；蓋集中諸作書甲子者遠過於書年號者，論者遂爲所蔽也。

至何焯說而與《宋傳》《五臣注》相反〔一三〕，直無意義可言。陶、趙異軍突起，羌無實據，亦強爲之辭。大抵《宋傳》《五臣注》之說，後世疑者甚多，《陶註》三卷卷首所引可見。善哉《吳譜》之言〔一四〕曰：

> 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概，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

其說可信；拈出不稱宋號一事，尤足排難解紛，蓋最合集中實情也。《丁譜》亦曰〔一五〕：「陶集義熙以前備書甲子，不始於永初也。但自永初以後，不書劉宋年號爾。」說正同〔一六〕。然此不書者，有意耶？無意耶？以《述酒》詩徵之，或不爲偶然。得不書宋號一語，吳、丁以外各家甲子年號之論皆可廢。然《宋傳》云云亦有所本〔一七〕。《後漢書》七十六《陳寵傳》云：

> 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尙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此事與沈約所紀淵明出處甚相似：莽誅不附己者咸卽去職，所謂「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也。莽篡位，咸猶用漢家「祖」「臘」，所謂「永初以來但書甲子」也。約不必卽據范書，然范書當有所出，約用其事，固在情理中耳。

〔一〕《李箋》作十二首，是也。思悅當是僅計詩題，又漏第一卷中《游斜川》一首耳。

〔二〕據《曾集本》。

〔三〕據吳宗慈君等《廬山志副刊廬山記合校本》。

〔四〕宋人闕名撰。《說郛》作蔡宋之，陳喬樅編《謝疊山先生集》（卷五）亦收此記。

〔五〕《困學紀聞》二亦謂「陶淵明于義熙後但書甲子」。

〔六〕宋說見《金華叢書》本《宋學士集》十三，郎說見《七修類藁》二十。

〔七〕《讀書偶記》七。

〔八〕李善注《辛丑歲赴假還江陵》詩，全採《宋傳》。

〔九〕見《陶註》三。

〔一〇〕《古譜》謂《北宋》皆作辛丑，南宋始改辛酉，舉證多可信，見元嘉二年下。

〔一一〕陽序錄，宋私記，見《陶註諸本序錄》。

〔一二〕衢本《郡齋讀書志》十七。

〔一三〕周春《耄餘詩話》八謂《宋傳》云云但指所著文章而言；若詩則不然，大約晉時書甲子，入宋不書甲子（郭紹虞君《陶集考》講義）。其說承何而啓錢也。

〔一四〕元熙二年（卽永初元年）下。

〔一五〕永初元年下。

〔一六〕《眞西山文集》三十六《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云云。獨重「不著年號」，自是有見。惟必舉義熙以後，殊不須爾。傅占衡《湘帆堂集》十一《永初甲子辨》云：「陶詩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語最透澈。

〔一七〕《困學紀聞》二：「陶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四

淵明義熙元年乙巳（西四〇五）賦《歸去來辭》，序稱「彭澤去家百里」。《顏誄》稱「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南嶽當指廬山。又稱其「卒於潯陽縣之某里」〔一〕。《宋傳》《蕭傳》《南傳》並作「潯陽柴桑人」〔二〕；又謂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弘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三〕；據各家年譜，淵明時在南村。所引均不云栗里爲淵明故里。顏眞卿《栗里詩》亦無一語及之。至白居易《訪陶公舊宅》詩序（《白香山詩·長慶集》七）云：「今游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又詩云：「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乃謂栗里爲柴桑村落，有淵明故居矣。故宅易傅會，惟栗里在柴桑當可信。陳舜俞《廬山記》遂直以爲淵明所居；後世從之，實無確證也。《李箋·酬丁柴桑》詩題下云：「柴桑，潯陽故里」，又《戊申歲六月中遇火》詩下云：「靖節舊宅居於柴桑縣之柴桑里」，當係誤記集所載《顏誄》

中「潯陽縣之柴桑里」一語，不足辯。

淵明始居柴桑，嗣三經移居，上京，南村，潯陽是也，《還舊居》詩、《移居》詩（《陶註》二）及《顏誄》可證。《還舊居》詩，說者最爲紛異。詩在第三卷，列《乙巳使都》詩（西四〇五）及《戊申遇火》詩（西四〇八）之間。《四庫全書提要》謂今世陶集即宋庠《私記》〔四〕所稱「次第最若倫貫」之「江左本」，然已非蕭統所編之舊。且據北齊陽休之序錄〔五〕，統之前陶集已行世，「編比顚亂，兼復闕少」，則陶詩次序紊亂，由來已久。而惲敬《靖節集書後一》〔六〕云：「昭明太子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搜校，粗爲區目』，是先生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則並統所編亦未必當耳。《還舊居》一詩次於《乙巳使都》詩後，殆以淵明乙巳（西四〇五）歸耕當之。是卷之首有《始作鎭軍參軍》詩，《庚子歲從都還》詩（西四〇〇），前作初無甲子，而次在前者〔七〕，殆以題中「始作」二字。後人膠執此次第，遂多戲論。就《還舊居》詩言，王、吳兩譜均以淵明始就軍職在庚子（西四〇〇），所據即此次第，及詩首「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二語，蓋庚子（西四〇〇）至乙巳（西四〇五）恰爲六載也〔八〕。又據「上京」「去還歸」及「今日始復來」等語，謂淵明六載中家居京師；蓋以此「上京」與《荅龐參軍》詩（《陶註》一）中「作使上京」同論。至舊居所在，則王謂柴桑，吳謂潯陽〔九〕，吳意或以潯陽概柴桑耳。

然家居京師之說，與《庚子歲從都還》，辛丑正月《游斜川》，《七月赴假還江陵》，《癸卯始春懷古田舍》，《十二月中與從弟敬遠》諸作，無不乖迕；王、吳乃各從而爲之辭。王謂從都還當是銜命自京

都上江陵。父在柴桑，故詩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爲人度不肯適都，淵明當是已舍單行。吳則謂此還正挈家居京師。《游斜川》詩（西四二一），吳作「辛酉」；《赴假還江陵》詩，無確說。王說牽強過甚，茲不論〔10〕。癸卯二詩（《懷古田舍》二首在西四〇三，《與弟》一首在西四〇四），王謂淵明失父，宅憂居京，思盜城，故有《懷古田舍》，其《與弟》詩云：「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在都亦當是處野。吳據《飲酒詩》及本傳，謂《懷古田舍》當作於辛卯（西三九一），而《與弟》詩云云，則因癸卯桓玄篡晉，有激而云。此其說之迂曲，至爲顯白。《陶攷》辨之甚詳〔11〕，謂誤在以《還舊居》詩之上京爲上都，不知上京乃山名，淵明舊居所在也。其說蓋本諸宋人地志，朱子語錄及與人書，吳師道詩話〔12〕，雖尚未可考信，或不爲無根之談。又謂淵明作鎮軍參軍當在己亥（西三九九），自是至甲辰（西四〇四），去來靡定，故詩有「六載去還歸」之語〔13〕。然詩作於乙巳（西四〇五），所云「六載」乃截至前一年而止，亦難通也。《古譜》說此詩最爲近之：謂舊居指栗里。而淵明移居南村，據《吳譜·與殷晉安別詩》（《陶註》二），參以《宋書·武帝紀》《殷景仁傳》，定在庚戌歲〔14〕（西四一〇）。上溯乙巳（西四〇五），適爲六載〔15〕，爲「疇昔家上京」之年，則乙巳（西四〇五）始自柴桑遷居上京也。此六載中，栗里尚時往還，故詩有「六載去還歸」之句，及徙南村，遂不復至；更閱多年，始重來一行，乃惻愴多悲，邑屋非舊，鄰老罕遺也。若如《陶攷》說，六載之中，數來數去，何至感慨如此〔16〕。惟作詩之年殊不能定；此事與淵明年歲若干又頗相涉耳。《移居》詩明言南村，不須爭辨。

惟南村所在，說各不同。《李箋》云：「卽栗里」，又《戊申歲遇火》詩下云：「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其南村之註，不知何據；至云「越後年」，卽義熙六年庚戌（西四一〇），蓋亦本《吳譜》。南村地望，則當推《古譜》所論爲可信；《古譜》通考淵明詩文及誄傳，自義熙七年（西四一一）至元嘉四年（西四二七）凡十七年，其蹤跡皆在潯陽，因知南村當在潯陽負郭〔二七〕。惟《譜》中有「終焉上京」〔二八〕一語，蓋據《還舊居》詩，以爲淵明晚年重寓上京；然未申其說。按古氏既信《顏誄》卒於潯陽，實無從再持此論；且詩中固亦無定居意。《顏誄》所稱潯陽某里，不知是否卽南村，抑淵明晚年又移居他處也。

葉夢得以《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詩，疑淵明嘗仕桓玄〔二九〕；《吳譜》駁之〔三〇〕，謂庚子（西四〇〇）至乙巳（西四〇五）凡六年，《還舊居》詩既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庚子（西四〇〇）又有《從都還阻風》詩，是未嘗居江陵；使淵明果仕玄，固當居之也。其實《還舊居》詩之六載，固不如吳說，而居江陵與仕玄亦不必併爲一談；惟淵明未嘗居江陵則可信耳。《梁譜》論《還舊居》詩〔三一〕，謂細繹全集，未見有六年不還家痕跡，因疑上京，當從毛氏綠君亭本作上荊〔三二〕，所指爲江陵。淵明僑寓於此。「故辛丑歸省之作，題云『還江陵』，而《祭妹文》敍丁憂事〔三三〕，亦言『昔在江陵』（重罹天罰）也」。舊居則謂指柴桑；而《癸卯懷古田舍》爲在江陵懷柴桑之作。按上荊之名無所本，又爲孤證，不足據。《辛丑歲赴假還江陵》詩乃敍行役，非歸省，梁君誤記《庚子從都還》詩耳。《祭妹文》語

祇言在江陵丁憂，無家居其地意〔二四〕。「懷古田舍」謂於田舍中懷古〔二五〕，亦不得云江陵作。梁君於此原有小註，以作鎮軍參軍而移家江陵爲不可解，蓋於其說亦不能自信。《傳譜》採梁君說，然於何以移居江陵，亦云不可知〔二六〕。倡其說者且不能自圓其說，何能起他人之信耶？

至論栗里遺址所在，古今頗有其人〔二七〕，然千百載後，必指某處爲是，某處爲非，亦未免鑿矣，茲故不及焉〔二八〕。

〔一〕集本作「卒於潯陽縣柴桑里」。

〔二〕《晉傳》不載址貫。

〔三〕《晉傳》不言栗里。

〔四〕、〔五〕均載《陶註・諸本序錄》。

〔六〕《大雲山房文藁》二集二。

〔七〕《晉集》本《始作鎮軍參軍》次於《庚子從都還》詩之後。

〔八〕韓子蒼亦以庚子至乙巳爲六載，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或爲兩家所本。《李箋》引趙泉山語，乙未佐鎮軍，至庚子爲六載，當是據《庚子從都還》詩推算，殊不足信。

〔九〕兩譜義熙元年下。

〔一〇〕《王譜》隆安五年下。

〔一一〕元興二年下。

〔一二〕義熙元年下。

〔一三〕隆安五年下。

〔一四〕丁楊兩譜謂移居在義熙四年戊申，則徒以戊申有《遇火詩》而想當然耳。

〔一五〕《古譜》義熙七年以甲辰至庚戌爲六載，亦可通。

〔一六〕以上大體用《古譜》文。

〔一七〕義熙六年下。

〔一八〕《古譜》二，三葉。

〔一九〕《吳譜》隆安五年下引。

〔二〇〕隆安五年下。

〔二一〕元興二年下。

〔二二〕梁君據《陶註》引。

〔二三〕王、吳並以爲外艱，《陶攷》（太元元年下）駁之謂爲丁內艱，梁、古兩譜申其說，可從也。

〔二四〕《祭妹》文（《陶註》七）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憂是切。」潯陽亦稱楚，《贈龐參軍詩》（《陶註》一）有「依依舊楚」語可證。《吳譜》隆安五年下謂此六句指江陵丁外艱而兄弟乖隔，獨與女弟居喪。謂女弟居江陵，淵明父或因過其女，以疾留江陵，遂不起也。亦曲說。

〔二五〕《陶攷》說。

〔二六〕隆安五年下。
〔二七〕《古譜》卽嘗論之，見三葉。
〔二八〕吳宗慈等編《廬山志》六，目之二十，載此種論辨甚多。

五

《宋傳》云：

潛少有高趣。……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鎭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一〕。

此淵明出處之凡也，請依次論之。

（一）(江)州祭酒　《梁譜》據《顏誄》「初辭州府三命」一語，謂淵明未嘗就州職，而以《始作鎭軍參軍》詩之「始作」爲「始仕」〔二〕。按《顏誄》云：「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敍淵明仕履只二語，但明其爲養而仕，

爲貧而仕耳。「初辭」句即《宋傳》「少有高趣」〔三〕意。顏本不重敍事，不當據以疑史文。《吳譜》太元十八年癸巳（西三九三）下，謂是歲淵明二十九，爲州祭酒，蓋據《飲酒》詩第十九「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二語推算〔四〕。《陶攷》從之，更舉同詩「亭亭復一紀」語爲證，謂癸巳（西三九三）至乙巳（西四〇五）適爲一紀，蓋以詩爲乙巳（西四〇五）作。然詩第十六云：「行行向不惑，淹留竟無成」，實爲作詩之年〔五〕；按《吳譜》，乙巳（西四〇五）淵明已四十一，與此不合也。《古譜》倡淵明五十二歲說，以「向立年」指彭澤棄官之時，謂「學仕」乃謙詞，非「始仕」意〔六〕。然《譜》中淵明棄官在三十歲，亦與「向立」不合。古君又據《宋傳》「弱年薄宦」之言，以「弱年」爲弱冠時，因謂淵明爲州祭酒，當在二十左右〔七〕；其釋「弱年」，似亦太鑿也。

（二）鎮軍參軍　《陶集》卷三首列《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鎮軍即鎮軍將軍，稱鎮軍者省文；集中以衞將軍爲衞軍（《答龐參軍》詩序，《陶註》一），左將軍爲左軍（見《贈羊長史》詩序，《陶註》一），皆同此例。曲阿，今江蘇丹陽縣。《文選》李善註此詩題下云：

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八〕。」

葉夢得亦疑淵明嘗仕劉裕，惟非其本意，蓋迫之仕耳〔九〕。《吳譜》以此詩爲隆安三年己亥（西三九九）作，謂裕元興三年（西四〇四）行鎮軍參軍，與此先後歲月不合，且淵明亦豈從裕辟者〔一〇〕！惲敬《靖節集書後二》云〔一一〕：「元興二年（西四〇四）桓玄篡位。三年（西四〇五）劉裕復京邑，行鎮軍將

鎭軍參建威，自建威令彭澤，然後脫然遠去。」與葉夢得同信李善註而立說相反。《陶攷》謂「鎭軍」指劉牢之，淵明以隆安三年己亥（西三九九）參其軍，說甚繁〔三〕。《梁譜》亦同此見，但敍在隆安二年戊戌（西三九八）；說異於《陶攷》，而與陶先所爲《靖節先生爲鎭軍建威參軍辨》〔四〕近似；《辨》中所陳，將於後文詳之。大抵葉、吳、惲、陶諸家，皆有「恥事二姓」一語橫梗胸中，故或信或不信李善註，均曲爲辭說，以申此義。實則勿論淵明見解如何，裕是時逆跡未著，亦何由「微窺」、「逆揣」〔五〕？知其必篡，輒於十六年前恥事二姓哉！此一事也。《陶集》次第不足憑信，前已具言；《始作鎭軍參軍》詩以「始作」二字列在三卷之首，要當以史事證之。李善引臧榮緒《晉書》文，已先見，《陶攷》亦云：「東晉爲鎭軍將軍者，郤愔以後，至裕始復見此號〔六〕」，其時又在乙巳（西四〇五）淵明棄官之前，則淵明之仕裕，豈不信而有徵耶〔七〕？尋《宋書・武帝紀》元興三年（西四〇四）裕鎭石頭城，義熙元年（西四〇五），屢請歸藩，三月，旋鎭丹徒。淵明始作參軍而經曲阿，當是赴丹徒；味「歸藩」之語，裕在丹徒殆亦設軍府也。「始作」但謂初就軍職，惲氏以爲自幸附義〔八〕，梁君以爲「始仕」，皆無當。此二事也。

陶澍《靖節先生爲鎭軍建威參軍辨》以隆安三年己亥（西三九九）至義熙元年乙巳（西四〇五）當《還舊居》詩〔九〕之「六載」，謂其所以知參軍不始庚子（西四〇〇）而始己亥（西三九九）者，以《庚子

從都還》詩有「久游戀所生」及「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等語，若其年始出，五月卽還，是離家不過數旬，安得云「久游」，而一再欣喜若渴耶？時劉牢之以鎭北將軍開府鎭京口。其不稱「鎭北」而稱「鎭軍」者，《晉書·王恭傳》載都督以「北」爲號者果有不祥，恭表讓軍號（平北將軍）而實惡其名。牢之正當恭之後，而「鎭北」適有時忌；淵明爲其僚佐，不稱「鎭北」而稱「鎭軍」，正禮所謂從俗從宜〔一〇〕云云。然據《晉書·安帝紀》，牢之爲鎭北將軍，實在隆安四年庚子（西四〇〇）。《陶攷》於是改定其說，謂己亥（西三九九）牢之爲前將軍，東討孫恩於會稽，淵明從之。而《晉書·職官志》有左右前後軍將軍，左右前後四軍爲鎭衞軍。牢之爲前將軍，正鎭衞軍，卽省文曰「鎭軍」，亦奚不可云云〔一一〕。以此知《辨》作於前也。按是年牢之爲前將軍，討孫恩，見《宋書·武帝紀》。《晉書·安帝紀》作輔國將軍；次年始以前將軍爲鎭北將軍。吳士鑑劉承幹《晉書斠注》十引丁國鈞《晉書校文》一云：「以《牢之傳》攷之，則進號前將軍在破孫恩後，此紀所書官號爲得其實，《宋書》誤。」然則己亥（西三九九）牢之不爲前將軍矣。抑「左右前後四軍爲鎭衞軍」一語亦誤。按《晉書·職官志》「五校」條下有云：「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鎭衞軍」，意卽省併爲一軍；《陶攷》引此，截去「後省」二字，義便大異。至《飮酒》詩第十「在昔曾遠游，直至東海隅」二句，則當從劉履《選詩補註》五說：東海隅卽指曲阿，其地在宋爲南東海郡；固不必傅會牢之討孫恩事〔一二〕。然則若主鎭軍參軍爲牢之，惟有採「鎭北」時忌之說，而移淵明作參軍之年於庚子（西四〇〇），然亦太曲矣。又論《始作鎭軍參軍》詩者，恆以《庚子

歲從都還》詩爲言。淵明何以在都，其事難知；尋二詩皆直敍歸省，不及宦情，與《始作鎭軍參軍》、《辛丑歲赴假還江陵》、《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諸作悉異也。

（三）建威參軍　集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吳譜》謂是年劉懷肅以建威將軍〔三〕爲江州刺史，淵明實參建威軍事，從討桓玄逆黨於江陵。《陶攷》謂其據晉義熙元年（西四〇五）三月桓振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而淵明詩題云：「乙巳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故遂以此事當之。然懷肅雖亦號建威將軍，而時爲淮南、歷陽二郡太守，非江州刺史〔四〕。吳瞻泰《陶詩彙註》於此詩題下云，《晉書·劉牢之傳》：「劉敬宣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鎭潯陽」，《宋書·劉敬宣傳》所載亦同，實安帝元興三年甲辰（西四〇四）。則淵明爲敬宣建威參軍，未可知也。《陶攷》、《古譜》從之，陶謂淵明爲江州柴桑人，得佐本州戎幕〔五〕。《古譜》元興二年癸卯（西四〇三）下論《始春懷古田舍》詩竟，因謂淵明以後復作參軍縣令，亦因去家不遠，聊復爲之。理或然也。惟入建威幕之時不可知。乙巳（西四〇五）三月，安帝自江陵反正，敬宣自表解職〔六〕。陶澍《靖節先生爲鎭軍建威參軍辨》謂淵明使都，當是奉賀復位，或並爲建威表求解職，其說殊嫌過巧。

（四）彭澤令　《歸去來辭序》云：

親故多勸余爲長吏，……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

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二七〕十一月也。

史但稱其求爲縣令而不詳。此云「四方之事」，當指爲建威使都，「諸侯」當卽指建威；至所云「家叔」，《陶攷》疑與《孟府君傳》之「從父太常夔」爲一人〔二八〕——若然，則夔或嘗爲之推轂耶？彭澤之歸，史稱因督郵之故，與序異。《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三引韓駒云：「余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洪邁《容齋五筆》一亦謂「觀序中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厲』『違己』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辭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吳譜》謂不知者以爲督郵，知者以爲爲女弟之喪；實則是時劉裕自以復晉鼎於桓氏竊據之餘，規模所建漸廣，決非臣事晉者，故淵明見幾而作。尋督郵之事，殆非虛構，而謂以此去職，則史家張大之詞；妹喪固是實情，然亦以去志久決，故藉此急求自免，庶有詞以對親友及執事者耳。序中語氣明明可見，不僅辭中不及武昌已也。然洪說要最爲得之。

《宋傳》謂淵明「恥復屈身異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後來多信其說，卽思悅、宋濂亦以

爲「得其實」。五臣注「恥事二姓」，卽「恥復屈身異代」。《王譜》所謂「逆揣」，惲敬所謂「微窺」，則皆本於「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二語；而《碧湖雜記》引晉恭帝禪宋之言，謂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裕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云云，以證成「逆知未流」之說，蓋又變本加厲者。惟惲敬雖許《宋傳》所言得淵明之心，而於「高祖王業漸隆」一語，則謂爲「未悉當日事勢」，蓋淵明去官時，裕猶未執政也〔二九〕。全不信《宋傳》語者，僅方東樹、梁啓超二氏。方所著《陶詩附考》（以下簡稱《方考》）謂淵明彭澤解歸之年，裕始以下邳太守〔三〇〕拜都督鎮京口，豈得云王業已漸著而不可待乎？又謂淵明之不仕，其本量高致，原非爲禪代之故。梁君謂淵明祇不顧見當日仕途混濁，羞與熱中之人爲伍耳，初不關裕之王業隆不隆〔三一〕。二氏之說是也。

（五）赴假還江陵　集有《辛丑歲七月中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敍行役事。江陵之行，於史無徵，論者紛紜，莫衷一是。葉夢得謂荊州刺史自隆安三年（西三九九）桓玄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至於篡未別授人，淵明之行在五年（西四〇一），疑其嘗爲玄迫仕也〔三二〕。《王譜》據《庚子歲從都還》及《游斜川》二詩，謂淵明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三三〕。語極含混，臆測而已。《吳譜》言是時淵明居京師，果仕玄，不應爾，因疑爲省親。居京之說，前既破之，則亦不足難葉也。《陶攷》謂淵明如參玄軍，不得途經曲阿〔三四〕，語殊支離；又以赴假爲假歸，謂淵明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請假歸覲，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三五〕。無端增一「自」字。至疑爲奉詔止桓

玄入都〔三六〕，更屬不根之論。《古譜》從陶說而釋「赴假」爲「急假」，輾轉引證以成其說〔三七〕。然其箋陶詩〔三八〕，於此作題下引《世說》「陸機赴假還洛」以明「赴假」之義。此文見《自新篇》云：「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此寧類「急假」耶！抑機吳人，若云假還，何得向洛耶！足知「赴假」當卽今言銷假意；淵明正是銷假赴官，乃有「投冠」「養眞」等語耳。惲敬據本傳「州召主簿不就」，謂淵明旣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其不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玄領江州刺史駐南郡（卽江陵）也〔三九〕。說殊繳繞。按史敍抱羸疾，在不就主簿，躬耕自資之後，惲所謂以疾乞假，實爲無中生有。以全詩及所紀之年攷之，淵明固嘗仕玄，蓋無庸諱；惟所仕何官則不可知矣。淵明歷仕，據《吳譜》先後凡十三年；《歸田園居》詩第一「一去三十年」，以從《吳譜》說作「十三年」爲是，與《飮酒》詩第十九之「亭亭復一紀」，《雜詩》第十之「荏苒經十載」，似皆指其事也。

〔一〕《蕭傳》《南傳》皆有「元嘉四年，將復徵命」一語。

〔二〕隆安二年下。

〔三〕《顏誄》亦云：「弱不好弄，長實素心。」

〔四〕《王譜》元興三年下，謂淵明爲州祭酒，在壬辰、癸巳之間。

〔五〕《梁譜》（義熙八年下）謂《飮酒》詩二十首，非作於一時，《古譜》（義熙十年下）據詩序駁之。古君說是也。

〔六〕義熙元年下。據集中《祭從弟敬遠文》及《後漢書·袁安傳》。

〔七〕太元二十年下。

〔八〕《陶詩彙註》三引李善註，多「辟公參其軍事」一句，不知何以致誤。

〔九〕《吳譜》隆安五年下引。

〔10〕隆安四年下。

〔11〕《大雲山房文藁二集》二。

〔12〕《宋書·武帝紀》謂何無忌、劉道規破玄大將鄭鈴等，進據潯陽，時裕固鎮石頭耳，惲說誤。

〔13〕隆安五年下。

〔14〕《陶文毅公全集》四十三。

〔15〕「《王譜》自宋武帝芟玄復馬，逆揣其未流，即不出」。「微窺」係惲敬語，引見上文。

〔16〕《陶攷》上二八葉。

〔17〕明茅國縉《晉史删》二十六謂淵明爲鎮軍建武參軍；建武之號雖見於《晉書》，然此當是誤字。又清周濟《晉略彙傳》七謂淵明隆安四年爲武陵王遵鎮軍參軍，按《晉書》六十四《元四王傳》不云遵爲鎮軍參軍，惟遵父晞嘗爲之，見《簡文帝紀》，濟豈誤記耶？

〔18〕《靖節集書後一》。

〔19〕原作《歸田園居》詩，當係偶誤。

〔20〕《梁譜》疑「鎮車」爲「鎮北」之譌，見《陶淵明》六七面。

〔二一〕《陶攷》上二八葉。

〔二二〕《陶攷》上三〇葉。

〔二三〕《晉書斠注》九十九《桓玄傳》引《晉書校文》一曰：《宋書·懷肅傳》但言爲輔國將軍而不及建威。然此紀及桓玄、桓振傳皆作建威將軍，疑《懷肅傳》失書，或輔國卽建威之譌。

〔二四〕《宋書》四十七本傳。

〔二五〕《陶攷》上四一葉。

〔二六〕《宋書》四十七本傳。

〔二七〕《晉傳》謂義熙三年（西四〇七）解印去縣，當係誤讀《祭妹文》。文作於「服制再周」之時，故云義熙三年也。

〔二八〕義熙元年下。

〔二九〕《靖節集書後二》。

〔三〇〕《宋書·武帝紀》，是年爲靑、徐二州刺史，方誤。

〔三一〕《陶淵明》六面。

〔三二〕《吳譜》隆安五年下引。按據《晉書·安帝紀》及《桓玄傳》，是年玄已兼領江州刺史。

〔三三〕《王譜》同年下。

〔三四〕、〔三五〕俱見《陶攷》上二七葉。

〔三六〕《陶攷》上三一葉。

〔三七〕隆安五年下。

〔三八〕《隅樓叢書》本《陶靖節詩箋》。

〔三九〕《靖節集書後一》。

六

淵明爲侃曾孫，見於《宋傳》、《蕭傳》、《晉傳》、《蓮傳》。祖茂，武昌太守，見《晉傳》。《李箋・命子》詩註謂「陶茂麟譜以岱爲祖」，又謂「父姿城太守，生五子」〔一〕。又引趙泉山曰：「靖節之父，史逸其名，惟載於陶茂麟《家譜》。」《陶攷》謂茂麟《家譜》僅見於《宋史・藝文志》，久失傳。據《昌邑陶氏族譜》所載宋仁宗時李慶孫舊序，略知茂麟世系〔二〕。序係茂麟孫鑑立石，而文中謂鑑所存譜錄〔三〕已剝落不全，頗多無從稽考。此譜錄不知是否卽茂麟譜。南宋初鄧名世作《古今姓氏書辨證》，敍茂麟先世甚詳〔四〕，雖亦似有脫落，然視李慶孫所記完整多矣。謂侃生員外散騎岱，岱生晉安城太守逸〔五〕，逸生彭澤令贈光祿大夫潛，潛生族人熙之。鄧氏亦不知何據。而趙泉山、李公煥兩家引茂麟譜，又不知嘗親見之否〔六〕。是則此譜已是疑案，其所敍更難考定矣。按《晉書》六十六《陶侃傳》：「岱，散騎侍郎」，與淵明《命子》詩（《陶註》一）所云「惠和千里」不合；淵明亦未贈光祿大夫；至「生族人熙之」一語，尤顯有譌誤：足知譜牒之不可信。其改茂爲岱，當以茂名不見《侃傳》，恐人不見重耳。惟侃爲淵明曾祖，則從無異辭。至全祖望始疑之。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四十有《陶淵明世系考》，謂淵明爲侃七世孫。所據有二事：一者侃十七子，九人皆見《晉書》，得列附傳，而謂其餘不顯。淵明之祖，武昌太守茂也，使亦在十七人之內，則不得曰九人而外不顯。可知茂非侃子。二者，淵明有《贈長沙公族祖詩》（《陶註》一），序云：

長沙公於余爲族祖，同出大司馬〔七〕。昭穆既遠，已爲路人。……

攷《晉書》，侃卒，（長子夏以罪廢）以第三子瞻之子宏嗣，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封吳昌縣侯〔八〕。淵明爲侃曾孫，則於綽之爲再從昆弟，於延壽爲族叔，固不當有「族祖」之稱，亦不當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然則據諸家〔九〕謂是詩爲延壽作，淵明固當爲侃七世孫。其於侃以女妻孟嘉，實爲淵明外王母〔一〇〕一事，則云「屬盡則同姓亦疏，於親表乎何有！」後王昶亦主此說〔一一〕，姚瑩《東溟文後集》一有《與方植之論陶淵明爲桓公後說》，以詩所稱長沙公爲綽之，而以淵明爲侃六世孫。謂淵明與宏年不相接。若是延壽，爲淵明族祖，則襲爵之宏，是爲高祖，其支派當在長沙，無緣還居潯陽。以綽之爲族祖，則高祖乃瞻也。瞻子未必止宏一人；襲爵之宏必居其長。兄弟不得立者，未必偕往長沙，或居潯陽，蓋故里也。

按曾祖侃之說始見《宋傳》；祖茂祇載《晉傳》。茂非無爵位，宋不應不記；疑沈約所據僅《命子詩》次第，初未見譜牒。抑《晉傳》雖見茂名，而《侃傳》諸子中復不列之；茂位既非不顯，理不應爾。疑作《侃傳》者與作《淵明傳》者所據不同，遂致牴牾；《晉書》本成於衆人之手，小小疏漏，自難免也。

至《晉傳》曾祖侃之語，不知是否別有所本；或卽沿襲《宋傳》，亦未可知。此一事也。

《贈長沙公族祖詩序》已引，其詩首章云：

>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

詩題及序，並此所言，殊與史文違迕，南宋人已疑之；則有序中一作「余於長沙公爲族祖」，及「長沙公於余爲族」爲句之說。《吳譜》以「長沙於余爲族祖」乃俗本所改。疑淵明所見乃延壽之子，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也。又謂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又謂長沙公於宗族之義過薄〔二〕。張縯於「族」字絕句，謂長沙公爲延壽，淵明不欲以長自居，故相稱以「族」。然莫友芝翻宋本，《曾集本湯註》，《李箋》固皆從「長沙公於余——」之文，而以「余於長沙公——」爲「一作」，疑「一作」乃經人校改，非本來面目；至曾、湯、李諸家皆以「族」字絕句，則採張縯說。此二事也。

直以淵明不出於侃者，閻詠也，說見《左汾近稿》〔三〕。所據亦爲《贈長沙公詩》。其讀詩序，以「族」字絕句，謂「大司馬」當作「右司馬」，指漢高祖功臣舍；蓋淵明果出於侃，此襲公爵者方爲吾從祖昆弟子之（指延壽），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哉！詩曰：「念茲厥初」，「初」正指漢初而言。又謂《孟府君傳》（《陶註》六）稱「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亦豈稱曾祖之辭？方東樹〔四〕申其說，惟不主「族」字絕句，亦不主改「大司馬」爲「右司馬」〔五〕；於長沙公之爲綽之爲延壽不具論，但謂其人於世次適爲淵明祖行〔六〕。方說雖詳，多前人所已言。其論「大司馬」，謂魏、晉重譜牒，相尚以郡望，多

虛誣失實，此大司馬或是陶譜謂始祖舍相沿爲望之稱，後人耳目所習，祇知有一陶侃贈大司馬，因竪附著之耳〔一七〕。至《命子》詩舉侃者，侃爲族祖，世近名赫，自不得遺也。

篤信史文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三十二《跋陶淵明詩集》舉閻氏之謬凡五；其論「右司馬」，謂漢初，軍營有左右司馬，品秩最卑，不過中涓、舍人之比；舍位爲列侯，不稱侯而稱右司馬，稍通官制者知其不可。說最有見。又據《命子》詩述侃勳德，謂攀援貴族，鄉黨自好者不爲，淵明高士，豈宜有此！然洪亮吉《更生齋文甲集》三《後蕭陶氏重修族譜序》辨之云：「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高、勳業重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蓋漢、晉以來文士皆然，非獨淵明也。」錢論「昭穆既遠，已爲路人」二語，謂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疏，故有「慨然寤嘆，念茲厥初」〔一八〕之句。其云「昭穆既遠」者，隱痛家難，不忍斥言耳。說蓋本《吳譜》及葛立方《韻語陽秋》〔一九〕。陶澍雖從錢說，於此解乃云「以辭害意」。《方考》則謂淵明平昔吟詠，並無悼心家難之語，而此詩方頌美如新，乃僅於此「昭穆」一語寓感，亦太隱矣。且「昭穆」亦無兩世之解〔二〇〕。其說是也。錢又以《顏誄》「韜此洪族」爲言，謂指宰輔之冑。《方考》謂《命子》詩稱陶唐，虞賓，御龍，豕韋，司徒，愍侯，丞相，累世名德，豈不足當「洪族」之稱，而必屬之侃一人耶〔二一〕！按「洪族」僅是泛言，未足據以爲證；洪亮吉且以《顏誄》不言淵明出於侃，證成閻氏之說也〔二二〕。孫志祖《讀書脞錄》六論淵明世系，則謂長沙公不著名字，必非侃之子爲淵明大父行者；主從閻氏改「大司馬」爲「右司馬」。至淵明爲侃後，據《命子》詩甚顯

白。其意蓋謂別有一陶姓長沙公；實毫無依據，不足信。其疑《孟府君傳》「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一語中「陶侃」二字爲孟氏後人所增，尤妄。近人曾星笠君有《陶淵明世系略考》，載廣州印行之《文學雜志》四，謂據《侃傳》，淵明祖行決無襲爵爲長沙公者。《贈長沙公詩序》首句當作「余於長沙公爲族祖」，題下「族祖」二字衍〔三〕。序文本意，純就己說。又謂此詩必爲延壽作；以長沙爲大宗正統，稱爲「族孫」，嫌有未安，故詩云「於穆令族」，各本註云一作「祖」，誤。此蓋從張縯說。又謂玩全詩命意，皆尊長對卑幼之辭；率意之言，勖勉之語，皆以此故。則長沙公當爲侃六世孫。然據《侃傳》，至延壽傳世僅五。此必史傳中脫去一代，或在宏與綽之之間，或在綽之與延壽之間。按曾君所說詩意，殊未必爾；至謂史傳脫文，更涉虛構之嫌也。

舊說既有難通，七世孫六世孫之說亦不可信；方東樹謂侃卒於成帝咸和九年（西三三四），下逮哀帝興寧三年（西三六五）而淵明生，相距三十一年而得七世，何得如是之遽！且淵明母乃侃外孫女，亦不應降配侃六世孫〔四〕。六世孫說可同此破。而閻、方二氏之論，於「大司馬」一事，又殊難爲辭：閻氏改字固不足憑，「右司馬」之稱又不衷於理，如錢氏說。方氏則祇憑揣測；姚瑩嘗歷考史籍，漢、晉以來，絕無陶氏爲大司馬其人，至侃始得追贈此官〔五〕，其說殊非徒弄筆墨所可爭。大抵此事祇可存疑矣。

〔一〕據趙泉山語，此當亦茂麟譜文。

〔二〕《陶攷》上七至十葉。

〔三〕李序原無「譜錄」之名，但謂陶鑑出數紙示之耳。見《陶攷》上七葉。

〔四〕《陶攷》上六葉。

〔五〕《陶攷》謂《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皆無姿城，惟安城太守領縣七，當以安城爲是，見上卷十一葉。

〔六〕《陶攷》謂兩家所引當即鄧文，然實不相合，恐別有所本。

〔七〕《晉書．陶侃傳》，爲長沙郡公，卒贈大司馬，諡曰「桓」。

〔八〕《陶攷》據《宋書．武帝紀》所載永初元年六月詔，封長沙公爲醴陵縣侯，謂《晉書》誤。

〔九〕當是從張縯說來。

〔一〇〕《孟府君傳》云：「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

〔一一〕《春融堂集》四十三《書陶淵明傳後》。

〔一二〕元嘉二年下。

〔一三〕附《潛邱劄記》後。

〔一四〕《方考》前已引，爲答姚瑩而作。《援鶉堂筆記刊誤》中亦有論陶語，在前，持論同《方考》，但《方考》加詳耳。

〔一五〕《吳氏評本昭昧詹言》卷十三，七，八葉。

〔一六〕同上九葉。

〔一七〕同上七，八葉，又二五至二七葉。

〔一八〕同上一〇，一一葉。

〔一九〕《韻語陽秋》二十謂「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祖』云云，故其詩云云，蓋深傷之也。」

〔二〇〕《吳氏評本昭昧詹言》卷十三，一三，一四葉。

〔二一〕同上一四葉。

〔二二〕見前引《後蕭陶氏重修族譜序》。

〔二三〕陶澍已有題中「族祖」二字因序誤衍之說，見《陶註》一八葉。

〔二四〕《援鶉堂筆記刊誤》（卷三十三刊誤）。

〔二五〕見前引《與方植之論淵明爲桓公後說》。

七

《顏誄》謂淵明元嘉四年（西四二七）卒，春秋若干。卒年與集中《自祭文》合。《宋傳》卒年同，云年六十三。以曆推之，生於晉安帝興寧三年，乙丑歲（西三六五）。《蕭傳》《晉傳》同，《南傳》《蓮傳》不記年歲。《吳譜》據《自祭文》「律中無射」，及挽歌「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之語，謂其卒當在九月。朱熹《通鑑綱目》則書在十一月，未知何據。張縯據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謂「若以詩爲正，則淵明生於壬子歲（西三五二），得年七十六。」然此詩序之辛丑，一作辛酉，「開歲倏五十」又有

作「開歲倏五日」〔一〕者。張蓋不能自信，故有「若以詩爲正」之語。清黃璋力主張說，其集未見，僅於《陶攷》知其著辨數則。《陶攷》難黃，據《飲酒》詩第十九推算，以爲不合。然詩語簡略，可立異解，不當專據之；但《游斜川》詩版本既多異同，又與《戊申歲遇火》詩「奄出四十年」〔二〕相違，自難置信。

自後倡異說者有《梁譜》《古譜》。梁君自稱鉤稽全集，知淵明得年五十六，舉證凡八〔三〕。游國恩君嘗著《陶潛年紀辨疑》駁之，見《國學月報彙刊》。其第六證改《戊申遇火》詩「奄出四十年」爲「奄出四九年」，第七證以《飲酒》詩第十九爲三十四歲作，又以詩中「向立年」爲「立年」〔四〕，皆無足論。第一證謂淵明自十二歲至五十四歲之事蹟，既屢見於詩文中，若壽過六十，不應無一字道及，其實淵明詩文題年月，只是偶然〔五〕；安知五十四以後所作，非偶然未題耶？況淵明晚年抱疾，不常爲文，見於《答龐參軍詩序》〔六〕；所作既少，則偶然不題年月，更屬事理之常矣。第二證謂《與子儼等疏》，甑詞當是遺囑，而僅云「吾年過五十」。游君謂此文不必爲遺囑；即爾，亦不必即爲易簀時作。第四證舉《游斜川》詩，序作辛酉（西四二一），詩作「開歲倏五十」，但既有異文，即難取證。第五證舉《辛丑歲還江陵》詩「閒居三十載」一語，謂與辛酉（西四二一）五十正合，然「閒居」而從落地計之，殊嫌未安也〔七〕。第三證舉挽歌「早終非命促」，謂若壽六十三，不得言「早終」，並舉《孟府君傳》以五十一爲不壽作旁證。此說頗言之成理。游君以《莊子》下壽六十之說難之，然「下壽」與「早終」，當有

別也。第八證舉《顏誄》「年在中身，疢唯痁疾」，謂用《書·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成語，指五十而言〔八〕，若六十以外，不得言此。此證甚堅；游君謂二語僅敍五十後嬰疾，未謂便死，下接「視化如歸，臨凶若吉」，乃謂死耳。然誄中四語銜接，亦可謂敍一時事，游君說固不必確鑿無疑；惟用典原有泛指切指之殊，「中身」即「中年」〔九〕，顏或泛用「中身」指五六十，亦未可知也。

《古譜》主五十二歲說，其證明淵明無六十三歲，凡據三事，即《梁譜》第二，第三，第八諸證。其證明淵明止有五十二歲，舉《祭從弟敬遠文》，《歸田園居》詩第一及《歸去來辭序》，《飲酒》詩第十六、第十九及《癸卯懷古田舍》詩，又史文及《飲酒》詩第九，凡四事。陸侃如君嘗爲文跋《古譜》，駁其說。其據《歸田園居》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謂淵明歸田在乙巳歲（西四〇五），著於《歸去來辭序》，更佐以《祭弟文》中之證，遂定淵明是歲年三十。按《王譜》亦據「塵網」二語謂淵明年三十，但在太元十九年甲午（西三九四），不在乙巳（西四〇五）。古君當採《王譜》說也。《祭弟文》語容後論，茲就文義言之。《陶攷》謂王「以墮地爲塵網，故繫此詩於年三十，說近釋氏，淵明胸中無此。塵網當以仕途言之。」其說是也。且詩云：「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若以墮地爲塵網，則上下文義俱不聯貫矣；此所謂斷章取義者，不足爲證。其據《飲酒》詩及《癸卯懷古田舍》詩，謂「投耒學仕」之年在甲辰（西四〇四），以「向立年」語證之，淵明年二十九。按《吳譜》以「投耒學仕」指州祭酒，

在太元十八年癸巳（西三九三），蓋以癸卯（西四〇三）當《飲酒》詩「向不惑」之年，謂是年淵明三十九；因推知「向立年」爲癸巳（西三九三），是年淵明二十九也。然《癸卯懷古田舍》詩（西四〇三）云：「在昔聞南畝，當年竟未踐」，是躬耕實始是年，與癸巳（西三九三）投耒不合。《吳譜》乃改癸卯（西四〇三）爲太元十六年辛卯（西三九一），以就其說。然史敍躬耕，亦在辭州主簿後也。古君說似矣，而與他事又不相應；譜中既改《辛丑還江陵》詩之「閒居三十載」爲「閒居二十載」，又據《陶攷》引《江州志》〔一〇〕之孤證，謂《戊申歲遇火》詩當作「戊午」（西四一八），其苦心彌縫可知。其據《飲酒》詩第九「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以爲卽史稱「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之事，時在義熙十四年（西四一八），淵明三十九歲。又據《飲酒》詩第十七「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二語，以爲卽指史所載是年劉裕芟鋤異己之事，皆嫌牽合無據。其自以爲最堅之證，實在《祭弟文》；所爲《陶靖節年歲考證》，駁陸侃如君以外，殆專申此義。然此說亦本《梁譜》，但發揮盡致耳。按《祭弟文》作於辛亥（西四一一），文中謂敬遠「年甫過立，奄與世辭」，又謂「相及齠齔，並罹偏咎」；而《祭妹文》云：「慈妣〔一一〕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才九齡」，則淵明罹偏咎之年爲十二也。《廣韻》：髫，俗作齠；《說文》：齔，毀齒也，男八歲而齔。古君謂淵明十二爲髫年，敬遠及齔〔一二〕爲七歲，相差五歲；又謂敬遠卒於辛亥（西四一一），「年甫過立」，爲三十一歲，時淵明當年三十六。其說雖有過巧處，如辛亥（西四一一）不必卽爲敬遠卒年，「年甫過立」亦不必卽指三十一，然固足破六十三之說。惜所據似《陶註》本。汲

古閣翻宋本，莫友芝翻宋本，《曾集》本，《李箋》，「相及」句均作「相及齠齒」；《陶註》作「相及齠齔」，當係據明人刻本。按《李箋》此句下有註云：

齠與齔義同，毁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齔。」齠音條，齔音襯。

此註爲「齠」字而發；以註中「齔」字亦非常用，故牽連而及，一若所註爲「齠」「齔」二字也者。明人當卽據此臆改正文。然亦思李既謂「齠」「齔」同義，若原文果作「相及齠齔」，則「相及」二字無義，其語寧非不辭？然則古君之堅壘，固不足據矣。梁、古兩家之說，論證俱嫌不足，舊說雖於辛丑《游斜川》詩，《癸卯懷古田舍》詩，及《顏誄》「中身」之語，尙待研討，然大體固無矛盾處也。

〔一〕宋馬永卿《嬾眞子》一（《儒學警悟》本）謂得廬山東林寺舊本，作「五日」。但此係孤證。

〔二〕按張說推算，是年淵明已五十七。

〔三〕《陶淵明》五六至五九面。

〔四〕又謂「向立年」爲「三十歲前後」，見同書七八面。

〔五〕思悅亦謂「淵明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

〔六〕序云：「吾抱疾多年，不復爲文」（《附註》二）。

〔七〕陸侃如君《跋古譜》文，以辛丑還江陵題及此語向無異文，推爲鐵證，以明淵明祗有五十六歲。

〔八〕《僞孔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全數」不必卽指五十也。

〔九〕《詩·文王》疏引鄭玄云：「中身謂中年」，勝於《僞孔傳》。

〔一〇〕《陶攷》上十三葉：陶按云：「當作戊申。」

〔一一〕《李箋》以「慈妣」爲「庶母」，《陶攷》申其說，謂卽程氏妹生母。《梁譜》據《顏誄》「母老子幼」語，及《命子詩》「仁考」之稱，謂祭文「妣」字誤。《古譜》從之。

〔一二〕「相及齠齔」謂一齠一齔相及。《梁譜》疑「敬遠正向齔」（《陶淵明》六一面），「向齔」之「向」，已屬無中生有；《古譜》據其說更謂「及齔則尚未齔」，因定敬遠爲七歲，以與他事相應。姑無論句中「及」字不關「及齔」，卽「及齔」二字，亦當解作「至齔歲」，不能反解作「未齔」也。

八

陶譜諸事，可得論定者，約有四端：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書年號，二也。始居柴桑，繼遷上京，復還南村。栗里在柴桑，爲淵明嘗游之地〔一〕。上京有淵明故居。南村在潯陽附郭。三也。淵明嘗爲州祭酒，嘗仕桓玄，丁憂歸。嗣州召主簿不就。又爲鎭軍參軍，仕劉裕，建威參軍，仕劉敬宣或劉懷肅。官終彭澤令。四也。至世系年歲，則祇可姑存然疑而已。

（《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七月。）

〔一〕査愼行《廬山遊記》亦謂淵明「家在柴桑而栗里則其所嘗遊者」（《廬山志》六「栗里」下引）。

李賀年譜

李賀，字長吉，唐宗室鄭王之後。

兩《唐書》皆云然〔一〕。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自稱「唐諸王孫李長吉」；《仁和里雜敍皇甫湜》有「宗人貸宅荒厥垣」，「宗孫不調爲誰憐」之句，《許公子鄭姬歌》有「爲謁皇孫請曹植」之句，「宗人」「宗孫」「皇孫」「曹植」，皆自謂也。

鄭王有二：鄭孝王亮，高祖從父，隋海州刺史，武德初進封鄭王〔二〕。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貞觀十年，改封鄭王〔三〕。《新書》稱元懿爲鄭惠王，「惠」者元懿謚也，又謂唐時稱元懿後爲小鄭王後，亦曰惠鄭王後，以別鄭王亮〔四〕；《宗室世系表》中復稱亮爲大鄭王房。《舊書》雖均稱鄭王，然於大鄭王後，追敍世系，至於大鄭王子淮安王神通而止，不及大鄭王〔五〕；殆以世遠名微，不足增重故歟？其於小鄭王後，則舉「鄭王元懿」或「宗室鄭王元懿」〔六〕。《新書》於大鄭王後，亦溯至大鄭王次子襄邑恭王神符而止〔七〕？其於小鄭王後，則舉「鄭惠王元懿」〔八〕，間亦曰「鄭王元懿」〔九〕。兩《唐書》之於二王，其分別略如此。

《舊書》謂賀爲「宗室鄭王之後」，曰「宗室鄭王」而不名，《新書》謂「系出鄭王後」，亦不名，皆以

別於元懿，其理甚顯。是賀當出於大鄭王。田北湖氏亦持此見而無說；又謂大鄭王子孫多留東都〔一〇〕，亦無據。王禮錫氏則謂「說鄭王，便是大鄭王；如說《漢書》，便是《前漢書》」。又舉《宗室世系表》標目，謂「賀若出小鄭王房，必稱系出惠鄭王」〔一一〕。說雖少疏；實爲有見。閻崇璩君作《李長吉年譜》〔一二〕，獨主賀出小鄭王後；然其說難自樹立〔一三〕。

居河南府福昌縣之昌谷。

福昌本爲宜陽，因隋宮爲名，西十七里有蘭昌宮；有故隋福昌宮〔一四〕。西南三十四里有女几山〔一五〕，蘭香神女上天處，遺几在焉〔一六〕。昌谷水亦在縣西，與甘水俱流注於洛水〔一七〕。昌谷在縣之三鄉東〔一八〕，隋故宮北〔一九〕，與女几山嶺阪相承〔二〇〕。其地依山帶水，有南北二園，桑竹叢生焉〔二一〕。

賀嘗有詩憶「昌谷山居」〔二二〕，又有《春歸昌谷》詩、《昌谷》詩等。《昌谷》詩盛稱其地景物之美，風俗之厚。其云「遙巒相壓疊，頹綠愁墮地」〔二三〕者，女几山也；「待駕棲鸞老，故宮椒壁圮」云云，福昌宮也；「紆緩玉眞路，神娥蕙花裏」，則當爲蘭香神女廟〔二四〕。

昌谷不著於地書。明曾益註《憶昌谷山居》詩，謂在隴西。蓋以唐室原出隴西，賀旣宗孫，又有「隴西長吉摧頹客」，「刺促成紀人」〔二五〕等語，遂意其居隴西耳。然賀自長安歸昌谷，則曰「發軔東門

外」，又曰「今將下東道，祭酒而別秦」〔二六〕；在京思家，則曰「家山遠千里，雲腳天東頭」，又曰「犬書曾去洛，鶴病悔游秦」〔二七〕；自家詣京，則曰「又將西適秦」〔二八〕；皆謂昌谷在京師東，又近東都也。其曰「隴西」「成紀」者，亦以誇其郡望，示人身爲皇孫而已。宋張耒有《歲暮福昌懷古》（李賀宅）詩，又有《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詩〔二九〕，亦可證昌谷所在〔三〇〕。

父晉肅，邊上從事。

韓愈《諱辯》及兩《唐書》本傳均謂賀父名晉肅。《太平廣記》〔三一〕二百二引五代王定保《摭言》，謂名瑨肅，邊上從事；「瑨」字當誤。

母夫人鄭氏。

見《太平廣記》四十九引唐張讀《宣室志》。《新書》本傳云：「（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三二〕

姊嫁王氏〔三三〕。

李商隱《李賀小傳》云：「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

弟猶。

賀有《示弟》詩，《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又《題歸夢》詩云：「長安風雨夜，書客夢昌谷。怡怡中堂笑，小弟裁澗菉。」名「猶」則始見於徐渭董懋策《唐李長吉詩集》，即在《示弟》詩題下增一字。此本云是依宋上黨鮑欽正刻本，實亦不盡然〔三四〕。然宋本《賀集》今猶存蜀本宣城本〔三五〕，皆無此字。

妻某氏，無出。

賀《出城》詩云：「雪下桂花稀，啼烏被彈歸。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入鄉誠萬里，無印始堪悲。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

王禮錫氏據此詩「卿卿」二語，謂賀有婦〔三六〕，是也。《咏懷》之一云：「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亦可資佐證。杜牧《李長吉歌詩敍》述沈子明語，謂「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疑其時

鄭夫人及賀妻均已亡歿，賀又無子，故沈云云也。

族兄數輩。

見於詩者三人，曰二兄，曰正字十二兄，曰十四兄。詩各一見：《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秋涼寄正字十二兄》，《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是也。知爲族兄者，以賀與諸人跡甚疏，詩語亦不親切故〔三七〕。

賀細瘦，通眉，巨鼻，長指爪。能苦吟疾書。

見《李傳》及《巴童答》詩。詩云：「巨鼻宜山褐，龐眉入苦吟」，「龐眉」即「通眉」，俗所謂「濃眉」也。王禮錫先生以爲白黑相雜，非是。

德宗貞元六年庚午（七九〇） 賀一歲

賀當生於是年。

杜牧《李長吉歌詩敍》作於文宗太和五年（八三一）十月〔三八〕；敍中謂「賀生二十七年死矣」，又謂「賀死後凡十五年〔三九〕，京兆杜牧爲其敍」。自太和五年（八三一）上溯十五年，爲憲宗元和十一年

(八一六)，賀當於是年死。更依中土計齒常例，上溯二十七年，爲德宗貞元六年(七九〇)，賀當於是年生〔四〇〕。

《李傳》謂賀生二十四年，《舊書》採其說；《新書》則從《杜敍》；《太平廣記》引《宣室志》亦云，卒年二十四，當亦據《李傳》。然沈亞之《序詩送李膠秀才》〔四一〕有云：「賀年二十七，官卒奉常。」亞之與賀爲友〔四二〕，其言宜可信。李說最晚出，雖引賀姊語，疑得諸傳聞，不免謬誤也。

是年韓愈二十三歲，後爲賀作《諱辯》。皇甫湜十四歲〔四三〕，後於賀亦頗加推引。賀嘗爲二人作《高軒過》詩。

貞元七年辛未(七九一)　二歲

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三歲

貞元九年癸酉(七九三)　四歲

是年元稹十五歲，兩經擢第〔四四〕。

貞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五歲

貞元十一年乙亥(七九五)　六歲

貞元十二年丙子（七九六）　七歲

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搆，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

《太平廣記》二〇二引《摭言》亦云：

賀年七歲，以長短之歌名動京師。時韓愈、皇甫湜覽賀所業，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謂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會有以瑨肅行止言者，二公因連騎造門請其子。既而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曰「華裾云云」。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

《高軒過》詩題云：「韓員外愈、皇甫侍御湜見過，因而命作。」按是年愈未爲員外〔四五〕，湜亦尚未擢進士第；且詩有「秋蓬」「死草」「垂翅」等語，亦不當出於七齡童子之手〔四六〕。餘詳後。

貞元十三年丁丑（七九七）　八歲

貞元十四年戊寅（七九八）　九歲

貞元十五年己卯（七九九）　十歲

貞元十六年庚辰（八〇〇）　十一歲

貞元十七年辛巳（八〇一） 十二歲

貞元十八年壬午（八〇二） 十三歲

貞元十九年癸未（八〇三） 十四歲

杜牧生〔四七〕。賀死十五年，牧為作歌詩敘。

貞元二十年甲申（八〇四） 十五歲

以樂府歌詩名於時。

《新書》二〇三《李益傳》云：「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兩《唐書》賀傳亦謂其長於歌篇，樂府數十篇，雲韶樂工皆合之絃管。然沈亞之《序詩》云：

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不多，怨鬱悽豔之功，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裁其字句，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

審是則兩《唐書》所記雲韶樂工皆合之絃管等語，為不實矣。然亞之此文，似於賀及當世作者不無微詞，味所引末句及上文，「近世學者之詞何為不聞充陳於管絃」之問，可見；疑所言或過其實也〔四八〕。

按賀詩實可歌，《申胡子觱篥歌序》云：

> 歌成，左右人合譟相唱。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吾問所宜，稱善平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爲壽。

又《花遊曲序》云：

> 寒食諸王妓遊。賀入座，因採梁簡文詩調賦《花遊曲》，與妓彈唱。

則兩《唐書》云云，固未必盡誣。抑《花遊曲序》復足證賀以樂府得名，不獨其詞「蓋古排今」，亦其能「備聲絃唱」也。所謂「備聲絃唱」，初不必全篇入樂，孟棨《本事詩》記梨園子弟歌李嶠《汾陰行》末四語，爲玄宗所賞，是其例。《觱篥歌》《花遊曲》皆賀以後所作。時賀似尙居昌谷，未詣京；其歌詩傳播，當是由東都而西。賀亦頗自負其樂府，《申胡子觱篥歌序》略可見。又《公莫舞歌序》謂「南北樂府率有歌引，賀陋諸家，今重作」云云，尤爲露才揚己。今集第四卷及外集中多樂府詩。

賀樂府歌詩蓋上承梁代「宮體」，下爲溫庭筠、李商隱、李羣玉開路。詳宮體之勢，初唐以太宗之好尙，一時甚盛；至盛唐而寖衰，至賀而復振焉〔四九〕。蓋唐人好詞，杜甫以議論入詩，又時以文爲詩，顧不爲當時所重，選家多不之及，卽元稹亦祇推其排律，至宋初楊億，猶目爲「村夫子」。此中消息可知。賀既以詞爲主〔五〇〕，用奇僻濟宮體浮豔之窮，其《還自會稽歌》《金銅仙人辭漢歌》，又有如杜牧所稱「求取情狀，離絕遠去」者，則其見重於世，蓋自有故。抑唐人承六代遺習，極重樂府歌

詩；——伶官妓女亦往往取文人所作譜入管絃，世所傳旗亭畫壁，是其事也。則賀之以樂府知名，蓋亦當日風氣使然[五一]。於時張籍、王建皆以工樂府聞；惟張所作多存諷諭之旨爲異。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八〇五） 十六歲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八〇六） 十七歲

時鬢已斑白。

《春歸昌谷》云：「終軍未乘傳，顏子鬢先老。」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見《家語》。《漢書》六十四《終軍傳》，軍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所見便宜以聞。「乘傳」當指此。「未乘傳」謂未及終軍乘傳之年；蓋賀髮白於十八以前也[五二]。

《綠章封事》詩疑作於是年。

《新書》三十六《五行志》謂本年「夏浙東大疫，死者大半」。詩題云：「爲吳道士夜醮作」；詩云：「虛空風氣不淸冷，短衣小冠作塵土。」按《洛陽伽藍記》二《景寧寺》條載元愼嘲陳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云云。疑「短衣小冠作塵土」即指浙東死者。詩中有「六街」字，殆在東都設醮也。

元和二年丁亥（八〇七）　十八歲

至東都，以歌詩謁韓愈。

唐張固《幽閑鼓吹》（《顧氏文房小說》本，後同）云：

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援帶，命邀之。

據洪興祖《韓子年譜》及方崧卿附錄，愈以去年夏爲國子博士，本年秋分司東都。賀來謁當在是時；按福昌在東都西一百五十里〔五三〕，往來甚易也。然此文與《摭言》所記《高軒過》詩故事頗不合；彼謂賀始識韓在作詩時。小說固難盡信，姑並存之。

丁外艱疑在是年。

《太平廣記》二〇二引《摭言》謂賀「年未弱冠，丁內艱」。但據《李傳》及《廣記》引《宣室志》，賀死時，太夫人固及見。田北湖氏以爲當是「外艱」之誤，理或有然。賀以元和五年（八一〇）應進士舉入京（詳後），其時當已服闋；而《摭言》云「年未弱冠」，當去冠年甚近，故疑在是年。

是年賀所與游者〔五四〕王參元、楊敬之、權璩登進士第〔五五〕。

柳宗元有《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書史會要》工於翰墨類中有「王參元」名〔五六〕。楊敬之，字茂

孝，擢第後爲右衛胄曹參軍。官卒連州刺史，《新書》一六一有傳。權璩，德輿子，字大珪，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官至中書舍人。《新書》一六五有傳。賀後有《出城寄權璩楊敬之》詩。

元和三年戊子（八〇八）　十九歲

《黃洞蠻》詩當作於是年。

據《新書》及《通鑑》〔五七〕，貞元、元和間黃洞蠻爲寇凡三次：一在貞元十年（七九四），賀才五歲。一在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八一六），是年賀死。一在本年五六月。《通鑑》記其事云：

（五月）西原蠻酋長（《新書》稱爲黃洞首領）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爲歸順州刺史。

然未幾復叛〔五八〕。賀詩作於本年爲近理；當在六月後。

元和四年己丑（八〇九）　二十歲

在東都。韓愈、皇甫湜相過，賀爲作《高軒過》詩。

詩題語已見，詩云：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

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詩明言東京，故知賀是年在斯。《洪譜》考愈於本年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五九〕。《附錄》謂愈除都官爲六月十日；則過賀當在其後。

皇甫湜以元年（八〇六）擢進士第〔六〇〕。去年與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侮宰相〔六一〕，牛調伊闕尉，李洛陽尉〔六二〕。《新書》本傳謂湜爲陸渾尉；當亦在此時〔六三〕。牛、李後皆遷監察御史，湜當亦爾。監察御史十五人，屬御史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六四〕，衆呼「侍御」〔六五〕。巡按分十道；本年湜之至東都，當卽爲巡按來也。

愈、湜甚負時譽，「東京才子文章公」，殆非諛詞而已。其過賀足爲增名不少，賀之感激可知；故有秋蓬生風，附鴻，作龍之語，信其能相推引也。《摭言》記牛僧孺事云：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卽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遺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六六〕。

觀此可見當時風氣一斑。

是年張徹登進士第〔六七〕。

徹爲韓愈門下士，又其從子壻。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穆宗長慶二年（八二二）罵賊死，贈給事

中。事詳愈所爲墓誌中〔六八〕。賀後有《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潞州張大宅被酒》二詩。

元和五年庚寅（八一〇）　二十一歲

是年韓愈爲河南令〔六九〕。賀應河南府試，作《十二月樂詞》，獲雋。冬，舉進士入京。

唐鄉貢進士由京兆、河南、太原、鳳翔、成都、江陵諸府送者爲府試，多差當府參軍或屬縣主簿與尉爲試官〔七〇〕。學者皆懷牒自列於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敍少長焉〔七一〕。

是年韓愈有《燕河南府秀才詩》（得「生」字）〔七二〕。

詩云：

吾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七三〕尹東京。功曹上言公，是日當登名。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羣儒負己材，相賀揀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鏗轟。此都自周公，文物繼名聲。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今者遭震薄，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妒與爭。還家敕妻兒，具此煎炰烹〔七四〕。柿紅葡萄紫，肴果相扶擎。芳茶出蜀門，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宴，庶以露厥誠。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丈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冷雨澀不晴。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

敍鄉貢事甚詳。田北湖氏謂愈爲舉主；觀此知舉主蓋河南尹房式，非愈也。惟愈嘗與賀書，勸其舉進士，見《諱辯》。

或毀賀曰：「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辯》，然賀卒不就試，歸〔七五〕。

《諱辯》曰：

> 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

文中舉「二名不偏諱」及「不諱嫌名」之條，謂「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宜可無譏。按應進士舉與就進士試非一事；一鄉貢入京，一赴禮部試也。鄉貢進士例於十月二十五日集戶部，正月乃就禮部試〔七六〕。賀已應舉，卽爲進士，惟未赴禮部耳。毀之者意在不使就試，至其舉進士，乃既成之局，彼輩固無如何也。唐制，舉進士而未第者曰進士，曰舉進士，通稱曰秀才，得第者曰進士第，曰前進士〔七七〕，與後世異。

唐人應試，極重家諱。宋錢易《南部新書》丙云：

>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謂之文字不便，卽託疾下將息狀來（求）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

時俗如此，賀之不就試，殆不僅負氣而已。按唐制，衆科之目，進士爲尤貴。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

人，故爭名，常爲時所重。又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世推爲「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七八)。然獲雋良不易。名爲歲舉，而科場或開或不開。每擢第復不滿數十，或不滿十(七九)。時有「五十少進士」之語，謂其難也。故得人雖盛，較之他流則狹(八〇)。觀此則賀之不應試所失甚鉅；賀方盛年，固以遠大自期，遭此坎軻，其怨憤無聊可以想見。其詩如「二十男兒那刺促」，「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少年心事當拏雲，誰念幽寒坐鳴呃」，「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天網信崇大，矯士常慅慅」，「文章何處哭秋風」(八一)，皆此物此志也。沈亞之謂其所賦，怨鬱悽豔之功，蓋古排今；杜牧論其詩，以爲「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蓋有以激之使然。

唐康駢《劇談錄》(《學津討原》本)云：

>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稹年老(少)，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攬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目，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進」(「晉」)，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轗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按元稹明經擢第，賀才四歲(見前)。事之不實，無庸詳辯。抑兩《唐書·稹傳》僅謂其穆宗長慶初擢祠部郎中。祠部郎中雖亦屬禮部，然所掌爲「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

事」，與禮部郎中掌禮樂學校等事者異[八二]，昧者不察，遂張冠李戴耳。然唐時明經進士二科同爲士子所趨，而明經較易，人較多，故進士尤貴；此文雖不實，亦可見風氣也。

是年冬，自京歸里。

有《出城》詩，已見，以「啼烏被彈歸」爲喻，「無印自堪悲」矣。

元和六年辛卯（八一一）　二十二歲

爲奉禮郎當在是年。

據《示弟》詩及《勉愛行》之二，賀在京師三年，又據《客游》詩，遊趙三年（均詳後），而賀死於元和十一年（八一六）；依此推算，其爲奉禮郎不能晚於是年。是年韓愈入爲行尚書職方員外郎[八三]，或當與賀偕；賀之得官，或亦愈爲之地也。賀有《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句云：「小樹棗花春」，知在春時。

奉禮郎屬太常寺，從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宗廟則設皇帝位於庭，九廟子孫列焉，昭穆異位，去爵從齒。凡樽彝勺羃，篚坫簠簋，登鉶籩豆，皆辨其位。凡祭祀朝會，在位拜跪之節，皆贊導之。公卿巡行諸陵，則主其威儀鼓吹而相其禮[八四]。

唐選人之制，六品以下，須集而試；先試「書」「判」，繼察「身」「言」〔八五〕。王鳴盛疑賀以恩蔭得官〔八六〕，近之。《新書·選舉志》，太廟及郊社齋郎即以蔭子爲之，然亦須應試；賀之爲奉禮郎，殆亦由斯道也。然實不樂此。是年冬《贈陳商》詩記其事云：

風雪直齋壇，墨組貫銅綬。臣妾氣態間，唯欲承箕帚。天眼何時開，古劍庸一吼。

憤鬱之情如見。賀屢以劍自比，《出城寄權璩楊敬之》詩云：「自言漢劍當飛去」，《走馬引》云：「我有辭鄉劍，玉鋒堪截雲」，皆不甘居人下之意。

陳商，字述聖，見詩。元和九年（八一四）擢進士第。武宗時，權知禮部貢舉。官至祕書監，許昌縣開國男。卒於宣宗時，贈工部尚書〔八七〕。韓愈有《答陳商書》〔八八〕，云：「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正詩所謂「學爲堯、舜文，時人責衰偶」也。

四月，居崇義里，與朔客李氏對舍。

《申胡子觱篥歌序》云：

朔客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江夏王廟。當年踐履失序，遂奉官北郡。自稱學長調短調，久未知名。今年四月，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置酒，命予合飲。氣熟，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調，不能作五字歌詩，直強迴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吾對後請撰《申胡子觱篥歌》，以五字斷句。

賀初得官，宜有定居，詩當作於是年。此序並可見賀之詩功，及五言之衰。

《幽閑鼓吹》云：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爲筆硯之舊。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正。」李公喜，並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審此文當是賀死後事。然《舊書》一四八《藩傳》，謂其死於本年，年五十八；則張固所敍亦妄言之耳。

元和七年壬辰（八一二）　二十三歲

是年沈亞之下第，歸吳江，賀作詩送之（《送沈亞之歌》）。

詩序云：

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於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

可見賀之貧也。是年冬，亞之有與《京兆試官書》，見集。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八一五）

登進士第。歷辟藩府。嘗游韓愈門。賀許其工爲情語，有窈窕之思〔八九〕。終郢州掾〔九〇〕，有集。

是年李漢登進士第〔九一〕。

《舊書》一七一，漢字南紀，亦唐宗室。韓愈門下士，又其子壻。擢第後累辟使府。官終汾州司馬，武宗會昌中淪躓而卒。賀後《有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

是年李商隱生〔九二〕，後爲賀作小傳。

元和八年癸巳（八一三）　二十四歲

是年春，以病辭官，歸昌谷。

《示弟》詩云：「別弟三年後」，《勉愛行送小季之廬山》之二云：「維爾之昆二十餘，年來持鏡頗有鬚。去家三載今如此，索米王門一事無。」玩「索米王門」句，知所指爲居京三年事。又《勉愛行》之一云：「洛郊無俎豆，弊廐殘老馬」，正自嘲失奉禮郎。賀五年冬入京，至此適三年也。

《春歸昌谷》詩云：

逸目騁甘華，羈心如荼蓼。旱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頳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兔目官槐小。思焦面如病，嘗膽腸似絞。京國心爛漫，夜夢歸家少。發軔東門外，天地皆浩浩。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云：

李子別上國，南山崆峒春。不聞今夕鼓，差慰煎情人。趙壹賦命薄，馬卿家業貧。鄉書無所報，紫蕨生石雲。

京師臨發情景如此。賀詩常言「官槐」，或曰「行槐」，《勉愛行》之二云：「官槐如兔目」，《送韋仁實兄弟入關》詩云：「行槐引西道」，知唐時官道多植槐也。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詩云：「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示弟》詩又云：「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仁和里雜敘皇甫湜》詩云：「歸來骨薄面無膏，疫氣衝頭鬢莖少」，皆言病。知其非假歸者，是年秋《自昌谷到洛後門》詩云：「始欲南去楚，又將西適秦」(詳後)，餬口之方未定，其無官甚明也。然病實託辭，《仁和里雜敘》詩云：「宗孫不調爲誰憐」，《出城別張酬李》詩云：

長安玉桂國，戢帶披侯門。慘陰地自光，寶馬踏曉昏。臘春戲草苑，玉輓鳴䡾轔。綠網縋金鈴，霞卷清池滑。開貫瀉蚨母，買水防夏蠅。時宜裂大袂，劍客車盤茵。小人如死灰，心切生秋榛。

所謂「長安居，大不易」，區區奉禮郎，眞「臣朔飢欲死」矣。其前數語以趙壹、馬卿自況，實由衷之言，不同戲論。

歸途所歷，皆著爲詩。

有《經沙苑》，《過華清宮》，《新夏歌》，《銅駝悲》，《三月過行宮》，《蘭香神女廟》諸篇；皆紀春景，或明言三月，知作於此時也。《金銅仙人辭漢歌》疑亦此時作；蓋辭京赴洛，百感交并，故作非非想，

寄其悲於金銅仙人耳。

家居撰著讀誦，有燕婉之樂；送弟之廬山謀食。

《勉愛行》情辭悽切，有云：「欲將千里別，持我易斗粟」，所謂「馬卿家業貧」，不得不爾。味「官槐如兔目」句，賀時甫歸來耳。《詠懷》亦復以馬卿自許，曰：「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此琴瑟之好也。曰：「惟留一卷書，金泥泰山頂」，曰：「日夕著書罷」，此傳後之志也。《昌谷詩》（題下云：「五月二十七日作」，當係自注），《南園》，《昌谷北園新筍》，皆此時作。

秋有《昌谷讀書示巴童》詩、《巴童答》詩。其示巴童云：「蟲響燈光薄，宵寒藥氣濃。君憐垂翅客，辛苦尚相從。」怨抑深矣。送韋仁實兄弟入關，當在此時。詩云：「君子送秦水，小人巢洛煙。……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夜雨叫租吏，春聲暗交關。誰解念勞勞！蒼突唯南山。」略可知其所以自處；「一畝蒿磽田」耳，猶不能脫催租吏手，苦已。《秋來詩》之悽楚，宜作於此時。又《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兄》云：

> 閉門感秋風，幽姿任契闊。大野生素空，天地曠肅殺。光露泣殘蕙，蟲響連夜發。房寒寸輝薄，迎風絳紗折。題書古芸馥，恨唱華容歇。

與前首俱詠秋夜讀書事。《還自會稽歌》疑此時作；「濕螢」「秋衾」「霜」「塘蒲」固是即景語，「夢銅

輩」「點歸鬢」「辭金魚」亦以抒其辭官歸里不忘京華之情焉。杜牧論《銅仙歌》與此詩「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實則固非全無畦逕可尋耳。《南山田中行》當亦是時作。「南山」即前所云「蒼突惟南山」者，詩中有「九月」句，乃作詩實候。末云：「鬼燈如漆點松花」，足見其荒寂也。

韋仁實見兩《唐書·王播傳》，謂其官補闕，嘗與獨孤朗等奏播之姦邪云。

冬十月，復入京，與皇甫湜別。

湜時爲監察御史如故。賀時與往還，《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詩》云：

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書司曹佐走如牛。疊聲問佐「官來否？」官不來，門幽幽。

詩作於秋日，先輩乃推敬進士已第者之稱。此爲詼諧之作；集中僅此與《唐兒歌嘲謝秀才》等五首耳〔九三〕。蓋以嘲湜之處閒曹也。《仁和里雜敍》詩云：

大人乞馬癯乃寒，宗人貸宅荒厥垣。横庭鼠逕空土澀，出籬大棗垂珠殘。安定美人截黃綬，脫落纓裾瞑朝酒，還家白筆未上頭，使我清聲落人後。枉辱稱知犯君眼，排引才陞強緪斷。洛風送馬入長關，闔扇未開逢猰犬。……欲雕小說干天官，宗孫不調爲誰憐。明朝下元復西道，崆峒敍別長如天。

仁和里在東都城南〔九四〕，《河南志》引韋述《兩京記》云：「此坊北側數坊，去朝市遠，居止稀少，惟園林

滋茂耳」〔九五〕。賀蓋僦居於是，詩中所云「宗人貸宅荒厥垣」，與《韋記》正合也。詩首四語詠二人寒酸情景，同病相憐。次四語謂湜官卑不調，逃於麴蘖之中〔九六〕。次四語述韓愈與湜相援引，令其舉進士，而卒爲人所毀。次二語謂欲上書吏部，乞其見憐。末二語則謂將復西行入京。唐人謂十月望日爲「下元」；「崆峒」即《出城別張酬李詩》「南山崆峒春」之「崆峒」，指京師；詩中用語，不必泥也〔九七〕。詩題下舊有旁注云「湜新尉陸渾」，當是後人所加；玩詩中所紀，即知其誤。

賀之行當在十月望後，復有《洛陽城外別皇甫湜》詩云：

洛陽吹別風，龍門起斷煙。冬樹束生澀，晚紫凝華天。單身野霜上，疲馬飛蓬間。凭軒一雙淚，奉墜綠衣前。

唐人送別，皆在向晚，明發行人乃首途〔九八〕；故有「晚紫生華天」之句。唯詩言「綠衣」，似與唐制迕。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九九〕。監察御史正八品下，不應綠衣。意者亦如「侍御」之稱，不妨假借；抑詩中用語固不必拘定制歟？

賀蓋先歸昌谷省覲，十月末始由昌谷到洛後門，然後西去，《自昌谷到洛後門》詩云：「寒涼十月末，雪霰濛曉昏」，是也。賀蓋嘗居洛後門，故有「強行到東舍，解馬投舊鄰」之語。時賀「始欲南去楚，又將西適秦」，徬徨未即定，乃欲以杖頭錢就卜者占之〔一〇〇〕。賀有十四兄在楚，思往依之，求其援引；然又恐楚地局於方隅，未必能以文顯，故卒西行也。惟此行竟無所成就，亦似無詩。

尋賀在京師三年，韓愈亦在京師。故所與游多愈門下。賀交游有姓名可考者十四人；愈以外，若皇甫湜、沈亞之、李漢、陳商、張徹皆其門下士若後輩，其所以推引賀者至矣。後賀依張徹於潞州者復三年（詳後），向使不識愈，焉能若是？則謂其平生出處，繫於愈一人可也。

賀交游之事跡可考者尚有張又新、崔植。《新書》一五七，又新字孔昭，元和九年（八一四）及進士第，歷左右補闕，終左司郎中。善文辭，再以諂附敗，喪其家聲。又一四二，崔植字公修，元和中爲給事中，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李傳》謂賀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云云，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云云。似賀在京時與太夫人偕者。然賀既無產業，奉禮微祿固不足迎養；抑其弟與其婦明居昌谷，亦無任太夫人獨出之理。疑《傳》語不盡實也。

集中諸詩，不能定其爲何年，然可知爲在京師三年間作者，有《李憑箜篌引》，《同沈駙馬賦得御溝水》，《春坊正字劍子歌》，《老夫採玉歌》，《傷心行》，《宮娃歌》，《送秦光祿北征》，《酬答》，《嘲謝秀才》，《難忘曲》，《夜飲朝眠曲》，《崇義里滯雨》，《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答贈》，《花遊曲》，《牡丹種曲》，《秦宮詩》，《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章和二年中》，《五粒小松歌》，《呂將軍歌》，《京城》，《官街鼓》，《許公子鄭姬歌》，《沙路曲》，《題歸夢》，《崑崙使者》，《聽穎師彈琴歌》等，皆詠京朝人，京朝事，或京朝風物者。

元和九年甲午（八一四）　二十五歲

是年自京師歸，秋至潞州，依張徹，時徹初效潞幕。

《客游詩》云：

悲滿千里心，日暖南山石。不謁承明廬，老作平原客。四時別家廟，三年去鄉國。旅歌屢彈鋏，歸問時裂帛。

詩云「老作平原客」，用趙國故事，而《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詩云：「葛衣斷碎趙城秋」，又《潞州張大宅病酒》詩云：「當知趙國寒」，知「客游」指潞州。詩又云：「三年去鄉國」，則游潞之時甚久，計其始去之期不能晚於本年，而詩則當作於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卽賀卒年也。

潞州今山西長治縣。按《新書》六十六《方鎭表》，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昭義軍節度使兼領澤潞二州，徙治潞州。澤州今山西晉城縣。是年至十一年，郗士美爲節度使〔一〇一〕。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辟置爲重〔一〇二〕。徹登科在元和四年（八〇九），當未仕，故是年應潞將辟。知在是年者，賀《酒罷張大徹索贈詩》之作，題有「初效潞幕」之文也。詩有「公主遣秉魚鬚笏」一語，不知公主何指，徹或其所介歟？徹所司爲章奏，其職蓋甚勞苦〔一〇三〕，詩云「匣中章奏密如蠶」者是也。賀之來則又依徹以見於郗者。

賀有《七月一日入太行山》詩，當作於是年，以自洛詣潞，必經太行也；又以此知其必先自京歸。——《李傳》云：「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事或有然——《閻譜》謂賀潞州之行，先抵河陽（今孟縣），作《河陽歌》；次入太行，作詩；次至長平（今晉城），作《長平箭頭歌》；次經高平，作《高平縣東私路》詩；遂達於潞。此說驗之地理而合，又諸詩皆明言「秋」，或敍秋日景色，信是一時之作。惟尚有《貴主征行樂》一詩，有「中軍留醉河陽城」語，王琦疑「當時有公主出行，宴飲於河陽城中，長吉見之而作是詩」，說可信；意者其即「遣秉魚鬚笏」之公主歟？又《將發詩》疑當是發東都時作。詩云：「東牀卷席罷，濩落將行去。秋白遙遙空，日滿門前路」，亦失志無聊之情也。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詩，當作於初至潞時。詩云：「長鬣張郎三十一，天遣裁詩花作骨」，張蓋甚有佳趣人。《潞州張大宅病酒逢江使寄上十四兄》詩云：「秋至昭關後，當知趙國寒」，亦在秋日，惟不能定爲何年。曰「趙國」者，王琦云：

潞州，春秋時潞子國。戰國時爲上黨地，初屬韓；其後馮亭以上黨降趙，又爲趙地。

昭關在今安徽和縣，古屬楚，蓋十四兄所在。詩云：「覺騎燕地馬，夢載楚溪船」，猶是昔年欲「南適楚」之旨。

尋賀之不能忘楚，或爲餬口之方，或爲兄弟之好；然似尚有不止於此者。詩末云：「椒桂傾長席，鱸魴斫玳筵；豈能忘舊路，江島滯佳年」，舊解殊不了了；椒桂鱸魴明非潞產，句當屬下讀，謂少

時嘗滯留江島，至今難忘舊路耳。集中詠南中風土者頗多，其中固有用樂府舊題者，然讀其詩，若非曾經身歷，當不能如彼之親切眷念。如《追和柳惲》，《大堤曲》，《蜀國絃》，《蘇小小墓》，《湘妃》，《黄頭郎》，《湖中曲》，《羅浮山父與葛篇》，《畫甬東城》〔一〇四〕，《釣魚詩》，《安樂宫》，《石城曉》，《巫山高》，《江南弄》，《貝宫夫人》，《江樓曲》，《莫愁曲》等，踪跡皆在吳、楚之間。意賀入京之先，嘗往依其十四兄，故得飽領江南風色也。其《七夕》詩末云：「錢塘蘇小小，更值一年秋」，注家多不明其何以忽及蘇小小，頗疑其不倫；明此當可釋然。

元和十年乙未（八一五）　二十六歲

在潞州。

元和十一年丙申（八一六）　二十七歲

是年自潞州歸，卒。

《客游詩》已見，當作於是年。

《李傳》云：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

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

《太平廣記》四十九引《宣室志》亦云：

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夢賀，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從小奉親命，能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得非天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

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榮於辭，故召某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稍解。

《李傳》力求人信，《宣室志》託之夢寐，增其枝葉，務在炫耀而已。然文俱甚美。張氏固以爲夢寐無憑，茲故無庸深究；但論《李傳》。《新書》本傳多採李氏，然悉刪此節，雖以求簡，亦爲「其言頗涉於怪」〔一〇五〕耳。顧事亦未必全出於「造作」。大抵賀賦性怪僻，而多奇情異采；既遭謗毀，幽憂彌甚，遂出其全力爲詩。然與郊、島輩之苦吟亦異，要以求新意爲急；杜牧所論「荒國陊殿，梗莽邱壠，不足爲其怨恨悲愁」，「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最爲得之。王禮錫先生謂其好用「死」字，「哭」「泣」「淚」等字〔一〇六〕。故其詩悽然有鬼氣。洪爲法先生謂賀惟畏死，不同於衆，時復道及死，

不能去懷；然又厭苦人世，故復常作天上想。《李傳》所記，曰白玉樓，應是賀意中樂土，曰召之作記，則賀向之全力以赴之者，乃有自見之道。瀕死神志既虧，種種想遂幻作種種行，要以洩其隱情，償其潛願耳。其說是也〔一〇七〕。

兩《唐書》均言賀爲協律郎而不及奉禮郎。《新書·百官志》，協律郎亦屬太常寺，正八品上，掌和律呂。學須專門，故高於奉禮者二級。德宗時嘗有試太常寺協律郎之舉，著於《新書》四十五《選舉志》，足徵人選之重。賀雖以樂府知名，然於音律一道，不聞有所獻替。又以進士不第之人，驟膺正八品上之職，唐制似亦所不許〔一〇八〕。且賀爲奉禮，自言之，沈亞之言之，其王氏姊亦言之。兩《唐書》之誤無疑；蓋以雲韶樂工，取其樂府合於絃管，遂牽連而及，意其能協律耳。田北湖氏作調和之論，謂兼攝協律，事或有之，惟未嘗久於其位；引《別張又新酬李漢》詩：「吾將譔禮樂，聲調摩清新。欲使十千載，帝道如飛神」爲證。然王琦注前二語云：「謂作爲雅頌，以歌詠休明之德；譔者，不憚多言之意」，與協律無涉也。

《王濬墓下作》詩當作於在潞州時。濬墓在虢州恆農縣（今河南靈寶縣南），賀殆于役其地而有是作，詩云「秋藜」「菊花」，蓋在晚秋也。

洪邁《容齋三筆》七云：

唐昭宗光化三年（九〇〇）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

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劉稚圭、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望追賜及第，各贈補闕拾遺。現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奬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

此事正史失載。按其時適有內難，雖旋歸平定〔一〇九〕，莊所陳或因之被寢置也。

賀詩今存二百四十一首〔一一〇〕

（《清華學報》第十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十月。）

〔一〕《舊唐書》一三七，《新唐書》二〇三。
〔二〕《舊書》六十。
〔三〕《舊書》六十四。
〔四〕《新書》七十九。
〔五〕《舊書》一一二《李暠傳》、《李國貞傳》。
〔六〕《舊書》一三一《李勉傳》，一七六《李宗閔傳》。
〔七〕《新書》一三一《李程李石傳》。
〔八〕《新書》一三一《李勉傳》、《李夷簡傳》。
〔九〕《新書》一七四《李宗閔傳》。

〔一〇〕《昌谷別傳并注》，見《國粹學報》四十三期。

〔一一〕王禮錫《李長吉評傳》二十三，二十四面。

〔一二〕本校二十二年度畢業論文。

〔一三〕閻君謂兩《唐書》於小鄭王後，俱標出「鄭王」字，與記大鄭王後異，此爲文例。然所引諸傳，「鄭王」下皆繫「元懿」，無單稱者。閻君爰舉《舊書》一七六《李宗閔傳》云：「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臺閣，知名於時。」謂是「鄭王」單稱，以指元懿之證。但《賀傳》係稱「宗室鄭王」而不名，與單稱「鄭王」異。而《新書》七十《宗室世系表》之末，明以「鄭王房」與「小鄭王房」對舉，其《賀傳》所云「系出鄭王後」，更爲大鄭王無疑也。《閻譜》用力甚勤，本篇他處頗有采錄，附此致謝。

〔一四〕宋歐陽忞《輿地廣記》五。

〔一五〕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五。

〔一六〕宋吳正子箋註劉辰翁評點《李長吉歌詩》三《蘭香神女廟》詩中「元註」。此係夾註，與劉評他書式同，當卽劉註。

〔一七〕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十翁元圻註。

〔一八〕同上王原註。

〔一九〕《南園詩》云：「宮北田塍曉氣酣。」

〔二〇〕《吳箋劉評李集》三，《蘭香神女廟》詩「元註」。

〔二一〕見《南園》十三首，《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二二〕《始爲奉禮憶昌谷山居》詩。

〔二三〕本篇引賀詩，均據影印宣城本《李賀歌詩編》。

〔二四〕參用清王琦集解說。

〔二五〕《酒罷張大徹索贈詩》及《昌谷詩》。

〔二六〕見《春歸昌谷》詩及《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

〔二七〕見《崇義里滯雨》詩及《始爲奉禮》詩。

〔二八〕見《自昌谷到洛後門》詩。

〔二九〕《宋詩鈔》及《困學紀聞》二十。

〔三〇〕以上多用田北湖氏說。

〔三一〕據影印明談愷刻本，後同。

〔三二〕當是據李商隱《小傳》而頗有別裁（詳後），故引之。

〔三三〕馮浩《樊南文集詳註》八疑即賀同游王參元所娶，殊嫌附會。

〔三四〕書中題辭云如此。

〔三五〕蜀本影印本，在《續古逸叢書》中，宣城本，誦芬室影印。

〔三六〕《評傳》三十七面。

〔三七〕此節采《閤譜》。

〔三八〕見序中。

〔三九〕《四部叢刊》本（據明鈔本）《樊川文集》及明朱一是刻杜集，均作「十某年」。然本校所藏元刊《文粹》九十三，及明隆慶本《文苑英華》七一四均作十五年，宜可信。

〔四〇〕清姚燮註《昌谷集》凡例一，謂賀卒於元和十二年丁酉（八一七），馮浩《樊南文集詳註》亦持此說，皆以死後第二年爲第一年，非是。

〔四一〕《四部叢刊》本《沈下賢集》九十三葉。此條及注四三，承聞一多先生指示，謹謝。

〔四二〕賀有《送沈亞之歌》。

〔四三〕姚範《援鶉堂筆記》三十三：「韋處厚薦湜于宰相書云：『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此疑（湜）試賢良方正之時也。」按處厚原名淳，元和元年（八〇六）與湜俱及進士第，同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湜試賢良方正科在元和三年（八〇八），（以上均據清徐松《登科記考》十六，十七，《南菁書院叢書》本）處厚當於是時爲之延譽也。以是年三十二計之，本年當爲十四歲。

〔四四〕《新書》一六六。

〔四五〕洪興祖《韓子年譜》（粵雅堂本）三，是年秋，爲汴州觀察推官。

〔四六〕此說疑者甚多。馮浩《樊南文集詳註》八即嘗辯之。

〔四七〕據清錢大昕《疑年錄》一。

〔四八〕宋王灼《碧雞漫志》亦疑沈說，見《學海類編》本六葉。

〔四九〕胡小石《中國文學史講稿》上編一六八，一六九，二四四面。

〔五〇〕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上。

〔五一〕胡適《白話文學史》十二章論此風氣甚詳。

〔五二〕《評傳》四十面。

〔五三〕《元和郡縣志》五。

〔五四〕據詩中所見及《李傳》所記。

〔五五〕據《登科記考》十七。

〔五六〕據清勞格趙鉞《唐尙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十一。

〔五七〕《新書》二二二下,《通鑑》二三四,二三七,二三九。

〔五八〕《新書》二二二下。

〔五九〕《洪譜》五。馮浩《樊南集詳註》八(通行本十八葉)亦據此謂韓與皇甫「並轡訪李,必元和四五年事」。

〔六〇〕據《登科記考》十六。

〔六一〕《舊書》十四《憲宗紀》。

〔六二〕《新書》一七四。

〔六三〕《五百家注韓昌黎集》四,十四葉。通行本。

〔六四〕《新書》四十八《百官志》。

〔六五〕唐趙璘《因話錄》五,《稗海》本。

〔六六〕《說庫》本。

〔六七〕據《登科記考》十七。

〔六八〕《五百家注》三十四。

〔六九〕《洪譜》五。

〔七〇〕據《登科記考》凡例六葉。

〔七一〕《新書》四四《選舉志》。

〔七二〕《五百家注》四。

〔七三〕房式，見《五百家注》。

〔七四〕《摭言》謂解送之日，行鄉飲禮，牲用少牢，以官物充。讀此知亦不盡然。

〔七五〕《新書》本傳作「卒亦不就舉」，非，詳後。

〔七六〕據《登科記考》凡例三，四葉。

〔七七〕《摭言》。

〔七八〕均見《摭言》。

〔七九〕元劉將孫《送吳文彬序》，見《登科記考》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五葉。

〔八〇〕《考索續》，見《登科記考》二十八，十八至二十葉。

〔八一〕《浩歌贈陳商》，《開愁歌》，《致酒行》，《崇義里滯雨》，《春歸昌谷》，《南園》十三首。

〔八二〕《新書·百官志》。

〔八三〕《洪譜》六。

〔八四〕《新書·百官志》文。

〔八五〕《新書》四十五《選舉志》。

〔八六〕《十七史商榷》八十九。

〔八七〕《郎官石柱題名考》十二。

〔八八〕《五百家注》十八。

〔八九〕宋人《沈下賢集序》,《四部叢刊》本。

〔九〇〕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八。

〔九一〕據《登科記考》十八。

〔九二〕用張采田《玉谿生詩年譜會箋》說。

〔九三〕《摭言》。

〔九四〕、〔九五〕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五。

〔九六〕《新書》二十四《車服志》,六品以下去劍,佩綬。七品以上,以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監察御史正八品下,故祇能「截黃綬」而「白筆未上頭」也,二語皆謂湜。

〔九七〕王琦註,《太平寰宇記》,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有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

〔九八〕聞一多先生說。

〔九九〕《舊書》四十五《輿服志》。

〔一〇〇〕詩中詠及此事。

〔一〇一〕《舊書》十四《憲宗紀》,元和六年(八一一)三月,以河南尹郗士美兼潞府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十二年八月,以河南尹

尹辛祕代郗士美，以士美爲工部尚書。

〔一〇二〕宋洪邁《容齋續筆》一。

〔一〇三〕同上。謂幕職甚勞苦。

〔一〇四〕原作「畫角東城」，依曾益改。

〔一〇五〕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十二。

〔一〇六〕《評傳》第五節。

〔一〇七〕北新《青年界》五卷二期。

〔一〇八〕進士甲第，僅得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見《新書》四十五《選舉志》。

〔一〇九〕《舊書》二十上《昭宗紀》。

〔一一〇〕依王琦彙解本；有作二百四十二首者，蓋並其重出之一首計之。《四庫提要》據吳正子《箋註》本正集二百一十九篇，謂視杜序述沈子明語少十四篇，又外集二十三篇，視黃伯思《東觀餘論》所跋少二十九篇，以爲莫可考。《樂府》載有賀詩二篇，王琦本已錄，《提要》疑或在伯思藏本所佚之內也。

李賀年譜補記

上期《李賀年譜》貞元二十年下引《新唐書》二〇三《李益傳》云：

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

嗣承聞一多先生見示，益與賀齊名之説可疑。蓋據《李尚書集·從軍詩序》〔一〕云：「君虞（益字）長始八歲，燕戎亂作。」「燕戎」指安祿山，事在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七五五）；益是年八歲，則當生於天寶七載（七四八）。又《新書》本傳云：「（文宗）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若在太和元年（八二七），則益當年八十也。益以代宗大曆四年（七六九）進士擢第〔二〕，年二十二〔三〕；至貞元二十年（八〇四）五十七歲，成名已久。時賀年才十五；《益傳》乃稱益名與賀埒，似非信史云云。按聞先生所考益生卒甚確。《新書》名與賀埒一語，《舊書》作「與宗人李賀齊名」，苦不知其所據。疑原意或僅謂二子皆以樂府見稱；雖益成名在前，而賀才情不匱，亦能比肩先輩。然其語實有病，宜聞先生疑之也。

此條多蒙聞先生指教，謹致謝。

（《清華學報》第十卷第五期，一九三六年一月。）

〔一〕《二酉堂叢書》本。
〔二〕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四。
〔三〕唐蔣防《霍小玉傳》謂益年二十進士擢第，疑有誤。

現代人眼中的古代

——介紹郭沫若著《十批判書》

約莫十年前，馮友蘭先生提出「釋古」作爲我們研究古代文化的態度。他說的「釋古」，是對向來的「尊古」「信古」和近代的「疑古」而言，敎我們不要一味的盲信，也不要一味的猜疑，敎我們客觀的解釋古代。但這是現代人在解釋，無論怎樣客觀，總不能脫離現代人的立場。即如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的分期，就根據了種種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而不像從前的學者只是就哲學談哲學，就文化談文化。這就是現代人的一種立場。現代知識的發展，讓我們知道文化是和政治經濟社會分不開的，若將文化孤立起來討論，那就不能認淸它的面目。但是只求認淸文化的面目，而不去估量它的社會的作用，只以解釋爲滿足，而不去批判它對人民的價値，這還只是知識階級的立場，不是人民的立場。

有些人看到了這一點，努力的試驗着轉換立場來認識古代，評價古代。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戰就是這樣開始的。這大概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是這個試驗並不容易。先得對古代的記錄有一番辨析和整理工夫，然後下手，才能有些把握，才不至於曲解，不至於公式化。而對人民的立場，也得

多少經過些實際生活的體驗，才能把握得住；若是只憑空想，也只是公式化。所以從迷信古代，懷疑古代到批判古代，中間是得有解釋古代這一步工作才成。這一步工作，讓我們熟悉古代文化，一點一滴的將它安排在整個社會裏來看。我們現在知道若是一下子就企圖將整個古代文化放在整個社會機構裏來看，那是不免於生吞活剝的。

說到立場，有人也許疑心是主觀的偏見而不是客觀的態度，至少也會妨礙客觀的態度。其實並不這樣。我們討論現實，討論歷史，總有一個立場，不過往往是不自覺的。立場大概可別爲傳統的和現代的；或此或彼，總得取一個立場，才有話可說。就是聽人家說話，讀人家文章，或疑或信，也總有一個立場。立場其實就是生活的態度；誰生活着總有一個對於生活的態度，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對古代文化的客觀態度，也就是要設身處地理解古人的立場，體會古人的生活態度。盲信古代是將自己一代的願望投影在古代，這是傳統的立場。猜疑古代是將自己一代的經驗投影在古代，這倒是現代的立場。但是這兩者都不免強古人就我，將自己的生活態度，當作古人的生活態度，都不免主觀的偏見。客觀的解釋古代，的確是進了一步。理解了古代的生活態度，這才能親切的做那批判的工作。

中國社會史論戰結束的時候，郭沫若先生寫成了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轉換立場來研究中國古代的第一部系統的著作，不但「博得了很多的讀者」，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抗戰以來的

許多新史學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這部書的啓示。但是郭先生在《十批判書》裏，首先就批判這部書，批判他自己。他說：

> 我首先要譴責自己。我在一九三〇年發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那一本書，雖然博得了很多的讀者，實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錯誤的判斷，一直到現在還留下相當深刻的影響。有的朋友還沿用着我的錯誤，有的則沿用着我錯誤的徵引，而又引到另一錯誤的判斷，因此關於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許多新的混亂。

我們相信這是他的誠實的自白。

但是他又說：

> 關於秦以前的古代社會的研究，我前後費了將近十五年的工夫，現在是能達到了能够作自我批判的時候，也就是說能够作出比較可以安心的序說的時候。

我們也相信這是他的誠實的自白。在《後記》裏又說：

> 秦、漢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澈底勦翻了。考古學上的、文獻學上的、文字學、音韻學、因明學，就我所能涉獵的範圍內，我都作了盡我可能的準備和耕耘。

有了上段說的「將近十五年的工夫」和這兒說的「準備和耕耘」，才能寫下這一部《十批判書》。最重要的，自然還是他的態度。《後記》裏也說得明白：

批評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斷獄一樣，須得十分周詳，然後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據法律來判決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據道理。道理是什麼呢？便是以人民爲本位的這種思想，合乎這種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惡。我之所以比較推崇孔子和孟軻，也因爲他們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較富於人民本位的色彩的。

這「人民本位」的思想，加上郭先生的工夫，再加上給了他「精神上的啓蒙」的辯證唯物論，就是這一部《十批判書》之所以成爲這一部《十批判書》。

十篇批判，差不多都是對於古代文化的新解釋和新評價，差不多都是郭先生的獨見。這些解釋和評價的新處，《後記》中都已指出。郭先生所再三致意的有兩件事：一是他說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不是新意義的封建社會。二是他說「在公家腐敗，私門前進的時代，孔子是扶助私門而墨子是袒護公家的」。他「所見到的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爲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段中的前驅者」，而墨子「純全是一位宗教家，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場的人」。這兩層新史學家都持着相反的意見，郭先生贊同新史學家的立場或態度，卻遺憾在這兩點上彼此不能相同。我們對於兩造是非很不容易判定。但是仔細讀了郭先生的引證和解釋，覺得他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在後一件上，他似乎是恢復了孔子的傳統地位。但這是經過批判了的，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重新估定的，孔子的價值，跟從前的盲信不能相提並論。

聯帶着周代是奴隸社會的意見，郭先生並且恢復了傳統的井田制。他說「施行井田的用意」，

一是作爲榨取奴隸勞力的工作單位，另一是作爲賞賜奴隸管理者的報酬單位」。他說：

> 井田制的破壞，是由於私田的產生，而私田的產生，則由於奴隸的剩餘勞動之盡量榨取。這項勞動便是在井田制的母胎中破壞了井田制的原動力。

這裏用着辯證唯物論，但我們不覺得是公式化。他以爲《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三個字「確是新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因爲在這時才正式的承認了土地的私有」。「這的確是井田制的死刑宣佈，繼起的莊園制的湯餅會。」

傳統之所以爲傳統，有如海格爾所說「凡存在的總是有道理的」。我們得研究那些道理，那些存在的理由，一味的破壞傳統是不公道的。郭先生在新的立場上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雖然他所依據的是新的道理，但是傳統的繼續存在，卻多少能夠幫助他的批判，讓人們起信。因爲人們原就信慣了這些傳統，現在意義雖然變了，信起來總比較嶄新的理論容易些。郭先生不但批判的承認了一些傳統，還闡明了一些，找補了一些。前者如「呂不韋與秦王政」，闡明「秦始皇與呂不韋，無論在思想上同政見上，完全是立於兩絕端」。「呂不韋是代表着新興階層的進步觀念，而企圖把社會的發展往前推進一步的人，秦始皇則相反，他是站在奴隸主的立場，而要把社會扭轉。」這裏雖然給予了新評價，但秦始皇的暴君身分和他對呂不韋找衝突，是傳統裏有的。

後者如儒家八派，稷下、黃、老學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傳統裏已經失掉的一些連環，郭先生將

它們找補起來，讓我們認清楚古代文化的全貌，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實的根據。特別是稷下、黃、老學派，他是無意中在《管子》書裏發現了宋鈃、尹文的遺著，因而「此重要學派重見天日，上承孔、墨，旁逮孟、莊，下及荀、韓，均可得其聯鎖」。他又「從《墨經》上下篇看出了墨家辯者有兩派的不同」：「上篇盈堅白，別同異」，「下篇離堅白，合同異。」「這個發現在《莊子》以後是爲前人所從未道過的」。對於名家辯者的一些「觀念遊戲」或「詭辭」，他認爲必然有它們的社會屬性。如惠施的「山淵平，天地比」，「是曉示人民無須與王長者爭衡」，高低原只是相對的。又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可以演繹爲「暴人非人」，那麼殺暴人非殺人，暴政就有了藉口。

郭先生的學力，給他的批判提供了充實的根據，他的革命生活、亡命生活和抗戰生活，使他親切的把握住人民的立場。他說「現在還沒有達到可以下結論的時候，自然有時也不免要用辯論的筆調」。他的辯論的筆調，給讀者啓示不少。他「要寫得容易懂」，他寫得確是比較容易懂；特別是加上那帶着他的私人情感的《後記》，讓人們更容易懂。我推薦給關心中國文化的人們，請他們都讀一讀這一部《十批判書》。

（《大公報》，一九四七年）

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

系統的自覺的文學批評著作，中國只有鍾嶸的《詩品》；劉勰的《文心雕龍》，現在雖也認爲重要的批評典籍，可是他當時的用意還是在論述各體的源流利病與屬文的方法，批評不過附及罷了。這兩部書以外，所有的都是零星的，片斷的材料。這些材料卻很早就有，例如《尚書·堯典》裏「詩言志」一節（《僞孔傳》此節在《舜典》中），及《論語》、《孟子》中論《詩》的話；可是並不曾成爲獨立的學問。就是《詩品》與《文心雕龍》，在《隋書·經籍志》裏，也還附列在集部的總集中間。直到宋王堯臣等的《崇文總目》，才在集部裏立了文史一類，來安插這些書。鄭樵《通志》卻分爲文史、詩評兩類，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又合爲詩文評類，清《四庫全書提要》從之。但這種分類也不甚確定。再則，目錄學上雖劃分了獨立的一類，而在一般學人心目中，這個還只是小道，算不得學問的。這一類書裏也不盡是文學批評的材料；有些是文學史史料，有些是文學方法論。反過來說，別類書裏倒蘊藏着不少的文學批評的材料，如詩文集、筆記、史書等。

現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有兩大困難。第一，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煙海的書籍裏披沙揀金去。第二，得讓大家相信文學批評是一門獨立的學問，並非無根的游

談。換句話說，得建立起一個新的系統來。這比第一件實在還困難。郭君的書出版前七年，已經有人寫過一本《中國文學批評史》。那似乎隨手掇拾而成，並非精心結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東西，說解也只是順文敷衍，毫無新意，所以不爲人所重。郭君這部書，雖然只是上卷，我們卻知道他已費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書雖不是同類中的第一部，可還得算是開創之作；因爲他的材料與方法都是自己的。

這卷書所敍述的從周、秦到北宋，分期的理由見《自序》(一至二面)。取材的範圍廣大：不限於詩文評，也不限於人所熟知的「論文集要」一類書，而採用到史書文苑傳或文學傳序，筆記，論詩詩等；也不限於文學方面，郭君相信「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連帶的關係，因此中國的文學批評，即在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中，也足以看出其社會思想的背景」(一至二面)，所以隨時引證思想方面的事件。這已不止於取材而兼是方法了。用這個方法爲基本，他建立起全書的系統來。《自序》裏說「此書編例，各時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時代分，有的以文體分，更有的以問題分」(三面)，關鍵全在思想背景的不同。思想影響文學批評之大，像北宋的道學，人人皆知；但像儒道兩家的「神」「氣」說，就少有注意到的。書中敍入此種，才是探原立論。郭君還有一個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義，他的書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這裏。例如「文學」、「神」、「氣」、「文筆」、「道」、「貫道」、「載道」這些個重要術語，最是纏夾不清；書中都按着它們在各個時代或各家學

說裏的關係，仔細辨析它們的意義。懂得這些個術語的意義，才懂得一時代或一家的學說。他的分析也許還有未盡透徹的地方，如「情文」的分類（一二〇面）等，但大體是有結果的。

「文學批評」一語不用說是舶來的。現在學術界的趨勢，往往以西方觀念（如「文學批評」）爲範圍去選擇中國的問題；姑無論將來是好是壞，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進一步，直用西方的分類來安插中國材料，卻很審愼。書中用到西方分類的地方並不多，如眞善美三分法（六三、一八九面），各類批評的名稱（一〇三面）偶爾涉及，無庸深論；只有純文學、雜文學二分法，用得最多，卻可商榷。「純文學」、「雜文學」是日本的名詞，大約從 De Quincey 的「力的文學」與「知的文學」而來，前者的作用在「感」，後者的作用在「教」。這種分法，將「知」的作用看得太簡單（知與情往往不能相離），未必切合實際情形。況所謂純文學包括詩歌小說戲劇而言。中國小說戲劇發達得很晚；宋以前得稱爲純文學的只有詩歌，幅員未免過窄。而且這裏還有一個問題，漢賦算不算純文學呢？再則，書中說南北朝以後「文」「筆」不分（一四一面），那麼，純與雜又將何所附麗呢？書中明說各時代文學觀念不同，最好各還其本來面目，才能得着親切的了解；以純文學、雜文學的觀念介乎其間，反多一番糾葛。又書中以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觀念與我們的相同（三面），稱爲「離開傳統思想而趨於正確」（八面）。這裏前半截沒有什麼問題，後半截以我們自己的標準，衡量古人，似乎不大公道。各時代的環境決定各時代的正確標準，我們也是各還其本來面目的好。

此外可以商榷的還有幾處。如《詩》六義中「賦」、「比」、「興」三者影響後世詩論極大，而「比興」更是歷代評詩的金科玉律；甚至清代詞人也用此標準。書中《經學家之論詩見解》一章未詳說此層，僅云：「漢人解詩之失只在泥於王道」，似乎是不够的。又論「八病」以爲沈約所謂「輕」「重」，劉勰所謂「飛」「沈」即後世所謂「平」「側」；按阮元《揅經室續集·文韻說》，鄒漢勛《遺書·五均論》（《五音二十五論》之三）及胡小石君《中國文學史》中都有此說，可資引證。又唐人選唐詩中如《河嶽英靈》、《中興閒氣》諸集，多有敍文或評語，足供鉤稽。這些人論詩、選詩，自成一派（參看朱東潤《司空圖詩論綜述》，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三卷二號），似當列一專章論之。又書中有幾節專載書目提要，頗傷體例，再版時似可删去。又書中分期，以南宋、金、元直至現代爲「文學批評完成期」。「完成」一語，暗示止境，不如改「集成期」好些。這末了兩層郭君在《自序》中已提起一些了。

（《清華學報》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十月。）

詩文評的發展

——評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隋唐文學批評史》（以上《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一、二、三分册，商務印書館出版）與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開明書店出版）

「文學批評」是一個譯名。我們稱爲「詩文評」的，與文學批評可以相當，雖然未必完全一致。我們的詩文評有它自己的發展；現在通稱爲「文學批評」，因爲這個名詞清楚些，確切些，尤其鄭重些。但論到發展，還不能抹殺那個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個附庸的地位和一個輕蔑的聲音——「詩文評」在目錄裏只是集部的尾巴。原來詩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蟲小技，那麼，詩文的評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論。一面從《文心雕龍》和《詩品》以後，批評的精力分散在選本和詩話以及文集裏，絕少系統的專書，因而也就難以快快的提高自己身分。再說有許多人以爲詩文貴在能作，評者往往不是作手，所評無非廢話，至多也只是閒話。不過唐、宋以來，詩文評確還在繼承從前的傳統發展着，各家文集裏論文論詩之作，各家詩話，以及選本、評選本、評點本、加上詞話、曲品等，數量着實驚人。

詩文評雖在附庸地位，卻能獨成一類，便因爲目錄學家不得不承認這種發展的情勢。但它究竟還在附庸地位，若沒有「文學批評」這個新意念、新名字輸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經能夠鄭重的接受這個新意念，目下是還談不到任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

清末我們開始有了中國文學史。「文學史」雖也是輸入的意念，但在我們的傳統中卻早就有了根苗。六朝時沈約、劉勰都論到「變」，指的正是文學的史的發展，所以這些年裏文學史出的不算少，雖然只有三四本值得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現，卻得等到「五四」運動以後，人們確求種種新意念新評價的時候。這時候人們對文學取了嚴肅的態度，因而對文學批評也取了鄭重的態度，這就提高了在中國的文學批評——詩文評——的地位。二十年來我們已經有了至少五種中國文學批評史，進展算是快的，在西方，貴創作而賤批評的人也不少，他們雖有很多文學批評的著作，但文學批評史一類著作似乎還是比文學史少的多。我們這二十來年裏，文學批評史卻差不多要追上了文學史。這也許因爲我們正在開始一個新的批評時代，一個從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時代，要從新估定一切價值，就得認識傳統裏的種種價值，以及種種評價的標準；於是乎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有些就將興趣和精力放在文學批評史上。再說我們對現代中國文學所用的評價標準，起初雖然是普遍的——其實是借用西方的——後來就漸漸參用本國的傳統的，如所謂「言志派」和「載道派」——其實不如說是「載道派」和「緣情派」。文學批評史不止可以闡明過去，並且可以闡明現在，指引將來的路；這也增高

了它的趣味與地位。還有，所謂文學遺產問題，解決起來，不但用得着文學史，也用得着文學批評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發展得相當快，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響。

第一個人大規模搜集材料來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得推郭紹虞先生。他搜集的詩話，我曾見過目錄，那豐富恐怕還很少有人趕得上的。他寫過許多單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國文學批評裏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啓發我們很多。可惜他那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只出了上冊，又因爲寫的時期比較早些，不免受到不能割愛之處，加上這種書還算在草創中，體例自然難得謹嚴些。羅先生的書，情形就不相同了。編制便漸漸勻稱了，論斷也漸漸公平了。這原也是自然之勢。羅先生這部書寫到五代爲止，比郭先生寫到北宋的包括的時期短些，可是詳盡些。這原是一部書，因爲戰時印刷困難，分四冊出版，但第四冊還沒有出。就已出的三冊而論，這是一部值得細心研讀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批評」原是外來的意念；我們的詩文評雖與文學批評相當，卻有它自己的發展，上文已經提及。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就難在將這兩樣比較得恰到好處，敎我們能以靠了文學批評這把明鏡，照清楚詩文評的面目。詩文評裏有一部分與文學批評無干，得清算出去；這是將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是第一步。還得將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按這方向走，才能將我們的材料跟那外來意念打成一片，才能處處抓住要領；抓住要領以後，才值得詳細探索起去。羅先生的書除《緒言》（第一冊）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錄，就敎人耳目清新，就是因爲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說要兼攬編年、

紀事本末、紀傳三體之長，創立一種「綜合體」。有時也不必拘泥體例：如就一般的文學批評而言，隋、唐顯與魏、晉、南北朝不同，所以分爲兩期。但唐初的音律說，則傳南北朝衣鉢，便附敍於南北朝的音律說後。他要做到章學誠所謂「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觀態度（一册三六至三八面）。能够這樣才眞能將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隋唐文學批評史》（三册）開宗明義是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錄，也許覺得這種瑣屑的題目不值得耑章討論，更不值得占去兩章那麽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細讀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音律說》（在二册中占兩章）有過之無不及，著者特別提出，不厭求詳，正是他的獨見；而這也正是切實的將中國還給中國的態度。

《緒言》裏指出：「西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偏於文學理論」。「中國的批評，大都是作家的反串，並沒有多少批評專家。作家的反串，當然要側重理論的建設，不側重文學的批評。」又說中國的「批評不是創作的裁判，而是創作的領導」（一册一四、一五面）。他以爲這是因爲中國文化「尙用重於尙知，求好重於求眞」（一册一六至一七面）。這裏指出的事實大體是不錯的；說是「尙用重於尙知」，也有一部分眞理。但是說作家反串的「就當然側重理論」，以及「求好重於求眞」，似乎都還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說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典論・論文》），後者更說「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與楊德祖書》），都並不側重理論。羅先生稱這些爲「鑒賞論」（二册七八至七九面），鑒賞不就是創作的批評或裁判麽？照羅先生

的意思，這正是求眞；照曹植的話看，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謂長短，也是好與不好的別名。而西方的文學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評，一面固然是求眞，一面也還是求好。至於中國的文學理論，如載道說，卻與其說是重在求好，不如說是重在求眞還貼切些。總之，在文學批評裏，理論也罷，裁判也罷，似乎都在一面求眞，同時求好。我們可以不必在兩類之間強分輕重。至於中國缺少作家作品的系統的批評，儒家尙用而不尙知，固然是一個因子，道家尙玄而不尙實，關係也許更大。原來我們的「求好」的藝術論淵源於道家，而道家不信賴語言，以爲「言不盡意」，所以崇尙「無端崖之辭」。批評到作家和作品，便不免着實，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辭，或禪宗所謂死話頭。所以這種批評多少帶一點「陋」；陋就是見小不見大。中國文學批評就此沒有得着充分的發展；它所以不能成爲專業而與創作分途並進，也由於此。至於現代西方人主張「創作必寓批評」，「批評必寓創作」，如書中所引朱光潛先生的話，卻又因爲分業太過，不免重枝節而輕根本，所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這一步爲的矯正那偏重的情形，促進批評的更健全的發展。但那批評和創作分業的現象，還要繼續存在，因爲這是一個分業的世界。中國對作家和作品的批評，鍾嶸《詩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系統的著作，劉勰《文心雕龍》也系統的論到作家，這些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淸代幾部書。陳祚明的《古詩選》，對入選作家依次批評，以辭與情爲主，很多精到的意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從一方面看，也不失爲系統的文學批評，這裏紀昀的意見爲多。還有趙翼的《甌北詩話》分列十家，

家各一卷，朱東潤先生說是「語長而意盡，爲詩話中創格」(《批評史大綱》二六八面)，也算得系統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材料了。羅先生提到「制藝選家的眉批總評」，以爲毫無價値(一冊一六面，參看八面)。這種選家可稱爲評點家。評點大概創始於南宋時代，爲的是給應考的士子揣摩；這種選本一向認爲陋書，這種評點也一向認爲陋見。可是這種書漸漸擴大了範圍，也擴大了影響，有的無疑的能够代表甚至領導一時創作的風氣，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後者如明末鍾惺、譚元春的《古唐詩歸》。文學批評史似乎也應該給予這種批評相當的地位，才是客觀的態度。其實選本或總集裏批評作家或作品的片段的話，是和選本或總集同時開始的。王逸的《楚辭章句》，該算是我們第一部總集或選本，裏面就有了駁班固論《離騷》的話。班氏批評屈原和《離騷》，王氏又批評他的批評，這已經發展到二重批評的階段了。原來我們對集部的工作，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箋注，是求眞；裏面也偶有批評，卻只算作箋注的一部分。《楚辭章句》裏論《離騷》，似乎屬於這一類，又如《文選》裏左思《魏都賦》張載注，論到如何描寫鳥將飛之勢，如何描寫臺榭的高，比較各賦裏相似的句子，指出同異，顯明優劣，那更清楚的屬於這一類。二是選錄，是求好；選錄旨趣大概見於序跋或總論裏，有時更分別批評作家以至於作品。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和李充的《翰林論》是開山祖師，他們已經在批評作家和作品了。選本的數量似乎遠在註本之上，但是其中文學批評的材料並不多，完整的更少，原因上文已經論及。別集裏有論詩文等的書札和詩，其中也少批評到作家和作品；序

跋常說到作家，不過敷衍的多，批評的少，批評到作品的更是罕見。詩話文話等，倒以論作家和作品爲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鑒賞，尤其瑣屑。史書文苑傳或文學傳裏有些批評作家的話，往往根據墓誌等等。墓誌等等有時也批評到作品，最顯著的例子是元稹作的杜甫的《墓係銘》，推尊杜甫的排律，引起至今爭議莫決的李、杜優劣論。從以上所說，可見所謂文學裁判，在中國雖然沒有得着充分的發展，卻也有着古久的淵源和廣遠的分布。這似乎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羅先生這部書的確能够借了「文學批評」的意念的光，將我們的詩文評的本來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在《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裏特立專章闡述「文體類」的理論(二一四至四一面)。從前寫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的人都覺得這種文體論瑣屑而凌亂，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可是讀了羅先生的敍述和分析，我們能以看出那種種文體論正是作品的批評。不是個別的，而是綜合的；這些理論指示人們如何創作如何鑒賞各體文字。這不但見出人們如何開始了文學的自覺，並見出六朝時那新的「淨化」的文學概念如何形成。這是失掉的一環，現在才算找着了，連上了。這一分册裏《文學概念》一章(一至一七面)，敍述也更得要領，其中「蕭綱的鼓吹鄭邦文學」和「徐陵的編輯麗人豔歌」，各占了一個獨立的節目。還有上文提過的第三分册的頭兩章《詩的對偶及作法》，跟「文體類」有同樣的作用，見出律詩是如何發展的，也見出「元稹白居易的社會詩論」的背景的一面來。再說魏晉時代開始了文學的自覺以後，除文體論外，各種的批評還不少。這些批評，以前只歸到時代或作家批評

家的名下，本書卻分立《創作論》和《鑑賞論》兩章來闡述（二冊七〇至八一面），面目也更清楚了。《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裏還提到「古經中的辭令論」（五三面），這也是失掉的一環。春秋是「詩」和「辭」的時代；那時「詩」也當作「辭」用，那麼，也可以說春秋是「辭」的時代。戰國還是「辭」的時代。辭令和說辭如何演變為種種文體，這裏不能討論（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曾觸及這問題，但他還未認清「辭」的面目）；現在只想指出孔子的「辭達而已矣」那句話和《易》傳裏「修辭立其誠」那句話，對後世文論影響極大，而這些原都是論「辭」的。從這裏可見「辭令論」的重要性。可是向來都將「文」和「辭」混為一談，又以為「辭」同於後世所謂的「文辭」，因此就只見其流，不見其源了。《文選》序曾提出戰國的「辭」，但沒有人注意。清代阮元那麼推重《文選》，他讀那篇序時，卻也將這一點忽略了。羅先生現在注意到「古經中的辭令論」，自然是難得的，只可惜他僅僅提了一下沒有發揮下去。第三分冊裏敍述史學家的文論，特立「文學史觀」一個節目（八九至九一面）；這是六朝以來一種新的發展，是跟着文學的自覺和文學概念的轉變來的。前面說過「文學史」的意念在我們的傳統中早就有了根苗，正是指此。以前的文學史等，卻從沒有這麼清楚的標目，因此就隱蔽了我們傳統中這個重要的意念。這一分冊敍述「古文論」（一〇三至一五一面），也很充實，關於韓愈，特別列出「不平則鳴」與「文窮益工」一目（一三三至一三四面）。這是韓愈的重要的文學見解，不在「惟陳言之務去」以下，但是向來沒有得着應得的地位。本書《緒言》中說到「解釋的方法」，有「辨似」一項，就是分析

詞語的意義，在研究文學批評是極重要的。文學批評裏的許多術語沿用日久，像滾雪球似的，意義越來越多。沿用的人有時取這個意義，有時取那個意義，或依照一般習慣，或依照行文方面，極其錯綜複雜。要明白這種詞語的確切的意義，必須加以精密的分析才成。書中如辨漢代所謂「文」並不專指詩賦（一冊九八面），又如論到辭賦的獨特價値就是在「不同於詩」，而漢人將辭賦看作詩，「辭賦的本身品性，當然被他們埋沒不少，辭賦的當時地位，卻賴他們提高好多」（一冊一二〇面），都是用心分析的結果，這才能辨明那些疑似之處。

朱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自序》裏說：「這本書的敍述，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四面）。他的書大部分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直到清代《白雨齋詞話》的著者陳廷焯爲止。他的「遠略近詳」的敍述恰好供給我們的需要，彌補我們的缺憾。這還是第一部簡要的中國文學批評全史，我們讀來有滋味的。這原是講義稿，不是「詳密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自序》裏說得明白。我們只能當它「大綱」讀着；有人希望書裏敍述得詳備些，但那就不是「大綱」了。《自序》中還說這本書是兩次稿本湊合成的，現在卻只留下一處痕跡，第三十七章裏說：「東坡、少游於柳詞皆不滿，語見前」（一九六面），前面並不見；這總算不錯了。作爲「大綱」，本書以批評家標目，倒是很相宜的；因爲如《自序》所說，這裏「所看到的，常常是整個的批評家」（四面）。朱先生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很多，《讀詩四論》（商務）之外，還有許多研究歷代批評家的論文，曾載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學報》上，現在

聽說已集成一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了。《讀詩四論》和那些論文都够精詳的，創見不少。他取的是客觀的分析的態度。《大綱》的《自序》裏提到有人「認爲這本書不完全是史實的敍述，而有時不免加以主觀的判斷」。朱先生承認這一點，他提出「史觀的問題」，說「作史的人總有他自己的立場」（五面）。本書倒是有夾敍夾議的，讀來活潑有味，這正是一因。但是朱先生的史觀或立場，似乎也只是所謂「釋古」，以文學批評還給文學批評，中國還給中國，一時代還給一時代。這似乎是現代的我們一般的立場，不見其特別是朱先生主觀的地方。例如書中敍「盛唐」以後論詩大都可分二派：「爲藝術而藝術，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圖等」，「爲人生而藝術，如元結、白居易、元稹等」（九三至九四面）。兩派的存在得着外來的意念來比較而益彰。又如論袁枚爲王次回辯護道：「次回《疑雨集》，與《隨園詩話》所舉隨園、香亭兄弟之詩論之，非特與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無當，卽贈芍采蘭，亦不若是之繪畫裸陳也。……若因風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爲大宗，固不可矣。」（三六六面）這可以說是「雅正」的傳統，不過是這時代已經批評的接受了的，和上例那一對外來的傳統的意念的地位一般。這些判斷都反映着我們的時代，與其說是主觀的，不如說是客觀的，可是全書以陳廷焯作殿軍，在這末一章裏卻先敍莊棫、譚獻道：「清人之詞，至莊、譚而局勢大定，莊、譚論詞無完書，故以亦峯（廷焯字亦峯）之說終焉。」（三九六面）這個判斷是客觀的，但標目不列代表的批評家莊、譚，只舉出受莊氏影響的陳氏，未免有些偏畸或疏忽。然而這種小節是不足以定主客觀之辨的。

《大綱》以個別的批評家標目，這些批評家可以說都是代表一個時代、一個派別或一種理論的批評家，著者的長處在能够根據客觀的態度選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評家。如南宋反對「江西派」的張戒（三十章），清代論詩重變的葉燮（六十一章），第一個有文學批評史的自覺的紀昀（六十七章），創詩話新格的趙翼（七十章），他們的文學批評，一般的文學史，似乎都不大提及，有些簡直是著者第一次介紹和我們相見。此外如金人瑞和李漁各自占了一章的地位（六十三、六十四章），而袁宏道一章（五十章）中也特別指出他推重小說戲曲的話（二六四面），這些都表現着現代的客觀態度。這種客觀的態度，雖然是一般的，但如何應用這種態度，還得靠著者的學力和識力而定，並不是現代的套子，隨意就可以套在史實上。論金人瑞批評到他的評點（三三七、三四〇面），並徵引他的《西廂記》評語（三三八面），論鍾惺、譚元春一章（五十一章）也徵引《詩歸》裏的評語；論到近代批評，是不能不給予評點公平的地位的。因此想到宋、元間的評點家劉辰翁，他評點了很多書，似乎也應該在這本書裏占個地位。書中論曹丕兄弟優劣，引王夫之《薑齋詩話》：「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子桓，俗論大抵如此。」以爲「此言若就文學批評方面論之，殆不可廢」（二五面，參看二七面），最是公平的斷語。又評鍾嶸持論「歸於雅正」（六八面）；向來只說鍾氏專重「自然英旨」，似乎還未達一間。至於論嚴羽：「吾國文學批評家，大抵身爲作家，至於批判今古，不過視爲餘事。求之宋代，獨嚴羽一人，自負識力，此則專以批評名家者。」（一八四面）這確是獨到之見。兩宋

詩話的發達，培養出這種自覺心，也是理有固然，只是從來沒人指出罷了。其他如論元稹「持論雖與(白)居易大恉相同，而所見之範圍較大，作詩之母題較多，故其對人之批評，亦不若居易之苛」(九九面)。論柳冕「好言文章與道之關係，與韓愈同，然有根本不同者，愈之所重在文，而冕之所重在道」(一〇六面)。似乎也都未經人說及。書中又指出陸機兄弟「重在新綺」，而皇甫謐和左思的《三都賦序》持「質實」之說(三二面)；人們一向卻只注意到齊代裴子野的《雕蟲論》。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彙》列杜甫爲大家，好像推尊之至，但書中指出他不肯當杜甫是「正宗」(二一三面)。韓愈的文統——文統說雖到明代茅坤才明白主張(二四七至二四八面)，但韓愈已有此意，這裏依郭紹虞先生的意見——，五經而下，列舉左氏、莊、《騷》、太史公、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進學解》，《答劉正夫書》)。本書指出明代王世貞又以莊、列、淮南、左氏爲「古四大家」(二三八面)，這種異同該是很有意義的。又如引曾國藩日記「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說「此爲曾氏持論一大特點，故其論文，每每從字句聲色間求之」(三九二面)。這也關係一時代一派別的風氣。以上各例，都可見出一種慎思明辨的分析態度。

中國文的三種型

——評郭紹虞編著的《語文通論》與《學文示例》（開明書店出版）

這兩部書出版雖然已經有好幾年，但是抗戰結束後我們才見到前一部書和後一部書的下冊，所以還算是新書。《語文通論》收集關於語文的文章九篇，著者當作《學文示例》的序。《學文示例》雖然題爲「大學國文教本」，卻與一般國文教本大不相同。前一部書裏討論到中國語文的特性和演變，對於現階段的白話詩文的發展關係很大，後一部書雖然未必是適用的教本，卻也是很有用的參考書。

《語文通論》裏《中國語詞之彈性作用》、《中國文字型與語言型的文學之演變》、《新文藝運動應走的新途徑》、《新詩的前途》，這四篇是中心。《文筆再辨》分析「六朝」時代的文學的意念，精詳確切，但是和現階段的發展關係比較少。這裏討論，以那中心的四篇爲主。郭先生的課題可以說有三個。一是語詞，二是文體，三是音節。語詞包括單音詞和連語。郭先生「覺得中國語詞的流動性很大，可以爲單音同時也可以爲複音，隨宜而施，初無一定，這卽是我們所謂彈性作用」（二面）。他分「語詞伸縮」、「語詞分合」、「語詞變化」、「語詞顚倒」四項，舉例證明這種彈性作用。那些例子豐富而

顯明，足够證明他的理論。筆者尤其注意所謂「單音語詞演化爲複音的傾向」(四面)。筆者覺得中國語還是單音爲主，先有單音詞，後來才一部分「演化爲複音」，商朝的卜辭裏絕少連語，可以爲證。但是這種複音化的傾向開始很早，卜辭裏連語雖然不多，卻已經有「往來」一類連語或詞。《詩經》裏更有了大量的疊字詞與雙聲疊韻詞。連語似乎以疊字與雙聲疊韻爲最多，和六書裏以形聲字爲最多相似。筆者頗疑心雙聲疊韻詞本來只是單音詞的延長。聲的延長成爲雙聲，如《說文》只有「蝕」字，後來卻成爲「蟋蟀」；韻的延長成爲疊韻，如「消搖」，也許本來只說「消」一個音。書中所舉的「玄黃」「猶與」等雙聲連語可以自由分用(二三面)，似乎就是從這種情形來的。

但是複音化的語詞似乎限於物名和形況字，這些我們現在稱爲名詞、形容詞和副詞；還有後世的代詞和聯結詞(詞類名稱，用王了一先生在《中國現代語法》裏所定的)。别的如動詞等，卻很少複音化的。這個現象的原因還待研究，但是已經可以見出中國語還是單音爲主。本書說「複音語詞以二字連綴者爲最多，其次則三字四字」(三面)。雙聲疊韻詞就都是「二字連綴」的。三字連綴似乎該以上一下二爲通例。書中舉《離騷》的「忳鬱邑余侘傺兮」，並指出「忳與鬱邑同義」(一八面)，正是這種通例。這種複音語詞《楚辭》裏才見，也最多，似乎原是楚語。後來五七言詩裏常用它。我們現在的口語裏也還用着它，如「亂烘烘」之類。四字連綴以上二下二爲主，書裏舉的馬融的《長笛賦》「安翔駘蕩，從容闡緩」等，雖然都是兩個連語合成，但是這些合成的連語，意義都相近或相同，合成之後

差不多成了一個連語。書裏指出「辭賦中頗多此種手法」(二〇面)，筆者頗疑心這是辭賦家在用着當時口語。現代口語裏也還有跟這些相近的，如「死氣白賴」「慢條斯理」之類。不過就整個中國語看，究竟是單音爲主，二音連語爲輔，三四音的語詞只是點綴罷了。

郭先生將中國文體分爲三個典型，就是「文字型，語言型，與文字化的語言型」(六六面)。他根據文體的典型的演變劃分中國文學史的時代。「春秋」以前爲詩樂時代，「這是語言與文字比較接近的時代」。文字「組織不必盡同於口頭的語言」，卻還是「經過改造的口語」；「雖與習常所說的不必盡同，然仍是人人所共曉的語言」。這時代的文學是「近於語言型的文學」(六八——九面)。古代言文的分合，主張不一；這裏說的似乎最近情理。「戰國」至兩漢爲辭賦時代，這是「漸離語言型而從文字型演進的時代，同時也可稱是語言文字分離的時代」。郭先生說：

> 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極重要的時代，因爲是語文變化最顯著的時代。此種變化，分爲兩途：其一，是本於以前寡其詞協其音，改造語言的傾向以逐漸進行，終於發見單音文字的特點，於是在文學中發揮文字之特長，以完成辭賦的體製，使文學逐漸走上文字型的途徑；於是始與語言型的文學不相一致。其又一，是藉統一文字以統一語言，易言之，卽藉古語以統一今語，於是其結果成爲以古語爲文辭，而語體與文言遂趨於分途。前一種確定所謂駢文的體製，以司馬相如的功績爲多；後一種又確定所謂古文的體製，以司馬遷的功績爲多。(六九——七〇面)

以古語爲文辭，即所謂「文字化的語言型」(七一面)。這裏指出兩路的變化，的確是極扼要的。魏、晉、南北朝是駢文時代，「這才是充分發揮文字特點的時代」，「是以文字爲工具而演進的時代」(七二面)。

「文字型的文學既演進到極端，於是起一個反動而成爲古文時代」，隋、唐至北宋爲古文時代。書中說這是「託古的革新」。「古文古詩是準語體的文學，與駢文律詩之純粹利用文字的特點者不同。」南宋至現代爲語體時代，「充分發揮語言的特點」，「語錄體的流行，小說戲曲的發展，都在這一個時代，甚且方言的文學亦以此時爲盛。」這「也可說是文學以語言爲工具而演進的時代」(七三——四面)。語體時代從南宋算起，確是郭先生的特見。他覺得：

> 有些文學史之重在文言文方面者，每忽視小說與戲曲的地位；而其偏重在白話文方面者，又抹煞了辭賦與駢文的價值。前者之誤，在以文言的餘波爲主潮；後者之誤，又在強以白話的伏流爲主潮。(七四面)

這是公道的評論。他又說「中國文學的遺產自有可以接受的地方，(辭賦與駢文)不得僅以文字的遊戲視之」，而「現在的白話文過度的歐化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至少也應帶些土氣息，合些大衆的脾胃」。他要白話文「做到不是啞吧的文學」(七五面)。書中不止一回提到這兩點，很是強調，歸結可以說是在音節的課題上。他以爲「運用音節的詞，又可以限制句式之過度歐化」(一一二面)，這樣「才能使白話文顯其應用性」(一一七面)。他希望白話文「早從文藝的路走上應用的路」，「代替文言

文應用的能力」，並「顧到通俗教育之推行」（八九面）。筆者也願意強調白話文「走上應用的路」。但是郭先生在本書《自序》的末了說：

我以爲施於平民教育，則以純粹口語爲宜；用於大學的國文教學，則不妨參用文言文的長處；若是純文藝的作品，那麼卽使稍偏歐化也未爲不可。（自序四面）

這篇序寫在三十年。照現在的趨勢看，白話文似乎已經減少了歐化而趨向口語，就是郭先生說的「活語言」、「眞語言」（一〇九面），文言的成分是少而又少了。那麼，這種辨別雅俗的三分法，似乎是並不需要的。

郭先生特別強調「中國文學的音樂性」，同意一般人的見解，以爲歐化的白話文是「啞吧文學」。他對中國文學的音樂性是確有所見的。書中指出古人作文不知道標點分段，所以只有在音節上求得句讀和段落的分明；駢文和古文甚至戲劇裏的道白和語錄都如此，駢文的匀整和對偶，古文句子的短，主要的都是爲了達成這個目的。而這種句讀和段落的分明，是從誦讀中覺出（三八——九面，又《自序》二——三面）。但是照晉朝以來的記載，如《世說新語》等，我們知道誦讀又是一種享受，是代替唱歌的。郭先生雖沒有明說，顯然也分到這種情感。他在本書《自序》裏主張「於文言取其音節，於白話取其氣勢，而音節也正所以爲氣勢之助」（三面），這就是「參用文言文的長處」。書中稱贊小品散文，不反對所謂「語錄體」，正因爲「文言白話無所不可」（一〇四——八面），又主張白話詩「容

納舊詩詞而仍成新格」（一三二面），都是所謂「參用文言文的長處」。但是小品文和語錄體都過去了，白話詩白話文也已經不是「啞吧文學」了。《自序》中說「於白話取其氣勢」，在筆者看來，氣勢不是別的，就是音節，不過不是駢文的鏗鏘和古文的吞吐作態罷了。朗誦的發展使我們認識白話的音節，並且漸漸知道如何將音節和意義配合起來，達成完整的表現。現在的青年代已經能够直接從自己唱和大家唱裏享受音樂，他們將音樂和語言分開，讓語言更能盡它的職責，這是一種進步。至於文言，如書中說的，駢文「難懂」，古文「只適宜於表達簡單的意義」（三九面）；「在通篇的組織上，又自有比較固定的方法，遂也不易容納複雜的思想」（《自序》三面）。而古詩可以用古文做標準，律詩可以用駢文做標準。那麼，文言的終於被揚棄，恐怕也是必然的罷。

《語文通論》裏有一篇道地的《學文示例序》，說這部書「以技巧訓練爲主而以思想訓練爲輔」，「重在文學之訓練」，彙選文言和白話，散文和韻文，「其編製以例爲綱而不以體分類」，「示人以行文之變化」（一四五——九面）。全書共分五例：

一、評改例，分摘謬、修正二目，其要在去文章之病……。二、擬襲例，分摹擬、借襲二目，摹擬重在規範體貌，借襲重在點竄成言，故又爲根據舊作以成新製之例。三、變翻例，分譯辭、翻體二目，或迻譯古語，或櫽括成文，這又是改變舊作以成新製之例。四、申駁例，分續廣、駁難二目，續廣以申前文未盡之意，駁難以正昔人未愜之見，這又重在立意方面，是補正舊作以成新製之例。五、鎔裁例，此則爲學文最後工夫，是摹擬而異其

形迹，出因襲而自生變化，或同一題材而異其結構，或異其題材而合其神情，……這又是比較舊作以啓迪新知之例。（一四九——一五〇面）

郭先生編《學文示例》這部書，搜採的範圍很博，選擇的作品很精，類列的體例很嚴，值得我們佩服。書中白話的例極少，這是限於現有的材料，倒不是郭先生一定要偏重文言；不過結果卻成了以訓練文言爲主。所選的例子大多數出於大家和名家之手，精誠然是精，可是給一般大學生「示例」，要他們從這裏學習文言的技巧，恐怕是太高太難了。至於現在的大學生有幾個樂意學習這種文言的，姑且可以不論。不過這部書確是「一種新的編製，新的方法」，如郭先生序裏說的。近代陳曾則先生編有《古文比》，選錄同體的和同題的作品，並略有評語。這還是「班、馬異同評」一類書的老套子，不免簡單些。戰前鄭奠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教，編出《文鏡》的目錄，同題之外，更分別體製，並加上評改一類，但是也不及本書的完備與變化。這《學文示例》確是一部獨創的書。若是用來啓發人們對於古文學的欣賞的興趣，並培養他們欣賞的能力，這是很有用的一部參考書。

（《清華學報》）

修辭學的比興觀

——評黎錦熙《修辭學比興篇》(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部書原是一本講義，民國十四年寫定(《自序》)。而這本講義又是《文心雕龍比興篇校釋》一文的擴大(七十二面)。所以體例和一般的修辭學書頗不同。《自序》裏說：「宏綱之下，細目太張。例句號碼，數逾三百。詁訓校訂，曼衍紛紜。」這是眞話。書是三十二開本，一百十面，祇論顯比，自然够詳的，也够繁的。書中主要部分以「句式」爲綱，而黎先生稱那些句式爲「修辭法」(一面)；這卻暗示着指點方法的意思，與一般的修辭教科書又相同了。不過本書所取的是所謂「綜合而博涉的講法」，與敎科書之整齊勻稱不一樣，並不像是給初學者指點方法的。這是體例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自序》裏說：「修辭學所說的，只能在批評上、指導上、反省上呈露一些實效，並沒有什麼大用處。那麼，這種綜合而博涉的講法，也許比那法令條文似的許多規律，或者膚廓不切的許多理論，倒可多得點益處。」這是黎先生的辯護。但本書若有些用處，似乎還只在「批評上」。《自序》裏又說：「一個人要專靠着修辭學的修習而做出好文章或者說出漂亮話來，那是妄想。」這是不錯的。修辭學和文法一樣，雖然可以多少幫助一點初學的人，但其主要的任務該是研究語言文字的作用和組織，

這可以說是批評的。明白這一層，文法和修辭學才有出路〔一〕。本書作者雖然還徘徊於老路盡頭，但不知不覺間已向新路上走了，這個值得注意。

本書的毛病在雜。《自序》裏說：「劉勰（《比興》）之篇，陸機（《連珠》）之作，旣成專釋，理應別出；嵌入其中，不免臃腫。」這是體製的雜。不過眞覺得「臃腫」的是附錄的那篇《春末閒談》，白費了五面多。劉、陸之作，就全書而言，放在裏邊還不算壞。書中例句，古文大概到韓愈而止，是《馬氏文通》的影響。韓愈以後的可也引，但甚少（只四例）。韻文卻到皮黃劇本而止。韓愈以後那四例，零零落落，不痛不癢的，儘可以換去。書中有白話文例二十二個。六個不曾註出處，似乎是隨手編的。其餘出於《石頭記》、《儒林外史》、《老殘游記》的五個，出於魯迅《阿Q正傳》及徐志摩《曼殊斐兒》的四個，出於譯文的七個。選的太少，範圍太狹，不足以代表白話文。況且歐化的白話文和譯文，其句式乃至顯比，較古文及舊韻文變化很多，值得獨立研究。附合討論，不足以見其特色，而又附得那樣少，近於敷衍門面，簡直毫無用處。不如將這二十二例一律刪除，專論舊體，倒乾脆些。這是選例的雜。至於用所謂「晉、唐譯經」體（《自序》）爲綱，白話文爲說明，又是文體的雜了。

幸而也有不雜的地方。一是「詁訓」《詩經》喻句，並探討比興的意義，二是選釋陸機的《演連珠》，三是校釋《文心．比興篇》。體製雖因此而雜，卻見出黎先生心力有所專注，和「膚廓不切的理論」不一樣。就中說「連珠之文，比多成例」，雖受了嚴譯《穆勒名學》的暗示（嚴譯「三段論」爲「連

珠」），但為別的修辭學所不及，還算是新鮮的。《比興篇》的校釋卻全錄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別無發明。論《詩經》似乎是黎先生最著意的，全書百分之四十都是《詩經》的討論。句式（二）云：「以物為比，或事相方，物德事情，前文具足，喻句之內，不復重述。」（十四面）「若說《詩》者，不明此例：本詩之中，德已前舉，喻即後隨；乃對於喻，多方附會。夫以附會，廣說『比』義，說詩通病，千載于茲！」（十六、十七面）他舉「顒顒卬卬，如圭如璋」等句舊說，加以駁議。又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說，以為「道理愈說愈精，比喻似乎也愈切愈妙，卻和詩人本意愈離愈遠了」（三十八面）。這些話甚得要領。

但是黎先生所解釋的喻義，卻大抵只據人情，未加考證，難以徵信。他自己說：「所比的東西和所用的詞在古代是常俗所曉，到後來卻漸漸地晦塞了」（四十二面），可見沒有考證的工夫是不行的。但如書中說「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云：「這不但不相似，而且相反了：斧析薪是劈開，人說媒是合攏。只有『克』『得』兩字比上了。」又如舉類似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說是「牽強不切的比喻」（均六十九面）。但是詩人多以薪喻婚姻（二），黎先生所舉兩例之外，還有《漢廣》的「翹翹錯薪」，《綢繆》的「綢繆束薪」，《車舝》的「析其柞薪」，都是的。這當與古代民俗有關，尚待考證；用「牽強不切」四字一筆抹殺，是不公道的。不過本書提出廣說比義和切說比義兩原則，舉例詳論，便已觸着語言文字的傳達作用一問題，這就是新路了。書中論《詩經》

興義也頗詳細。所引諸家說都很重要，參考甚有用。但所說「興」的三義（七十四面），還和朱熹差不多，是不能結束舊公案（參看八十四面）的。

所以本書只能當作不完備的材料書用。可是在這方面也還有些缺點。如引比興舊說，有呂祖謙一條（七十九至八十面）不注出處。這見於《呂氏家塾讀詩記》二，還易檢尋；不過引文有刪節，未曾標明。又朱熹兩條，第二條不注出處。這一條其實是三條，黎先生似乎從《詩經傳說彙纂》首卷下鈔出。首尾兩條原見於《詩傳遺說》和《朱子語類》，中間一條卻慚愧，還不知本來的出處。又惠周惕一條引「鶴林吳氏」，黎先生「按吳氏原文」云云。吳泳有《詩本義補遺》，已佚，所謂「原文」，實係據《困學紀聞》三轉引，不加注明，會令人迷惑。這些地方可見本書雖定稿於民國十四年，卻始終是倉卒成編，未經細心校訂。這是教讀者遺憾的。

（一九三七年）

〔一〕參看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pp. 3-8.

〔二〕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十一。又胡承珙《毛詩後箋》一也有意義相同的話。

陶詩的深度

——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層冰堂五種之三)

註陶詩的，南宋湯漢是第一人。他因爲《述酒》詩「直吐忠憤」，而「亂以廋詞，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故加箋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一〕所以《述酒》之外，註的極爲簡略。後來有李公煥的《箋註》，比較詳些；但不止箋註，還採錄評語。這個本子通行甚久；直到清代陶澍的《靖節先生集》止，各家註陶，都跳不出李公煥的圈子。陶澍的《靖節先生年譜考異》，卻是他自力的工作。歷來註家大約總以爲陶詩除《述酒》等二三首外〔二〕，文字都平易可解，用不着再費力去作註；一面趣味便移到字句的批評上去，所以收了不少評語。評語不是沒有用，但夾雜在註裏，實在有傷體例；仇兆鰲《杜詩詳註》爲人詬病，也在此。註以詳密爲貴；密就是密切、切合的意思。從前爲詩文集作註，多只重在舉出處，所謂「事」；但用「事」的目的所謂「義」，也當同樣看重。只重「事」，便只知找最初的出處，不管與當句當篇切合與否；兼重「義」才知道要找那些切合的。有些人看詩文，反對找出處；特別像陶詩，似乎那樣平易，給找了出處倒損了它的天然。鍾嶸也曾從作者方面說過這樣的話；但在作者方面也許可以這麼說，從讀者的了解或欣賞方面說，找出作品字句篇章的

來歷，卻一面教人覺得作品意味豐富些，一面也教人可以看出那些才是作者的獨創。固然所能找到的來歷，即使切合，也還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個人讀書受用，有時候卻便在無意的浸淫裏。作者引用前人，自己儘可不覺得；可是讀者得給搜尋出來，才能有充分的領會。古先生《陶靖節詩箋定本》用昔人註經的方法註陶，用力極勤；讀了他的書才覺得陶詩並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麼平易，平易裏有的是「多義」。但「多義」當以切合為準，古先生書卻也未必全能如此，詳見下。

從《古箋定本》引書切合的各條看，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曾用吳瞻泰《陶詩彙註》及陶澍註本比看，本書所引為兩家所無者，共《莊子》三十八條，《列子》十九條；至於引《論語》處兩家全未註出，當時大約因為這是人人必讀書，所以從略。這裏可以看出古先生爬羅剔抉的工夫；而《列子》書向不及《莊子》烜赫，陶詩引《列子》竟有這麼多條，尤為意料所不及。沈德潛說：「晉人詩曠達者徵引《老》、《莊》，繁縟者徵引班、揚，而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三〕照本書所引，單是《莊子》便已比《論語》多；再算上《列子》，兩共七十次，超過《論語》一倍有餘。那麼，沈氏的話便有問題了。歷代論陶，大約六朝到北宋，多以為「隱逸詩人之宗」，南宋以後，他的「忠憤」的人格才擴大了。本來《宋書》本傳已說他「恥復屈身異代」等等〔四〕。經了眞德秀諸人重為品題〔五〕，加上湯漢的註本，淵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確立了。但是淵明的思想究竟受道家影響多，還是受儒家影響多，似乎還值得討

論。沈德潛以多引《論語》爲言。考淵明引用《論語》諸處，除了字句的胎襲，不外「游好在《六經》」，「憂道不憂貧」兩個意思〔六〕。這裏《六經》自是儒家典籍，固窮也是儒家精神，只是「道」是什麽呢？淵明兩次說「道喪向千載」〔七〕，我們可以看《飲酒》詩第二十云：「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眞」與「淳」都不見於《論語》〔八〕。什麽叫「眞」呢？我們可以看《莊子．漁父篇》云：

> 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

「眞」就是自然。「淳」呢？《老子》五十八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王弼註云：

> 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悶悶然卒至於大治，故曰「其政悶悶」也。其民無所爭競，寬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陶《勸農》詩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眞。」《感士不遇賦》云：「……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僞斯興。……」「抱朴」也是老子的話〔九〕。也就是「淳」的一面。「眞」和「淳」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眞」「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一〇〕。所以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又查愼行《詩評》論《歸田園居詩》第四云：「先生精於釋理，但不入社耳。」此指「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二語。但本書引《列子》、《淮南子》解「幻化」「歸空無」甚確。陶詩裏實在也看不出佛教影響。

陶詩裏可以確指爲「忠憤」之作者，大約只有《述酒》詩和《擬古》詩第九。《述酒》詩「廋詞」太多，古先生所箋可以說十得六七，但還有不盡可信的地方，——比湯註自然詳密得遠了。《擬古》詩第九怕只是泛說，本書以爲「追痛司馬休之之敗」，卻未免穿鑿。至於《擬古》詩第三、第七，《雜詩》第九、第十一，《讀山海經》詩第九，本書也都以史事比附，文外懸談，毫不切合，難以起信。大約以「忠憤」論陶的，《述酒》詩外，總以《詠荊軻》、《詠三良》及《擬古》詩、《雜詩》助成其說。湯漢說：「三良與主同死，荊軻爲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其實「三良」與「荊軻」都是詩人的熟題目：曹植有《三良詩》，王粲《詠史》詩也詠「三良」；阮瑀有《詠史》詩二首，詠「三良」及荊軻事。淵明作此二詩，不過老實詠史。未必別有深意。眞德秀、湯漢又以《擬古》詩第八「首陽」「易水」爲說；但還只是偶爾斷章取義。劉履作《選詩補註》乃云：「凡靖節退休後所作之詩，類多悼國傷時託諷之詞。然不欲顯斥，故以『擬古』『雜詩』等目名其題」，二十一篇詩就全變成「忠憤」之作了。到了古先生，更以史事枝節傅會，所謂變本加厲。固然這也有所本，《詩毛傳鄭箋》可以說便是如此；但毛、鄭所引史實大部分豈不也是不切合的！以上這些詩，連《述酒》在內，歷來並不認爲淵明的好詩。朱熹雖評《詠荊軻》詩「豪放」，但他總論陶詩，只說：「平淡出於自然」，他所重的還是「蕭散沖澹之趣」〔二〕，便是那些田園詩裏所表現的。田園詩才是淵明的獨創；他到底還是「隱逸詩人之宗」，鍾嶸的評語沒有錯。朱熹又說：「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這卻有些對的。《雜詩》第五云：「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

遠矣。」《飲酒》詩第十六及《榮木》詩也以「無成」「無聞」爲恨。但這似乎只是少壯時偶有的空想，他究竟是「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人。

鍾嶸說陶詩「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應璩詩存者太少，無可參證。游國恩先生曾經想在陶詩字句裏找出左思的影響〔三〕。他所找出的共有七聯，其中左思《招隱》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確可定爲淵明《和劉柴桑》詩「山澤久見招」「荒途無歸人」二語所本，「聊欲投吾簪」確可定爲淵明《和郭主簿》詩第一「聊用忘華簪」所本。本書所舉卻還有左思《詠史》詩「寂寂揚子宅」（爲淵明《飲酒》詩「寂寂無行迹」所本），「寥寥空宇中」（爲淵明《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蕭索空宇中」所本），「遺烈光篇籍」（爲同上「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所本），及《雜詩》「高志局四海」（爲淵明《雜詩》「猛志逸四海」所本）四句。不過從本書裏看，左思的影響並不頂大；陶詩意境及字句脫胎於《古詩十九首》的共十五處，字句脫胎於嵇康詩賦的八處，脫胎於阮籍《詠懷》詩的共九處。那麼《詩品》的話就未免不賅不備了。但就全詩而論，胎襲前人的地方究竟不多；他用散文化的筆調，卻能不像「道德論」而合乎自然，才是特長。這與他的哲學一致。像「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三〕。都是從前詩裏不曾有過的句法；雖然他是並不講什麼句法的。

本書頗多勝解。如《命子》詩「既見其生，實欲其可」的「可」字，註家多忽略過去，本書卻證明「題

目人以『可』字，乃晉人之常。」〔四〕和《劉柴桑》詩，題下引《隋書・經籍志》註：「梁有『晉』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錄》一卷。」證「劉柴桑」卽「劉遺民」。此事向來只據李公煥註，得此確證，可爲定論。又「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或以爲比酒之醨薄，或以爲賦，都無證據。本書解爲比，引《魏書・徐邈傳》及《世說》，以見「魏、晉人每好爲酒品目，靖節亦復爾爾」〔五〕。《還舊居》詩「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次句向無人能解；本書引《禮記・王制》「五十始衰」，及《檀弓》鄭注，才知「常恐……不及衰」，卽常恐活不到五十歲之意〔六〕。《飲酒》詩第十六「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舊注都以「孟公」爲投轄的陳遵，實與本詩不切；本書據詩中境地定爲劉龔，確當不易〔七〕。又第十八前以揚子雲自比，後復以柳下惠自比。這二人間的關係，向來無人能說；本書卻引《法言》及他書證明「子雲以柳下惠自比，故靖節以柳下惠比之」〔八〕。又如《雜詩》第六起四句云：「昔聞長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諸家註都不知「此事」是何事。本書引陸機《歎逝賦序》「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九〕，乃知指的是親故凋零。

但書中也不免有疏漏的地方。如《停雲》詩「豈無他人」，本書引《詩・唐風・杕杜》〔一〇〕，實不如引《鄭風・褰裳》切合些。《命子》詩「寄迹風雲，冥茲慍喜」，下句本書引《莊子》爲解，不如引《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歸田園居》詩第二「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上句無註，似可引《詩・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及《楚辭・九辯》「霜露慘悽而交下

兮，心尚委(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這兩句詩是所謂賦而比的。《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末云：「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鍾期」明指龐、鄧，意謂只有你們懂得我。不必引古詩爲解。《答龐參軍詩序》：「楊公所歎，豈惟常悲」；李公煥註：「楊公，楊朱也。」本書引《淮南子》楊子哭歧路故事，但未申其「義」。按《文選》有晉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起四句云：「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這裏的「歧路」只是各自東西的歧路，而不是那「可以南可以北」的了。可見這時候「歧路」一詞，已有了新的引申義；淵明所用便是這個新義。「楊公所歎」只是「歧路」的代語，「歎」字的意思是不着重的。《和郭主簿》詩第一末云：「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本書解云：「遙遙望白雲」卽「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也〔三〕。這原是何焯的話，富貴二語見《歸去來辭》。但懷古與白雲或帝鄉究竟怎樣關聯呢？按《莊子·天地篇》：「華封人謂堯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鳥行而無章。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懷古》也許懷的是這種乘白雲至帝鄉的古聖人。又第二末云：「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本書所解甚曲。「檢素」卽簡素，就是書信；「檢素不獲展」就是接不着你的信。《飮酒》詩第十三「規規一何愚」，引《莊子·秋水》「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不切，不如引下文「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止酒》詩每句藏一「止」字，當係俳諧體。以前及當時諸作，雖無可供參考，但宋以後此等詩體大盛，建除、數名、縣名、姓名、藥名、卦名之類，

不一而足，必有所受之。逆推而上，此體當早已存在，但現存的只《止酒》一首，便覺得莫名其妙了。本書引《莊子》「惟止能止衆止」頗切；但此體源流未說及。

古先生有《陶靖節詩箋》，於民國十五年印行，已經很詳盡。丁福保先生《陶淵明詩註》引用極多。《定本》又加了好些材料，刪改處也有；雖然所刪的有時並不應刪，就如《停雲》詩「搔首延佇」一句，原引《詩經·靜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阮籍《詠懷》「感時興思，企首延佇」，《定本》卻將阮籍詩一條刪去了。我們知道陶淵明常用阮詩，他那句話兼用《靜女》及《詠懷》或從《靜女》及《詠懷》脫胎，是很可能的；古先生這條註實在很切合。《定本》所改卻有好的，如《飲酒》詩第十八的註便是（詳上文）。《詩箋》中四言詩註未用十分力，《定本》這一卷裏卻幾乎加了篇幅一半。

〔一〕以上引語均見湯序註。
〔二〕《臘日詩》及《雜詩》第十二都極難解。
〔三〕《古詩源》九。
〔四〕拙著《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中有辯，見《清華學報》九卷二期。
〔五〕參看眞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見《文集》三十六。
〔六〕《飲酒》詩第十六及《癸卯始春懷古田舍》詩第二。

〔七〕《示周掾祖謝》及《飲酒》詩第三。
〔八〕據日本森本角藏《四書索引》。
〔九〕十九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10〕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册六〇二至六〇四面。
〔11〕參看《朱子語類》卷百四十。
〔12〕述學社《國學月報彙刊》第一集一三九、一四〇面。
〔13〕《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
〔14〕卷一,十四葉。
〔15〕卷二,十二葉。
〔16〕卷三,五葉六葉。
〔17〕卷三,十二葉。
〔18〕卷三,十三葉。
〔19〕卷四,六葉。
〔20〕原作「小雅」誤。
〔21〕卷二,十三葉。

什麽是宋詩的精華

——評石遺老人(陳衍)《評點宋詩精華錄》(商務印書館出版)

本書倣嚴羽、高棅的辦法，分宋詩爲初、盛、中、晚四期，每期的詩爲一卷。第一卷選詩三十九家，一百十七首，其中近體九十六首。第二卷選詩十八家，二百三十九首，其中近體一百六十四首。第三卷選詩三十二家，二百十二首，其中近體一百八十六首。第四卷選詩四十家，一百二十二首，其中近體一百零二首。全書共選詩一百二十九家，六百九十首，其中近體五百四十八首，占百分之七十九強，可見本書重心所在。自序云：

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祈嚮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竹金革。焉得命爲「律和聲」「八音克諧」哉！故本鄙見以錄宋詩，竊謂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開宗明義，便以近體爲主。所謂「宋詩精華在此而不在彼」，可以就音律而言，也可以就宋詩全體而言。照前說，老人的意見似乎和傅玉露相近；傅氏爲張景星等《宋詩百一鈔》(《宋詩別裁》)作序，有云：「宮商協暢，何貴乎腐木溼鼓！」不過傅氏就宋詩論宋詩，老人卻要矯近賢之弊，用意各不相同罷了。照後一說，便有可商榷處。從前翁方綱選宋人七律，以爲宋人七律登峯造極。本書所錄七絕最

多，七律次之；多選七律，也許與翁氏見解相同。多選七絕，卻是老人的創舉。他說過：

今人習於沈歸愚先生各別裁集之說，以爲七言絕句必如王龍標、李供奉一路，方爲正宗；以老杜絕句在盛唐爲獨創一格，變體也。……沈歸愚墨守明人議論故耳。（《石遺室詩話》，商務本，卷三，八葉）

老人此說，也有所本。「今人」是宋湘，老人已自言之（卽在引文中，文繁從略）。再遠還有葉燮，他在《原詩》中說：

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概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十六七，學商隱者十三四。

又說：

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看了這些話，老人的多選七絕也就不足怪了。

可是若說宋詩精華專在近體，古體又怎樣呢？王士禛《古詩選》錄五古以選體爲主，唐代只收陳、李、韋、柳而不收杜，似乎還是明人見解。七古卻以爲自杜以後，盡態極妍，蔚爲大國，所收直到元代的虞集、吳淵穎爲止。可是所選的詩似乎偏重妥帖敷愉一種，排奡者頗少。這是《宋詩鈔序》所謂「近唐調」者。選宋人七古而求其「近唐調」，那麽，選也可，不選也可。但是宋人古體的長處似乎

別有所在，所謂「妥帖」「排奡」，大概得之。五七古多如此，而七古尤然。這自然從杜、韓出，但五言迴旋之地太少，不及七言能盡其所長，所以七古比五古爲勝。我們可以說這些詩都在散文化，或說「以文爲詩」。不過詩的意義，似乎不該一成不變，當跟着作品的變化而漸漸擴展。「溫柔敦厚」固是詩，「沈着痛快」也是詩。《宋詩鈔》似乎只選後一種，致爲翁方綱所詆。他在《石洲詩話》中說《宋詩鈔》所選古詩實足見宋詩眞面目，雖然不免有粗獷的。石遺老人論古詩，重在結想「高妙」（《詩話》十二葉）。本書所選，側重在立意新妙，合於所論。但工於形容，工於用事，工於組織，都是宋人古體詩長處，似乎也難抹煞不論。宋人近體自「江西派」以來，有意講求句律，也許較古體精進些；可是古體也能發揮光大，自闢門戶，若以精華專歸近體，似乎不是公平的議論。我想老人論古詩語，原依白石《詩說》立言，並非盱衡全局。至於選錄宋詩，原是偏主近體之音律諧暢者，以矯時賢之弊；古體篇幅太繁，若面面顧到，怕將成爲龐然巨帙，所以只從結想「高妙」者着手。序中「精華」云云，想是只就近體說，一時興到，未及深思，便成歧義了。

本書分期，頗爲妥帖自然。向來論宋詩的，已經約略有此界畫，老人不過水到渠成，代爲拈出罷了。至於選錄標準，可於評點及圈點中見出。本書評點扼要，於標示宗旨和指導初學，都甚方便。大抵首重吐屬大方。此事關係修養，不盡在詩功深淺上。如評錢惟演《對竹思鶴》云：「有身分，是第一流人語。」（一、一）陳與義《次韻樂文卿北園》云：「五六濡染大筆，百讀不厭。」（三、一）蘇軾《和子由踏

青》云：「不甚高妙景物，名大家能寫得恰如分際，小名家則非雅事不肯落筆矣。」(二、二〇)這都說的是胸襟廣闊，能見其大。又評黃魯直《宿舊彭澤懷陶令》云：「古人命名，未嘗非用意有在。但專就名字上着筆，終近小巧。」(二、二三)《題竹石牧牛》云：「用太白《獨漉篇》調甚妙，但須少加以理耳。」(二、二六)按此處語太簡略，其詳見《詩話》十七(一葉)，以爲如詩語「何其厚於竹而薄於石」，未免巧而傷理了。又評陳師道《妾薄命》云：「二詩比擬，終嫌不倫。」(二、二九)《放歌行》第一首云：「終嫌炫玉。」(二、三〇)所謂「不倫」，當是說得太親暱，失了身分之意。又評樂雷發《送丁少卿自桂帥移鎭西蜀》云：「如用『瑞露』等字，終嫌小方。」又評文同《此君庵》云：「諺所謂『巧言不如直道』」，這是墨守明人議論的所不敢說的。老人不甚喜歡禪語。評饒節云：「詩多禪語，非淺嘗者比，然茲所不錄。」(三、八)又評蘇軾《百步洪》云：「坡公喜以禪語作達，數見無味。此詩就眼前篙眼指點出，眞非鈍根人所及矣。」(二、一四)老人能够領略非淺嘗的禪語而不喜東坡以禪語作達，大約也是覺得他太以此自炫了。至於不選饒節禪語之作，或因禪太多而詩太少之故。不過禪學影響於詩甚大，有人說黃山谷的新境界全是禪學本領。這層似尙値得詳論。大方不但指思想，也指才力。書中評嚴羽云：「滄浪有《詩話》，論詩甚高，以禪爲喩。而所造不過如此。專宗王、孟者，囿於思想，短於才力也。」(四、六)老人論詩，所以不主一格。他說過：「知同體之善，忘異量之美，皆未嘗出此。」(《詩話》十二、一葉)評秦觀《春日》五首之一云：「遺山譏『有情』二語爲『女郞詩』。詩者，勞人、思婦公共之言，豈能有《雅》、

《頌》而無《國風》，絕不許女郎作詩耶？」(二、三三)

大方而外，眞摯與興趣也是本書選錄的標準。評蘇舜卿《哭曼卿》云：「歸來句是實在沈痛語。」(一、一一)評梅堯臣《悼亡》之三云：「情之所鍾，不免質言，雖過當，無傷也。」(一、一三)《殤小女稱稱》之二云：「末十字苦情寫得出。」(一、一六)評黃魯直《次韻吳宣義三徑懷友》云：「末四句沈痛。」(二、二四)《次韻文潛》云：「沈痛語一二敵人千百。」(二、二八)評陳師道《妾薄命》之一云：「沈痛語，可以上接顧長康之於桓宣武。」(二、二九)評陸游《沈氏小園》等作云：「古今斷腸之作，無如此前後三首者。」(三、二八)這都是眞摯之作。語不眞摯而入選者也有，那必是別有可取處。評王安石《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云：「雖非由衷之言，而說來故自動聽。」(二、四)黃魯直《次韻子瞻武昌西山》云：「併子瞻於次山，付諸一慨，此時境地同也。」(二、二五)評尤袤《送吳待制守襄陽》云：「酬應之作，然三四六語有分寸。」(三、一三)都可見。評黃魯直《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云：「此興到語耳。」(二、二五)《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一云：「興會之作。」(二、二六)老人並不特別看重佇興之作，《詩話》三有評說(四葉)，所以此二詩評語也只輕描淡寫出之。但於蔡襄、歐陽修、蘇軾、陸游夢中四詩(一、六；一、九；二、一一；三、二七)，卻極端推重，以爲「如有神助」，甚至說「四詩之高妙，爲四君生平所未曾有」(三、二七)。歐作確奇，而一句一意，沒有多少組織的工夫。陸作貼切便利，「自然」可喜。蘇作可稱「興會」。蔡作句奇意不奇。老人推許似乎太過了些。這和他論王安石詩，以「柳葉

鳴蜩唔綠」二首壓卷(二、六),同是難解。又評穆修《貴侯園》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一、八)孔武仲《瓜步阻風》云:「第二句甚趣。」(二、三七)楊萬里《題鍾家村石崖》云:「末七字使人失笑。」(三、二一)詩雜詼諧,杜甫晚年作品實開風氣(胡適之先生《白話文學史》說)。宋人頗會學他。老人也賞識這一種的。

自來論詩文,都重模擬。死的模擬,所謂畫死人坐像,不足重;重在能變化,能以故爲新,所謂脫胎換骨的便是。本書評語往往指出詩句藍本;其按而不斷者都是能變化的。這種評語不但有助於詩的多義,兼能指點初學的人。有時也指出死模擬的句子,告訴人不可學。評陳師道《贈歐陽叔弼》云:「末二句學杜而得其皮者,切不可學。」(三、三〇——三一)但評陳與義《再登岳陽樓感賦》云:「五六學杜而得其骨者。」(三、二)得皮是死,得骨便活了。避熟就生也是活法,也是變。評蘇舜卿《中秋夜吳江亭上對月懷前宰張子野及寄君謨蔡大》云:「望月懷人語數見不鮮矣,此作頗能避熟就生。」(一、一一)變化其實也是創新;純粹的創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評王安石《壬辰寒食》云:「起十字無窮生清新。」(二、四)蘇軾《題西林壁》云:「此詩有新思想,似未經人道過。」(二、一三)楊萬里《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頭潘家灣阻風不止》云:「寫逆風全就江水西流着想,驚人語乃未經人道矣。」(三、一九——二〇)誠齋詩中,新境較多,但時流於巧,巧就不大方了。老人評徐照《柳葉詞》云:「新巧而已」,也不滿意於那巧味。書中於用字、造句、押韻,也偶然評及。用字如陳師道《和李使

君九日登戲馬臺》云：「三四加『堪』字、『更』字，便不陳舊。」(二、三二)這也是變。又如文同《北齋雨後》云：「『占』字、『尋』字下得切。」(二、三六)造句如黃魯直《宿舊彭澤懷陶令》云：「鑄詞有極工處。」(二、二三)唐庚、張求詩云：「工於造句。」(三、一〇)押韻如樓鑰《求仲抑招游山歸途遇雨》云：「押『及』韻如拋磚落地，從《左氏傳》『師何及』句來。」(三、五)都頗精當。只有辯黃魯直《醇遂得蛤蜊復索舜泉》詩中「前」字韻諸語(二、二二——三)，未免牽強附會。其實那「前」字與「邊」字同意，並無趁韻之嫌；「世人藉口」，未知何指，似不足辯。書中尤重章句組織。評古詩常有「辭費」之語。如梅堯臣名作《范饒州坐中客語食河豚魚》云：「此詩絕佳者，實只首四句，餘皆詞費。然所謂探驪得珠，其餘鱗爪之物，聽之而已。」(一、一二)組織工者曰「健」，就是「經濟的」之意。句健易，全詩健難。老人評蘇軾《王維吳道子畫》云：「大凡名大家詩，每篇必有一、二驚人名句，全篇方鎮壓得住；其鱗爪之處，亦不處處用全力也。」(二、八)這是爲名大家辯護，實在是組織不容易。近體也如此，所以古今詩話，摘句者多，錄全篇者少。《石遺室詩話》中論此最精云：

> 作近體詩，患在意不足。如七律詩八句，奈無八句之見，則空滑搪塞，無所不至矣。但果是作手，倘張羅得來，八句中有兩三句，三四句可味，餘亦可觀耳。意有餘，而後如截奔馬，如臨水送將歸，非施手段善含蓄不可。意僅足，則剡谿歸櫂，故作從容，故有餘地，工於作態而已。(《詩話》十、一葉)

書中評近體諸作，不大說及組織，實因全美的少，一一指疵，未免太煩。只有組織特別者才有說明。

評鄭文寶《闕題》云：「案此詩首句一頓，下三句連作一氣說，體格獨創。唐人中唯太白『越王句踐破吳歸』一首，前三句一氣連說，末句一掃而空之。此詩異曲同工。善於變化。」（一、二）陳師道《春懷示鄰里》云：「此詩另是一種結構，似兩絕句接成一律。」（二、三二）楊萬里《題沈子壽旁觀錄》云「倒戟而入作法。」（三、一九）這三首詩若不細加吟味，是會囫圇看過的。

書中選錄的詩甚有別裁，而且宋人詩話中稱道的，和有關詩家掌故的作品，大抵也都在選中。讀此書如在大街上走，常常看見熟人。評論詩家，如王安石（二、六）、蘇軾（二、一六）、黃魯直（二、二四）、朱熹（三、一二）、陸游（三、二九）、劉克莊（四、一一）等人，語雖簡短而能扼要，絕非興到振筆者可比。至於說詩，更是老人的長處。如說王安石《元豐行》（二、一）、《明妃曲》（二、二），抉出用意，鞭辟入裏，古今人所未道及。又如黃魯直《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之一（二、二三），時序先後，頗不易明，老人一語點破，便覺豁然。評語中也間有附會處，上文論押韻，已舉一條。他如評王安石《歌元豐》云：「微有楊子幼『豆落爲萁』意。」（二、四）細味原詩，卻絕無此意。與《元豐行》、《後元豐行》不同，只「南山」二字，涉想過遠，才有此評；但他自己也不深信，所以只說「微有」。不過書中如此附會處極少。評語中間論改詩。歐陽修《豐樂亭小飲》云：「第五句以太守而說游女醜，似未得體，當有以易之。」（一、九）原詩云：「看花游女不知醜，古妝野態爭花紅」，這是詼諧語，與蘇軾《於潛女》貌異心同；重在游女之樸眞，不在品題美醜。再說詩並非作給游女看，也不是作給州民看，乃是給朋友們

看的，旣非宣教，何苦以體統相繩呢？又《招許主客》詩五六句云：「更掃廣庭寬百畝，少容明月放淸光」；評云：「『少容』若作『多容』，更佳。」明月淸光何限？卽「橫掃廣庭寬百畝」，豈能盡容其放開來？說「少容」，是比較的多之意，意曲而趣；改「多容」就未免太「直道」了。

讀書筆記

一 《元曲三百首》與《盪氣迴腸曲》

前一書任中敏先生主編，民智書局出版，後一書任夫人王悠然女士編，大江書舖出版。都是散曲選本。《三百首》中寫離別的曲子最爲筆酣墨飽。言志的却都說想歸隱山林，各篇一律，不免落了熟套。但和一般詩人筆底下寫的歸田的念頭又微有不同，詩人的「歸田」，大概是說說罷了，心裏總還想着作官的。所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闕」，正可描寫這種人，這種詩。這也可以說是儒家思想作底子，道家思想作幌子。散曲家身分本不甚高，無甚遠志；他們只圖個自己快活，說想歸隱，倒是眞的。

散曲這東西似乎只够寫寫兒女之情，用來言志，總覺得有種俳諧氣而不切摯。宋詞除蘇、辛一派外，似乎也是如此。這大概因爲還未脫去民間文學骨子的緣故。詞到了淸代中葉以後，一般作者才有意識的加以推尊，爭闢新境，使它可以作正正經經言志的工具；但是詞這個體裁似乎根本上幷不宜於言志，所以許多作者的努力，成功並不怎樣大。散曲方面，却連作這種偷樑換柱工夫的人也沒有；近代作散曲的人也比作詞的少得多。

《盪氣迴腸曲》專取私情之作，以尖新爲主；與《三百首》取氣勢灝瀚的迥乎不同。這倒是當行出色，但在禮敎高壓的時代，讀了痛快淋漓的；現在時移世易，却也覺得有點遼遠了。

二　《楊荷集》

這是邵瑞彭先生的詞集，刻本。集中令詞，境界蒼老，像詩中的宋詩。其中《生查子》數首，格調頗新。如：

娟娟陌上花，皎皎機中素，嫋嫋翠樓人，夜夜啼秋雨。遙遙青海頭，去去黃塵暮；惻惻坎侯吟，悵悵公無渡。

又如：

名士悅傾城，歡愛誠無匹。譬彼蔦蘿枝，終古依松柏。涼風一以吹，河、漢遙相隔。橋首望青陵，淚墮山頭石。

這些簡直以詩爲詞，寓剛健於婀娜，前所少有。其餘《玉樓春》、《菩薩蠻》、《蝶戀花》諸調，也獨有深趣，不同空架子。《文心雕龍》論詩，有「清剛」「儁上」的話，可以移作本集令詞評語。又有《南歌子》一首云：

電掣靈蛇走，雲開怪蜃沈；燭天星漢壓潮音，十萬燈船搖蕩火珠林。鷁羽迎風轉，頹輪掠海深，叩舷忼愾

發高吟，疑有鮫宮泉客夜彈琴。
詠的是輪船，想像頗奇，似李賀詩的境界。
慢詞多生僻的調子，却能圓轉自然；可是情不深，只以辭勝。豪放和婉約兩體，倒是都有；不過典故太多，雖然華麗，眞意反讓辭藻埋沒了。寫景物常敎人覺得「隔」着一層。往往讀完一篇，不知他的用意所在。雖然章句的安排組織，煞費苦心，却不免覺得是空架子。大概作者慢詞功力很深，技巧很熟，而未能去陳言；因此也許就深入而不能顯出了。集中諸作較見眞性情的，只《洞僊歌》一首，哀他六歲的殤兒的。

愁鴉聲裏，滿重城寒雨；滾滾渾河背人去。把靑箱世業，玄草年光，空換了一片斜陽荒土。□重泉猶此世，啼笑都難，珍重牽衣舊時語。淚眼看中原，如此江山，也値得長眠如汝。算今生負我一甆來，免較短論長，蟪蛄朝暮。

（一九三六年二月）

經典常談

目錄

序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羣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經典訓練成爲教育的唯一的項目，自然偏枯失調；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後，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小學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爲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裏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裏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範圍，不以經爲限，又按着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註「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於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註後來成了小學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註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註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但到了現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家」對於經典的校勘和訓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應該儘可能的採取他們的結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的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註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這需要見解、學力和經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生國學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着呢。理想的經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有些人便想着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術史略》,用意便在這裏。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啓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只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作一隻船,航到經典的海裏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典訓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兒。可是如果讀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爲魚,未免孤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這部書不是「國學概論」一類。照編撰者現在的意見,「概論」這名字容易教讀者感到自己滿

足；「概論」裏好像什麽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實什麽都只有一點兒！「國學」這名字，和西洋人所謂「漢學」一般，都未免籠統的毛病。國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分別標明歷史和語言，不再渾稱「國學」，確是正辦。這部書以經典爲主，以書爲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等作綱領。但《詩》、《文》兩篇，卻還只能敍述源流；因爲書太多了，沒法子一一詳論，而集部書的問題，也不像經、史、子的那樣重要，在這兒也無需詳論。書中各篇的排列，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順序；並照傳統的意見，將「小學」書放在最前頭。各篇的討論，儘量採擇近人新說；這中間並無編撰者自己的創見，編撰者的工作只是編撰罷了。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後面；局部的，隨處分別註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註出的，那是爲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讀物和考據的著作不同，是無需乎那樣嚴格的。末了兒，編撰者得謝謝楊振聲先生，他鼓勵編撰者寫下這些篇常談。還得謝謝雷海宗先生允許引用他還沒有正式印行的《中國通史選讀》講義，陳夢家先生允許引用他的《中國文字學》稿本。還得謝謝董庶先生，他給我鈔了全份淸稿，讓排印時不致有太多的錯字。

朱自淸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聯合大學。

《說文解字》第一

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說有四隻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蹏兒、鳥爪兒印着的痕跡，靈感湧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眞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洩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會變機靈了，會爭着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着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裏嚎哭〔一〕；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國末期才有，那時人並不都相信，如《易·繫辭》裏就只說文字是「後世聖人」造出來的。這「後世聖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的在演變着；說是一人獨創，是不可能的。《繫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相承，民間書卻極爲龐雜。到了戰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擡出一個造字的聖人，實

在是統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聖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並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麼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於「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可能因爲這點聯繫，商契便傳爲造字的聖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着文字起於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於倉頡是黄帝的史官，始見於《說文序》。「倉頡造字說」大概凝定於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那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後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他也統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祕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佚去，但許愼《說文解字》裏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爲「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

不是人名。

始皇爲了統一文字，敎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歷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裏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爲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敎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爲一書，單稱爲《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在殘存着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着。《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後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後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敎授學童用，一面供民衆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愼，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典和別的字書裏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裏，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典的註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並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

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後人可以溯源沿流；現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現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於經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在學問的範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說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裏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愼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裏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金」是銅器，銅器的銘文稱爲金文。銅器裏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爲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現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現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的腹甲，骨是牛胛骨。商人鑽灼甲骨，以卜吉凶，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紀錄。這稱爲甲骨文，又稱爲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後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裏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在統統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

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書」用筆，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三〕。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於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爲「六書」。「六書」這個總名初見於《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裏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二」(上)「二」(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着一個物類。「二」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二」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這「上」和「下」兩種關係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爲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爲聲；但水小爲「淺」，金小爲「錢」，貝小爲「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作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後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裏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於」、「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號」，借爲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爲縣長的「長」。「縣令」、「縣長」是「令」、「長」的引伸義。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後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伸義的多，一字數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象形字本於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於語言，語言發於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只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文字」與「字」都是通稱；分析的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三〕。「文」本於「名」，如先有「日」名，才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

窮，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爲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爲數字，後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如「⊠」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ㄐ一」。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後來才加「月」爲「期」，加「㫃」爲「旗」，加「鹿」爲「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的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漸多」的意思〔四〕。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二」（上）、「二」（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裏。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麼，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展的邏輯的程序，但甲骨文裏三種字都已經有了。這裏所說的程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後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爲「隸書」，因爲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爲扁方的，「斂筆」變爲「挑

筆」。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爲「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爲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現的漢、晉間的木簡裏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着挑筆，稱爲「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爲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爲單位。這稱爲「今草」。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爲「正書」。這起於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爲「隸書」，而稱漢隸爲「八分書」。晉代也稱爲「楷書」。宋代又改稱爲「眞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爲了好看。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於晉代。大概正書不免於拘，草書不免於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爲適用。但現在還通用着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

〔一〕《淮南子·本經訓》及高誘注。

〔二〕古代簡牘用泥封口，在泥上蓋印。

〔三〕《說文·文部》。

〔四〕《說文序》。

【參考資料】《說文解字敍》。容庚《中國文字學》。陳夢家《中國文字學》稿本。

《周易》第二

在人家門頭上，在小孩的帽飾上，我們常見到八卦那種東西。八卦是聖物，放在門頭上，放在帽飾裏，是可以辟邪的。辟邪還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來，預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課的，都用得着它。他們普通只用五行生尅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詳細推算，就得用陰陽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陰陽五行和我們非常熟習，這些道理直到現在還是我們大部分人的信仰，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覺之中教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謀事未成，財運欠通，婚姻待決，子息不旺，乃至種種疾病疑難，許多人都會去求籤問卜，算命看相，可見影響之大。講五行的經典，現在有《尚書·洪範》，講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傳是伏羲氏畫的。另一個傳說卻說不是他自出心裁畫的。那時候有匹龍馬從黃河裏出來，背着一幅圖，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來罷了。但這因爲伏羲是聖人，那時代是聖世，天才派了龍馬賜給他這件聖物。所謂「河圖」，便是這個。那講五行的《洪範》，據說也是大禹治水時在洛水中從一隻神龜背上得着的，也出於天賜。所謂「洛書」，便是那個。但這些神怪的故事，顯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傳家造出來擡高這兩種學說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壓根兒就沒有這個人，他只是

秦、漢間儒家假託的聖王。至於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後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龜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們先在甲骨上鑽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經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細看兆象，斷定吉凶；然後便將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問句等用刀筆刻在甲骨上，這便是卜辭。卜辭裏並沒有陰陽的觀念，也沒有八卦的痕跡。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龜甲是很少的。商代農業剛起頭，游獵和畜牧還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時牛骨頭不缺少。到了周代，漸漸脫離游牧時代，進到農業社會了，牛骨頭便沒有那麼容易得了。這時候卻有了筮法，作為卜法的輔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難得的。蓍草是一種長壽草，古人覺得這草和老年人一樣，閱歷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來占吉凶。筮的時候用它的桿子，方法已不能詳知，大概是數的。取一把蓍草，數一下看是什麼數目，看是奇數還是偶數，也許這便可以斷定吉凶。古代人看見數目整齊而又有變化，認為是神祕的東西。數目的連續、循環以及奇偶，都引起人們的驚奇。那時候相信數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術裏用得着它。——我們一般人直到現在，還嫌惡奇數，喜歡偶數，該是那些巫術的遺跡。那時候又相信數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學裏用得着它。我們現在還說，凡事都有定數，這就是前定的意思；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數，世界也有數，數是算好了的一筆帳；用現在的話說，便是機械的。數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1〕，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說是一種巫術，是靠了數目來判斷吉凶的。

八卦的基礎便是一、二、三的數目。整畫「一」是一；斷畫「--」是二；三畫疊而成卦是三。這樣配出八個卦，便是☰☱☲☳☴☵☶☷；乾、兌、離、震、艮、坎、巽、坤，是這些卦的名字。那整畫、斷畫的排列，也許是在排列着蓍草時觸悟出來的。八卦到底太簡單了，後來便將這些卦重起來，兩卦重作一個，按照算學裏錯列與組合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裏的卦數。蓍草的應用，也許起於民間；但八卦的創製，六十四卦的推演，巫與卜官大約是重要的腳色。古代巫與卜官同時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記載，一切的檔案，都掌管在他們手裏。他們是當時知識的權威，參加創卦或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簡便得多，但起初人們並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時候，還有「筮短龜長」的話〔二〕。那些時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還得用卜的。

筮法襲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裏的兆象，據說有一百二十體，每一體都有十條斷定吉凶的「頌」辭〔三〕。這些是現成的辭。但兆象是自然的灼出來的，有時不能湊合到那一百二十體裏去，便得另造新辭。筮法裏的六十四卦，就相當於一百二十體的兆象。那斷定吉凶的辭，原叫作繇辭，「繇」是抽出來的意思。《周易》裏一卦有六畫，每畫叫作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數的。繇辭有屬於卦的總體的，有屬於各爻的；所以後來分稱爲卦辭和爻辭。這種卦、爻辭也是卜筮官的占筮紀錄，但和甲骨卜辭的性質不一樣。

從卦、爻辭裏的歷史故事和風俗制度看，我們知道這些是西周初葉的紀錄，紀錄裏好些是不聯

貫的，大概是幾次筮辭並列在一起的緣故。那時卜筮官將這些卦、爻辭按着卦、爻的順序編輯起來，便成了《周易》這部書。「易」是「簡易」的意思，是說筮法比卜法簡易的意思。本來呢，卦數既然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辭又是一定的，檢查起來，引申推論起來，自然就「簡易」了。不過這只在當時的卜筮官如此。他們熟習當時的背景，卦、爻辭雖「簡」，他們卻覺得「易」。到了後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傳，有些卦、爻辭簡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只是當時一部切用的筮書。

《周易》現在已經變成了儒家經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還沒注意這部書。孔子是不講怪、力、亂、神的。《論語》裏雖有「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話，但另一個本子作「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四〕；所以這句話是很可疑的。孔子只教學生讀《詩》、《書》和《春秋》，確沒有教讀《周易》。《孟子》稱引《詩》、《書》，也沒說到《周易》。《周易》變成儒家的經典，是在戰國末期。那時候陰陽家的學說盛行，儒家大約受了他們的影響，才研究起這部書來。那時候道家的學說也盛行，也從另一面影響了儒家。儒家就在這兩家學說的影響之下，給《周易》的卦、爻辭作了種種新解釋。這些新解釋並非在忠實的、確切的解釋卦、爻辭，其實倒是藉着卦、爻辭發揮他們的哲學。這種新解釋存下來的，便是所謂《易傳》。

《易傳》中間較有系統的是彖辭和象辭。彖辭斷定一卦的涵義——「彖」就是「斷」的意思。象辭推演卦和爻的象，這個「象」字相當於現在所謂「觀念」。這個字後來成爲解釋《周易》的專門名詞。

但象辭斷定的涵義，象辭推演的觀念，其實不是眞正從卦、爻裏探究出來的；那些只是作傳的人傳會在卦、爻上面的。這裏面包含着多量的儒家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象辭的話更有許多和《論語》相近的。但說到「天」的時候，不當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當作自然的道，卻是道家的色彩了。這兩種傳似乎是編纂起來的，並非一人所作。此外有《文言》和《繫辭》。《文言》解釋乾坤兩卦；《繫辭》發揮宇宙觀、人生觀，偶然也有分別解釋卦、爻的話。這些似乎都是抱殘守闕，彙集衆說而成。到了漢代，又新發現了《說卦》、《序卦》、《雜卦》三種傳。《說卦》推演卦象，說明某卦的觀念象徵着自然界和人世間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徵着天，又象徵着父之類。《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後的道理。《雜卦》比較各卦意義的同異之處。這三種傳據說是河內一個女子在什麼地方找着的，後來稱爲《逸易》；其實也許就是漢代人作的。

八卦原只是數目的巫術，這時候卻變成數目的哲學了。那整畫「一」是奇數，代表天，那斷畫「--」是偶數，代表地。奇數是陽數，偶數是陰數，陰陽的觀念是從男女來的。有天地，不能沒有萬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息一樣，所以三畫才能成一卦。卦是表示陰陽變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變化的意思。爲什麼要八個卦呢？這原是算學裏錯列與組合的必然，但這時候卻想着是萬象的分類。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長子等；巽是風，是長女等；坎是水，是心病等；離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監等；兌是澤，是少女等。這樣，八卦便象徵着也支配着整個

的大自然，整個的人間世了。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卦是複合的，卦象也是複合的，作用便更複雜、更具體了。據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一班聖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種種道理，這才製造了器物，建立了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等東西，「日中爲市」等等制度，都是他們從六十四卦推演出來的。

這個觀象制器的故事，見於《繫辭》。《繫辭》是最重要的一部《易傳》。這傳裏借着八卦和卦、爻辭發揮着的融合儒、道的哲學，和觀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的增加了《周易》的價值，擡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擡高了，關於它的傳說也就多了。《繫辭》裏只說伏羲作八卦；後來的傳說卻將重卦的，作卦、爻辭的，作《易傳》的人，都補出來了。但這些傳說都比較晚，所以有些參差，不盡能像「伏羲畫卦說」那樣成爲定論。重卦的人，有說是伏羲的，有說是神農的，有說是文王的。卦、爻辭有說全是文王作的，有說爻辭是周公作的；有說全是孔子作的。《易傳》卻都說是孔子作的。這些都是聖人。《周易》的經傳都出於聖人之手，所以和儒家所謂道統，關係特別深切；這成了他們一部傳道的書。所以到了漢代，便已跳到六經之首了[五]。但另一面陰陽八卦與五行結合起來，三位一體的演變出後來醫卜、星相種種迷信，種種花樣，支配着一般民衆，勢力也非常雄厚。這裏面儒家的影響卻很少了，大部分還是《周易》原來的卜筮傳統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學化了的；民衆的《周易》倒是巫術的本來面目。

〔一〕二語見《易・繫辭》。太極是混沌的元氣，兩儀是天地，四象是日月星辰。

〔二〕《左傳》僖公四年。

〔三〕《周禮・春官・太卜》。

〔四〕《古論語》作「易」，《魯論語》作「亦」。

〔五〕《莊子・天運篇》和《天下篇》所說六經的次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到了《漢書・藝文志》，便成了《易》、《書》、《詩》、《禮》、《樂》、《春秋》了。

【參考資料】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冊上）。 李鏡池《易傳探原》（同上）。 余永梁《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同上）。

《尙書》第三

《尙書》是中國最古的記言的歷史。所謂記言，其實也是記事，不過是一種特別的方式罷了。記事比較的是間接的，記言比較的是直接的。記言大部分照說的話寫下來，雖然也須略加剪裁，但是儘可以不必多費心思。記事需要化自稱爲他稱，剪裁也難，費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國的記言文是在記事文之先發展的。商代甲骨卜辭大部分是些問句，記事的話不多見。兩周金文也還多以記言爲主。直到戰國時代，記事文才有了長足的進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說出的、寫下的都可以叫作「辭」。卜辭我們稱爲「辭」，《尙書》的大部分其實也是「辭」。我們相信這些辭都是當時的「雅言」〔一〕，就是當時的官話或普通話。但傳到後世，這種官話或普通話卻變成詰屈聱牙的古語了。

《尙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衆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數，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製作，應該分別的看。那些號令多稱爲「誓」或「誥」，後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爲「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偶然有稱爲「謨」〔二〕的。這些

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親聞，後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並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歷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刪《書》爲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孔子教學生的典籍裏有《書》，倒是眞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麼樣子，已經無從知道。「書」原是紀錄的意思〔三〕；大約那所謂「書」只是指當時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並未結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裏。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將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尙書》。「尙」，「上」也；《尙書》據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四〕。「書」上加一「尙」字，無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於《書》稱爲「經」，始於《荀子》〔五〕；不過也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中，《尙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並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着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着了。那時傳《尙書》的只有一個濟南伏生〔六〕。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牆壁裏。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這一些，私自教授於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

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鼂錯來從他學。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尙書》流傳開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生卻只用當時的隸書鈔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尙書》或《今文尙書》。漢武帝提倡儒學，立五經博士；宣帝時每經又都分家數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員若干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從學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學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學的自然就多起來了。《尙書》也立下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卻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去伏生已久，傳經的儒者爲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尙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嗎〔七〕！這二十九篇，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現在差不多亡失乾淨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爲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牆壁裏得着「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只是晚周民間別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並且將這些書都交還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後人叫孔安國的。安國加以整理，發見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爲《古文尙書》。武帝時，安國將這部書獻上去。因爲語言和字體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裏。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後領校皇家藏書。劉向開始用《古文尙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

若干。哀帝時，劉歆想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尙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典。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爲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爭辯〔八〕。這便是後來所謂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是西漢經學一大史跡。所爭的雖然只在幾種經書，他們卻以爲關係孔子之道即古代聖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裏所爭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兩派的學風確也有不同處。大致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氣，「思以其道易天下」〔九〕，所以主張通經致用。他們解經，只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古文派不重哲學而重歷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詁、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日盛。私學壓倒了官學，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學者也以兼通爲貴，不再專主一家。但是這時候「古文」經典中《逸禮》即《禮》古經已經亡佚，《尙書》之學，也不昌盛。

東漢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非常寶愛，流離兵亂中，老是隨身帶着。他是怕「《古文尙書》學」會絕傳，所以這般珍惜。當時經師賈逵、馬融、鄭玄都給那一卷《古文尙書》作注，從此《古文尙書》才顯於世〔一〇〕。原來「《古文尙書》學」直到賈逵才眞正開始；從前是沒有什麼師說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決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學者竟愛重到那般地步。大約孔安國獻的那部《古文尙書》，一直埋沒在皇家圖書館裏，民間也始終沒有盛行，經過西漢末年的兵亂，便無聲

無臭的亡失了罷。杜林的那一卷，雖經諸大師作注，卻也沒傳到後世；這許又是三國兵亂的緣故。《古文尚書》的運氣眞够壞的，不但沒有能够露頭角，還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頂替的事兒。這在西漢就有。漢成帝時，因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無人通曉，下詔徵求能够通曉的人。東萊有個張霸，不知孔壁的書還在，便根據《書序》，將伏生二十九篇分爲數十，作爲中段，又采《左氏傳》及《書序》所說，補作首尾，共成《古文尚書百二篇》。每篇都很簡短，文意又淺陋。他將這僞書獻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圖書館藏着的孔壁《尚書》對看，滿不是的。成帝便將張霸下在獄裏，卻還存着他的書，並且聽它流傳世間。後來張霸的再傳弟子樊並謀反，朝廷才將那書毀廢；這第一部僞《古文尚書》就從此失傳了。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而有野心的人。他僞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一〕，又僞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着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僞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心思的。他采輯羣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歷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爲聯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將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爲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二〕，以合於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學以來的正統思想，所謂大經、大法，足以取信於人。只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三〕，正在他僞作的《大禹謨》裏，便見

出這部僞書影響之大。其實《尙書》裏的主要思想，該是「鬼治主義」，像《盤庚》等篇所表現的。「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卽敎主，可以唯所欲爲，不受什麼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擡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叫作「鬼治主義」。「西周以後，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開。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說都建築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誠信的感應；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從，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壓迫。」這叫作「德治主義」〔四〕。看古代的檔案，包含着「鬼治主義」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義」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僞書所以專從這裏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詞旨坦明，毫無詰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脚。

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尙書》曾立過博士〔五〕；這《古文尙書》大概就是王肅僞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卽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後來經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僞書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發見了它，便拿來獻到朝廷上去。這時候僞《古文尙書》孔傳便和馬、鄭注的尙書並行起來了。大約北方的學者還是信馬、鄭的多，南方的學者才是信僞孔的多。等到隋統一了天下，南學壓倒了北學，馬、鄭《尙書》，習者漸少。唐太宗時，因章句繁雜，詔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頒行天下，考試必用此本。《正義》成了標準的官書，經學從此大統一。那《尙書正義》便用的僞《古文尙書》孔傳。僞孔定於一尊，

馬、鄭便更沒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殘缺了，宋以來差不多就算亡了。僞《古文尚書》孔傳如此這般冒名頂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時候。

這一千年中間，卻也有懷疑僞《古文尚書》孔傳的人。南宋的吳棫首先發難。他有《書稗傳》十三卷〔六〕，可惜不傳了。朱子因孔安國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順易讀，也覺得可疑〔七〕。但是他們似乎都還沒有去找出確切的證據。至少朱子還不免疑信參半；他還采取僞《大禹謨》裏「人心」、「道心」的話解釋四書，建立道統呢。元代的吳澄才斷然的將伏生今文從僞古文分出；他的《尚書纂言》只注解今文，將僞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書考異》，更力排僞孔，並找出了相當的證據。但是嚴密鉤稽決疑定讞的人，還得等待清代的學者。這裏該提出三個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第二是惠棟，著《古文尚書考》；兩書辨析詳明，證據確鑿，教僞孔體無完膚，眞相畢露。但將作僞的罪名加在梅賾頭上，還不免未達一間。第三是清中葉的丁晏，著《尚書餘論》，才將眞正的罪人王肅指出。千年公案，從此可以定論。這以後等着動手的，便是搜輯漢人的伏生《尚書》說和馬、鄭注。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績也斐然可觀；不過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殘守缺的工作罷了。伏生《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重露出眞面目，清代諸大師的勞績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眞本，其中也還該分別的看。照近人的意見，《周書》大都是當時史官所記，只有一、二篇像是戰國時人託古之作。《商書》究竟是當時史官所記，還是周史官追記，尚在然疑之間。《虞、夏書》

大約多是戰國末年人託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許是後代史官追記的。這麼着，《今文尚書》裏便也有了眞僞之分了。

〔一〕「雅言」見《論語・述而》。

〔二〕《說文》言部：「謨，議謀也。」

〔三〕《說文》書部：「書，著也。」

〔四〕《論衡・正說篇》。

〔五〕《勸學篇》。

〔六〕裴駰《史記集解》引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七〕《論衡・正說篇》。

〔八〕《漢書》本傳。

〔九〕語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

〔一〇〕《後漢書・楊倫傳》。

〔一一〕《家語》託名孔安國，《孔叢子》託名孔鮒。

〔一二〕桓譚《新論》作五十八，《漢書・藝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一三〕見眞德秀《大學衍義》。所謂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僞《大禹謨》裏，是舜對禹的話。

〔一四〕以上引顧頡剛《盤庚中篇今譯》。（《古史辨》第二冊）

〔一五〕《晉書·荀崧傳》。

〔一六〕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

〔一七〕見《朱子語類》七十八。

【參考資料】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序例》及卷三十六《僞孔安國序》。顧頡剛《論今文尚書著作時代書》(《古史辨》第一册)。

《詩經》第四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够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歎的叫別人迴腸盪氣。唱歎再不够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脚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衆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一〕，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裏。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盃，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儘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爲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並行不悖，就是爲此。可也有經過衆人修飾，成爲定本的。歌謠眞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二〕。

歌謠可分爲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着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脚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裏說的土鼓土桴兒、蘆管兒〔三〕，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

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複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爲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脚的調協，似乎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裏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並不是因爲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爲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麼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着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爲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着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擡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

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四〕。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䛐）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着政治或敎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裏，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裏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裏，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五〕，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敎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七〕，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

野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八〕。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九〕；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洩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裏面〔一〇〕。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爲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裏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敎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着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敎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的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裏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眞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爲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爲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注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裏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採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一一〕的見解，以爲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麽時代作的，爲什麽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

志」〔三〕。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着政治敎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的表現在《詩序》裏。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託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裏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爲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的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着《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的附合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的發揮了作爲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裏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敎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風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着敎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

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於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衞詩，那麼只有十一《國風》〔三〕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於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裏。

賦、比、興的意義，說數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裏，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四〕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裏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做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一〕《呂氏春秋・古樂篇》。

〔二〕英美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說》。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

〔三〕「士鼓」、「蕢桴」見《禮運》和《明堂位》，「葦籥」見《明堂位》。

〔四〕今《詩經》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詩，實存三百零五篇。

〔五〕《衞風．淇澳》的句子。

〔六〕《論語．學而》。

〔七〕「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衞風．碩人》的句子；「素以為絢兮」一句今已佚。

〔八〕《論語．八佾》。

〔九〕「思無邪」，《魯頌．駉》的句子；「思」是語詞，無義。

〔10〕《論語．陽貨》。

〔一一〕、〔一二〕見《孟子．萬章》。

〔一三〕衞、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一四〕《周禮．大師》鄭玄注。

【參考資料】．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冊下）。　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同上）。

朱自清《言志說》（《語言與文學》）。　朱自清《賦比興說》（《清華學報》十二卷三期）（編者案：朱先生兩文，今均見《詩言志辨》中）。

三 《禮》第五

許多人家的中堂裏，供奉着「天地君親師」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親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師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奉着這些。荀子只稱這些爲禮的三本〔一〕；大概是到了後世才宗教化了的。荀子是儒家大師。儒家所稱道的禮，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儀式、社會風俗習慣等等，卻都加以合理的說明。從那「三本說」，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禮來包羅萬象的野心，他們認禮爲治亂的根本；這種思想可以叫作禮治主義。

怎樣叫作禮治呢？儒家說初有人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各人都要滿足自己的欲望，沒有界限，沒有分際，大家就爭起來了。你爭我爭，社會就亂起來了。那時的君師們看了這種情形，就漸漸給定出禮來，讓大家按着貴賤的等級，長幼的次序，各人得着自己該得的一分兒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着自己該做的一分兒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際；若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任性兒貪多務得，偷懶圖快活，這種人就得受嚴厲的制裁，有時候保不住性命。這種禮，教人節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會的秩序，可以說是政治制度。

天生萬物，是個很古的信仰。這個天是個能視能聽的上帝，管生殺，管賞罰。在地上的代表，便

是天子。天子祭天，和子孫祭祖先一樣。地生萬物是個事實。人都靠着地裏長的活着，地裏長的不够了，便鬧飢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仰。天子諸侯祭社稷，祭山川，都是這個來由。最普遍的還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們的時代，這個信仰還是很有力的。按儒家說，這些信仰都是「報本返始」〔二〕的意思。報本返始是慶幸生命的延續，追念本源，感恩懷德，勉力去報答的意思。但是這裏面怕不單是懷德，還有畏威的成分。感謝和恐懼產生了種種祭典。儒家卻只從感恩一面加以說明，看作禮的一部分。但這種禮教人恭敬，恭敬便是畏威的遺跡了。儒家的喪禮，最主要的如三年之喪，也建立在感恩的意味上；卻因恩誼的親疏，又定出等等差別來。這種禮，大部分可以說是宗教儀式。

居喪一面是宗教儀式，一面是普通人事。普通人事包括一切日常生活而言。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規矩。居喪以外，如婚姻、宴會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序，不能隨便馬虎過去；這樣是表示鄭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誠心。至於對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婦、朋友之間，也都自有一番道理。按着尊卑的分際，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朋友互相敬愛，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個人飲食言動，也都該有個規矩，別叫旁人難過，更別侵犯着旁人，反正諸事都記得着自己的分兒。這些個規矩也是禮的一部分；有些固然含着宗教意味，但大部分可以說是風俗習慣。這些風俗習慣有一些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

王道不外乎人情，禮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說是通乎人情的〔三〕。既通乎人情，自然該誠而不僞了。但儒家所稱道的禮，並不全是實際施行的。有許多只是他們的理想，這種就不一定通乎人情了。就按那些實際施行的說，每一個制度、儀式或規矩，固然都有它的需要和意義。但是社會情形變了，人的生活跟着變；人的喜、怒、愛、惡，雖然還是喜、怒、愛、惡，可是對象變了。那些禮的惰性卻很大，並不跟着變。這就留下了許許多多遺形物，沒有了需要，沒有了意義；不近人情的僞禮，只會束縛人。《老子》裏攻擊禮，說「有了禮，忠信就差了」〔四〕；後世有些人攻擊禮，說「禮不是爲我們定的」〔五〕；近來大家攻擊禮教，說「禮教是吃人的」。這都是指着那些個僞禮說的。

從來禮樂並稱，但樂實在是禮的一部分；樂附屬於禮，用來補助儀文的不足。樂包括歌和舞，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六〕。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且樂聲的綿延和融和也象徵着天地萬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七〕。這便是樂本。樂教人平心靜氣，互相和愛，敎人聯合起來，成爲一整個兒。人人能够平心靜氣，互相和愛，自然沒有貪欲、搗亂、欺詐等事，天下就治了。樂有改善人心、移風易俗的功用，所以與政治是相通的。按儒家說，禮、樂、刑、政，到頭來只是一個道理；這四件都順理成章了，便是王道。這四件是互爲因果的。禮壞樂崩，政治一定不成；所以審樂可以知政〔八〕。「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九〕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樂工奏那一國的樂，他就知道是那一國的；他是從樂歌裏所表現的政治氣象而知道

的〔一〇〕。歌詞就是詩；詩與禮樂也是分不開的。孔子教學生要「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一一〕；那時要養成一個人才，必需學習這些。這些詩、禮、樂，在那時代都是貴族社會所專有，與平民是無干的。到了戰國，新聲興起，古樂衰廢，聽者只求悅耳，就無所謂這一套樂意。漢以來胡樂大行，那就更說不到了。

古代似乎沒有關於樂的經典；只有《禮記》裏的《樂記》，是抄錄儒家的《公孫尼子》等書而成，原本已經是戰國時代的東西了。關於禮，漢代學者所傳習的有三種經和無數的「記」。那三種經是《儀禮》、《禮古經》、《周禮》。《禮古經》已亡佚，《儀禮》和《周禮》相傳都是周公作的。但據近來的研究，這兩部書實在是戰國時代的產物。《儀禮》大約是當時實施的禮制，但多半只是士的禮。那些禮是很繁瑣的，踵事增華的多，表示誠意的少，已經不全是通乎人情的了。《儀禮》可以說是宗教儀式和風俗習慣的混合物；《周禮》卻是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那些制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戰國時代；但組成了整齊的系統，便是著書人的理想了。

「記」是儒家雜述禮制、禮制變遷的歷史，或禮論之作；所述的禮制有實施的，也有理想的。又叫作《禮記》；這《禮記》是一個廣泛的名稱。這些「記」裏包含着《禮古經》的一部分。漢代所見的「記」很多，但流傳到現在的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記》和四十九篇《小戴記》。後世所稱《禮記》，多半專指《小戴記》說。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聖，戴德的姪兒。相傳他們是這兩部書的編輯人。但二戴

都是西漢的《儀》、《禮》專家。漢代有五經博士；凡是一家一派的經學影響大的，都可以立博士。大戴儀禮學後來立了博士，小戴本人就是博士。漢代經師的家法最嚴，一家的學說裏絕不能摻雜別家。但現存的兩部「記」裏都各摻雜着非二戴的學說。所以有人說這兩部書是別人假託二戴的名字纂輯的；至少是二戴原書多半亡佚，由別人拉雜湊成的，——可是成書也還在漢代。——這兩部書裏，《小戴記》容易些，後世誦習的人比較多些；所以差不多專占了《禮記》的名字。

〔一〕《禮論篇》。

〔二〕《禮記·郊特牲》。

〔三〕《禮記·樂記》。

〔四〕《老子》三十八章。

〔五〕阮籍語，原文見《世說新語·任誕》。

〔六〕《荀子·樂論篇》，《禮記·樂記》。

〔七〕、〔八〕、〔九〕《禮記·樂記》。

〔一〇〕《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一一〕《論語·泰伯》。

【參考資料】洪業《禮記引得序》，《儀禮引得序》。

《春秋》三傳第六（《國語》附）

「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各國有各國的春秋，但是後世都不傳了。傳下的只有一部《魯春秋》，《春秋》成了它的專名，便是《春秋經》了。傳說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編的。魯哀公十四年，魯西有獵戶打着一隻從沒有見過的獨角怪獸，想着定是個不祥的東西，將它扔了。這個新聞傳到了孔子那裏，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說，「這是麟啊。爲誰來的呢！幹什麽來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說着流下淚來，趕忙將袖子去擦，淚點兒卻已滴到衣襟上。原來麟是個仁獸，是個祥瑞的東西；聖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會來，不然是不會來的。可是那時代那有聖帝、明王？天下正亂紛紛的，麟來的眞不是時候，所以讓獵戶打死；它算是倒了運了。

孔子這時已經年老，也常常覺着生的不是時候，不能行道；他爲周朝傷心，也爲自己傷心。看了這隻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無限感慨。他覺着生平說了許多教；當世的人君總不信他，可見空話不能打動人。他發願修一部《春秋》，要讓人從具體的事例裏，得到善惡的教訓，他相信這樣得來的教訓，比抽象的議論深切著明的多。他覺得修成了這部《春秋》，雖然不能行道，也算

不白活一輩子。這便動起手來，九個月書就成功了。書起於魯隱公，終於獲麟；因獲麟有感而作，所以敍到獲麟絕筆，是紀念的意思。但是《左傳》裏所載的《春秋經》，獲麟後還有，而且在記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後還有：據說那卻是他的弟子們續修的了。

這個故事雖然够感傷的，但我們從種種方面知道，它卻不是眞的。《春秋》只是魯國史官的舊文，孔子不曾摻進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裏面所記的魯國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學家所推算的相合，這決不是偶然的。不過書中殘闕、零亂和後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書起於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後世稱這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時代。書中紀事按年月日，這叫作編年。編年在史學上是個大發明；這敎歷史系統化，並增加了它的確實性。《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史。書中雖用魯國紀元，所記的卻是各國的事，所以也是我們第一部通史。所記的齊桓公、晉文公的霸跡最多；後來說「尊王攘夷」是《春秋》大義，便是從這裏着眼。

古代史官記事，有兩種目的：一是徵實，二是勸懲。像晉國董狐不怕權勢，記「趙盾弒其君」〔一〕，齊國太史記「崔杼弒其君」〔二〕，雖殺身不悔，都爲的是徵實和懲惡，作後世的鑒戒。但是史文簡略，勸懲的意思有時不容易看出來，因此便需要解說的人。《國語》記楚國申叔時論敎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項，說「春秋」有奬善、懲惡的作用，可以戒勸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個開門授徒，拿經典敎

給平民的人，《魯春秋》也該是他的一種科目。關於勸懲的所在，他大約有許多口義傳給弟子們。他死後，弟子們散在四方，就所能記憶的又教授開去。《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所謂《春秋》三傳裏，所引孔子解釋和評論的話，大概就是檢的這一些。

三傳特別注重《春秋》的勸懲作用；徵實與否，倒在其次。按三傳的看法，《春秋》大義可以從兩方面說：明辨是非，分別善惡，提倡德義，從成敗裏見教訓，這是一；誇揚霸業，推尊周室，親愛中國，排斥夷狄，實現民族大一統的理想，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鑒，後者是撥亂反正的程序。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裏。《春秋》裏記災，表示天罰；記鬼，表示恩仇，也還是勸懲的意思。古代記事的書常夾雜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傳的看法，大體上是對的。但在解釋經文的時候，卻往往一個字一個字的咬嚼；這一咬嚼，便不顧上下文穿鑿傅會起來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

這樣咬嚼出來的意義就是所謂「書法」，所謂「褒貶」，也就是所謂「微言」。後世最看重這個。他們說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三〕，「筆」是書，「削」是不書，都有大道理在內。又說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還榮耀，一字之貶，比將你作罪人殺了還恥辱。本來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四〕，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勸懲作用而言。等到褒貶說發展，孟子這句話倒像更坐實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權威也就更大了。後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認這種書法是天經地

義；但實際上他們卻並不照三傳所咬嚼出來的那麽穿鑿傅會的辨。這正和後世詩人儘管推尊《毛詩傳箋》裏比興的解釋，實際上卻不那樣穿鑿傅會的作詩一樣。三傳，特別是《公羊傳》和《穀梁傳》，和《毛詩傳箋》，在穿鑿解經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傳之中，公羊、穀梁兩家全以解經爲主，左氏卻以敍事爲主。公、穀以解經爲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戰國末期，專門解釋《春秋》的有許多家，公、穀較晚出而僅存。這兩家固然有許多彼此相異之處，但淵源似乎是相同的；他們所引別家的解說也有些是一樣的。這兩種《春秋經傳》經過秦火，多有殘闕的地方；到漢景帝、武帝時候，才有經師重加整理，傳授給人。公羊、穀梁只是家派的名稱，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於他們解經的宗旨，已見上文；《春秋》本是儒家傳授的經典，解說的人，自然也離不了儒家，在這一點上，三傳是大同小異的。

《左傳》這部書，漢代傳爲魯國左丘明所作。這個左丘明，有的說是「魯君子」，有的說是孔子的朋友；後世又有說是魯國的史官的[五]。這部書歷來討論的最多。漢時有五經博士。凡解說五經自成一家之學的，都可立爲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學；那派經師便可作官受祿。當時《春秋》立了公、穀二傳的博士。《左傳》流傳得晚些，古文派經師也給它爭立博士。今文派卻說這部書不得孔子《春秋》的眞傳，不如公、穀兩家。後來雖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還是廢了。倒是民間傳習的漸多，終於大行！原來公、穀不免空談，《左傳》卻是一部僅存的古代編年通史（殘缺又少），用處自然大得

多。《左傳》以外，還有一部分國記載的《國語》，漢代也認爲左丘明所作，稱爲《春秋外傳》。後世學者懷疑這一說的很多。據近人的研究，《國語》重在「語」，記事頗簡略，大約出於另一著者的手，而爲《左傳》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這書的說教，也不外尙德、尊天、敬神、愛民，和《左傳》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誰。其實《左傳》著者我們也不知道。說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左傳》成書的時代大概在戰國，比《公》、《穀》二傳早些。

《左傳》這部書大體依《春秋》而作；參考羣籍，詳述史事，徵引孔子和別的「君子」解經評史的言論，吟味書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記禍福的預言，幾乎無不應驗；這卻大大違背了徵實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晉范寧作《穀梁傳序》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豔」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敍鬼神，預言禍福。這是句公平話。注《左傳》的，漢代就不少，但那些許多已散失；現存的只有晉杜預注，算是最古了。

杜預作《春秋序》，論到《左傳》，說「其文緩，其旨遠」，「緩」是委婉，「遠」是含蓄。這不但是好史筆，也是好文筆。所以《左傳》不但是史學的權威，也是文學的權威。《左傳》的文學本領，表現在記述辭令和描寫戰爭上。春秋列國，盟會頗繁，使臣會說話不會說話，不但關係榮辱，並且關係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極重辭令。《左傳》所記當時君臣的話，從容委曲，意味深長。只是平心靜氣的說，緊要關頭卻不放鬆一步，眞所謂恰到好處。這固然是當時風氣如此，但不經《左傳》著者的潤飾工夫，

也決不會那樣在紙上活躍的。戰爭是個複雜的程序，敍得頭頭是道，已經不易，敍得有聲有色，更難；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閒，透着優游不迫神兒才成。這卻正是《左傳》著者所擅長的。

〔一〕《左傳》宣公二年。

〔二〕《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三〕《史記·孔子世家》。

〔四〕《孟子·滕文公》下。

〔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說是「魯君子」，《漢書·劉歆傳》說「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杜預《春秋序》說是「身爲國史」。

【參考資料】洪業《春秋傳引得序》。

四書第七

「四書五經」到現在還是我們口頭上一句熟語。五經是《易》、《書》、《詩》、《禮》、《春秋》；四書按照普通的順序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前二者又簡稱《學》、《庸》，後二者又簡稱《論》、《孟》；有了簡稱，可見這些書是用得很熟的。本來呢，從前私塾裏，學生入學，是從四書讀起的。這是那些時代的小學敎科書，而且是統一的標準的小學敎科書，因爲沒有不用的。那時先生不講解，只讓學生背誦，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圇吞棗的念，囫圇吞棗的背；不懂不要緊，將來用得着，自然會懂的。怎麼說將來用得着？那些時候行科舉制度。科舉是一種競爭的考試制度，考試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題目都出在「四書」裏，而且是朱注的「四書」裏。科舉分幾級，考中的得着種種出身或資格，憑着這種資格可以建功立業，也可以升官發財；作好作歹，都得先弄個資格到手。科舉幾乎是當時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每個學生都先讀「四書」，而且讀的是朱注，便是這個緣故。

將朱注「四書」定爲科舉用書，是從元仁宗皇慶二年（西元一三一三）起的。規定這四種書，自然因爲這些書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讀的價值；規定朱注，也因爲朱注發明書義比舊注好些，切用些。

這四種書原來並不在一起，《學》、《庸》都在《禮記》裏，《論》、《孟》是單行的。這些書原來只算是諸子書，朱子原來也只稱爲「四子」；但《禮記》、《論》、《孟》在漢代都立過博士，已經都升到經裏去了。後來唐代的「九經」裏雖然只有《禮記》，宋代的「十三經」卻又將《論》、《孟》收了進去〔一〕。《中庸》很早就被人單獨注意，漢代已有關於《中庸》的著作，六朝時也有，可惜都不傳了〔二〕。關於《大學》的著作，卻直到司馬光的《大學通義》才開始，這部書也不傳了。這些著作並不曾教《學》、《庸》普及，教《學》、《庸》和《論》、《孟》同樣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書也是他編在一起的，四書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這幾種書的是程顥、程頤兄弟。他們說：「《大學》是孔門的遺書，是初學者入德的門徑。只有從這部書裏，還可以知道古人做學問的程序。從《論》、《孟》裏雖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這部書的分明易曉。學者必須從這部書入手，才不會走錯了路。」〔三〕這裏沒提到《中庸》。可是他們是很推尊《中庸》的。他們在另一處說：「『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的書，是子思記下來傳給孟子的。書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長；會讀書的細加玩賞，自然能心領神悟終身受用不盡。」〔四〕這四種書到了朱子手裏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見解，加以系統的說明，四種書便貫串起來了。

他說，古來有小學大學。小學裏敎灑掃進退的規矩，和禮、樂、射、御、書、數，所謂「六藝」的。大學裏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敎的都切於民生日用，都是實學。《大學》這部書便是古來

大學裏敎學生的方法，規模大，節目詳；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循序漸進的。程子說是「初學者入德的門徑」，就是爲此。這部書裏的道理，並不是爲一時一事說的，是爲天下後世說的。這是「垂世立敎的大典」〔五〕，所以程子舉爲初學者的第一部書。《論》、《孟》雖然也切實，卻是「應機接物的微言」〔六〕，問的不是一個人，記的也不是一個人。淺深先後，次序既不分明，抑揚可否，用意也不一樣，初學者領會較難。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於《中庸》，是孔門的心法，初學者領會更難，程子所以另論。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孟》裏精微的分別去處；融貫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裏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道心，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領會《中庸》裏的心法，是不能從大處着眼，讀天下的書，論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將《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學》、《論》、《孟》合爲「四書」，作爲初學者的基礎敎本。後來規定「四書」爲科舉用書，原也根據這番意思。不過朱子敎人讀「四書」，爲的成人，後來人讀「四書」，卻重在獵取功名；這是不合於他提倡的本心的。至於順序變爲《學》、《庸》、《論》、《孟》，那是書賈因爲《學》、《庸》篇頁不多，合爲一本的緣故；通行既久，居然約定俗成了。

《禮記》裏的《大學》，本是一篇東西，朱子給分成經一章，傳十章；傳是解釋經的。因爲要使傳合經，他又顚倒了原文的次序，並補上一段兒。他注《中庸》時，雖沒有這樣大的改變，可是所分的章

節，也與鄭玄注的不同。所以這兩部書的注，稱爲《大學章句》、《中庸章句》。《論》、《孟》的注，卻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稱爲《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的經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話；傳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們記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樣，都接受《史記》的記載，認爲是子思〔七〕。但關於書名的解釋，他修正了一些。他說，「中」除「不偏」外，還有「無過無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八〕。照近人的研究，《大學》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學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貫，從前就有人疑心。照近來的看法，這部書的中段也許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發揚孔子的學說，如「時中」「忠恕」「知仁勇」「五倫」等。首尾呢，怕是另一關於《中庸》的著作，經後人混合起來的；這裏發揚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謂「至誠」「盡性」，都是的。著者大約是一個孟子學派。

《論語》是孔子弟子們記的。這部書不但顯示一個偉大的人格——孔子，並且讓讀者學習許多做學問做人的節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時習」、「闕疑」、「好古」、「隅反」、「擇善」、「困學」等，都是可以終身應用的。《孟子》據說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孫丑、萬章等共同編定的。書中說「仁」兼說「義」，分辨「義」「利」甚嚴；而辯「性善」，教人求「放心」，影響更大。又說到「養浩然之氣」，那「至大至剛」、「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九〕，這是修養的最高境界，所謂天人相通的哲理。書中攻擊楊朱、墨翟兩派，辭鋒咄咄逼人。這在儒家叫作攻異端，功勞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戰國時代，他不

免「好辯」，他自己也覺得的〔一〇〕；他的話流露着「英氣」，「有圭角」，和孔子的溫潤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稱爲「亞聖」，次於孔子一等〔一一〕。《孟子》有東漢的趙岐注。《論語》有孔安國、馬融、鄭玄諸家注，卻都已殘佚，只零星的見於魏何晏的《集解》裏。漢儒注經，多以訓詁名物爲重；但《論》、《孟》詞意顯明，所以只解釋文句，推闡義理而止。魏、晉以來，玄談大盛，孔子已經道家化；解《論語》的也多參入玄談，參入當時的道家哲學。這些後來卻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給《論》、《孟》作注，雖說融會各家，其實也用他自己的哲學作架子。他注《學》、《庸》，更顯然如此。他的哲學切於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將他解釋的孔子當作眞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書」注實在用盡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臨死的時候，他還在改定《大學・誠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書或問》，發揚注義，並論述對於舊說的或取或捨的理由。他在「四書」上這樣下工夫，一面固然爲了誘導初學者，一面還有一個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統。他在《中庸章句序》裏論到諸聖道統的傳承，末尾自謙說，「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其實他是隱隱在以傳道統自期呢。《中庸》傳授心法，正是道統的根本。將它加在《大學》、《論》、《孟》之後而成「四書」，朱子自己雖然說是給初學者打基礎，但一大半恐怕還是爲了建立道統，不過他自己不好說出罷了。他注「四書」在宋孝宗淳熙年間（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九）。他死後朝廷將他的「四書」注審定爲官書，從此盛行起來。他果然成了傳儒家道統的大師了。

〔一〕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十三經：《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二〕《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

〔三〕原文見《大學章句》卷頭。

〔四〕原文見《中庸章句》卷頭。

〔五〕同前條。

〔六〕朱子《大學或問》卷一。

〔七〕《孔子世家》。

〔八〕《中庸或問》卷一。

〔九〕《公孫丑》。

〔10〕《滕文公》。

〔11〕《孟子集注序》說引程子說。

《戰國策》第八

春秋末年，列國大臣的勢力漸漸膨脹起來。這些大臣都是世襲的，他們一代一代聚財養衆，明爭暗奪了君主的權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機會成熟，便跳起來打倒君主自己幹。那時候各國差不多都起了內亂。晉國讓韓、魏、趙三家分了，姓姜的齊國也讓姓田的大夫占了。這些，周天子只得承認了。這是封建制度崩壞的開始。那時候周室也經過了內亂，土地大半讓鄰國搶去，剩下的又分爲東、西周；東、西周各有君王，彼此還爭爭吵吵的。這兩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時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國諸侯相等了。後來列國紛紛稱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們至多能和宋、魯等小國君主等量齊觀罷了。

秦、楚兩國也經過內亂，可是站住了。它們本是邊遠的國家，卻漸漸伸張勢力到中原來。內亂平後，大加整頓，努力圖強，聲威便更廣了。還有極北的燕國，向來和中原國家少來往；這時候也有力量向南參加國際政治了。秦、楚、燕和新興的韓、魏、趙、齊，是那時代的大國，稱爲「七雄」。那些小國呢，從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護，作大國的附庸；現在可不成了，只好讓人家吞的吞，併的併，算只留下宋、魯等兩三國，給七雄當緩衝地帶。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壞中，七雄便各成一單位，各自爭存，

各自爭強；國際政局比春秋時代緊張多了。戰爭也比從前嚴重多了。列國都在自己邊界上修起長城來。這時候軍器進步了，從前的兵器都用銅打成，現在有用鐵打成的了。戰術也進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從前精明，從前只用兵車和步卒，現在卻發展了騎兵了。這時候還有以幫人家作戰為職業的人。這時候的戰爭，殺傷是很多的。孟子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一〕可見那兇慘的情形。後人因此稱這時代為戰國時代。

在長期混亂之後，貴族有的作了國君，有的漸漸衰滅。這個階級算是隨着封建制度崩壞了。那時候的國君，沒有了世襲的大臣，便集權專制起來。輔助他們的是一些出身貴賤不同的士人。那時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攬有技能的人，甚至學雞鳴、學狗盜的也都收留着。這是所謂「好客」、「好士」的風氣。其中最高的是說客，是游說之士。當時國際關係緊張，戰爭隨時可起。戰爭到底是勞民傷財的，況且難得有把握；重要的還是作外交的工夫。外交辦得好，只憑口舌排難解紛，可以免去戰禍；就是不得不戰，也可以多找一些與國，一些幫手。擔負這種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說之士。游說之士既然這般重要，所以立談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計謀，會辯說就成，出身的貴賤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從孝公用商鞅變法以後，日漸強盛。到後來成了與六國對峙的局勢。這時候的游說之士，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抗秦，有的勸六國聯合起來親秦。前一派叫「合縱」，是聯合南北各國

的意思，後一派叫「連橫」，是聯合東西各國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國家。合縱派的代表是蘇秦，連橫派的是張儀，他們可以代表所有的戰國游說之士。後世提到游說的策士，總想到這兩個人，提到縱橫家，也總是想到這兩個人。他們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蘇秦起初也是連橫派。他游說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窮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極了，用心讀書，用心揣摩；夜裏倦了要睡，用錐子扎大腿，血流到脚上。這樣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來游說六國合縱。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國相印，又有勢又有錢。打家裏過的時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頭，嫂嫂爬在地下謝罪。他嘆道：「人生世上，勢位富貴，眞是少不得的！」張儀和楚相喝酒。楚相丟了一塊璧。手下人說張儀窮而無行，一定是他偷的，綁起來打了幾百下。張儀始終不認，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說：「唉，要不是讀書游說，那會受這場氣！」他不理，只說：「看我舌頭還在罷？」妻子笑道：「舌頭是在的。」他說：「那就成！」後來果然作了秦國的相；蘇秦死後，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蘇秦使錐子扎腿的時候，自己發狠道：「那有游說人主不能得金玉錦繡，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這正是戰國策士的心思。他們憑他們的智謀和辯才，給人家畫策，辦外交；誰用他們就幫誰。他們是職業的，所圖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貴；幫你的時候幫你，不幫的時候也許害你。翻覆，在他們看來是沒有什麽的。本來呢，當時七雄分立，沒有共主，沒有盟主，各幹各的，誰勝誰得勢。國際間

沒有是非，愛幫誰就幫誰，反正都一樣。蘇秦說連横不成，就改說合縱，在策士看來，這正是當然。張儀說舌頭在就行，說是說非，只要會說，這也正是職業的態度。他們自己沒有理想，沒有主張，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彎兒抹角投其所好。這需要技巧；韓非子《說難篇》專論這個。說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錦繡」和「卿相之尊」，說得不好也會招殺身之禍，利害所關如此之大，蘇秦費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當時各國所重的是威勢，策士所說原不外戰爭和詐謀；但要因人、因地進言，廣博的知識和微妙的機智都是不可少的。

記載那些說辭的書叫《戰國策》，是漢代劉向編定的，書名也是他提議的。但在他以前，漢初著名的說客蒯通，大約已經加以整理和潤飾，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漢書》本傳裏記着他「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雋永》」，大約就是劉向所根據的底本了〔二〕。蒯通那枝筆是很有力量的。鋪陳的偉麗，叱咤的雄豪，固然傳達出來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聲口，也絲絲入扣，千載如生。讀這部書，眞是如聞其語，如見其人。漢以來批評這部書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劉向的序裏說戰國時代「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說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異智」，「亦可喜，皆可觀」。這便是文辭的作用了。宋代有個李文叔，也說這部書所記載的事「淺陋不足道」，但「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又道，說的還不算難，記的才眞難得呢〔三〕。這部書除文辭之勝外，所記的事，上接春秋時代，下至楚、

漢興起爲止，共二百零二年（西元前四〇三——二〇二），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謂戰國時代，便指這裏的二百零二年；而戰國的名稱也是劉向在這部書的序裏定出的。

〔一〕《離婁》。

〔二〕羅根澤《戰國策作於蒯通考》及《補證》（《古史辨》第四册）。

〔三〕李格非《書戰國策後》。

【參考資料】雷海宗《中國通史選讀》第二册（清華大學講義排印本）。

《史記》《漢書》第九

說起中國的史書，《史記》、《漢書》，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有兩個原因。一則這兩部書是最早的有系統的歷史，再早雖然還有《尙書》、《魯春秋》、《國語》、《春秋左氏傳》、《戰國策》等，但《尙書》、《國語》、《戰國策》，都是記言的史，不是記事的史。《春秋》和《左傳》是記事的史了，可是《春秋》太簡短，《左氏傳》雖够鋪排的，而跟着《春秋》編年的系統，所記的事還不免散碎。《史記》創了「紀傳體」，敍事自黃帝以來到著者當世，就是漢武帝的時候，首尾三千多年。《漢書》採用了《史記》的體製，卻以漢事爲斷，從高祖到王莽，只二百三十年。後來的史書全用《漢書》的體製，斷代成書；二十四史裏，《史記》、《漢書》以外的二十二史都如此。這稱爲「正史」。《史記》、《漢書》，可以說都是「正史」的源頭。二則，這兩部書都成了文學的古典；兩書有許多相同處，雖然也有許多相異處。大概東漢、魏、晉到唐，喜歡《漢書》的多，唐以後喜歡《史記》的多，而明、清兩代尤然。這是兩書文體各有所勝的緣故。但歷來班、馬並稱，《史》、《漢》連舉，它們敍事寫人的技術，畢竟是大同的。

《史記》，漢司馬遷著。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景帝中元五年——西元前一四五——生，卒年不詳。)他是太史令司馬談的兒子。小時候在本鄉只幫人家耕耕田、放放牛玩

兒。司馬談作了太史令，才將他帶到京師（今西安）讀書。他十歲的時候，便認識「古文」的書了。二十歲以後，到處游歷，眞是足跡遍天下。他東邊到過現在的河北、山東及江、浙沿海，南邊到過湖南、江西、雲南、貴州，西邊到過陝、甘、西康等處，北邊到過長城等處；當時的「大漢帝國」，除了朝鮮、河西（今寧夏一帶）、嶺南幾個新開郡外，他都走到了。他的出游，相傳是父親命他搜求史料去的；但也有些處是因公去的。他搜得了多少寫的史料，沒有明文，不能知道。可是他卻看到了好些古代的遺跡，聽到了好些古代的軼聞；這些都是活史料，他用來印證並補充他所讀的書。他作《史記》，敍述和描寫往往特別親切有味，便是爲此。他的游歷不但增擴了他的見聞，也增擴了他的胸襟；他能夠綜括三千多年的事，寫成一部大書，而行文又極其抑揚變化之致，可見出他的胸襟是如何的闊大。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應試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一一〇），大行封禪典禮，步騎十八萬，旌旗千餘里。司馬談是史官，本該從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陽不能去。司馬遷卻跟去了。回來見父親，父親已經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嗚咽着道：「我們先人從虞、夏以來，世代作史官；周末棄職他去，從此我家便衰微了。我雖然恢復了世傳的職務，可是不成；你看這回封禪大典，我竟不能從行，眞是命該如此！再說孔子因爲眼見王道缺，禮樂衰，才整理文獻，論《詩》、《書》，作《春秋》，他的功績是不朽的。孔子到現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國只管爭戰，史籍都散失了，這得搜求整

理；漢朝一統天下，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也得記載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卻沒能盡職，無所論著，眞是惶恐萬分。你若能繼承先業，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揚名於後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話罷。」〔一〕司馬遷聽了父親這番遺命，低頭流淚答道：「兒子雖然不肖，定當將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來，不敢有所遺失。」〔二〕司馬談便在這年死了；司馬遷這年三十六歲。父親的遺命指示了他一條偉大的路。

父親死的第三年，司馬遷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機會看到許多史籍和別的藏書，便開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時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裏，特別是漢代各地方行政報告，他那裏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卻忙着改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西元前一〇四），太初曆完成，才動手著他的書。天漢二年（西元前九九），李陵奉了貳師將軍李廣利的命，領了五千兵，出塞打匈奴。匈奴八萬人圍着他們；他們殺傷了匈奴一萬多，可是自己的人也死了一大半。箭完了，又沒吃的，耗了八天，等貳師將軍派救兵。救兵竟沒有影子。匈奴卻派人來招降。李陵想着回去也沒有臉，就降了。武帝聽了這個消息，又急又氣。朝廷裏紛紛說李陵的壞話。武帝問司馬遷，李陵到底是個怎樣的人。李陵也作過郎中，和司馬遷同過事，司馬遷是知道他的。

他說李陵這個人秉性忠義，常想犧牲自己，報效國家。這回以少敵衆，兵盡路窮，但還殺傷那麼些人，功勞其實也不算小。他決不是怕死的人，他的降大概是假意的，也許在等機會給漢朝出力呢。

武帝聽了他的話，想着貳師將軍是自己派的元帥，司馬遷卻將功勞歸在投降的李陵身上，眞是大不敬；便教將他抓起來，下在獄裏。第二年，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宮刑。宮刑是個大辱，汚及先人，見笑親友。他灰心失望已極，只能發憤努力，在獄中專心致志寫他的書，希圖留個後世名。過了兩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獄，不久卻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書令，重被寵信。但他還繼續寫他的書。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九一），全書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他死後，這部書部分的流傳；到宣帝時，他的外孫楊惲才將全書獻上朝廷去，並傳寫公行於世。漢人稱爲《太史公書》、《太史公》、《太史公記》、《太史記》。魏、晉間才簡稱爲《史記》，《史記》便成了定名。這部書流傳時頗有缺佚，經後人補續改竄了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間褚少孫補的有主名，其餘都不容易考了。

司馬遷是竊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司馬遷是秦火以後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他們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樣。《史記自序》裏記着司馬遷和上大夫壺遂討論作史的一番話。司馬遷引述他的父親稱揚孔子整理六經的豐功偉業，而特別着重《春秋》的著作。他們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話：「我有種種覺民救世的理想，憑空發議論，恐怕人不理會；不如借歷史上現成的事實來表現，可以深切著明些。」〔三〕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惡、賢不肖，存亡繼絕，補敝起廢，作

後世君臣龜鑑。《春秋》實在是禮義的大宗，司馬遷相信禮治是勝於法治的。他相信《春秋》包羅萬象，采善貶惡，並非以刺譏爲主。像他父親遺命所說的，漢興以來，人主明聖盛德，和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是他父子職守所在，正該記載表彰。他的書記漢事較詳，固然是史料多，也是他意主尊漢的緣故。他排斥暴秦，要將漢遠承三代。這正和今文家說的《春秋》尊魯一樣，他的書實在是竊比《春秋》的。他雖自稱只是「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四〕，述而不作，不敢與《春秋》比，那不過是謙詞罷了。

他在《報任安書》裏說他的書「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自序》裏說：「罔（網）羅天下放佚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王迹所興」，始終盛衰，便是「古今之變」，也便是「天人之際」。「天人之際」只是天道對於人事的影響；這和所謂「始終盛衰」都是陰陽家言。陰陽家倡「五德終始說」，以爲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剋勝，終始運行，循環不息。當運者盛，王迹所興；運去則衰。西漢此說大行，與「今文經學」合而爲一。司馬遷是請教過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師；他也許受了董的影響。「五德終始說」原是一種歷史哲學；實際的教訓只是讓人君順時修德。

《史記》雖然竊比《春秋》，卻並不用那咬文嚼字的書法，只據事實錄，使善惡自見。書裏也有議論，那不過是著者牢騷之辭，與大體是無關的。原來司馬遷自遭李陵之禍，更加努力著書。他覺得

自己已經身廢名裂，要發抒意中的鬱結，只有這一條通路。他在《報任安書》和《史記自序》裏引了文王以下到韓非諸賢聖，都是發憤才著書的。他自己也是個發憤著書的人。天道的無常，世變的無常，引起了他的慨嘆；他悲天憫人，發爲牢騷抑揚之辭。這增加了他的書的情韻。後世論文的人推尊《史記》，一個原因便在這裏。

班彪論前史得失，卻說他「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論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以爲「大敝傷道」〔五〕；班固也說他「是非頗謬於聖人」〔六〕。其實推崇道家的是司馬談；司馬遷時，儒學已成獨尊之勢，他也成了一個推崇的人了。至於《游俠》、《貨殖》兩傳，確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時候有錢可以贖罪，他遭了李陵之禍，刑重家貧，不能自贖，所以才有「羞貧窮」的話；他在窮窘之中，交游竟沒有一個抱不平來救他的，所以才有稱揚游俠的話。這和《伯夷傳》裏天道無常的疑問，都只是偶一借題發揮，無關全書大旨。東漢王允死看「發憤」著書一語，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見，便說《史記》是「佞臣」的「謗書」〔七〕，那不但誤解了《史記》，也太小看了司馬遷了。

《史記》體例有五：十二本紀，記帝王政跡，是編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記世代爲主。八書，記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記侯國世代存亡。七十列傳，類記各方面人物。史家稱爲「紀傳體」，因爲「紀傳」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斷片的雜記，便是順案年月的纂錄；自出機杼，創立規模，以

駕馭去取各種史料的，從《史記》起始。司馬遷的確能夠貫穿經傳，整齊百家雜語，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齊」的必要，並知道怎樣去「整齊」：這實在是創作，是以述爲作。他這樣將自有文化以來三千年間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爐而冶之」，卻反映着秦漢大一統的局勢。《春秋左氏傳》雖也可算通史，但是規模完具的通史，還得推《史記》爲第一部書。班固根據他父親班彪的意見，說司馬遷「善敍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八〕。「直」是「簡省」的意思；簡省而能明確，便見本領。《史記》共一百三十篇，列傳占了全書的過半數；司馬遷的史觀是以人物爲中心的。他最長於描寫；靠了他的筆，古代許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還活現在紙上。

《漢書》，漢班固著。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光武帝建武八年——西元三二——生，和帝永元四年——西元九二——卒。）他家和司馬氏一樣，也是個世家；《漢書》是子繼父業，也和司馬遷差不多。但班固的憑藉，比司馬遷好多了。他曾祖班斿，博學有才氣，成帝時，和劉向同校皇家藏書。成帝賜了他全套藏書的副本，《史記》也在其中。當時書籍流傳很少，得來不易；班家得了這批賜書，眞像大圖書館似的。他家又有錢，能夠招待客人。後來有好些學者，老遠的跑到他家來看書；揚雄便是一個。班斿的次孫班彪，既有書看，又得接觸許多學者；於是盡心儒術，成了一個史學家。《史記》以後，續作很多，但不是偏私，就是鄙俗；班彪加以整理補充，著了六十五篇《後傳》。他詳論《史記》的得失，大體確當不移。他的書似乎只有本紀和列傳；世家是併在列

傳裏。這部書沒有流傳下來,但他的兒子班固的《漢書》是用它作底本的。

班固生在河西;那時班彪避亂在那裏。班固有弟班超,妹班昭,後來都有功於《漢書》。他五歲時隨父親到那時的京師洛陽。九歲時能作文章,讀詩賦。大概是十六歲罷,他入了洛陽的大學,博覽羣書。他治學不專守一家;只重大義,不沾沾在章句上。又善作辭賦。爲人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驕人。在大學裏讀了七年書,二十三歲上,父親死了,他回到安陵去。明帝永平元年(西元五八),他二十八歲,開始改撰父親的書。他覺得《後傳》不夠詳的,自己專心精究,想完成一部大書。過了三年,有人上書給明帝,告他私自改作舊史。當時天下新定,常有人假造預言,搖惑民心;私改舊史,更有機會造謠,罪名可以很大。

明帝當卽詔令扶風郡逮捕班固,解到洛陽獄中,並調看他的稿子。他兄弟班超怕鬧出大亂子,永平五年(西元六二),帶了全家趕到洛陽;他上書給明帝,陳明原委,請求召見。明帝果然召見。他陳明班固不敢私改舊史,只是續父所作。那時扶風郡也已將班固稿子送呈。明帝卻很賞識那稿子,便命班固作校書郎,蘭臺令史,跟別的幾個人同修世祖(光武帝)本紀。班家這時候很窮。班超也作了一名書記,幫助哥哥養家。後來班固等又述諸功臣的事蹟,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上。這些後來都成了劉珍等所撰的《東觀漢記》的一部分,與《漢書》是無關的。

明帝這時候才命班固續完前稿。永平七年(西元六四),班固三十三歲,在蘭臺重行寫他的大

著。蘭臺是皇家藏書之處，他取精用弘，比家中自然更好。次年，班超也作了蘭臺令史。雖然在官不久，就從軍去了，但一定給班固幫助很多。章帝即位，好辭賦，更賞識班固了。他因此得常到宮中讀書，往往連日帶夜的讀下去。大概在建初七年（西元八二），他的書才大致完成。那年他是五十一歲了。和帝永元元年（西元八九），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用他作中護軍，參議軍機大事。這一回匈奴大敗，逃得不知去向。竇憲在出塞三千多里外的燕然山上刻石紀功，教班固作銘。這是著名的大手筆。

次年他回到京師，就作竇憲的祕書。當時竇憲威勢極盛；班固倒沒有仗竇家的勢欺壓人，但他的兒子和奴僕卻都無法無天的。這就得罪了許多地面上的官兒；他們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他的奴子喝醉了，在街上罵了洛陽令种兢，种兢氣恨極了，但也只能記在心裏。永元四年（西元九二），竇憲陰謀弒和帝，事敗，自殺。他的黨羽，或誅死，或免官。班固先只免了官，种兢卻饒不過他，逮捕了他，下在獄裏。他已經六十一歲了，受不得那種苦，便在獄裏死了。和帝得知，很覺可惜，特地下詔申斥种兢，命他將主辦的官員抵罪。班固死後，《漢書》的稿子很散亂。他的妹子班昭也是高才博學，嫁給曹世叔，世叔早死，她的節行並爲人所重。當時稱爲曹大家。這時候她奉詔整理哥哥的書；並有高才郎官十人，從她研究這部書——經學大師扶風馬融，就在這十人裏。書中的八表和天文志那時還未完成，她和馬融的哥哥馬續參考皇家藏書，將這些篇寫定，這也是奉詔辦的。

《漢書》的名稱從《尙書》來，是班固定的。他說唐、虞、三代當時都有記載，頌述功德；漢朝卻到了第六代才有司馬遷的《史記》。而《史記》是通史，將漢朝皇帝的本紀放在儘後頭，並且將堯的後裔的漢和秦、項放在相等的地位，這實在不足以推尊本朝。況《史記》只到武帝而止，也沒有成段落似的。他所以斷代述史，起於高祖，終於平帝時王莽之誅，共十二世，二百三十年，作紀、表、志、傳凡百篇，稱爲《漢書》〔九〕。班固著《漢書》，雖然根據父親的評論，修正了《史記》的缺失，但斷代的主張，卻是他的創見。他這樣一面保存了文獻，一面貫徹了發揚本朝功德的趣旨。所以後來的正史都以他的書爲範本，名稱也多叫作「書」。他這個創見，影響是極大的。他的書所包舉的，比《史記》更爲廣大；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藝術、文章，盡在其中。

書裏沒有世家一體，本於班彪《後傳》。漢代封建制度，實際上已不存在；無所謂侯國，也就無所謂世家。這一體的併入列傳，也是自然之勢。至於改「書」爲「志」，只是避免與《漢書》的「書」字相重，無關得失。但增加了《藝文志》，敍述古代學術源流，記載皇家藏書目錄，所關卻就大了。《藝文志》的底本是劉歆的《七略》。劉向、劉歆父子都曾奉詔校讀皇家藏書；他們開始分別源流，編訂目錄〔10〕，使那些「中祕書」漸得流傳於世，功勞是很大的。他們的原著都已不存，但《藝文志》還保留着劉歆《七略》的大部分。這是後來目錄學家的寶典。原來秦火之後，直到成帝時，書籍才漸漸出現；成帝詔求遺書於天下，這些書便多聚在皇家。劉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樣大的貢獻，班固所以想到

在《漢書》裏增立《藝文志》，都是時代使然。司馬遷便沒有這樣好運氣。

《史記》成於一人之手，《漢書》成於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馬續補成；紀、傳從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後傳》作底本。而從高祖至武帝，更多用《史記》的文字。這樣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說他的書是「剽竊」而成〔二〕，算不得著作。但那時的著作權的觀念還不甚分明，不以鈔襲爲嫌；而史書也不能憑虛別構。班固刪潤舊文，正是所謂「述而不作」。他刪潤的地方，卻頗有別裁，決非率爾下筆。史書敍漢事，有闕略的，有隱晦的，經他潤色，便變得詳明，這是他的獨到處。漢代「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他實在表彰得更爲到家。書中收載別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說他是「浮華」之士〔三〕。這些文章大抵關係政治學術，多是經世有用之作。那時還沒有文集，史書加以搜羅，不失保存文獻之旨。至於收錄辭賦，卻是當時的風氣和他個人的嗜好；不過從現在看來，這些也正是文學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馬優劣論起於王充《論衡》。他說班氏父子「文義浹備，紀事詳贍」，觀者以爲勝於《史記」〔三〕。王充論文，是主張「華實俱成」的〔四〕。漢代是個辭賦的時代，所謂「華」，便是辭賦化。《史記》當時還用散行文字；到了《漢書》，便弘麗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長了。這正是辭賦的影響。自此以後，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愛《漢書》，專門傳習，《史記》的傳習者卻甚少。這反映着那時期崇尚駢文的風氣。唐以後，散文漸成正統，大家才提倡起《史記》來；明歸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

加推尊，《史記》差不多要駕乎《漢書》之上了。這種優劣論起於二書散整不同，質文各異；其實是跟着時代的好尙而轉變的。

晉代張輔，獨不好《漢書》。他說：「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的優劣，多以固爲勝，但是司馬遷敍三千年事，只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卻有八十萬言。煩省相差如此之遠，班固那裏趕得上司馬遷呢！」〔五〕劉知幾《史通》卻以爲「《史記》雖敍三千年事，詳備的也只漢興七十多年，前省後煩，未能折中；若敎他作《漢書》，恐怕比班固還要煩些」〔六〕。劉知幾左祖班固，不無過甚其辭。平心而論，《漢書》確比《史記》繁些。《史記》是通史，雖然意在尊漢，不妨詳近略遠，但敍漢事倒底不能太詳；司馬遷是知道「折中」的。《漢書》斷代爲書，儘可充分利用史料，盡其頌述功德的職分；載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這是一。《漢書》載別人文字也比《史記》多，這是二。《漢書》文字趨向駢體，句子比散體長，這是三。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爲《漢書》病。范曄《後漢書·班固傳贊》說班固敍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這是不錯的。

宋代鄭樵在《通志總序》裏抨擊班固，幾乎說得他不值一錢。劉知幾論通史不如斷代，以爲通史年月悠長，史料亡佚太多，所可採錄的大都陳陳相因，難得新異。《史記》已不免此失；後世仿作，貪多務得，又加上繁雜的毛病，簡直敎人懶得去看〔七〕。按他的說法，像《魯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個時代的一段兒，相當於《史記》的敍述漢事；不是無首無尾，就是有首無尾。這都不如斷代史

的首尾一貫好。像《漢書》那樣，所記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豐富，搜求不難。只需破費工夫，總可一新耳目，「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的〔八〕。鄭樵的意見恰相反。他注重會通，以爲歷史是聯貫的，要明白因革損益的軌跡，非會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見其全，能見其大。他稱贊《史記》，說是「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說班固斷漢爲書，古今間隔，因革不明，失了會通之道，眞只算是片段罷了〔九〕。其實通古和斷代，各有短長，劉、鄭都不免一偏之見。

《史》、《漢》可以說是各自成家。《史記》「文直而事覈」，《漢書》「文贍而事詳」〔一〇〕。司馬遷感慨多，微情妙旨，時在文字蹊徑之外；《漢書》卻一覽之餘，情詞俱盡。但是就史論史，班固也許比較客觀些，比較合體些。明茅坤說「《漢書》以矩矱勝」〔一一〕，清章學誠說「班氏守繩墨」，「班氏體方用智」〔一二〕，都是這個意思。晉傅玄評班固，「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一三〕。這些只關識見高低，不見性情偏正，和司馬遷《游俠》、《貨殖》兩傳蘊含着無窮的身世之痛的不能相比，所以還無礙其爲客觀的。總之，《史》、《漢》二書，文質和繁省雖然各不相同，而所採者博，所擇者精，卻是一樣；組織的弘大，描寫的曲達，也同工異曲。二書並稱良史，決不是偶然的。

〔一〕、〔二〕、〔三〕、〔四〕原文見《史記自序》。
〔五〕《後漢書·班彪傳》。

〔六〕《漢書·司馬遷傳贊》。
〔七〕《後漢書·蔡邕傳》。
〔八〕同〔六〕。
〔九〕《漢書·敘傳》。
〔一〇〕劉向著有《別錄》。
〔一一〕、〔一二〕《通志總序》。
〔一三〕《超奇篇》，這裏據《史通·鑒識》原注引，和通行本文字略異。
〔一四〕《超奇篇》。
〔一五〕原文見《晉書·張輔傳》。
〔一六〕原文見《史通·雜說》上。
〔一七〕、〔一八〕《史通·六家》。
〔一九〕同〔一一〕、〔一二〕。
〔二〇〕《後漢書·班固傳贊》。
〔二一〕《漢書評林序》。
〔二二〕《文史通義·詩教》下。
〔二三〕《史通·書事》。

【參考資料】鄭鶴聲《史漢研究》。《司馬遷年譜》。《班固年譜》。

諸子第十

春秋末年，封建制度開始崩壞，貴族的統治權，漸漸維持不住。社會上的階級，有了紊亂的現象。到了戰國，更看見農奴解放，商人擡頭。這時候一切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制度，都起了根本的變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個大解放的時代。在這個大變動當中，一些才智之士，對於當前的情勢，有種種的看法，有種種的主張；他們都想收拾那動亂的局面，讓它穩定下來。有些傾向於守舊的，便起來擁護舊文化、舊制度，向當世的君主和一般人申述他們擁護的理由，給舊文化、舊制度找出理論上的根據。也有些人起來批評或反對舊文化、舊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那些。還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來代替舊的；還有人壓根兒反對一切文化和制度。這些人也都根據他們自己的見解各說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這便是諸子之學，大部分可以稱爲哲學。這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也是一個思想發達的時代，在中國學術史裏是稀有的。

諸子都出於職業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裏貴族的末一級；但到了春秋、戰國之際，「士」成了有材能的人的通稱。在貴族政治未崩壞的時候，所有的知識、禮、樂等等，都在貴族手裏，平民是沒分的。那時有知識技能的專家，都由貴族專養專用，都是在官的。到了貴族政治崩壞以後，貴族

有的失了勢，窮了，養不起自用的專家。這些專家失了業，流落到民間，便賣他們的知識技能爲生。凡有權有錢的都可以臨時雇用他們；他們起初還是伺候貴族的時候多，不過不限於一家貴族罷了。這樣發展了一些自由職業；靠這些自由職業爲生的，漸漸形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便是「士農工商」的「士」。這些「士」，這些專家，後來居然開門授徒起來。徒弟多了，聲勢就大了，地位也高了。他們除掉執行自己的職業之外，不免根據他們專門的知識技能，研究起當時的文化和制度來了。這就有了種種看法和主張。各「思以其道易天下」〔一〕。諸子百家便是這樣興起的。

第一個開門授徒發揚光大那非農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階級的，是孔子。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國的貴族，貧寒失勢，才流落到魯國去。他自己作了一個儒士；儒士是以敎書和相禮爲職業的，他卻只是一個「老敎書匠」。他的敎書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有敎無類」〔二〕。他大招學生，不問身家，只要繳相當的學費就收；收來的學生，一律敎他們讀《詩》、《書》等名貴的古籍，並敎他們禮樂等功課。這些從前是只有貴族才能够享受的，孔子是第一個將學術民衆化的人。他又帶着學生，周遊列國，說當世的君主；這也是從前沒有的。他一個人開了講學和游說的風氣，是「士」階級的老祖宗。他是舊文化、舊制度的辯護人，以這種姿態創始了所謂儒家。所謂舊文化、舊制度，主要的是西周的文化和制度，孔子相信是文王、周公創造的。繼續文王、周公的事業，便是他給他自己的使命。他自己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三〕；所述的，所信所好的，都是周代的文化和制度。《詩》、《書》、

《禮》、《樂》等是周文化的代表，所以他拿來作學生的必修科目。這些原是共同的遺產，但後來各家都講自己的新學說，不講這些；講這些的始終只有「述而不作」的儒家。因此《詩》、《書》、《禮》、《樂》等便成爲儒家的專有品了。

孔子是個博學多能的人，他的講學是多方面的。他講學的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爲國家服務的人，並不在於養成某一家的學者。他敎學生讀各種書，學各種功課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養。他說爲人要有眞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這所謂「直」、「仁」、「忠」、「恕」；一面還得合乎禮，就是遵守社會的規範。凡事只問該作不該作，不必問有用無用；只重義，不計利。這樣人才配去幹政治，爲國家服務。孔子的政治學說，是「正名主義」。他想着當時制度的崩壞，階級的紊亂，都是名不正的緣故。君沒有君道，臣沒有臣道，父沒有父道，子沒有子道，實和名不能符合起來，天下自然亂了。救時之道，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正名定分，社會的秩序，封建的階級便會恢復的。他是給封建制度找了一個理論的根據。這個正名主義，又是從《春秋》和古史官的種種書法歸納得來的。他所謂「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爲作，就是理論化舊文化、舊制度，要將那些維持下去。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便在這裏。

孔子以後，儒家還出了兩位大師，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軻，鄒人；荀子名況，趙人。這兩位大師代表儒家的兩派。他們也都擁護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但更進一步的加以理論化和理想化。孟子說

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惻隱心、羞惡心、辭讓心、是非心；這便是仁、義、禮、智等善端，只要能夠加以擴充，便成善人。這些善端，又總稱爲「不忍人之心」。聖王本於「不忍人之心」，發爲「不忍人之政」〔五〕，便是「仁政」，「王政」。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制度都是爲民設的，君也是爲民設的——這卻已經不是封建制度的精神了。和王政相對的是霸政。霸主的種種制作設施，有時也似乎爲民，其實不過是達到好名、好利、好尊榮的手段罷了。荀子說人性是惡的。性是生之本然，裏面不但沒有善端，還有爭奪放縱等惡端。但是人有相當聰明才力，可以漸漸改善學好；積久了，習慣自然，再加上專一的工夫，可以到聖人的地步。所以善是人爲的。孟子反對功利，他卻注重它。他論王霸的分別，也從功利着眼。孟子注重聖王的道德，他卻注重聖王的威權。他說生民之初，縱欲相爭，亂得一團糟；聖王建立社會國家，是爲明分、息爭的。禮是社會的秩序和規範，作用便在明分；樂是調和情感的，作用便在息爭。他這樣從功利主義出發，給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論的根據。

儒士多半是上層社會的失業流民；儒家所擁護的制度，所講、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層社會所講、所行的。還有原業農工的下層失業流民，卻多半成爲武士。武士是以幫人打仗爲職業的專家。墨翟便出於武士。墨家的創始者墨翟，魯國人，後來做到宋國的大夫，但出身大概是很微賤的。「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大概是個渾名；「翟」是名字。墨家本是賤者，也就不辭用那個渾名自稱他們的學派。墨家是有團體組織的，他們的首領叫作「鉅子」；墨子大約就是第一任「鉅子」。他們不

但是打仗的專家，並且是製造戰爭器械的專家。

但墨家和別的武士不同，他們是有主義的。他們雖以幫人打仗爲生，卻反對侵略的打仗；他們只幫被侵略的弱小國家做防衛的工作。《墨子》裏只講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講。這是他們的「非攻」主義。他們說天下大害，在於人的互爭；天下人都該視人如己，互相幫助，不但利他，而且利己。這是「兼愛」主義。墨家注重功利，凡與國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認爲有價值。國家人民，利在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別的都是無益或有害。他們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對貴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他們主張「節葬」、「短喪」、「節用」、「非樂」，都和儒家相反。他們說他們是以節儉勤苦的夏禹爲法的。他們又相信有上帝和鬼神，能夠賞善罰惡；這也是下層社會的舊信仰。儒家和墨家其實都是守舊的；不過一個守原來上層社會的舊，一個守原來下層社會的舊罷了。

壓根兒反對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於隱士。孔子一生曾遇到好些「避世」之士；他們着實譏評孔子。這些人都是有知識學問的。他們看見時世太亂，難以挽救，便消極起來，對於世事，取一種不聞不問的態度。他們譏評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六〕，費力不討好；他們自己便是知其不可而不爲的，獨善其身的聰明人。後來有個楊朱，也是這一流人，他卻將這種態度理論化了，建立「爲我」的學說。他主張「全生保眞，不以物累形」〔七〕；將天下給他，換他小腿上一根汗毛，他是

不幹的。天下雖大，是外物；一根毛雖小，卻是自己的一部分。所謂「眞」，便是自然。楊朱所說的只是敎人因生命的自然，不加傷害；「避世」便是「全生保眞」的路。不過世事變化無窮，避世未必就能避害，楊朱的敎義到這裏卻窮了。老子、莊子的學說似乎便是從這裏出發，加以擴充的。楊朱實在是道家的先鋒。

老子相傳姓李名耳，楚國隱士。楚人是南方新興的民族，受周文化的影響很少，他們往往有極新的思想。孔子遇到那些隱士，也都在楚國，這似乎不是偶然的。莊子名周，宋國人，他的思想卻接近楚人。老學以爲宇宙間事物的變化，都遵循一定的公律，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這叫作「常」。順應這些公律，便不須避害，自然能避害。所以說，「知常曰明」〔八〕。事物變化的最大公律是物極則反。處世接物，最好先從反面下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九〕「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一〇〕這樣以退爲進，便不至於有什麼衝突了。因爲物極則反，所以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制度，推行起來，結果往往和原來目的相反。「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一一〕治天下本求有所作爲，但這是費力不討好的，不如排除一切制度，順應自然，無爲而爲，不治而治。那就無不爲，無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就是天地萬物所以生的總原理。物得道而生，是道的具體表現。一物所以生的原理叫作「德」，「德」是「得」的意思。所以宇宙萬物都是自然的。這是老學的根本思想，也是莊學的根本思想。但莊學比老學更進一

步。他們主張絕對的自由，絕對的平等。天地萬物，無時不在變化之中，不齊是自然的。一切但須順其自然，所有的分別，所有的標準，都是不必要的。社會上、政治上的制度，硬教不齊的齊起來，只徒然傷害人性罷了。所以聖人是要不得的；儒、墨是「不知恥」的〔三〕。按莊學說，凡天下之物都無不好，凡天下的意見，都無不對；無所謂物我，無所謂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變化，都是可喜的。明白這些個，便能與自然打成一片，成為「無入而不自得」的至人了。老、莊兩派，漢代總稱為道家。

莊學排除是非，是當時「辯者」的影響。「辯者」漢代稱為名家，出於訟師。辯者的一個首領鄭國鄧析，便是春秋末年著名的訟師。另一個首領梁相惠施，也是法律行家。鄧析的本事在對於法令能夠咬文嚼字的取巧，「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三〕語言文字往往是多義的；他能夠分析語言文字的意義，利用來作種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釋。這樣發展了辯者的學說。當時的辯者有惠施和公孫龍兩派。惠施派說，世間各個體的物，各有許多性質；但這些性質，都因比較而顯，所以不是絕對的。各物都有相同之處，也都有相異之處。從同的一方面看，可以說萬物無不相同；從異的一方面看，可以說萬物無不相異。同異都是相對的，這叫作「合同異」〔四〕。

公孫龍，趙人。他這一派不重個體而重根本，他說概念有獨立分離的存在。譬如一塊堅而白的石頭，看的時候只見白，沒有堅；摸的時候只覺堅，不見白。所以白性與堅性兩者是分離的。況且

天下白的東西很多，堅的東西也很多，有白而不堅的，也有堅而不白的。也可見白性與堅性是分離的，白性使物白，堅性使物堅；這些雖然必須因具體的物而見，但實在有着獨立的存在，不過是潛存罷了。這叫作「離堅白」〔五〕。這種討論與一般人感覺和常識相反，所以當時以爲「怪說」「琦辭」，「辯而無用」〔六〕。但這種純理論的興趣，在哲學上是有它的價值的。至於辯者對於社會政治的主張，卻近於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個共通的態度，就是託古立言；他們都假託古聖賢之言以自重。孔子託於文王、周公，墨子託於禹，孟子託於堯、舜，老、莊託於傳說中堯、舜以前的人物；一個比一個古，一個壓一個。不託古而變古的只有法家。法家出於「法術之士」〔七〕，法術之士是以政治爲職業的專家。貴族政治崩壞的結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權。這時候國家的範圍，一天一天擴大，社會的組織也一天一天複雜。人治、禮治，都不適用了。法術之士便創一種新的政治方法幫助當時的君主整理國政，作他們的參謀。這就是法治。當時現實政治和各方面的趨勢是變古——尊君權、禁私學、重富豪。法術之士便擁護這種趨勢，加以理論化。

他們中間有重勢、重術、重法三派，而韓非子集其大成。他本是韓國的貴族，學於荀子。他採取荀學、老學和辯者的理論，創立他的一家言；他說勢、術、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八〕，缺一不可。勢的表現是賞罰，賞罰嚴，才可以推行法和術。因爲人性究竟是惡的。術是君主駕御臣下的技巧。

綜核名實是一個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該能作出某些成績來；君主就可以照着去考核，看他名實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議，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說的作到否。名實相副的賞，否則罰。法是規矩準繩，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夠兼用法、術、勢，就可以一馭萬，以靜制動，無爲而治。諸子都講政治，但都是非職業的，多偏於理想。只有法家的學說，從實際政治出來，切於實用。中國後來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學說支配的。

古代貴族養着禮、樂專家，也養着巫祝、術數專家。禮、樂原來的最大的用處在喪、祭。喪、祭用禮、樂專家，也用巫祝；這兩種人是常在一處的同事。巫祝固然是迷信的；禮、樂裏原先也是有迷信成分的。禮、樂專家後來淪爲儒士；巫祝術數專家便淪爲方士。他們關係極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漢代所稱的陰陽家便出於方士。古代術數注意於所謂「天人之際」，以爲天道人事互相影響。戰國末年有些人更將這種思想推行起來，並加以理論化，使它成爲一貫的學說。這就是陰陽家。

當時陰陽家的首領是齊人騶衍。他研究「陰陽消息」〔二九〕，創爲「五德終始」說〔三〇〕。「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的信仰。騶衍以爲五行是五種天然勢力，所謂「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環。在它當運的時候，天道人事，都受它支配。等到它運盡而衰，爲別一德所勝、所剋，別一德就繼起當運。木勝土，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這樣「終始」不息。歷史上的事變都是這些天

然勢力的表現。每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變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永保的。陰陽家也講仁義名分，卻是受儒家的影響。那時候儒家也在開始受他們的影響，講《周易》，作《易傳》。到了秦、漢間，儒家更幾乎與他們混和爲一；西漢今文家的經學大部便建立在陰陽家的基礎上。後來「古文經學」雖然掃除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論〔三一〕，但陰陽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戰國末期，一般人漸漸感着統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呂不韋便是作這種嘗試的第一個人。他教許多門客合撰了一部《呂氏春秋》。現在所傳的諸子書，大概都是漢人整理編定的；他們大概是將同一學派的各篇編輯起來，題爲某子。所以都不是有系統的著作。《呂氏春秋》卻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書。呂不韋所以編這部書，就是想化零爲整，集合衆長，統一思想。他的基調卻是道家。秦始皇統一天下，李斯爲相，實行統一思想。他燒書，禁天下藏「《詩》、《書》百家語」〔三二〕。但時機到底還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敗了。所以漢初諸子學依然很盛。

到了漢武帝的時候，淮南王劉安仿效呂不韋的故智，教門客編了一部《淮南子》，也以道家爲基調，也想來統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向武帝建議：「六經和孔子的學說以外，各家一概禁止。邪說息了，秩序才可統一，標準才可分明，人民才知道他們應走的路。」〔三三〕武帝採納了他的話。從此，帝王用功名、利祿提倡他們所定的儒學，儒學統於一尊；春秋、戰國時代言論思想極端自由的空氣便消滅了。這時候政治上既開了從來未有的大局面，社會和經濟各方面的變

動也漸漸凝成了新秩序，思想漸歸於統一，也是自然的趨勢。在這新秩序裏，農民還占着大多數，宗法社會還保留着，舊時的禮教與制度一部分還可適用，不過民衆化了罷了。另一方面，要創立政治上、社會上各種新制度，也得參考舊的。這裏便非用儒者不可了。儒者通曉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論化，使那些東西秩然有序，粲然可觀。別家雖也有政治社會學說，卻無具體的辦法，就是有，也不完備，趕不上儒家；在這建設時代，自然不能和儒學爭勝。儒學的獨尊，也是當然的。

〔一〕語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
〔二〕《論語・衛靈公》。
〔三〕《論語・述而》。
〔四〕《論語・顏淵》。
〔五〕《孟子・公孫丑》。
〔六〕《論語・憲問》。
〔七〕《淮南子・氾論訓》。
〔八〕《老子》十六章。
〔九〕《老子》三十六章。

〔一〇〕《老子》四十五章。
〔一一〕《老子》五十七章。
〔一二〕《莊子·在宥》、《天運》。
〔一三〕《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
〔一四〕語見《莊子·秋水》。
〔一五〕《荀子·非十二子篇》。
〔一六〕語見《韓非子·孤憤》。
〔一七〕、〔一八〕《韓非子·定法》。
〔一九〕《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二〇〕《呂氏春秋·有始覽·名類篇》及《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七略》。
〔二一〕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說《春秋》中「多非常異議可怪之論」。
〔二二〕《史記·秦始皇本紀》。
〔二三〕原文見《漢書·董仲舒傳》。

【參考資料】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一篇。

辭賦第十一

屈原是我國歷史裏永被紀念着的一個人。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相傳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競渡據說原來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來是祭他的。現在定五月五日爲詩人節，也是爲了紀念的緣故。他是個忠臣，而且是個纏綿悱惻的忠臣；他是個節士，而且是個浮游塵外、清白不汚的節士。「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一〕，他的身世是一齣悲劇。可是他永生在我們的敬意尤其是我們的同情裏。「原」是他的號，「平」是他的名字。他是楚國的貴族，懷王時候，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現在的祕書。他很有學問，熟悉歷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參贊國事，一方面給懷王見客，辦外交，頭頭是道。懷王很信任他。

當時楚國有親秦、親齊兩派；屈原是親齊派。秦國看見屈原得勢，便派張儀買通了楚國的貴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懷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懷王果然被他們所惑，將屈原放逐到漢北去。張儀便勸懷王和齊國絕交，說秦國答應割地六百里。楚和齊絕了交，張儀卻說答應的是六里。懷王大怒，便舉兵伐秦，不料大敗而歸。這時候想起屈原來了，將他召回，教他出使齊國。親齊派暫時擡頭。但是親秦派不久又得勢。懷王終於讓秦國騙了去，拘留着，就死在那裏。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

屈原更不用說了。可是懷王的兒子頃襄王，卻還是聽親秦派的話，將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國的侵略一天緊似一天；他不忍親見亡國的慘象，又想以一死來感悟頃襄王，便自沈在汨羅江裏。

《楚辭》中《離騷》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時候所作。《離騷》尤其是千古流傳的傑構。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時作的。他感念懷王的信任，卻恨他糊塗，讓一羣小人蒙蔽着，播弄着。而頃襄王又不能覺悟；以致國土日削，國勢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二〕，簡直走投無路；滿腔委屈，千端萬緒的，沒人可以訴說。終於只能告訴自己的一支筆，《離騷》便是這樣寫成的。「離騷」是「別愁」或「遭憂」的意思〔三〕。他是個富於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憤，隨着他的筆奔迸出來，「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四〕，只是一片一段的，沒有篇章可言。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時候，叫「媽呀！」「天哪！」一樣；心裏亂極了，悶極了，叫叫透一口氣，自然是顧不到什麼組織的。

篇中陳說唐、虞、三代的治，桀、紂、羿、澆的亂，善惡因果，歷歷分明；用來諷刺當世，感悟君王。他又用了許多神話裏的譬喻和動植物的譬喻，委曲的表達出他對於懷王的忠愛，對於賢人君子的嚮往，對於羣小的深惡痛疾。他將懷王比作美人，他是「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情辭悽切，纏綿不已。他又將賢臣比作香草。「美人香草」從此便成爲政治的譬喻，影響後來解詩、作詩的人很大。漢

淮南王劉安作《離騷傳》說：「《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五〕「好色而不淫」似乎就指美人香草用作政治的譬喻而言；「怨誹而不亂」是怨而不怒的意思。雖然我們相信《國風》的男女之辭並非政治的譬喻，但斷章取義，淮南王的話卻是《離騷》的確切評語。

《九章》的各篇原是分立的，大約漢人才合在一起，給了「九章」的名字。這裏面有些是屈原初次被放時作的，有些是二次被放時作的。差不多都是「上以諷諫，下以自慰」〔六〕；引史事，用譬喻，也和《離騷》一樣。《離騷》裏記着屈原的世系和生辰，這幾篇裏也記着他放逐的時期和地域；這些都可以算是他的自敍傳。他還作了《九歌》、《天問》、《遠游》、《招魂》等，卻不能算自敍傳，也「不皆是怨君」〔七〕；後世都說成怨君，便埋沒了他的別一面的出世觀了。他其實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學。這可以說是神仙家，出於巫。《離騷》裏說到周游上下四方，駕車的動物，驅使的役夫，都是神話裏的。《遠游》更全是說的周游上下四方的樂處。這種游仙的境界，便是神仙家的理想。

《遠游》開篇說：「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篇中又說：「臨不死之舊鄉」。人間世太狹窄了，也太短促了，人是太不自由自在了。神仙家要無窮大的空間，所以要周行無礙；要無窮久的時間，所以要長生不老。他們要打破現實的、有限的世界，用幻想創出一個無限的世界來。在這無限的世界裏，所有的都是神話裏的人物；有些是美麗的，也有些是醜怪的。《九歌》裏的神大都可愛；

《招魂》裏一半是上下四方的怪物，說得頂怕人的，可是一方面也奇詭可喜。因爲注意空間的擴大，所以對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在在都有興味。《天問》裏許多關於天文地理的疑問，便是這樣來的。一面驚奇天地之廣大，一面也驚奇人事之詭異——善惡因果，往往有不相應的；《天問》裏許多關於歷史的疑問，便從這裏着眼。這卻又是他的入世觀了。

要達到游仙的境界，須要「虛靜以恬愉」、「無爲而自得」，還須導引養生的修鍊工夫，這在《遠游》裏都說了。屈原受莊學的影響極大。這些都是莊學；周行無礙，長生不老，以及神話裏的人物，也都是莊學。但莊學只到「我」與自然打成一片而止，並不想創造一個無限的世界；神仙家似乎比莊學更進了一步。神仙家也受陰陽家的影響；陰陽家原也講天地廣大，講禽獸異物的。陰陽家是齊學。齊國濱海，多有怪誕的思想。屈原常常出使到那裏，所以也沾了齊氣。還有齊人好「隱」。「隱」是「遯詞以隱意，譎譬以指事」〔八〕，是用一種滑稽的態度來諷諫。淳于髡可爲代表。楚人也好「隱」。屈原是楚人，而他的思想又受齊國的影響，他愛用種種政治的譬喻，大約也不免沾點齊氣。但是他不取滑稽的態度，他是用一副悲劇面孔說話的。《詩大序》所謂「譎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倒是合式的說明。至於像《招魂》裏的鋪張排比，也許是縱橫家的風氣。

《離騷》各篇多用「兮」字足句，句逗以參差不齊爲主。「兮」字足句，三百篇中已經不少；句逗參差，也許是「南音」的發展。「南」本是南樂的名稱；三百篇中的二《南》，本該與《風》、《雅》、《頌》分立

為四。二《南》是楚詩，樂調雖已不能知道，但和《風》、《雅》、《頌》必有異處。從二《南》到《離騷》，現在只能看出句逗由短而長、由齊而畸的一個趨勢；這中間變遷的軌跡，我們還能找到一些，總之，決不是突如其來的。這句逗的發展，大概多少有音樂的影響。從《漢書·王褒傳》，可以知道楚辭的誦讀是有特別的調子的〔九〕，這正是音樂的影響。屈原諸作奠定了這種體製，模擬的日見其多。就中最出色的是宋玉，他作了《九辯》。宋玉傳說是屈原的弟子；《九辯》的題材和體製都模擬《離騷》和《九章》，算是代屈原說話，不過沒有屈原那樣激切罷了。宋玉自己可也加上一些新思想；他是第一個描寫「悲秋」的人。還有個景差，據說是《大招》的作者；《大招》是模擬《招魂》的。

到了漢代，模擬《離騷》的更多，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都走着宋玉的路。大概武帝時候最盛，以後就漸漸的差了。漢人稱這種體製為「辭」，又稱為「楚辭」。劉向將這些東西編輯起來，成為《楚辭》一書。東漢王逸給作注，並加進自己的擬作，叫作《楚辭章句》。北宋洪興祖又作《楚辭補注》。《章句》和《補注》合為《楚辭》標準的注本。但漢人又稱《離騷》等為「賦」。《史記·屈原傳》說他「作《懷沙》之賦」；《懷沙》是《九章》之一，本無「賦」名。《傳》尾又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列「屈原賦二十五篇」，就是《離騷》等。大概「辭」是後來的名字，專指屈、宋一類作品；賦雖從辭出，卻是先起的名字，在未採用「辭」的名字以前，本包括「辭」而言。所以渾言稱「賦」，稱「辭賦」，分言稱「辭」和「賦」。後世引述屈、宋諸家，只通稱「楚辭」，沒有單稱

「辭」的。但卻有稱「騷」、「騷體」、「騷賦」的，這自然是《離騷》的影響。

荀子的《賦篇》最早稱「賦」。篇中分詠「禮」、「知」、「雲」、「蠶」、「箴」(針)五件事物，像是謎語；其中頗有諷世的話，可以說是「隱」的支流餘裔。荀子久居齊國的稷下，又在楚國作過縣令，死在那裏。他的好「隱」，也是自然的。《賦篇》總題分詠，自然和後來的賦不同，但是安排客主，問答成篇，卻開了後來賦家的風氣。荀賦和屈辭原來似乎各是各的；這兩體的合一，也許是在賈誼手裏。賈誼是荀卿的再傳弟子，他的境遇卻近於屈原，又久居屈原的故鄉；很可能的，他模擬屈原的體製，卻襲用了荀卿的「賦」的名字。這種賦日漸發展，屈原諸作也便被稱爲「賦」；「辭」的名字許是後來因爲擬作多了，才分化出來，作爲此體的專稱的。辭本是「辯解的言語」的意思，用來稱屈、宋諸家所作，倒也並無不合之處。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分賦爲四類。「雜賦」十二家是總集，可以不論。屈原以下二十家，是言情之作。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已佚，大概近於縱橫家言。就中「陸賈賦三篇」，在賈誼之先；但作品既不可見，是他自題爲賦，還是後人追題，不能知道，只好存疑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大概是敍物明理之作。這三類裏，賈誼以後各家，多少免不了屈原的影響，但已漸有散文化的趨勢；第一類中的司馬相如便是創始的人。——託爲屈原作的《卜居》、《漁父》，通篇散文化，只有幾處用韻，似乎是《莊子》和荀賦的混合體製，又當別論。——散文化更容易鋪張些。「賦」本是「鋪」的意思，鋪張倒

是本來面目。可是鋪張的作用原在諷諫；這時候卻爲鋪張而鋪張，所謂「勸百而諷一」〔一〇〕。當時漢武帝好辭賦，作者極衆，爭相競勝，所以致此。揚雄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一一〕；「詩人之賦」便是前者，「辭人之賦」便是後者。甚至有詼諧嫚戲，毫無主旨的。難怪辭賦家會被人鄙視爲倡優了。

東漢以來，班固作《兩都賦》，「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一二〕；張衡仿他作《二京賦》。晉左思又仿作《三都賦》。這種賦鋪敍歷史地理，近於後世的類書；是陸賈、荀卿兩派的混合，是散文的更進一步。這和屈、賈言情之作，卻迴不相同了。此後賦體漸漸縮短，字句卻整鍊起來。那時期一般詩文都趨向排偶化，賦先是領着走，後來是跟着走；作賦專重寫景述情，務求精巧，不再用來諷諫。這種賦發展到齊、梁、唐初爲極盛，稱爲「俳體」的賦〔一三〕。「俳」是游戲的意思，對諷諫而言；其實這種作品倒也並非滑稽嫚戲之作。唐代古文運動起來，宋代加以發揮光大，詩文不再重排偶而趨向散文化，賦體也變了。像歐陽脩的《秋聲賦》，蘇軾的前、後《赤壁賦》，雖然有韻而全篇散行，排偶極少，比《卜居》、《漁父》更其散文的。這稱爲「文體」的賦〔一四〕。唐、宋兩代，以詩賦取士，規定程式。那種賦定爲八韻，調平仄，講對仗；製題新巧，限韻險難。這只是一種技藝罷了。這稱爲「律賦」。對「律賦」而言，「俳體」和「文體」的賦都是「古賦」；這「古賦」的名字和「古文」的名字差不多，眞正「古」的如屈、宋的辭，漢人的賦，倒是不包括在內的。賦似乎是我國特有的體製；雖然有韻，而就它

全部的發展看，卻與文近些，不算是詩。

〔一〕《楚辭·漁父》。

〔二〕《史記·屈原傳》。

〔三〕王逸《離騷經序》，班固《離騷贊序》。

〔四〕劉熙載《藝概》中《賦概》。

〔五〕同〔二〕。

〔六〕王逸《楚辭章句序》。

〔七〕《朱子語類》一四〇。

〔八〕《文心雕龍·諧讔篇》。

〔九〕《漢書·王褒傳》：「宣帝時……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

〔一〇〕《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引揚雄語。

〔一一〕《法言·吾子篇》。

〔一二〕《兩都賦序》。

〔一三〕、〔一四〕「俳體」，「文體」的名稱，見元祝堯《古賦辨體》。

【參考資料】游國恩《讀騷論微初集》。

詩第十二

漢武帝立樂府，采集代、趙、秦、楚的歌謠和樂譜；教李延年作協律都尉，負責整理那些歌辭和譜子，以備傳習唱奏。當時樂府裏養着各地的樂工好幾百人，大約便是演奏這些樂歌的。歌謠采來以後，他們先審查一下。沒有譜子的，便給製譜；有譜子的，也得看看合式不合式，不合式的地方，便給改動一些。這就是「協律」的工作。歌謠的「本辭」合樂時，有的保存原來的樣子，有的删節，有的加進些複沓的甚至不相干的章句。「協律」以樂爲主，只要合調；歌辭通不通，他們是不大在乎的。他們有時還在歌辭裏夾進些泛聲；「辭」寫大字，「聲」寫小字。但流傳久了，聲辭混雜起來，後世便不容易看懂了。這種種樂歌，後來稱爲「樂府詩」，簡稱就叫「樂府」。北宋太原郭茂倩收集漢樂府以下歷代合樂的和不合樂的歌謠，以及模擬之作，成爲一書，題作《樂府詩集》；他所謂「樂府詩」，範圍是很廣的。就中漢樂府，沈約《宋書·樂志》特稱爲「古辭」。

漢樂府的聲調和當時稱爲「雅樂」的三百篇不同，所采取的是新調子。這種新調子有兩種：「楚聲」和「新聲」。屈原的辭可爲楚聲的代表。漢高祖是楚人，喜歡楚聲；楚聲比雅樂好聽。一般人不用說也是喜歡楚聲的。楚聲便成了風氣。武帝時樂府所采的歌謠，楚以外雖然還有代、趙、秦各地

的，但聲調也許差不很多。那時卻又輸入了新聲；新聲出於西域和北狄的軍歌。李延年多采取這種調子唱奏歌謠，從此大行，楚聲便讓壓下去了。楚聲的句調比較雅樂參差得多，新聲的更比楚聲參差得多。可是楚聲裏也有整齊的五言，楚調曲裏各篇更全然如此，像著名的《白頭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的〔一〕。這就是五言詩的源頭。

漢樂府以敍事爲主。所敍的社會故事和風俗最多，歷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離別之作，格言式的敎訓，人生的慨嘆等等。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歡的題材。用一般人所喜歡的調子，歌詠一般人所喜歡的題材，自然可以風靡一世。哀帝即位，卻以爲這些都是不正經的樂歌，他廢了樂府，裁了多一半樂工——共四百四十一人，——大概都是唱奏各地樂歌的。當時頗想恢復雅樂，但沒人懂得，只好罷了。不過一般人還是愛好那些樂歌。這風氣直到漢末不變。東漢時候，這些樂歌已經普遍化，文人仿作的漸多；就中也有仿作整齊的五言的，像班固《詠史》。但這種五言的擬作極少；而班固那一首也未成熟，鍾嶸在《詩品序》裏評爲「質木無文」，是不錯的。直到漢末，一般文體都走向整鍊一路，試驗這五言體的便多起來；而最高的成就是《文選》所錄的《古詩十九首》。

舊傳最早的五言詩，是《古詩十九首》和蘇武、李陵詩；說「十九首」裏有七首是枚乘作的，和蘇、李詩都出現於漢武帝時代。但據近來的研究，這十九首古詩實在都是漢末的作品；蘇、李詩雖題了

蘇、李的名字，卻不合於他們的事跡，從風格上看，大約也和「十九首」出現在差不多的時候。這十九首古詩並非一人之作，也非一時之作，但都模擬言情的樂府。歌詠的多是相思離別，以及人生無常、當及時行樂的意思；也有對於邪臣當道、賢人放逐、朋友富貴相忘、知音難得等事的慨嘆。這些都算是普遍的題材；但後一類是所謂「失志」之作，自然兼受了《楚辭》的影響。鍾嶸評古詩，「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因爲所詠的幾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說的，卻不是人人口中、筆下所能說的，而又能夠那樣平平說出，曲曲說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對朋友說家常話，並不在字面上用工夫，而自然達意，委婉盡情，合於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二〕。到唐爲止，這是五言詩的標準。

漢獻帝建安年間（西元一九六——二一九），文學極盛，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兩兄弟是文壇的主持人；而曹植更是個大詩家。這時樂府聲調已多失傳，他們卻用樂府舊題，改作新詞；曹丕、曹植兄弟尤其努力在五言體上。他們一班人也作獨立的五言詩。敘游宴，述恩榮，開後來應酬一派。但只求明白誠懇，還是歌謠本色。就中曹植在曹丕作了皇帝之後，頗受猜忌，憂患的情感，時時流露在他的作品裏。詩中有了「我」，所以獨成大家。這時候五言作者既多，開始有了工拙的評論；曹丕說劉楨「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三〕，便是例子。但眞正奠定了五言詩的基礎的是魏代的阮籍，他是第一個用全力作五言詩的人。

阮籍是老、莊和屈原的信徒。他生在魏、晉交替的時代，眼見司馬氏三代專權，欺負曹家，壓迫

名士，一肚皮牢騷只得發洩在酒和詩裏。他作了《詠懷詩》八十多首，述神話，引史事，敍豔情，託於鳥獸草木之名，主旨不外說富貴不能常保，禍患隨時可至，年歲有限，一般人鑽在利祿的圈子裏，不知放懷遠大，眞是可憐之極。他的詩充滿了這種悲憫的情感，「憂思獨傷心」〔四〕一句可以表見。這裏《楚辭》的影響很大；鍾嶸說他「源出於《小雅》」，似乎是皮相之談。本來五言詩自始就脫不了《楚辭》的影響，不過他尤其如此。他還沒有用心琢句；但語既渾括，譬喻又多，旨趣更往往難詳。這許是當時的不得已，卻因此增加了五言詩文人化的程度。他是這樣擴大了詩的範圍，正式成立了抒情的五言詩。

晉代詩漸漸排偶化、典故化。就中左思的《詠史》詩，郭璞的《游仙詩》，也取法《楚辭》，借古人及神仙抒寫自己的懷抱，爲後世所宗。郭璞是東晉初的人。跟着就流行了一派玄言詩。孫綽、許詢是領袖。他們作詩，只是融化老、莊的文句，抽象說理，所以鍾嶸說像「道德論」〔五〕。這種詩千篇一律，沒有「我」；《蘭亭集詩》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個味兒，正是好例。但在這種影響下，卻孕育了陶淵明和謝靈運兩個大詩人。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作了幾回小官，覺得作官不自由，終於回到田園，躬耕自活。他也是老、莊的信徒，從躬耕裏領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個人將田園生活描寫在詩裏。他的躬耕免禍的哲學也許不是新的，可都是他從實生活裏體驗得來的，與口頭的玄理不同，所以親切有味。詩也不妨說理，但須有理趣，他的詩能够作到這一步。他作

詩也只求明白誠懇，不排不典；他的詩是散文化的。這違反了當時的趨勢，所以《詩品》只將他放在中品裏。但他後來確成了千古「隱逸詩人之宗」〔六〕。

謝靈運，宋時作到臨川太守。他是有政治野心的，可是不得志。他不但是老、莊的信徒，也是佛的信徒。他最愛遊山玩水，常常領了一羣人到處探奇訪勝；他的自然的哲學和出世的哲學教他沈溺在山水的清幽裏。他是第一個在詩裏用全力刻劃山水的人；他也可以說是第一個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卻能創造新鮮的句子；不過描寫有時不免太繁重罷了。他在賞玩山水的時候，也常悟到一些隱遁的、超曠的人生哲理；但寫到詩裏，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寫打成一片，像硬裝進去似的。這便不如陶淵明的理趣足，但比那些「道德論」自然高妙得多。陶詩教給人怎樣賞味田園，謝詩教給人怎樣賞味山水；他們都是發現自然的詩人。陶是寫意，謝是工筆。謝詩從製題到造句，無一不是工筆。他開了後世詩人着意描寫的路子；他所以成爲大家，一半也在這裏。

齊武帝永明年間（西元四八三——四九三），「聲律說」大盛。四聲的分別，平仄的性質，雙聲疊韻的作用，都有人指出，讓詩文作家注意。從前只着重句末的韻，這時更着重句中的「和」；「和」就是念起來順口，聽起來順耳。從此詩文都力求諧調，遠於語言的自然。這時的詩，一面講究用典，一面講究聲律，不免側重技巧的毛病。到了梁簡文帝，又加新變，專詠豔情，稱爲「宮體」，詩的境界更狹窄了。這種形式與題材的新變，一直影響到唐初的詩。這時候七言的樂歌漸漸發展。漢、魏文士

仿作樂府，已經有七言的，但只零星偶見，後來舞曲裏常有七言之作。到了宋代，鮑照有《行路難》十八首，人生的感慨頗多，和舞曲描寫聲容的不一樣，影響唐代的李白、杜甫很大。但是梁以來七言的發展，卻還跟着舞曲的路子，不跟着鮑照的路子。這些都是宮體的諧調。

唐代諧調發展，成立了律詩絕句，稱爲近體；不是諧調的詩，稱爲古體；又成立了古、近體的七言詩。古體的五言詩也變了格調。這些都是劃時代的。初唐時候，大體上還繼續着南朝的風氣，輾轉在豔情的圈子裏。但是就在這時候，沈佺期、宋之問奠定了律詩的體製。南朝論聲律，只就一聯兩句說；沈、宋卻能看出諧調有四種句式。兩聯四句才是諧調的單位，可以稱爲週期。這單位後來寫成「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的譜。沈、宋在一首詩裏用兩個週期，就是重疊一次；這樣，聲調便諧和富厚，又不致單調。這就是八句的律詩。律有「聲律」、「法律」兩義。律詩體製短小，組織必須經濟，才能發揮它的效力；「法律」便是這個意思。但沈、宋的成就只在聲律上，「法律」上的進展，還等待後來的作家。

宮體詩漸漸有人覺得膩味了；陳子昂、李白等說這種詩頹靡淺薄，沒有價值。他們不但否定了當時古體詩的題材，也否定了那些詩的形式。他們的五言古體，模擬阮籍的《詠懷》，但是失敗了。一般作家卻只大量的仿作七言的樂府歌行，帶着多少的排偶與諧調。——當時往往就這種歌行裏截取諧調的四句入樂奏唱。——可是李白更撇開了排偶和諧調，作他的七言樂府。李白，蜀人，明皇時

作供奉翰林；觸犯了楊貴妃，不能得志。他是個放浪不羈的人，便辭了職，游山水，喝酒，作詩。他的樂府很多，取材很廣；他是藉着樂府舊題來抒寫自己生活的。他的生活態度是出世的；他作詩也全任自然。人家稱他爲「天上謫仙人」〔七〕；這說明了他的人和他的詩。他的歌行增進了七言詩的價值；但他的絕句更代表着新製。絕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數是諧調。南北朝民歌中，五言四句的諧調最多，影響了唐人；南朝樂府裏也有七言四句的，但不太多。李白和別的詩家紛紛製作，大約因爲當時輸入的西域樂調宜於這體製，作來可供宮庭及貴人家奏唱。絕句最短小，貴含蓄，忌說盡。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覺費力，並且暗示着超遠的境界；他給這新體詩立下了一個標準。

但是眞正繼往開來的詩人是杜甫。他是河南鞏縣人。安祿山陷長安，肅宗在靈武卽位，他從長安逃到靈武，作了「左拾遺」的官，因爲諫救房琯，被放了出去。那時很亂，又是荒年，他輾轉流落到成都，依靠故人嚴武，作到「檢校工部員外郎」，所以後來稱爲杜工部。他在蜀中住了很久。嚴武死後，他避難到湖南，就死在那裏。他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他的素志〔八〕。又身經亂離，親見了民間疾苦。他的詩努力描寫當時的情形，發抒自己的感想。唐代以詩取士，詩原是應試的玩意兒；詩又是供給樂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宮庭及貴人的玩意兒。李白用來抒寫自己的生活，杜甫用來抒寫那個大時代，詩的領域擴大了，價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寫「民間的實在痛苦，社會的實在問題，國家的實在狀況，人生的實在希望與恐懼」〔九〕，更給詩開闢了新世界。

他不大仿作樂府，可是他描寫社會生活正是樂府的精神；他的寫實的態度也是從樂府來的。他常在詩裏發議論，並且引證經史百家；但這些議論和典故都是通過了他的滿腔熱情奔迸出來的，所以還是詩。他這樣將詩歷史化和散文化；他這樣給詩創造了新語言。古體的七言詩到他手裏正式成立；古體的五言詩到他手裏變了格調。從此「溫柔敦厚」之外，又開了「沈着痛快」一派〔10〕。五言律詩，王維、孟浩然已經不用來寫豔情而用來寫山水；杜甫卻更用來表現廣大的實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詩，也是如此。他作律詩很用心在組織上。他的五言律詩最多，差不多窮盡了這體製的變化。他的絕句直述胸懷，嫌沒有餘味；但那些描寫片段生活印象的，卻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賞自然，晚年所作，頗有清新的刻劃的句子。他又是個有諧趣的人，他的詩往往透着滑稽的風味。但這種滑稽的風味和他的嚴肅的態度調和得那樣恰到好處，一點也不至於減損他和他的詩的身分。

杜甫的影響直貫到兩宋時代；沒有一個詩人不直接、間接學他的，沒有一個詩人不發揚光大他的。古文家韓愈，跟着他將詩進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險韻，鋪張描寫，像漢賦似的。他的詩逞才使氣，不怕說盡，是「沈着痛快」的詩。後來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沈了一番；他們卻繼承杜甫寫實的表現人生的態度。他們開始將這種態度理論化；主張詩要「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洩導人情」，「嘲風雪，弄花草」是沒有意義的〔11〕。他們反對雕琢字句，主張誠實自然。他們將自己

的詩分爲「諷諭」的和「非諷諭」的兩類。他們的詩卻容易懂，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話，所以雅俗共賞，一時風行。當時最流傳的是他們新創的諧調的七言敍事詩，所謂「長慶體」的，還有社會問題詩。

晚唐詩向來推李商隱、杜牧爲大家。李一生輾轉在黨爭的影響中。他和溫庭筠並稱；他們的詩又走回豔情一路。他們集中力量在律詩上，用典精巧，對偶整切。但李學杜、韓，器局較大；他的豔情詩有些實在是政治的譬喻，實在是感時傷事之作。所以地位在溫之上。杜牧作了些小官兒，放蕩不羈，而很負盛名，人家稱爲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詩詞采華豔，卻富有縱橫氣，又和溫、李不同。然而都可以歸爲綺麗一派。這時候別的詩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詩上。一些人專學張籍、賈島的五言律，這兩家都重苦吟，總捉摸着將平常的題材寫得出奇，所以思深語精，別出蹊徑。但是這種詩寫景有時不免瑣屑，寫情有時不免偏僻，便覺不大方。這是僻澀一派。另一派出於元、白，作詩如說話，嬉笑怒駡，兼而有之，又時時雜用俗語。這是粗豪一派〔三〕。這些其實都是杜甫的鱗爪，也都是宋詩的先驅；綺麗一派只影響宋初的詩，僻澀、粗豪兩派卻影響了宋一代的詩。

宋初的詩專學李商隱；末流只知道典故對偶，眞成了詩玩意兒。王禹偁獨學杜甫，開了新風氣。歐陽脩、梅堯臣接着發現了韓愈，起始了宋詩的散文化。歐陽脩曾遭貶謫；他是古文家。梅堯臣一生不得志。歐詩雖學韓，卻平易疏暢，沒有奇險的地方。梅詩幽深淡遠，歐評他「譬如妖韶女，

老自有餘態」,「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三〕。宋詩散文化,到蘇軾而極。他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因爲攻擊王安石的新法,一輩子升沈在黨爭中。他將禪理大量的放進詩裏,開了一個新境界。他的詩氣象洪闊,鋪敍宛轉,又長於譬喻,眞到用筆如舌的地步;但不免「掉書袋」的毛病。他們下出了一個黃庭堅,是第一個有意的講究詩的技巧的人。他是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人,也因黨爭的影響,屢遭貶謫,終於死在貶所。他作詩着重鍛鍊,着重句律;句律就是篇章字句的組織與變化。他開了江西詩派。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說他「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他不但講究句律,並且講究運用經史以至奇書異聞,來增富他的詩。這些都是杜甫傳統的發揚光大。王安石已經提倡杜詩,但到黃庭堅,這風氣才昌盛。黃還是繼續將詩散文化,但組織得更經濟些;他還是在創造那闊大的氣象,但要使它更富厚些。他所求的是新變。他研究歷代詩的利病,將作詩的規矩得失,指示給後學,教他們知道路子,自己去創造,展到變化不測的地步。所以能够獨開一派。他不但創新,還主張點化陳腐以爲新;創新需要大才,點化陳腐,中才都可勉力作去。他不但能够「以故爲新」,並且能够「以俗爲雅」。其實宋詩都可以說是如此,不過他開始有意的運用這兩個原則罷了。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組織固然更精密,音調也諧中有拗,使每個字都斬絕的站在紙面上,不至於隨口滑過去。

南宋的三大詩家都是從江西派變化出來的。楊萬里爲人有氣節；他的詩常常變格調。寫景最工；新鮮活潑的譬喻，層見疊出，而且不碎不僻，能從大處下手。寫人的情意，也能鋪敍纖悉，曲盡其妙；所謂「筆端有口，句中有眼」〔四〕。他作詩只是自然流出，可是一句一轉，一轉一意；所以只覺得熟，不覺得滑。不過就全詩而論，範圍究竟狹窄些。范成大是個達官。他是個自然詩人，清新中兼有拗峭。陸游是個愛君愛國的詩人。吳之振《宋詩鈔》說他學杜而能得杜的心。他的詩有兩種：一種是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一種是流連光景，清新刻露之作。他作詩也重眞率，輕「藻繪」，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五〕。他活到八十五歲，詩有萬首；最熟於詩律，七言律尤爲擅長。——宋人的七言律實在比唐人進步。

向來論詩的對於唐以前的五言古詩，大概推尊，以爲是詩的正宗；唐以後的五言古詩，卻說是變格，價值差些，可還是詩。詩以「吟詠情性」〔六〕，該是「溫柔敦厚」的。按這個界說，齊、梁、陳、隋的五言古詩其實也不够格，因爲題材太小，聲調太軟，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體成立於唐代，卻只能以唐代爲正宗。宋詩議論多，又一味刻劃，多用俗語，拗折聲調。他們說這只是押韻的文，不是詩。但是推尊宋詩的卻以爲天下事物窮則變，變則通，詩也是如此。變是創新，是增擴，也就是進步。若不容許變，那就只有模擬，甚至只有鈔襲；那種「優孟衣冠」，甚至土偶木人，又有什麼意義可言！即如模擬所謂盛唐詩的，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聲調；要是再不變，詩道豈不眞

窮了？所以詩的界說應該隨時擴展；「吟詠情性」、「溫柔敦厚」諸語，也當因歷代的詩辭而調整原語的意義。詩畢竟是詩，無論如何的擴展與調整，總不會與文混合爲一的。詩體正變說起於宋代，唐、宋分界說起於明代；其實，歷代詩各有勝場，也各有短處，只要知道新、變，便是進步，這些爭論是都不成問題的。

〔一〕以上參用朱希祖《漢三大樂府調辨》（《清華學報》四卷二期）說。

〔二〕「詩教」見《禮記·經解》。

〔三〕《與吳質書》。

〔四〕《詠懷》第一首

〔五〕《詩品序》。

〔六〕《詩品》論陶語。

〔七〕原是賀知章語，見《舊唐書·李白傳》。

〔八〕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九〕胡適《白話文學史》。

〔10〕《滄浪詩話》說詩的「大概有二：曰優游不迫，曰沈着痛快」。「優游不迫」就是「溫柔敦厚」。

〔11〕白居易《與元九（稹）書》。

〔一二〕以上參用胡小石《中國文學史》(上海人文社版)說。

〔一三〕《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一四〕周必大跋楊誠齋詩語。

〔一五〕陸游《文章詩》。

〔一六〕《詩大序》。

文第十三

現存的中國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辭。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節的。後來《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與年月的順序編纂起來，比卜辭顯得整齊些罷了。便是這樣，王安石還說《魯春秋》是「斷爛朝報」〔一〕。所謂「斷」，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的意思。卜辭的簡略大概是工具的緣故，在脆而狹的甲骨上用刀筆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辭和《魯春秋》似乎沒有能够跳出卜辭的氛圍去，雖然寫在竹木簡上，自由比較多，卻依然只跟着卜辭走。《尚書》就不同了。《虞書》、《夏書》大概是後人追記，而且大部分是戰國末年的追記，可以不論；但那幾篇《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也總在商、周之間。那不但有章節，並且成了篇，足以代表當時史的發展，就是敍述文的發展。而議論文也在這裏面見了源頭。卜辭是「辭」，《尚書》裏大部分也是「辭」。這些都是官文書。

記言、記事的辭之外，還有訟辭。打官司的時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叫作「辭」；辭原是「訟」的意思〔二〕，是辯解的言語。這種辭關係兩造的利害很大，兩造都得用心陳說；審判官也得用心聽，他得公平的聽兩面兒的。這種辭也兼有敍述和議論；兩造自己辦不了，可以請教訟師。這至少是周

代的情形。春秋時候，列國交際頻繁，外交的言語關係國體和國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說更需愼重了。這也稱爲「辭」，又稱爲「命」，又合稱爲「辭命」或「辭令」。鄭子產便是個善於辭命的人。鄭是個小國，他辦外交，卻能教大國折服，便靠他的辭命。他的辭引古爲證，宛轉而有理，他的態度卻堅強不屈。孔子贊美他的辭，更贊美他的「愼辭」〔三〕。孔子說當時鄭國的辭命，子產先教裨諶創意起草，交給世叔審查，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兒他再加潤色〔四〕。他的確是很愼重的。辭命得「順」，就是宛轉而有理；還得「文」，就是引古爲證。

孔子很注意辭命，他覺得這不是件易事，所以自己謙虛的說是辦不了。但教學生卻有這一科；他稱贊宰我、子貢，擅長言語〔五〕，「言語」就是「辭命」。那時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辭多指說出的言語，命多指寫出的言語；但也可以兼指。各國派使臣，有時只口頭指示策略，有時預備下稿子讓他帶着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總還得隨機應變，自己想說話；因爲許多情形是沒法預料的。——當時言語，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當時的京話或官話。孔子講學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魯語〔六〕。卜、《尚書》和辭命，大概都是歷代的雅言。訟辭也許不同些。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寫出，而寫出的和說出的雅言，大體上是一致的。孔子說「辭」只要「達」就成〔七〕。辭是辭命，「達」是明白，辭多了像背書，少了說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八〕辭命的重要，代表議論文的發展。

戰國時代，游說之風大盛。游士立談可以取卿相，所以最重說辭。他們的說辭卻不像春秋的辭命那樣從容宛轉了。他們鋪張局勢，滔滔不絕，眞像背書似的；他們的話，像天花亂墜，有時誇飾，有時詭曲，不問是非，只圖激動人主的心。那時最重辯。墨子是第一個注意辯論方法的人，他主張「言必有三表」。「三表」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廢(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九〕；便是三個標準。不過他究竟是個注重功利的人，不大喜歡文飾，「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說他「言多不辯」〔一〇〕。——後來有了專以辯論爲事的「辯者」，墨家這才更發展了他們的辯論方法，所謂《墨經》便成於那班墨家的手裏。——儒家的孟、荀也重辯。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一一〕荀子也說：「君子必辯。」〔一二〕這些都是游士的影響。但道家的老、莊，法家的韓非，卻不重辯。《老子》裏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一三〕，「老學」所重的是自然。《莊子》裏說：「大辯不言」〔一四〕，「莊學」所要的是神祕。韓非也注重功利，主張以法禁辯，說辯「生於上之不明」〔一五〕。後來儒家作《易·文言傳》，也道：「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評着游士好辯的風氣，恐怕還在暗暗的批評着後來稱爲名家的「辯者」呢。《文言傳》舊傳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這幾句話和「辭達」論倒是合拍的。

孔子開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從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種私家著作是《論語》，卻不是孔子自作而是他的弟子們記的他的說話。諸子書大概多是弟子們及後學者所記，自作的極少。《論語》

以記言爲主，所記的多是很簡單的。孔子主張「愼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們說話，大概是很質直的，弟子們體念他的意思，也只簡單的記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鋪排得多。《墨子》大約也是弟子們所記。《孟子》據說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孫丑、萬章等編定的，可也是弟子們記言的體製。那時是個「好辯」的時代。墨子雖不好辯，卻也脫不了時代影響。孟子本是個好辯的人。記言體製的恢張，也是自然的趨勢。這種記言是直接的對話。由對話而發展爲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老子》可爲代表；後來的《墨經》，《韓非子·儲說》的經，《管子》的《經言》，都是這體製。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莊子·齊物論》等篇以及《荀子》、《韓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羣經諸子書裏常常夾着一些韻句，大概是爲了強調。後世的文也偶爾有這種例子。中國的有韻文和無韻文的界限，是並不怎樣嚴格的。

還有一種「寓言」，藉着神話或歷史故事來抒論。《莊子》多用神話，《韓非子》多用歷史故事，《莊子》有些神仙家言，《韓非子》是繼承《莊子》的寓言而加以變化。戰國游士的說辭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風氣，這開了後來辭賦的路。論是進步的體製，但還只以篇爲單位，「書」的觀念還沒有。直到《呂氏春秋》，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統的書〔六〕。這部書成於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三十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數，六是秦代的聖數，這些數目是本書的間架，是外在的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漢代劉安主編《淮南子》，才按照邏輯的秩序，結構就嚴密多了。自從有了

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過越多，流傳也越過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後世大體採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還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七〕。但是齊語只在《春秋公羊傳》裏留下一些，楚語只在屈原的「辭」裏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

伴隨着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裏《春秋左氏傳》是一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國記言的《國語》，《左傳》從它裏面取材很多。那是鋪排的記言，一面以《尙書》爲範本，一面讓當時記言體的、恢張的趨勢推動着，成了這部書。其中自然免不了記事的文字；《左傳》便從這裏出發，將那恢張的趨勢表現在記事文裏。那時游士的說辭也有人分國記載，也是鋪排的記言，後來成爲《戰國策》那部書。《左傳》是說明《春秋》的，是中國第一部編年史。它最長於戰爭的記載；它能够將千頭萬緒的戰事敍得層次分明，它的描寫更是栩栩如生。它的記言也異曲同工，不過不算獨創罷了。它可還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書；它的順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編年並不是自覺的系統，而且「斷如復斷」，也不成一部「書」。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統的史書。他創造了「紀傳」的體製。他的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五十多萬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數，三十取《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表示那些「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

上」〔八〕；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爲列傳是記載人物的。這也是用數目的哲學作系統，並非邏輯的秩序，和《呂氏春秋》一樣。這部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剪裁與組織見長。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貢獻，還在描寫人物。左氏只是描寫事，司馬遷進一步描寫人；寫人更需要精細的觀察和選擇，比較的更難些。班彪論《史記》「善敍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九〕，這是說司馬遷行文委曲自然。他寫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盡；他的悲憤的襟懷，常流露在字裏行間。明代茅坤稱他「出《風》入《騷》」〔一〇〕，是不錯的。

漢武帝時候，盛行辭賦；後世說「楚辭漢賦」，眞的，漢代簡直可以說是賦的時代。所有的作家幾乎都是賦的作家。賦既有這樣壓倒的勢力，一切的文體，自然都受它的影響。賦的特色是鋪張、排偶、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都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裏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的賦，雖用排偶，卻還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典故也越用越多。西漢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兩個字的。東漢的句子，便長起來，最短的是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以完一意。所謂「駢文」或「駢體」，便這樣開始發展。駢體出於辭賦，夾帶着不少的抒情的成分；而句讀整齊，對偶工麗，可以悅目，聲調和諧，又可悅耳，也都助人情韻。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廢的體製。

梁昭明太子在《文選》裏第一次提出「文」的標準，可以說是駢體發展的指路牌。他不選經、子、

史，也不選「辭」。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不算「文」；子「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辭」是子史的支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選的只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是「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的，他才選在他的書裏。這種作品好像各種樂器，「並爲入耳之娛」，好像各種繡衣，「俱爲悅目之玩」。這是「文」，和經、子、史及「辭」的作用不同，性質自異。後來梁元帝又說：「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三〕這是說，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這種「文」大體上專指詩賦和駢體而言；但應用的駢體如章奏等，卻不算在裏頭。漢代本已稱詩賦爲「文」，而以「文辭」或「文章」稱記言、記事之作。駢體原也是些記言、記事之作，這時候卻被提出一部分來，與詩賦並列在「文」的尊稱之下，眞是「附庸蔚爲大國」了。

這時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佛典的翻譯，一是羣經的義疏。佛典翻譯從前不是太直，便是太華；太直的不好懂，太華的簡直是魏、晉人講老、莊之學的文字，不見新義。這些譯筆都不能作到「達」的地步。東晉時候，後秦主姚興聘龜茲僧鳩摩羅什爲國師，主持譯事。他兼通華語及西域語，所譯諸書，一面曲從華語，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譯筆可也不完全華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語趣」〔三〕；他介紹的「西域之語趣」是華語所能容納的，所以覺得「天然」。新文體這樣成立在他的手裏。但他的翻譯雖能「達」，卻還不能盡「信」；他對原文是不太忠實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

確，才能「信」、「達」兼盡，集佛典翻譯的大成。這種新文體一面增擴了國語的詞彙，也增擴了國語的句式。詞彙的增擴，影響最大而易見，如現在口語裏還用着的「因果」、「懺悔」、「剎那」等詞，便都是佛典的譯語。句式的增擴，直接的影響比較小些，但像文言裏常用的「所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譯語。另一面，這種文體是「組織的，解剖的」〔三〕。這直接影響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學〔四〕，間接影響了一般解經和講學的人。

演釋古人的話的有「故」、「解」、「傳」、「注」等。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叫作「故」。演釋原來辭意，叫作「解」。但後來解釋字句，也叫作「故」或「解」。「傳」，轉也，兼有「故」、「解」的各種意義。如《春秋左氏傳》補充故事，兼闡明《春秋》辭意。《公羊傳》、《穀梁傳》只闡明《春秋》辭意——用的是問答式的記言。《易傳》推演卦爻辭的意旨，也是鋪排的記言。《詩毛氏傳》解釋字句，並給每篇詩作小序，闡明辭意。「注」原只解釋字句，但後來也有推演辭意、補充故事的。用故事來說明或補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釋辭意，大抵明白易曉。《春秋》三傳和《詩毛氏傳》闡明辭意，卻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所以支離破碎，無中生有。注字句的本不該有大出入，但因對於辭意的見解不同，去取字義，也有各別的標準。注辭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實在是發揮老、莊的哲學；郭象注《莊子》，更是藉了《莊子》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南北朝人作羣經「義疏」，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響，一面也是翻譯文體的間接影響。這稱爲「義疏」之學。

漢、晉人作羣經的注，注文簡括，時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曉。南北朝人給這些注作解釋，也是補充材料，或推演辭意。「義疏」便是這個。無論補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義；這種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經文更精細一層。這種精細的确不算是破壞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譯的影響。就中推演辭意的有些也只發揮老、莊之學，雖然也是無中生有，卻能自成片段，便比漢人的支離破碎進步。這是王弼等人的衣鉢，也是魏、晉以來哲學發展的表現。這是又一種新文體的分化。到了唐修《五經正義》，削去玄談，力求切實，只以疏明注義爲重。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極詳。宋人所謂「注疏」的文體，便成立在這時代。後來清代的精詳的考證文，就是從這裏變化出來的。

不過佛典只是佛典，義疏只是義疏，當時沒有人將這些當作「文」的。「文」只用來稱「沈思翰藻」的作品。但「沈思翰藻」的「文」，漸漸有人嫌「浮」「豔」了。「浮」是不直說，不簡截說的意思。「豔」正是隋代李諤《上文帝書》中所指斥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那時北周的蘇綽是首先提倡復古的人，李諤等紛紛響應。但是他們都沒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倣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陳子昂提倡改革文體，和者尙少。到了中葉，才有一班人「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作之旨」[三]，而元結、獨孤及、梁肅最著。他們作文，主於敎化，力避排偶，辭取樸拙。但敎化的觀念，廣泛難以動衆，而關於文體，他們不曾積極宣揚，因此未成宗派。開宗派的是韓愈。

韓愈，鄧州南陽(今河南南陽)人。唐憲宗時，他作刑部侍郎，因諫迎佛骨被貶；後來官至吏部

侍郎，所以稱爲韓吏部。他很稱贊陳子昂、元結復古的功勞，又曾請教過梁肅、獨孤及。他的脾氣很壞，但提攜後進，最是熱腸。當時人不願爲師，以避標榜之名；他卻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願作章句師，他說師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二六〕。他實在是以文辭爲教的創始者。他所謂「傳道」，便是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謂「解惑」，便是排斥佛、老。他是以繼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的距楊、墨一樣。當時佛、老的勢力極大，他敢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觸犯了皇帝〔二七〕。這自然足以驚動一世。他並沒有傳了什麼新的道，卻指示了道統，給宋儒開了先路。他的重要的貢獻，還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說他作文取法《尚書》、《春秋》、《左傳》、《周易》、《詩經》以及《莊子》、《楚辭》、《史記》、揚雄、司馬相如等。《文選》所不收的經、子、史，他都排進「文」裏去。這是一個大改革、大解放。他這樣建立起文統來。但他並不死板的復古，而以變古爲復古。他說：「惟古於辭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二八〕，又說：「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二九〕；他是在創造新語。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換去排偶的句子，句逗總弄得參參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標準，那就是「氣」。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三〇〕；「氣」就是自然的語氣，也就是自然的音節。他還不能跳出那定體「雅言」的圈子而采用當時的白話；但有意的將白話的自然音節引到文裏去，他是第一個人。在這一點上，所謂「古文」也是不「古」的；不過他提出「語氣流暢」(氣盛)這個標準，卻給後進指點了一條明路。他的

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淑的，都往這條路上走，文體於是乎大變。這實在是新體的「古文」，宋代又稱爲「散文」——算成立在他的手裏。

柳宗元與韓愈，宋代並稱，他們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書》、《詩》、《禮》、《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也將經、子、史排在「文」裏，和韓的文統大同小異。但他不敢爲師，「摧陷廓清」的勞績，比韓差得多。他的學問見解，卻在韓之上，並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潔，最工遊記；他創造了描寫景物的新語。韓愈的門下有難、易兩派。愛易派主張新而不失自然，李翺是代表。愛難派主張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當時愛難派的流傳盛些。他們矯枉過正，語艱意奧，扭曲了自然的語氣、自然的音節，僻澀詭異，不易讀誦。所以唐末宋初，駢體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駢體文和僻澀的古文先後盤踞着宋初的文壇。直到歐陽脩出來，才又回到韓愈與李翺，走上平正通達的古文的路。

韓愈抗顏爲人師而提倡古文，形勢比較難；歐陽脩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勢比較容易。明代所稱唐宋八大家〔三〕，韓、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歐陽脩爲首，以下是曾鞏、王安石、蘇洵和他的兒子蘇軾、蘇轍。曾鞏、蘇軾是歐陽脩的門生，別的三個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眞是當時文壇的盟主。韓愈雖然開了宗派，卻不曾有意的立宗派；歐、蘇是有意的立宗派。他們雖也提倡道，但只促進了並且擴大了古文的發展。歐文主自然。他所作紆徐曲折，而能條達疎暢，無艱難勞苦之態；最以言

情見長，評者說是從《史記》脫化而出。曾學問有根柢，他的文確實而謹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勝人。三蘇長於議論，得力於《戰國策》、《孟子》；而蘇軾才氣縱橫，並得力於《莊子》。他說他的文「隨物賦形」，「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三〕；又說他意到筆隨，無不盡之處〔三〕。這眞是自然的極致了。他的文，學的人最多。南宋有「蘇文熟，秀才足」的俗諺〔四〕，可見影響之大。

歐、蘇以後，古文成了正宗。辭賦雖還算在古文裏頭，可是從辭賦出來的駢體卻只拿來作應用文了。駢體聲調鏗鏘，便於宣讀，又可鋪張詞藻不着邊際，便於酬酢，作應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傳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死去。但中間卻經過了散文化。自從唐代中葉的陸贄開始。他的奏議切實懇摯，絕不浮誇，而且明白曉暢，用筆如舌。唐末駢體的應用文專稱「四六」，卻更趨雕琢；宋初還是如此。轉移風氣的也是歐陽脩。他多用虛字和長句，使駢體稍稍近於語氣之自然。嗣後羣起仿效，散文化的駢文竟成了定體了。這也是古文運動的大收穫。

唐代又有兩種新文體發展。一是語錄，一是「傳奇」，都是佛家的影響。語錄起於禪宗。禪宗是革命的宗派，他們只說法而不著書。他們大膽的將師父們的話參用當時的口語記下來。後來稱這種體製爲語錄。他們不但用這種體製紀錄演講，還用來通信和討論。這是新的記言的體製；裏面夾雜着「雅言」和譯語。宋儒講學，也採用這種記言的體製，不過不大夾雜譯語。宋儒的影響究竟比禪宗大得多，語錄體從此便成立了，盛行了。傳奇是有結構的小說。從前只有雜錄或瑣記的小說，

有結構的從傳奇起頭。傳奇記述豔情，也記述神怪，但將神怪人情化。這裏面描寫的人生，並非全是設想，大抵還是以親切的觀察作底子。這開了後來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俠等小說的先路。它的來源一方面是俳諧的辭賦，一方面是翻譯的佛典故事；佛典裏長短的寓言所給予的暗示最多。當時文士作傳奇，原來只是向科舉的主考官介紹自己的一種門路。當時應舉的人在考試之前，得請達官將自己姓名介紹給主考官；自己再將文章呈給主考官看。先呈正經文章，過些時再呈雜文如傳奇等，傳奇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人又愛看，是科舉的很好媒介。這樣，作者便日見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話本」。這是白話小說的老祖宗。話本是「說話」的底本；「說話」略同後來的「說書」，也是佛家的影響。唐代佛家向民衆宣講佛典故事，連說帶唱，本子夾雜「雅言」和口語，叫作「變文」；「變文」後來也有說唱歷史故事及社會故事的。「變文」便是「說話」的源頭；「說話」裏也還有演說佛典這一派。「說話」是平民的藝術；宋仁宗很愛聽，以後便變爲專業，大流行起來了。這裏面有說歷史故事的，有說神怪故事的，有說社會故事的。「說話」漸漸發展，本來由一個或幾個同類而不相關聯的短故事，引出一個同類而不相關聯的長故事的，後來卻能將許多關聯的故事組織起來，分爲「章回」了。這是體製上一個大進步。

話本留存到現在的已經很少，但還足以見出後世的幾部小說名著，如元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明施耐菴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都是從話本演化出來的；不過這些已是文人的作

品，而不是話本了。就中《三國志演義》還夾雜着「雅言」，《水滸傳》和《西遊記》便都是白話了。這裏除《西遊記》以設想爲主外，別的都可以說是寫實的。這種寫實的作風在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裏得着充分的發展。《三國志演義》等書裏的故事雖然是關聯的，卻不是聯貫的。到了《紅樓夢》，組織才更嚴密了；全書只是一個家庭的故事。雖然包羅萬有，而能「一以貫之」。這不但是章回小說，而且是近代所謂「長篇小說」了。白話小說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鏤心刻骨的去簡鍊揣摩，所以極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這種體製，中間有八排文字互爲對偶，所以有此稱。——自然也有變化，不過「八股」可以說是一般的標準。——又稱爲「四書文」，因爲考試裏最重要的文字，題目都出在四書裏。又稱爲「制藝」，因爲這是朝廷法定的體製。又稱爲「時文」，是對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經典辭意的；它的來源，往遠處說，可以說是南北朝義疏之學，往近處說，便是宋、元兩代的經義。但它的格律，卻是從「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經義爲考試科目，是王安石的創制；當時限用他的羣經「新義」，用別說的不錄，元代考試，限於四書，規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經義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規定的標準，元、明兩代大體上遞相承襲。但明代有兩種大變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語氣。因爲排偶，所以講究聲調。因爲代古人語氣，便要描寫口吻；聖賢要像聖賢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這是八股文的僅有的本領，大概是小說和戲曲的不自覺的影響。八股

文格律定得那樣嚴，所以得簡鍊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聲調之外，八股文裏是空洞無物的。而因爲那樣難，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濫調，那眞是「每下愈況」了。這原是君主牢籠士人的玩藝兒，但它的影響極大；明、清兩代的古文大家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葉，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響。詩文作家自己標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詩派，在後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勢力，綿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國初期還殘留着；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開山祖師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當時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話〔三五〕，所以稱爲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歸有光的文章，歸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個提倡「義法」的人。他論古文以爲六經和《論語》、《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義法最精的是《左傳》、《史記》，其次是《公羊傳》、《穀梁傳》、《國語》、《國策》，兩漢的書和疏，唐宋八家文〔三六〕——再下怕就要數到歸有光了。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統論。「義」是用意，是層次；「法」是求雅、求潔的條目。雅是純正不雜，如不可用語錄中語、駢文中麗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俊語、《南史》《北史》中佻巧語以及佛家語。後來姚鼐又加上注疏語和尺牘語。潔是簡省字句。這些「法」其實都是從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來的。方苞論文，也講「闡道」〔三七〕；他是信程、朱之學的，不過所入不深罷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縛太甚，他學得的只是《史記》、歐、曾、歸的一部分，只是嚴整而不雄渾，又缺

乏情韻。姚鼐所取法的還是這幾家，雖然也不雄渾，卻能「迂迴蕩漾，餘味曲包」〔三八〕，這是他的新境界。《史記》本多含情不盡之處，所謂遠神的。歐文頗得此味，歸更向這方面發展——最善述哀，姚簡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師劉大櫆指出作文當講究音節，音節是神氣的跡象，可以從字句下手〔三九〕。姚鼐得了這點啓示，便從音節上用力，去求得那綿邈的情韻。他的文眞是所謂「陰與柔之美」〔四〇〕。他最主張誦讀，又最講究虛助字，都是爲此。但這分明是八股文講究聲調的轉變。劉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進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當時漢學家提倡考據，不免繁瑣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張義理、考據、詞章三端相濟，偏廢的就是「陋」儒〔四一〕。但他的義理不深，考據多誤，所有的還只是詞章本領。他選了《古文辭類纂》；序裏雖提到「道」，書卻只成爲古文的典範。書中也不選經、子、史；經也因爲太尊，子、史卻因爲太多。書中也選辭賦。這部選本是桐城派的經典，學文的必由於此，也只須由於此。方苞評歸有光的文庶幾「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四二〕。曾國藩評姚鼐也說一樣的話，其實桐城派都是如此。攻擊桐城派的人說他們空疏浮淺，說他們範圍太窄，全不錯；但他們組織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殺的。

姚鼐以後，桐城派因爲路太窄，漸有中衰之勢。這時候儀徵阮元提倡駢文正統論。他以《文選序》和南北朝「文」「筆」的分別爲根據，又扯上傳爲孔子作的《易·文言傳》。他說用韻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筆，或是「直言」的「言」，「論難」的「語」〔四三〕。古文以立意、記事爲宗，是子、史正流，終究

與文章有別。《文言傳》多韻語、偶語，所以孔子才題爲「文」言。阮元所謂韻，兼指句末的韻與句中的「和」而言(四四)。原來南北朝所謂「文」、「筆」，本有兩義：「有韻爲文，無韻爲筆」，是當時的常言(四五)。——韻只是句末韻。阮元根據此語，卻將「和」也算是韻，這是曲解一。梁元帝說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是文，駢體的章奏與散體的著述都是筆(四六)。阮元卻只以散體爲筆，這是曲解二。至於《文言傳》，固然稱「文」，卻也稱「言」，況且也非孔子所作——這更是傅會了。他的主張，雖然也有一些響應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國藩出來，中興了桐城派。那時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漢學、宋學的門戶之爭，卻越來越利害，各走偏鋒。曾國藩爲補偏救弊起見，便就姚鼐義理、考據、詞章三端相濟之說加以發揚光大。他反對當時一般考證文的蕪雜瑣碎，也反對當時崇道貶文的議論，以爲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見道多寡，也當以他們的文爲衡量的標準。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卻能以深博的學問、弘通的見識、雄直的氣勢，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眞回到韓愈，而且勝過韓愈。他選了《經史百家雜鈔》，將經、史、子也收入選本裏，讓學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統的一貫，眼光便比姚鼐遠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極衆，眞是登高一呼，羣山四應。這樣延長了桐城派的壽命幾十年。

但「古文不宜說理」(四七)，從韓愈就如此。曾國藩的力量究竟也沒有能够補救這個缺陷於一千年之後。而海通以來，世變日亟，事理的繁複，有些決非古文所能表現。因此聰明才智之士漸漸打

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啓超先生的「新文體」可算登峯造極。他的文「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而「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四八〕但這種「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國的變化實在太快，這種「新文體」又不夠用了。胡適之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這才起來提倡白話文，經過五四運動，白話文是暢行了。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這時代是第二回翻譯的大時代。白話文不但不全跟着國語的口語走，也不全跟着傳統的白話走，卻有意的跟着翻譯的白話走。這是白話文的現代化，也就是國語的現代化。中國一切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語言的現代化也是自然的趨勢，並不足怪的。

〔一〕宋周麟之跋孫覺《春秋經解》引王語。「朝報」相當於現在的政府公報。
〔二〕《說文》辛部。
〔三〕均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四〕《論語．憲問》。
〔五〕《論語．先進》。
〔六〕《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裏用劉寶楠《論語正義》的解釋。
〔七〕《論語．衞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
〔八〕《儀禮．聘禮》：「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九〕《非命》上。

〔一〇〕《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一一〕《滕文公》下。

〔一二〕《非相篇》。

〔一三〕八十一章。

〔一四〕《齊物論》。

〔一五〕《問辯》。

〔一六〕上節及本節參用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體》(《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說。

〔一七〕《孟子・滕文公》:「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楚人要學齊語，可見齊語流行很廣。又《韓詩外傳》四:「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楚言」和「齊言」並舉，可見楚言也是很有勢力的。

〔一八〕《史記自序》。

〔一九〕《後漢書・班彪傳》。

〔二〇〕《史記評林》總評。

〔二一〕《金樓子・立言篇》。

〔二二〕宋贊甯論羅什所譯《法華經》語，見《宋高僧傳》卷三。

〔二三〕梁啓超《翻譯文學與佛典》六之二。

〔二四〕佛教徒注釋經典，分析經文的章段，稱爲「科分」。

〔二五〕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二六〕《師說》。

〔二七〕《諫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爲潮州刺史。

〔二八〕樊紹述《墓誌銘》。

〔二九〕、〔三〇〕《答李翊書》。

〔三一〕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成爲定論。

〔三二〕《文說》。

〔三三〕何薳《春渚紀聞》中東坡事實。

〔三四〕陸游《老學菴筆記》。

〔三五〕周書昌語，見姚鼐《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三六〕《古文約選·序例》。

〔三七〕見雷鋐《卜書》。

〔三八〕呂璜纂《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三九〕劉大櫆《論文偶記》。

〔四〇〕姚鼐《復魯絜非書》。

〔四一〕《述菴文鈔序》，又《復秦小峴書》。

〔四二〕《書震川文集後》。

〔四三〕根據《說文》言部。

〔四四〕阮元《文言說》及《與友人論古文書》。

〔四五〕《文心雕龍·總術》。

〔四六〕《金樓子·立言篇》。

〔四七〕曾國藩《復吳南屏書》:「僕嘗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

〔四八〕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猶賢博弈齋詩鈔

自序

昔曹子建有言：「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斯論尙矣。余以老泉發憤之年，儕大學說詩之席，語諸生以巧拙，陳作者之神思，而聲律對偶，劣得皮毛；甘苦疾徐，悉憑胸臆，搔癢有隔靴之嘆，舉鼎般絕臏之憂。於是努力桑楡，課詩昕夕，學士衡之擬古，亦步亦趨；諷惜抱所鈔詩，惟兢惟業。暇日苦短，微願不償，終一暴而十寒，有寸進而尺退。歲星周天而復始，詩章大衍而不盈，洎夫盧溝肇釁，衡岳棲身，斷簡殘編，香滅燼絕，惟時望燕雲而馳想，撫萍跡以抽思。俄而西遷滇海，南放灕江，窮山水之恢奇，信舟楫之容與。其間獨詠寫懷，聯吟紀勝，偶有成篇，才堪屈指，蓋其詩功之淺，有如是者。迨抗戰之四歲，惟及瓜而一休，隨婦錦城，卜居東郭，謦訊頻傳，日懍冰淵之戒；生資不易，時惟凍餒之侵，白髮益滋，煩憂徒甚。則有蕭君公權者，投以生朝之作，觸其中路之悲，於是翰墨相將，唱酬無斁，詩簡往復，便爾經年，古律參差，居然成帙。憶雲生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曩者退食自公，逢場作戲，鬥葉子於斗室，結勝侶於名區。爾則蕭條窮巷，難招入幕之賓；羞澀阮囊，莫辦尋山之具。惠而不費，惟遊戲於文章；應而相求，庶肸蠁其聲氣。於是飛章叠韻，刻骨攢眉，漸知得失之林，轉成酸苦之癖。自後重理絃歌，不廢茲事。

惟是中年憂患，不無危苦之詞；偏意幽玄，遂多戲論之糞，未堪相贈，祇可自娛，畫蚓塗鴉，題籤入笥，敢云敝帚之珍，猶賢博弈之玩云爾。民國卅五年七月朱自清序於成都。

猶賢博弈齋詩鈔

灘江絕句 廿七年南寧作

招攜南渡亂烽催，碌碌湘衡小住纔。誰分灘江清淺水，征人又照鬢絲來。

龜行蝸步百丈長，蒲伏壓篙黃頭郎。上灘哀響動山谷，不是猿聲也斷腸。上水船

九折屏風水一方，絕無依傍上穹蒼。妃黟儷白荊關筆，點染烟雲獨擅場。畫山

皮鼓蓬蓬徹九幽，百夫爭扛木龍頭。齊心高唱祈年曲，自聽勞歌自送愁。龍門夜泊觀賽神

南嶽方廣道中寄內作 廿八年作

勒住羣山一徑分，乍行幽谷忽千雲。剛腸也學青峯樣，百折千迴卻憶君。

題白石山翁作墨志樓刊經圖 廿九年成都作

色空了了俱無礙，一卷心經攝萬喧。應是解人難覓得，只憑頑石寄微言。

百鍊剛成繞指柔，縱橫鐵筆壓神州。山翁意氣無前古，今見薪傳墨志樓。

題白石山翁爲墨志樓主作萬里歸帆圖

曾是邊陲百戰身，竭來湖海漫遊人。慈親色笑朝朝共，客子生涯事事新。訪羅書畫日不足，刻劃金石願無違。一朝興盡理歸櫂，江流浩淼片帆肥。

重九鄧晉康主任招飲康莊

將軍有丘壑，小築百花潭。松竹自多勝，風流昔所諳。逢辰集健侶，對酒唱高譚。異日烽烟靜，追思此味醰。

意多嫌世短，況值百端新。西陸龍蛇起，東夷狐鼠親。同心願久視，戮力靖囂塵。國慶明朝又，舉杯壽萬春。

公權四十三歲初度，有詩見示。忝屬同庚，余懷棖觸，依韻奉酬

卅年今見海揚塵，劫裏憑誰問果因？猿鶴沙蟲應定分，白雲蒼狗漫疑眞。荆榛塞眼不知路，風雨打頭寧顧身。安得巨靈開世界，再摶黃土再爲人。

堂堂歲月暗消磨，已分無聞井不波。八口累人前事拙，一時脫穎後生多。東西衣食驢

推磨，朝夜丹鉛鼠飲河。剩簡零編亦何補？且看茅屋學牽蘿。

與君難得舊相知，貽我連篇慷慨辭。儘有文章能壽世，那教酒脯患無貲。書生本色原同病，處士高風夙所遲。咫尺城闉艱一面，天寒日短苦縈思。

得遜生書作，次公權韻

見說新從海上回，一時幽抱爲君開。綵衣逶迤歸親舍，絮語依微傍鏡臺。豈肯聲光閑裏擲，不辭辛苦賊中來。匹夫自有興亡責，錯節盤根況此才。

里巷愔愔晝掩扉，狂且滿市共君違。沐猴冠帶心甘死，逐鹿刀錐色欲飛。南朔紛紛丘貉聚，日星炳炳熠光微。沈吟曩昔歡娛地，猶賸緇塵染敝衣。

過公權守愚郊居 卅年作

春城如海不關渠，乘興來尋二仲居。宿疾縈心筋力在，謂守愚 盤餐兼味笑談餘。爬梳舊夢顔能駐，拊掌時流習未除。世變幾人相呴沫，淸言勝讀十年書。

寄小孟，次公權韻

貧病相尋意興慳，栖栖倦翮未飛還。屠龍手有風雲氣，戴笠人逢飯顆山。百歲客居當貴我，一官匏繫且偷閒。君房語妙兼天下，伏枕維摩應解顏。

寄小孟白沙來書云病中輟吟詠　蕭公權

分首經冬聚首慳，春來喜得雁書還。庭花紅滿高低樹，窗影輕浮遠近山。靜到無言中有樂，病能養性正宜閒。遙知安臥成清福，此是神方好駐顏。

夜　坐

掛眼千家黑，娛魂一焰青。羣軒成隔世，瘦影獨橫經。日出還生事，天高有鍛翎。狺狺勿相讋，微當付沈冥。

吾生爲事畜，廿載骨皮存。圭角磨看盡，襟懷慘不温。追歡慚少壯，守道枉朝昏。賸學癡聾老，隨緣寐莫喧。

聖陶爲言今年少城公園海棠甚盛，恨未及觀。遼公權見和之作，有各自看花一暢顔語，再疊前韻奉答，并示聖陶

閉門拚自守窮慳，車馬街頭任往還。春訊委蛇來有脚，憂端澒洞欲齊山。城南錦帳空傳道，西蜀名花付等閒。苦憶舊都三四月，幾回繞樹笑酡顔。

聖陶頗以近作多苦言爲病，試爲好語自娛，兼示聖陶、公權，三疊顔字韻

此生未合恨緣慳，飽閲滄桑抵九還。天上重開新日月，人間無限好江山。驚心戰士三年血，了事癡兒四體閒。競說今春佳氣盛，烟塵長望莫摧顔。

成都有作舞會者，因憶清華園舊事，戲柬小孟，即次見和韻

裙屐蹁躚迹已陳，頻年判袂走風塵。逢場作戲童心滅，逐處爲家白髮新。病起應嗟髀上肉，路遙難共蜀西春。華園舊侶多才藝，餘事成詩亦勝人。

公權寄示囈語二章，疊顏字韻奉答

信有高言破衆慳，飄然塵外羽衣還。舊鄉臨睨隍中夢，雲氣低徊海上山。炊熟儘成無量劫，河淸能得幾生閒？蟪蛄只解貪朝暮，嶽嶽儒冠照苦顏。

囈語　蕭公權

宰世休疑造物慳，遼東曾是令威還。曹騰異夢三分日，旖旎殘春六代山。燭灺青樓歌席換，沙沈白骨戰場閒。湘纍何苦傳天問，未抵芳醪發悴顏。

無須高論讝梁陳，怨鳥終塡海作塵。禹域奔狠胡運短，昆陽起鳳漢儀新。稱心仙果三千歲，彈指澄波五百春。深惜放翁齎恨沒，靈山未學養形人。

公權寄和近作，辭意新警，感慨遙深，雒誦再三，情難自已。輒取詩中語成明鏡一章，倒疊顏字韻奉酬

繁霜壓鬢換朱顏，千里魚行豈自閒。仰屋有人餘作繭，埋憂無計只看山。蒼天板板高難問，白水滔滔逝不還。炙輠憑教勞筆舌，鏡中爭奈帶圍慳。

夢破

蕭公權

碧落紅塵分兩慳，遊仙夢破嘆生還。天流妖火焚暘谷，地湧狂泉拍閬山。蟻酒不成千日醉，鶴丹虛費十年閒。磨磚縱可爲明鏡，換盡淸都别後顏。

近懷示聖陶

少小嬰憂患，老戉到肝腑。歡娛非我分，顧影行踽踽。所期竭駑駘，黽勉自建樹。人一己十百，遑計犬與虎。涉世二十年，僅僅支門戶。多謝天人厚，怡然嚼脩脯。山崩溟海沸，玄黃戰大宇。健兒死國事，頭顱擲不數。絃誦幸未絕，豎儒猶仰俯。累遷來錦城，蕭然始環堵。索米米如珠，敝衣餘幾縷。老父淪陷中，殘燭風前舞。兒女七八輩，東西不相覩。衆口爭嗷嗷，嬌嬰猶在乳。百物價如狂，踊躣孰能主？不憂食無肉，亦有菜園肚。不憂出無車，亦有健步武。只恐無米炊，萬念日旁午。况復三間屋，蹙如口鼻聚。有聲豈能聾，有影豈能瞽。婦稚逐雞狗，攫人如網罟。况復地有毛，卑濕叢病蠱。終歲聞呻吟，心裂腦爲盬。贛鄂頻捷音，今年驅醜虜。天不亡中國，微忱寄干櫓。區區抱經人，於世百無補。死生等螻蟻，草木同朽腐。螻蟻自貪生，亦知愛吾土。鮒魚臥涸轍，

尙以沫相煦。勿怪多苦言，喋喋忘其苦。不如意八九，可語人三五。惟子幸聽我，骨鯁快一吐。

逖生來書，睠懷淸華園舊跡，有五年前事渾如一夢語，因成長句，寄逖生化成

茅檐坐雨苦岑寂，發書三復如快晴。滿紙瑣屑儼晤對，五年前事增眼明。羣居休沐偶佳抱，葉子四色盈手輕。各殫智巧角勝負，一往不覺宵崢嶸。浦子此中斲輪手，寢饋甘苦精權衡。興來更學僊僊舞，周旋進止隨鼓鳴。觩然角弓或張弛，無益聊遣有涯生。王子皉皉最好客，廣庭夏屋來衆英。綠草芊綿敷坐軟，高柳窈窕懸鐙瑩。入室汪洋陂十頃，照坐依稀鏡一泓。主人絕技湯糰擅，流匙滑口甘如餳。大胾長魚續羅列，座上朶頤腸欲撐。尙憶當年作除日，登場粉墨歌喉淸。龥生蹩躠逐履舃，平話嘮叨供解酲。逸興遄飛夜旣午，新歲舊歲相迭迎。門前執手道珍重，低徊躑躅難爲行。五年憂患壓夢破，故都夢影森縱橫。撫拾破碎勝無有，刺刺敢辭癡人名。

初作長句，寄示公權求教，戲媵一絕。新詞變體學《離騷》，公權定風波句也

敢云變體學《離騷》，長句初成筆顫毫。舉鼎自知應絕臏，先生有興肯吹毛？

再叠顔字韻答公權戲贈之作，兼謝觀澄先生

梧鼠心知五技慳，抛磚好語擲珠還。天孫錦美針無迹，筆陣圖成簣覆山。秩秩足音傳谷響，啾啾蚓唱倚身閒。忽聞匠石求樗櫟，只供狂酲一赧顔。

贈聖陶

平生遊舊各短長，君謙而光狷者行。我始識君歇浦旁，羡君卓爾盛文章。訥訥向人鋒斂鋩，親炙乃窺中所藏。小無町畦大知方，不茹柔亦不吐剛。西湖風冷庸何傷，水色山光足彷徉。君將至杭，來書約暢遊西湖，有「不管牠是冬天」之語。歸來一室對短牀，上下古今與翺翔。曾無幾何參與商，舊雨重來日月將。君居停我情汪洋，更有賢婦羅酒漿。嗟我馳驅如

捕亡，倚裝恨未罄衷腸。世運剝復氣初揚，咄爾倭奴何猖狂。不得其死者強梁，三年血戰勝算彰。烽火縱橫忽一鄉，錦城東西遙相望。悲歡廿載浩穰穰，章句時復同參詳。百變襟期自堂堂，談言微中相扶匡。通局從知否或臧，爲君黽勉圖自強。浮雲聚散理不常，珍重寸陰應料量。尋山舊願便須償，峨眉絕頂傾壺觴。

聖陶示偶成一章，超世而不出世，所感甚深，即次原韻奉答，并效其體

騶衍譚天識世變，陶公飲菊期年長。達觀無可與不可，日用知常守其常。破山雷霆響未徹，嚼膚蚊蚋痒難忘。米鹽事殫酸生活，方寸心亦今戰場。

偶成　葉聖陶

天地不能以一瞬，水月與我共久長。變不變觀徒雋語，身飛身想寧典常。敎宗堪慕信難起，夷夏有防義未忘。山河滿眼碧空合，遙知此中皆戰場。

公權寄示戲贈小孟之作，即次其韻

蕭君示我詩，稱君得妙悟。割愛淡芭菰，幷意必我固。袈裟欠一領，便欲到聖處。塵網苦纏人，身沈孰能去？惟君仗慧劍，一吷斷萬慮。明鏡固非臺，菩提亦無樹。直指見本心，寂然泯去住。月華雙照爍，惟是眼瞢故。風幡各飄搖，惟是心動故。見性自相非，得道何須助。戍虧餘等閒，空有歸吐茹。卓立示化身，旋看脫頑痼。嗟我斗筲人，愁心幻如絮。衣食横韁鎖，沈吟閱朝暮。觸處成牆面，徘徊不能步。安得從君遊，俾我忘喜怒。

小孟來書云：養疴習静，萬念俱息，生平最難割舍之淡芭菇，亦已戒斷。所少者惟袈裟一領耳。戲贈一首

蕭公權

孫公遠致書，妙語發玄悟。意通一指禪，心斷無根固。寄身淨室邊，寄室山空處。㔸與世還往，不礙雲來去。本已隔紅塵，無由染塵慮。潛修不壞身，誰辨菩提樹？香火祉慵結，天女花無住。云何不誦經？法炬未然故。云何不出家？衣缽未傳故。米貴食無肉，苦行天隱助。奚事嗅旃檀，見楞嚴經 儘能耐蔬茹。童顏知可返，豈惟蕩沈痼。我猶安火宅，晨飙翻意絮。「意絮晨飛」梁簡文

帝語癡頑愧難振，有期是衰暮。異日重謁公，頹形追健步。人觀老壯殊，兄我公勿怒。

爲某女士題紀念册

葉葉長看墨瀋新，一時俊彥此留眞。句圖歷落如珠顆，供養三生慧業人。

伯鷹有詩見及，次韻奉酬

夢痕黯澹雜烟痕，一片江山眼未昏。慚愧書生徒索米，雕鎪文字說寃恩。

今世書生士不殊，雞棲獨乘日馳驅。問津未識誰沮溺，登壟爭看賤丈夫。

聞佩弦居報恩寺　潘伯鷹

縮手危邦涕淚痕，起看八表亦同昏。細思文字眞何用，終有人知未報恩。

至竟書生道固殊，杜陵強項是前驅。報恩豈必皆同軌，要令人間見餓夫。原注杜詩：「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

答遜生見寄，次公權韻

幾日天河見洗兵？杜陵心事託平生。舊都歷劫殘宵夢，有次韻公權夢中偕返清華園之作 佳節思鄉戛玉聲。有端午寄內之作 倚澗蒼松得地厚，朝陽丹鳳待時鳴。雄才小試還鄉記，有「回到淪陷的故鄉」一文 已看文無一筆平。

齒牙分惠並標題，來詩有「我喜逢人譽兩君」之句 狡獪莊生論物齊。斥鷃有心隨鳳鳥，人間何處得天梯。淵冰凜凜酬高唱，風雨瀟瀟聽曉雞。欲頌中興才力薄，來詩有「會賦中興雅頌文」之語 妖烏坐看已沈西。

公權戲贈二絕次韻奉酬

浪學塗鴉昧法程，無端羽族獨鍾情。禽言啁哳榆枋際，那識雍容鳳噦聲。

物外高吟百尺壇，幽人論世總從寬。養禽只合謀升斗，未敢培風學乘鸞。

佩弦寄遜生詩一章中用四鳥自以爲嫌，戲賦二絕句以解之　　蕭公權

何須比興定章程，草木蟲魚盡有情。招得羽禽翔筆底，只緣詩作鳳鳴聲。

鳳毛池上築詩壇，縱鶴鳴鷗約法寬。青鳥同深知遇感，閬風高處報驂鸞。

夏夜次公權韻

電舌破天時一吐，望穿萬眼無滴雨。拋書分得農圃憂，敢言肥瘠非吾土。揮汗還需葛衣透，搖箑難驅衆蚊語。一身辛苦何足道，所憂衣食民父母。憶昔浙中山映水，舉家矮屋聽更鼓。遶屋水田熱比湯，晝夜熏蒸那逭暑。田中蚊蚋伸長喙，噆人輒病十之五。嗆鼻濃烟徒木屑，遮風斗帳枉絺紵。蚊陣長驅可奈何？任憑宰割肉登俎。天地不仁古所嘆，喋喋何當窮墨楮？侵膚溽熱生創痏，徹旦呻吟摩臂股。當時眼孔如豆大，切齒蹙眉不勝苦。自從移家入舊都，蕞爾醜類莫余侮。名園暑夕淸風生，促坐不勞揮玉麈。鐙明夜靜獨攤書，片語會心色飛舞。窗外婀娜搖細竹，壁間窸窣鳴飢鼠。解渴已辦冰梅湯，沁人齒頰一絲齼。平生知慕馬少游，此情合入無雙譜。讀倦開門自盤樕，高樹微涼侵肺腑。相逢不寐人兩三，亹亹淸談忘夜午。苦樂相形只及身，庶民饑寒豈關汝。禦侮今知賴衆擎，匹婦匹夫宜得所。足衣足食安危繫，奈何連年成飢阻。但願人定回雨暘，千倉萬箱盈天府。

次韻公權寄懷

褌中一虱蠕蠕起，數墨尋行緣蜀紙。四十三年斷梗因，（公權初次寄詩中句）一往蒼涼黯羅綺。中年哀樂不猶人，障目烟塵愁旖旎。哀梨幷翦快無匹，學步邯鄲由失喜。君詩成癖正法眼，嗟我狂禪奚所止。昔躭博弈今韻言，五雀六燕毋寧似。無心詩國求人爵，着意風簷消臏晷。不材未堪爲世用，願學楊生謀重己。舉家飄泊風前絮，歧路縱橫霧中藹。嘗聞遺興莫過詩，石惡自甘貪琰美。但恨力絀心有餘，枯毫倔強難驅使。顏回坐忘不可期，排遣牢愁尙賴此。餖飣字句付詩筒，敢言投桃報以李。候蟲唧唧吟秋砌，六義茫然況四始。人生相憐亦自憐，從古細民心同理。興亡云有匹夫責，索居常畏十手指。道是堂堂七尺軀，未許偷閒牖下死。陰晴變幻信多端，世事楸枰憑着子。窮通呫囁只費辭，無補時艱何待揣。吾儕詩爲知者道，不足流傳供謷訾。倡予和汝莫相忘，心聲應是無遐邇。惟君琢磨功日富，出口淸圓玉有沘。跛鼈曳尾泥塗中，蹣跚還笑雕蟲技。

佩弦兄次韻寄懷詩，詞旨兼美，奉酬一章，仍依前韻

蕭公權

寒蜩着霜飛不起，魄化蠹魚埋故紙。罷飡風露飫塵埃，默聽堦蛩美談綺。穿循簡隙走書縫，據

喑那知春旖旎。天憐清苦轉人身，不成魁梧去聲亦堪喜。卻緣識字憂無端，業與生俱不可止。蜩唱蠹鑽前世因，形態已非神宛似。擁被呻吟伏案讀，矻矻焚膏繼短晷。無益於人徒自勞，殊寵蒙君稱知己。君身元是謫仙人，吐屬紛綸琪樹蘤。妙研詩律示津梁，定論昔賢無遁美。謂尊作唐詩指導　才多意遠陋雕蟲，吐辭懇惻為心使。幾曾顛沛忘時艱，藹然仁者語如此。矯情傷直笑於陵，偷咽螬餘井上李。溫柔遺教久湮沈，重振風騷待君始。無意鳴詩名已傳，立言窮通有天理。倖邀青眼得隨肩，敢託南華喻非指。愧我三生徹骨寒，分宜草木同腐死。君姿喬松千歲標，餘事雍容管城子，瞭然高下判雲泥，末不可齊本漫揣。翦鐙磨墨急和詩，遑恤他人縱訾呰。我詩如爝君燎原，引火自焚愁嚮邇。目眩生花迷五色，無復餘明玩清泚。勉發寒蜩未竭聲，倘許蝦蟆能作技。荊公詩：「蝦蟆能作技，蝌蚪似可讀。」

紹穀書來，謂即偕夫人至錦城，因訊近居，賦此寄懷

少年同學氣如虹，川媚山輝挹不窮。衆裏推襟慚隻眼，世間垂涕有彎弓。畫眉時倩張郎筆，投轄長欽孟母風。雍穆一門能醉客，難忘酒醒日生東。

溯南廿載幾分馳，斷續鱗鴻繫夢思。雅興平生在湖海，好懷隨處得酣嬉。裨諶謀野看

經國，劉晏親民見遠規。聞道同車來問訊，望江樓畔一軒眉。

將離示石蓀，石蓀緬離別之苦，勸勿行

陰晴圓缺古來有，卻笑東坡怨不禁。常住團圞天上月，誰聽專一匣中琴？邨居愛數更長短，客至憑斟酒淺深。彼是相因感世味，新歡久別費沈吟。

偶成

應學禪和子，牆頭一口橫。生涯成苦笑，日月有吞聲。忍淚稻粱嚥，迴腸魂夢驚。襟期東海鰲，餘共井中明。

壽張志龢四十九歲生日。志龢邛崍人，幼學陸軍，辛亥參與革命，洊升師長，駐江津，頗得民望。嘗立小學於邛，以紀念其尊人。卸軍職後，遊歷各國，於國際政治蓋三致意焉

少年已盡孫吳妙，一劍縱橫與鼎新。腹有詩書懸史鏡，民登袵席樂陽春。文翁教化能

妻賢兒好家成俗，梓里菁莪爲顯親。覘國還遊大瀛海，插胸得失自嶙峋。自強不息暮復朝，健步直追時與潮。誰謂逾年卽知命？猶堪短後爭射雕。

之富，人傑地靈古所昭。斑衣娛母會賓侶，共醉潲江水滿瓢。邛州有潲酒甚美

滇南臨安酸石榴最美，曩在蒙自，駐軍方營長曾以見貽，今三年不嘗此味矣

避寇猶能謀飲啄，滇南異味石榴酸。雄姿英發承推食，絳玉魁奇似聚巒。不數黃柑三百顆，長留微齼一千般。頻年相憶天涯客，薇藿充腸見汝難。

次韻答公權

芭蕉照眼喜相過，揮扇談詩詩有魔。家國卅年留跡永，跡園詩存託始民國四年才華八斗嘔心多。澄淸天下玆餘事，鑽仰儒宗列二科。謂政事文學攻錯他山依片石，鉛刀從此割如何？

桂湖

流風笻杖仰天南，升菴笻竹杖今存昆明民衆教育館廟貌湖光此共參。總錄丹鉛破萬卷，千秋才士論升菴。

列桂輪囷水不孤，玲瓏亭館畫爭如。蟠胸邱壑民偕樂，遺愛猶傳張奉書。清季張宰新都，於湖中建亭館。

寄懷平伯北平

思君直溯論交始，明聖湖邊兩少年。刻意作詩新律呂，隨時結伴小遊仙。槳聲打徹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等是分襟今昔異，念家山破夢成烟。

延譽憑君列上庠，古槐書屋久彷徉。斜陽遠巷人踪少，夜語昏鐙意絮長。西郭移居鄰有德，南園共食水相忘。君移居清華園南院，余日往就食。平生愛我君爲最，不止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燧漫天開，如鯽羣賢南渡來。親老一身娛定省，庭空三徑掩莓苔。經年兀兀仍孤詣，舉世茫茫有百哀。引領朔風知勁草，何當執手話沈灰。

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貽墨志樓主人，時將去成都

論交存古道，稠叠故人情。嶽嶽丘山重，盈盈潭水生。插架足璆珍，風流異代親。吉金三百影，留贈賞音人。

別聖陶，次見贈韻　岷江舟中作

論交略形跡，語默見君眞。同作天涯客，長懷東海濱。貪吟詩句拙，酣飲酒筒醇。一載成都路，相偕意態新。我是客中客，憑君慰泬寥。情深河瀆水，路隔短長橋。小聚還輕別，公權句　淸言難重招。此心如老樹，鬱鬱結枝條。

成都送佩兄之昆明　葉聖陶

平生儔侶寡，感子性情眞。南北萍踪聚，東西錦水濱。追尋逾密約，相對擬芳醇。不謂秋風起，又來別恨新。

此日一爲別，成都頓寂寥。獨尋洪度井，悵望宋公橋。詩興憑誰發？茗園復孰招？共期抱貞

粹，雙鬢漫蕭條。

公權次寄懷平伯韻贈別，疊韻奉答

雋語徒聞物不遷，奈何聚散自年年。尋山霞客非吾願，投筆班生已上僊。千里攜家來蜀道，三秋顧影放江船。亂中輕別眞堪悔，回首蓉城一點烟。公權曩贈詩有：「珍重綠窗人似玉，亂中輕別奈愁顏」語。

里仁爲美共膠庠，舊苑星羅各徜徉。食譜精修碑在口，花畦偶過日初長。碎金照眼難相卽，妙手穿楊未可忘。公權習射擊，所發多中的，令兄叔玉謂其手妙。亦是平生一緣法，經年倡和到殊方。

樂事詩筒日日開，閉門幾度綠衣來。交疏深釀愁閑味，讀罷閑巡砌上苔。新句瓌奇神忽王，中年忼慨語多哀。相期酬酢依前例，尙有雕蟲意未灰。

贈別佩弦兄，謹依寄懷平伯韻　蕭公權

天遣詞人困播遷，更敎離合值中年。充懷哀樂成高響，照眼文章擬謫仙。絕域儘多吟嘯地，清遊幾夢木蘭船。歸時一任青山笑，萬首新詩兩鬢烟。曾是齊竽濫國庠，淸時悔未共翔徉。早欽

花管揚殊彩，怯對椿柯獻寸長。流落邊州交轉密，唱酬經歲樂難忘。誰知小聚還輕別，愁絕伊人水一方。

八表雲昏慘不開，蒼茫百感一時來。金城翠老當年柳，玉砌青沈故國苔。經亂愈傷浮梗別，孤吟徒作斷猿哀。臨歧莫訝辭情苦，尙有愁腸未化灰。

好夢再疊何字韻　幷序　敍永作

九月日夕，自成都抵敍永，甫得就榻酣眠，邇日飽飫，肥甘積食，致夢達旦不絕，夢境不能悉憶，祇覺游目騁懷耳。

山陰道上一宵過，菜圃羊蹄亂睡魔。弱歲情懷偕日麗，承平風物殢人多。魚龍曼衍歡無極，覺夢懸殊事有科。但恨此宵難再得，勞生敢計醒如何？

贈李鐵夫

董家山舍幾優遊，見說豪情勝輩流。葉石蓀云　載我倭遲下岷水，共君磊落數雄州。盤渦出入開心眼，抵掌從容散客愁。獨去滇南無限路，主人長憶孟公儔。

發敍永，車中寄鐵夫

堂廡恢廓盤餐美，十日棲遲不憶家。忽報飈輪迎戶外，遂教襆被去天涯。整裝衆手爭俄頃，握別常言乘一譁。如此匆匆奈何許，登車回首屢長嗟。

憶宜賓公園中木芙蓉作，次公權暨介弟公遜倡和韻 昆明作

風流遙想謝家塘，異地經時草有霜。一樹牆邊紅欲墜，幾番眼底影偏長。戎州走馬看秋老，客路逢花覺土香。蜀錦温馨憐片段，他年同賦更何方。

婦難爲，戲示公權 三十一年作

婦詈翻成幼婦辭，公權有《婦詈》五章 卻憐今日婦難爲。米鹽價逐春潮漲，奴僕星爭皎月奇。長伺家公狙喜怒，臏看穉子色寒飢。閒嗔薄怨猶論罪，安得詩人是女兒。

前作意有未盡，續成一章，疊前韻

入室時聞有謫辭，逢人輒道婦難爲。不甘弱羽籠中老，曾是明珠掌上奇。夫婿自憐牛馬走，賓朋誰療夢魂飢。温柔鄉冷荆榛漸，奈此平生好牛兒。英語好牛兒謂婦也

蠟梅次公權韻

最愛平生黃蠟梅，和風和雪數枝開。蜜脾細沁甜滋味，金磬微憐舊館臺。天遠翻驚春至早，地温只見日烘來。滇中氣暖無雪，蠟梅初冬即開。瓦瓶誰遣撩人意，可奈新停濁酒盃。近以胃疾戒飲

憶曲靖至昆明車中觀晚霞作

朝雨困泥塗，午霽豁蒙瞀。大道比弦直，飈車爭矢驟。滇中氣清朗，秋空藍欲透。高遠杳無極，仰視徒引脰。西日漸依山，迎眸一釜覆。釜底火焚如，燒天積柴槱。雲霞金在冶，瞬息萬奔湊。斗然湧奇峯，峨嵋天下秀。太華蒼龍翔，匡廬五老瘦。黃山眞幽絕，

有石皆皴皺。不須訪名山，指點窺層岫。何來金獅子，蹈舞隨節奏。長毛紛尨茸，遠蹠勇踐蹂。髬髵首低昂，意欲腥膻嗅。百獸匿踪跡，甘心誰與鬥？似聞氣咻咻，千里通一吼。莊嚴現世尊，光明鬱如餾。地上寸寸金，法身彌廣袤。偃蹇一孔中，眉頭承艾灸。搖蕩平生心，帖焉醉醇酎。張目暝色合，晚風盈懷袖。漸覺親塵囂，燈火如撒豆。

憶舊京西府海棠，次公權韻 三十二年作

北地經冬不見梅，幾番春訊待卿來。長條穎脫穿雲去，錦幄珠暉映日開。未覺環肥矜淡掃，肯緣香少損仙裁？黃庭初寫今誰賞，應效啼妝悔賦才。

胃疾自儆

孤影猙獰鏡裏看，摩霄意氣凛冰寒。肥甘腊毒頻貪味，腸胃生瘍信素餐。尙賴仔肩承老幼，剩憑瘦骨拄悲歡。異時亦自堂堂地，饕餮何容蝕五官。

雲南實業銀行新廈落成開幕，紹穀任總經理，詩以賀之

縮轂川黔拱此州，南金東箭美難收。拓開寶藏需才士，彌補時艱仗遠謀。平準一書如指掌，運籌廿載擅屠牛。輕車熟路行無事，紹穀嘗任昆明中國農民銀行經理。輪奐雍容羡帶裘。

送福田歸檀香山 福田二年未歸，近得其兒攝影，頎碩勝常。

檀島風光異昔時，彌天烽火動歸思。經年勞止如番卒，行見迎門影裏兒。

中秋從月涵先生及岱孫、繼侗至積翠園培源寄居，次今甫與月涵先生倡和韻

天南獨客遠拋家，容易秋風惜晚花。佳節偶同湖上過，無邊朗月伴清茶。
酒美餚甘卽是家，古今上下舌翻花。興來那計愁千斛，痛飲盧仝七椀茶。
且住爲佳莫問家，茫茫世事眼中花。人生難得逢知好，樹影園窗細品茶。
暫借園居暫作家，重陽節近憶黃花。主人儻訂登高約，布襪青鞋來吃茶。

疊前韻贈今甫

漫郎四海漫爲家，看盡春風百種花。已了向平兒女願，襟懷淡似雨前茶。
此心安處卽吾家，瞥眼前塵霧裏花。贉得相知人幾個，淡芭菰釅壓新茶。
住慣天涯解作家，案頭親供折枝花。學書看畫消淸晝，客至紅爐緩煑茶。
北望燕雲舊帝家，宮牆西畔菊堆花。相期破虜收京後，社稷壇前一盞茶。

題李宇龕無雙吟

含毫和淚詠無雙，萬語千言意未降。字外憂思侵獨抱，生前眉影黯虛釭。同心如覩鳳麟出，各夢常聞水石撞。莫訝鍾情成一往，谷深難得足音跫。
相憐我亦過來人，歷歷星霜舊恨新。甘咽秋茶及夫婿，絕無怨語向交親。列車一別眞成訣，墓樹常靑那是春。兒女天涯多聚散，孤魂千里應逡巡。

遊倒石頭因憶石林，示同遊諸子

龍門幽險窮巧智，雕鏤西山剔蒼翠。龍門下臨倒石頭，刀斧不施別有致。山崩石倒壓滇海，訪勝遊踪時一至。到眼危欹森逼人，磅礴直欲無天地。聞道山崩塵蔽天，谷響波迴魂魄悸。只今白石大如屋，阨隍道旁餘贔屭。或相爭道頂相摩，怒峙如門搖欲墜。亦有壁立儼成峯，顧盼一方竊心憙。亦有馮河死無悔，碧波掩映多姿媚。東山月出照龍門，上下猶然判僊魅。因憶石林眞神工，僊魅低頭應斂避。無始以來大頑石，渾沌不材天所棄。巨靈擘蹋肌理分，耳目鼻口從其類。滇南偃蹇百千載，天荒地老無人記。及今風高白日昏，來者毛裏生寒意。登覽奇峯鬱不開，枯木槎枒刀劍植。又如朽骨聚丘山，一世賢愚臂交臂。入林仰望智井智，深谷迷人欲長睡。神仙工拙都戲談，覓句雕蟲徒好事。惟當着屐二三人，攜酒重游聊自肆。

挽張素癡

妙歲露頭角，眞堪張一軍。書城成寢饋，筆陣掃風雲。勤拾考工緒，精研復性文，淋漓

修國史，亘眼幾揮斤。自古才爲累，天慳狷與狂。明鐙宵作畫，白眼短流長。脫穎爭終賈，傷心絕孟光。黑頭戕二豎，鴻業失蒼茫。

次公權韻

開緘五色爭春妍，精思健筆誰能先？擁鼻吟諷不釋手，望塵學步知其難。不殊海上三神山，風濤出沒風骨寒。宮闕如雲未可即，僊人陟降何安閒。手眼別出殊媸妍，奪人奪境爭聲先。選徒嚚嚚多益善，衝鋒陷陣當者難。草木森森八公山，秦兵望影皆膽寒。圍碁賭墅報破敵，門外蕭蕭嘶馬閒。蕭侯下筆呈餘妍，著意與古爭後先。分唐界宋亦多事，行雲流水人所難。作詩如未登泰山，天之蒼蒼風氣寒。俯視茫茫百感發，不同徒矜觜爪閒。

清常見示攝影册子，輙題其後 幷序 昆明觀音山作

清常與夫人相別六載，曩夕學生聚譚會，清常陳辭感慨，四座動容。頃復以攝影冊子見示，皆其夫人造像也。

新婚六稔苦相思，滿座悲君感慨辭。一夕現身聞妙法，盛年造像見幽姿。平生歡愛腸千結，故國妻兒淚幾絲。爲道春華難久駐，軒車宜辦莫過時。

國徽花，俗所謂五子蓮者

密葉披牆碧欲流，微波徐動妙蓮浮。亭亭洛女矜妝淡，嫋嫋蜻蜓識水柔。入眼分明國徽似，彰身燦爛寶星侔。山中蹀躞頻看汝，豔骨冰容孰與酬？

山　泉　昆明西山道中口占

是曾相識此泉聲，滾玉跳珠意未平。應喜別來兩無恙，在山莫怨一身輕。

爲春臺題所畫清華園之菊　昆明作

霜姿麗質掩莓苔，曾詡繽紛照眼來。此日丹青重點染，山河秋影費疑猜。

贈岱孫

濁世翩翩迥不羣，勝流累葉舊知聞。書林貫串東西國，武庫供張前後軍。冷眼洞穿腸九轉，片言深入木三分。閒居最愛長橋戲，笑謔無遮始見君。

爲人題印譜選存

使轉縱橫意有無，能於寸石見眞吾。若將鐵筆論詩法，此是君家摘句圖。

書懷

何須別白論親讎，伺寐無吪任百憂。翻覆雨雲輸隻手，森嚴崖岸過人頭。網羅庶免豹藏霧，冷暖自知蚓有樓。一夢還登閶闔上，賢愚俯視忽同丘。

贈之椿

十年相見霜侵鬢，自力更生國有魂。潤色輿言起盟友，之椿爲《掃蕩報》作論，論中英邦交，英國領

事館有函致謝。縱橫椽筆壯心存。

壽涂母陳太夫人七十 代吳正之作

吾鄉有賢母，七十古來稀。錦水清徽遠，塗山世族歸。撫孤勤畫荻，達旦聽鳴機。戲綵看蘭桂，皆前次第輝。

伯子欣同硯，妙年知所裁。南雍擢高第，贛水育英才。桃李春春暖，菁莪處處催。願偕重拜母，此日共銜盃。

農曆壬午歲嘉平月十六日，值丏尊伉儷結縭四十週年（三十二年）之慶，雪邨首倡賀章，丏尊有和作，即次原韻奉祝

舉案齊眉四十年，年年人逐月同圓。烹鮮佐酒清談永，伴讀縫衣樂趣全。平屋湖山神輒往，小隄桃柳色將妍。胡塵滿地身雙健，莫爲思鄉負醉筵。

贈蕭慶德，叔玉大兒也

髫歲狷成癖，茲兒有父風。一毫不肯挫，百役總能同。卽物知窮理，繁言解折衷。會心忽微笑，獨往興無窮。

春來小極、江淸共話，大慰鄙懷

天涯聯榻各無家，狠藉丹鉛送歲華。退食高言河漢遠，飣盤常供錦糖賒。昆明什錦南糖余所夙嗜 憂來乘病如蜂擁，語重兼金抵纘加。蛩蟨相期君一笑，癡人芳草不須嗟。庾信《春賦》：「一叢芳草足癡人。」

嬌　女

誰家嬌小女，啼哭賺親憐。寵媼常同榻，邨童敢比肩。出言如老吏，努目試輕拳。兄姊避三舍，司晨不待年。

紹穀喆嗣君恕世兄與廣東陸女士成婚，詩以賀之

家風城北最温文，長袖英年已軼羣。西亞宏規參建樹，君恕任昆明亞西銀行襄理南天隻燕久朝曛。雀屏喜獲渝中選，春色平分嶺上雲。難得佳兒復佳婦，一門弓冶世相聞。紹穀暨君恕、陸女士均在銀行任職。

雨僧以淑女將至詩見示，讀之感喟，即次其韻

幾人兒女入懷來？客影徊徨只自哀。白傅思鄉馳五憶，陶公責子愛非才。失羣孤雁形音杳，大兒成龍州，久無消息。遶膝諸孫意興灰。三兒在淪陷區依嚴君膝下，來書多苦語。更有飛烏將弱息，天涯望父訊頻催。內子偕三幼兒在成都，時問歸期。

答程千帆見贈，即次其韻

層疊年光冉冉波，波中百我看蹉跎。白頭猶自憂千歲，奈此狂馳夸父何。

槳聲鐙影眉頭夢，數米量鹽劫裏身。今日秦淮嗚咽水，叛兒誰復賞心人。

師心擴臂起膏肓，鄉愿軒眉掩狷狂。忽憶尼山獅子吼，斯文興喪不關匡。

一髮文心足愈愚，辨深淄澠百家沽。天孫乞與金針巧，卻向凡夫問有無。千帆釋詩諸作，剖析入微，心細如髮。

奉贈四絶　　程會昌

短夢蘧蘧感逝波，兵塵詩卷兩蹉跎。揚州年少今頭白，駐景神方奈汝何。

槳聲鐙影秦淮水，燭轉蓬飄劍外身。爲問江南舊遊地，好天良夜付何人？

胸中泉石笑膏肓，壇上宗風別聖狂。著屐我慚成佛謝，解頤人愛說詩匡。旅蜀七載，未嘗登峨嵋青城，承詢及，殊愧作也。

訪道何由失智愚，每驚高士雜屠沽。後山而後風流歇，謂順德黃先生，先生有小印，文曰後山而後。肯把金針度與無？

卅三年夏，與慰堂、士生重聚於陪都，談笑歡甚，作此紀事，兼贈二君

不知有此樂，廿載各驅馳。孰意萍蹤聚，相看夢影疑。笑譚隨所向，禮法勿須持。慷慨

無當世，居然少壯時。

風流承別下，聲氣接通人。四庫英華出，東觀輪奐新。求書赴湯火，謂抗戰後冒險赴滬求書分目足梁津。自得百城樂，焉知十丈塵。慰堂

歷盡崎嶇路，猶存赤子心。直言增嫵媚，閱世曉晴陰。眼底蠻爭觸，人前尺換尋。從來有夷惠，寧與俗浮沈。士生

中秋節近，以火腿乾菜月餅貽慰堂，皆鄉味也。慰堂峻卻不受，作此調之

餅餌聊隨俗，先生拒勿深。團圞中秋月，迢遞故鄉音。且快屠門嚼，還同千里心。物輕人意重，佳節儘難禁。

鐵螺山房集贈主人卅四年作

馬車轆轆大堤側，主人倚杖出迎客。小園照眼一椽新，書册縱橫猶滿壁。似曾相識三摩挲，主人殷勤數來歷。淡芭菰香茶味永，主婦將雛頻絡繹。登樓舊燕各翩翩，坐覺春

風生兩腋。小詩坦率見世情，烟斗陸離徵雅癖。竹根木癭得風流，手運錐刀隨曲折。案頭失喜名伶傳，譜學精微誰與敵。食時方丈列吳盤，初寫黃庭皆嘖嘖。不遑應接山陰道，向隅止酒良失策。曲終奏雅盆如海，雞母豚肩相比翼。望洋興嘆奈若何？拄腹撐腸吃不得。飽食誰當復用心，往事重温矜點滴。主婦娓娓論家常，主人津津嚥烟液。大噱豪談震屋瓦，人生難得忘形跡。不知何處是他鄉？此語眞能道胸臆。詩成主人卜市居，鐵峯螺峯天外碧。山房一集自千秋，從古忘憂唯美食。

寄三弟敍永

同生四兄弟，汝最與我親。念汝生不永，吾家方患貧。弱冠執教鞭，三載含酸辛。不恥惡衣食，錙銖黽朝昏。辭家就閩學，讀律期致身。學成厠下僚，有志未得申。兄弟天一方，勞苦僅相聞。軍興過漢上，執手展殷勤。相視雜悲喜，面目侵風塵。小聚還復別，臨歧久諄諄。我旋客天南，汝方事駿奔。長沙付一炬，命與懸絲均。歷劫得相見，不怨天與人。奔走助我役，玩好與我分。終始如一日，感汝性情眞。鐵鷲肆荼毒，鄰室無遺痕。賴汝移藏書，插架今紛綸。輾轉陪都去，旅食春復春。陪都兩見汝，日日來相存。

啖我餅餌香，餽我烟絲醇。去歲官敍永，法曹人所尊。宿願一朝酬，當思惠吾民。亦當思中饋，及時締良姻。極目千里外，寸心託飛雲。

卅四年夏，余自昆明歸成都，子愷亦自重慶來，晤言歡甚，成四絕句

千里浮萍風聚葉，十年分袂雪盈顚。關河行脚停辛苦，贏得飄髯一颯然。

應憶當年湖上娱，天眞兒女白描圖。子愷諸兒及小女采芷皆曾入畫 兩家子侄各笄冠，卻問向平願了無？

執手相看太瘦生，少年意氣比烟輕。教鞭畫筆爲餬口，能值幾錢世上名？

錦城雖好愛渝州，一片鄉音入耳柔。敝屋數椽家十口，慰情只此似吳頭。記子愷語

賀郭毅菴與殷劍明女士結婚

魯風吹拂潭千尺，湘月摩挲劍兩枝。毅菴魯人，殷女士湘人。眷屬有情臨勝節，一家歡喜萬家隨。婚期在中秋節後、雙十節前各數日。

賀惠國姝女士與楊君結婚

佳人好合逢佳節，樂事無加住樂鄉。婚期在雙十節，行禮在樂鄉酒家。東箭南金聯二姓，惠女士遥東人，楊君遥南人。馬龍車水醉千觴。

讀馮友蘭、景蘭、淑蘭昆季所述尊妣吳太夫人行狀及祭母文，系之以詩

飲水知源木有根，瓣香賢母此思存。本支百世新家廟，吳太夫人新建宗祠昆弟三塗耀德門。
趨拜曾瞻慈蔭暖，論交深信義方惇。長君理學尤沾溉，錫類無慚古立言。

題所藏李晨嵐沅陵圖殘卷

湘西羡殺好風帆，一角沅陵且解饞。最是浮家滋味足，數竿漁網映衣衫。
商量款式幾回裝，鼠嚙難飛冷不防。今日樂昌欣合鏡，河山還我碎奚傷。

市肆見三希堂山谷尺牘，愛不忍釋，而力不能致之

詩愛蘇髯書愛黃，不妨嫵媚是淸剛。攤頭蹀躞涎三尺，了願終慳幣一囊。

勝利已復半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次公權去夏見答韻 三十五年作

凱歌旋踵仍據亂，極目昇平杳無畔。幾番雨橫復風狂，破碎山河天四暗。同室操戈血漂杵，奔走驚呼交喘汗。流離瑣尾歷九秋，災星到頭還貫串。異鄉久客如蟻旋，敝服飢腸何日瞻？災星寧獨照吾徒，西亞東歐人人見。大熊赫赫據天津，高掌遠蹠開生面。教訓生聚三十春，長宵萬里噤光焰。疾雷破空時一吼，文字無靈嗟筆硯。珠光寶氣獨不甘，西方之人美而豔。寶氣珠光射斗牛，東海西海皆歆羨。熊乎熊乎爾誠能，張脈僨興爭爛絢。誰家天下今域中？鈎心鬥角從君看。看天左右作人難，亞東大國吾爲冠。白山黑水吾之有，維翰維藩吾所願。如何久假漫言歸，舊京孤露思縈萬。舊京坊巷眼中明，剜肉補瘡裝應辦。稷壇黃菊燦如金，太液柔波淸可泛。只愁日夕困心兵，孤負西山招手喚。更愁凍餒隨妻子，瘦骨伶丁淪棄扇。

滌非惠詩，其言甚苦，次韻慰之

俳諧秋興曲，辛苦後山詩。哀樂誠超俗，丘軻自待時。大人能變跡，老婦倒綳兒。劣得紙田在，滌非舊有「況乃紙爲田」句無勞百所思。

春來無作，佩師見問，因呈　　蕭滌非

爲報先生道，春來未有詩。半生不死地，多難寡歡時。遶樹猶三匝，臨巢又一兒。祗應牛馬走，前路了無思。

戲贈蕭慶年，叔玉長女公子也

不作嬌羞態，還餘爛漫風。親人形孺慕，倒峽見辭雄。飲水羌爭渴，由窗徑願通。慶年窺樓窗曰：「此捷徑也，吾欲躍下矣。」下樓頻復上，自笑百忙中。

華　年

明眸皓齒駐春魂，一笑能令斗室温。卻憶麗沙留片影，意人達文齊畫麗沙微笑像，今存巴黎羅浮

宦，傑作也。到今賺得百思存。

玉潤珠圓出自然，稱身裁剪映華年。街頭兩姝連肩擁，一段天眞我最憐。

客倦次公權韻 成都作

客倦藏蝸角，蓬蓬昧遠春。敢言天下事，怯對眼中人。儒服隨時斂，翻潮逐日新。四方何所騁，堪嘆贅餘身。

客倦　　蕭公權

客倦猶能望，樓高好送春。飛花搖落日，流水勸羈人。猿鶴消沈舊，雞蟲得失新。江山無是處，着此亂餘身。

賀金拾珊、張弢英婚禮

舊業說金張，新婚膠漆行。同窗研貨殖，二君俱應留學考試負笈治梯航。錦水明雙璧，中秋豔畫堂。遙期共圓月，額手舉壺觴。時將去成都

贈石蓀 成渝道中作

不惜齒牙惜羽毛，淸辭剛膽擅吾曹。揄揚寸善花堆舌，叱咤千人氣壓濤，報國書生何忼慨，緣情曲子近風騷。難忘促膝傾筐篋，半日醺然勝飲醪。

贈單五傳淵 重慶作 傳淵讀律於四川大學，暑中至涪陵販牛歸。

兒童奔走告，高唱單哥來。爲說殷勤覓，方如雲霧開。相牛騰舌辯，讀律有心裁。五萬探囊出，相邀要一回。

健吾以振鐸所貽舊紙來索詩書，不成行，輒易一幅應之 卅六年北平作

堪羨逢場能作戲，八年哀樂過於人。山河有怨憑君訴，卻頌和平孰與陳？《山河怨》、《和平頌》皆健吾所作劇本

鄭先贈紙古香色，千里郵筒密裹來。破筆塗鴉不成列，換將素幅俗堪咍。

慰堂墜車折臂，養痾滬上，寄示舊作。并承贈詩，即次見贈韻

分手三秋物屢遷，蕭牆戰鼓聽填填。不堪屈指米煤價，可以療飢珠玉篇。玄覽庫鈔勤播印，千元皕宋看排編。慰堂長中央圖書館，主印四庫珍本叢書及玄覽堂叢書，館中有皕宋千元萬明之齋儲藏善本，散見諸詩及識語中。折肱盡瘁光家國，但問耕耘莫問年。

慰　堂

不忮不求物外遷，無華悃愊貌填填。一家注補經典集，原注：君作經典集語，頗有勝義。萬口爭傳《背影》篇。燈火秦淮成故事，烽烟歐陸待重編。原注：君著有《歐游隨筆》。何時古月圓前夢，記否滄桑已廿年。

紹穀伉儷北來，同遊香山靜宜園，話舊奉贈

向平累減事清遊，眷屬如仙故國秋。好是無風白日靜，香山紅葉足凝眸。

平仲與人久不忘，卅年無改舊時裝。車行亦有崎嶇處，回策如縈氣自揚。

夜不成寐，憶業雅老境一文，感而有作，即以示之 卅七年北平作

中年便易傷哀樂，老境何當計短長。衰疾常防兒輩覺，童眞豈識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親友時看星墜光。筆妙啓予宵不寐，羨君行健尙南強。君籍湖南

贈程硯秋君及高足王吟秋君

二月十四日夕，清華同仁眷屬聯誼會春節團拜，約程清唱《鎖麟囊》，王演劇。主其事者，囑作詩以謝。

韓娥歌哭入雲深，老幼悲歡不自禁。今夕琳琅聞一曲，千人忘味各沈吟。

盛年頭角已崢嶸，雛鳳清聲滿座傾。不負苦心傳妙緒，程門此子最能鳴。

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之一

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

(全二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插頁：(精) 10　(平) 2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4.875　字數 489,000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精) 1—1,600　(平) 1—11,100

統一書號：10186·283　定價(七)：(精)3.70元　(平)2.95元

（全 二 册）

统一书号：10186·283
定 价： 2.95 元